

图瓦历史与经济概述

[苏] P. 卡 鲍 著

K25/2

图瓦历史与经济概述

〔苏〕P. 卡 鲍 著

辽宁大学外语系 俄语专业七二年级工农兵学员译
翻 译 教 研 室 校

本书是供内部参考用的，写
文章引用时务请核对原文，
并在注明出处时用原著版本。

首都师范大学图书馆



20630286



商 务 印 书 馆

1976年·北京

630286

Р. Кабо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И ЭКОНОМИКИ
ТУВЫ**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социаль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осква, 1934, Ленинград.

内部发行

图瓦历史与经济概述

[苏] P. 卡鲍著

辽宁大学外语系俄语专业七二年级工农兵学员译
翻译教研室校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8 1/4, 印张 1 插页 210 千字

1976年4月第1版 1976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 11017·371 定价, 0.87 元

出版说明

图瓦即唐努乌梁海，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的西北，原为我国领土。汉时为坚昆部属地；唐时为黠戛斯（哈卡斯），以其地为坚昆都督府，隶属燕然都护府；元时为吉利吉思（吉尔吉斯）地；明以后为乌梁海部落所居，境内有唐努山，因称唐努乌梁海；清时于1727年与俄国签订了《中俄布连斯奇条约》，规定以萨彦岭为界，唐努乌梁海地区为中国领土，归乌里雅苏台定边左将军管辖；民国时会设置唐努乌梁海参赞，统辖其地。1914年，沙俄强行侵占唐努乌梁海，中国于1919年收复。1921年，唐努乌梁海宣布“独立”，中国历届政府从未予以承认。1944年，苏联将该地并入俄罗斯联邦。目前，唐努乌梁海已成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下属的图瓦自治共和国。

本书出版于1934年，全书分为两部。现在翻译出版的是第一部，主要内容为图瓦的自然条件和社会经济制度、乌梁海民族的形成、沙俄帝国主义在政治上、经济上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侵略和乌梁海地区沦为沙俄殖民地的历史过程等。

本书作者在叙述图瓦历史时，肯定了“图瓦是中国的一个遥远边区”，乌梁海人的古代祖先“哈卡斯人的国家是中国的附属国”。十八世纪中叶，清朝为了加强在乌梁海地区的统治，在该地区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军事行政组织，“将原有王公封地改成军事单位‘旗’”，“这些部落的王公都服从《中国理藩院则例》……规定的法律”，一些重大案件“都要在乌里雅苏台进行审理”。乌梁海地区的“总管在乌里雅苏台和北京为了巩固官位，获得赏赐（顶珠、黄马褂、封号等等）而进行大量贿赂”。因此，“在图瓦的发展上反映

了中国社会制度的特点——满族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制”。

在十八世纪前，乌梁海人是在叶尼塞河上游的米努辛斯克草原从事游牧的，作者揭露说，“在俄国人进逼下，大批撤离米努辛斯克”，“他们想要不遭洗劫和奴役，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迁徙到萨彦岭以南，他们从前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去”。这就是乌梁海人历史上的十八世纪初的大迁徙，乌梁海人从此就在萨彦岭南定居下来了。在十九世纪中叶清朝政府经过鸦片战争、英法联军入侵后，力量大为削弱，帝国主义列强乘机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掠夺和压迫。沙俄帝国主义在侵占了我们东北、西北大片领土后，它的侵略魔爪就伸进了唐努乌梁海地区。作者针对沙俄的扩张侵略政策指出，当时俄国“除满洲之外，可以对中国施加压力的地区就是乌梁海”，采取“把俄国人无声不响地塞满乌梁海地区，以未经许可的方式占有这块土地”。“从1913年起，俄国政府在乌梁海边区设置了两个新代表：一个管政治，另一个管经济”，他们从政治上威逼各旗总管“申请”加入俄国国籍，从经济上则进行残酷掠夺，使乌梁海地区的劳动人民处于日益破产的境地。沙俄的行政官员“通过向图瓦统治者进行‘说服’和劝告……以便公开地、直接地吞并图瓦”。同时，“还编造了许多神话，说什么索约特人愿意当俄国臣民，服从‘白沙皇’管辖”。而且为了侵占我国一大片领土，在伊尔库次克的一次会议上竟不顾一切，公然提出“把我们地图上的边界移到唐努山脉”。沙皇政府采取的种种阴谋手段，“是为了能给这种占领披上一件‘自愿的’、和平并入俄国的外衣”，“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地掠夺一块属于中国的领土”。

沙皇俄国在乌梁海地区推行的是“俄国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他们掠夺、压迫的强盗行径与“侵占和欺诈”的手段，遭到了当地人民的激烈反抗。作者指出，图瓦人民不怕残酷报复，多次采取以“暴力反对暴力”的手段，“消灭和杀死那些最凶恶、最贪

婪的剝削者”，“抢劫俄国商站”，“萨拉吉克旗和托锦旗仍不承认俄国的保护”，他们又“开始同中国人洽谈重归中国的问题”，“吉尔吉斯人部落不仅本身奋起反抗俄国人的统治，而且还号召其他部落不要屈服”。当时北京的报纸对沙俄侵略我国的扩张政策也进行了抗议。

作者在撰写本书时引用了革命导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许多有关论述，同时以沙俄的历史档案资料，如内阁会议记录、大臣奏折、沙皇批示，以及一些殖民主义分子的自白作为例证，比较清楚地揭露了沙俄帝国主义的强盗嘴脸和侵略本性，作者指出，“图瓦过去的历史，同时也就是沙皇俄国殖民政策历史的一页”。但作者由于史料局限，对有些问题的叙述不全面，特别应该指出，作者关于中国对唐努乌梁海行使主权的资料，掌握不够，有些地方也存在着一定的偏见。但本书所提供的材料，对于研究沙俄侵华的侵略扩张政策，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目 录

序言	3
第一章 图瓦的自然条件	9
第二章 图瓦封建制度的基本特征	50
第三章 商业高利贷资本向图瓦的渗透	118
第四章 俄罗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及其在 图瓦的殖民活动	156
第五章 占领乌梁海	206
第六章 革命前的图瓦与沙皇俄国间的经济关系(关于不 等价交换问题).....	229
参考书目	242
人名对照表.....	265
地名对照表.....	269

序 言

3

图瓦人民共和国(从前的乌梁海边区)是人民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新型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它正在为逐步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奠定基础。这种新型国家的形成,是十月革命引起的殖民地民族革命的结果。

十月革命推翻了资本家和地主的统治,彻底粉碎了沙皇殖民帝国,使高举反帝反封建革命旗帜的图瓦人民得以充分发挥自己的积极性。

图瓦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把反帝斗争同反封建斗争结合在一起了。

这次革命当时面临着以下几项任务:

一、推翻外国(俄国)帝国主义压迫,争取民族与国家的独立。图瓦人民,就其成分来说是农民,他们与苏联无产阶级联合并在苏联无产阶级的领导下,通过同帝国主义代理人——温甘伦、巴基奇、卡赞采夫等高尔察克匪帮作斗争,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上述任务。今后,保卫独立、防止任何新的武装进攻威胁的使命,将通过维护和加强人民革命政权,维护和发展同苏联的兄弟关系而获得保证。

二、消灭封建阶级,拔掉封建主义老根,彻底清除社会制度中的农奴制的一切残余。具体地说,这次革命的资产阶级民主内容包括:消除国家的政治分散性;消灭封建土地所有制、封建牲畜占有制和各种非经济性的封建强制形式;取消喇嘛寺院的特权地位;创造本民族的文字,普及文化知识。

3

图瓦革命在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任务、发展生产力的同时，正在为逐步过渡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奠定基础。

4 现代图瓦对自己的经济、风俗习惯和文化正在进行革命的改造工作。

在图瓦人民进行的这一复杂而艰巨的改造工作中，给他们以力所能及的帮助——这就是本书的主要目的。

如能帮助读者正确地弄清楚下列问题，本书预期的目的也就达到了。这些问题就是：现代图瓦的社会生产制度如何；当地居民由哪些基本社会阶级组成；这些阶级之间的关系怎样；哪些力量坚持走革命的发展道路；哪些力量持敌对态度，等等。对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社会经济结构有一个明晰而正确的理解，是完成现阶段各项最重要任务的一个必要前提。

然而，要确定现代图瓦的国民经济发展的类型以及保证这一发展的那些阶级力量，除了历史地观察问题，在运动中、在斗争中、在矛盾中观察所研究的对象，是没有别的途径的。今天的各种矛盾和斗争，同昨天、同往昔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马克思曾说过：“在历史发展的每一新阶段上，前一时代的生产力都充当着创造新生产力和新社会制度的原料。”^① 如果将图瓦革命前夕形成的生产力水平和社会经济结构作为出发点，并且观察它们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形成的，那就可以对现代图瓦的革命斗争和建设的具体任务获得一个正确的理解。图瓦人民共和国的经济特点和民族风俗习惯特点，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也都是容易理解的。这就是作者为什么在本著作的第一部用全部篇幅来研究革命前图瓦的缘故。此外，图瓦过去的历史，同时也就是沙皇俄国殖民政策历史的一页，是象图瓦人民那样给沙俄当俘虏和殖民地奴隶的许多民族遭受奴役和获得解放的历史的一页。

^① 作者未注明出处，译文是按词面译的。——译者

图瓦过去的历史还具有更为普遍的理论意义。因为图瓦所走过的殖民地道路，就是现在亚非许多跟过去乌梁海大致处于同一发展阶段上的国家与民族正在走着的那条道路。当然，沙皇俄国同其所属各殖民地之间的相互关系各有特点，但是，抛开这些特点，我们总还可以得到那些仍然处于帝国主义压迫下的殖民地民族在发展上的某种带有共同性和典型性的东西。

因此，作者希望本书的第一部，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帝国主义理论的历史例证，能同本书的第二部一样，成为一本有益的⁵书。本书的第二部将论述现代图瓦问题，它将说明已经摆脱了帝国主义压迫的殖民地，在苏维埃共和国这一强大的社会主义中心存在的条件下，可以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这种学说的例证。

最后一点，作者认为本书无论就其宗旨，还是就其写作方法而言，在总体上是一部经济地理性质的著作。作者撰写这部书，是以研究图瓦人民共和国经济发展的特点为宗旨的。在这一方面，作者必须牢记列宁、斯大林如下一些十分重要的指示：“在共产国际给各国工人运动作出指导性的指示时，一定要估计到每个国家的民族特殊的东西和民族独有的东西；”“使共产国际的一般原理适应于各个国家的民族—国家的特点……。”¹

列宁曾经不止一次地指出过：在运用共产主义的一些基本原则时，一项最重要的任务是“当每个国家采取具体的途径来解决统一的国际任务……的时候，都必须考察、研究、探索、揣测和把握民族的特点和特征”。²

要想了解个别国家的特点，无论这个国家是帝国主义国家还是其所属殖民地，都毫无必要直接或间接地去乞灵于任何一种“有利位置”论，不管这种理论是已有的还是新炮制出来的，因为上述

1 斯大林：《论反对派》，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473—474页。

2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4卷，第246页。

这种特点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一般理论的基础上能够得到唯一正确而且是详尽无遗的解释。经济、文化、风俗习惯方面的民族特点是长期历史发展的产物。

按照经济地理学这门科学的要求，作者是十分重视自然条件的。因为，自然条件是客观所提供的生活条件，每个国家的经济发展都是在这种生活条件下进行的，而且这种生活条件在被利用于经济领域的时候，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经济发展的民族独特形式¹。

每一部以研究基本规律表现形式为主的经济地理学著作，都应以马克思的下述方法论原则为基础：“相同的经济基础——按主要条件来说相同——可以由于无数不同的经验的事实，自然条件，6 种族关系，各种从外部发生作用的历史影响等等，而在现象上显示出无穷无尽的变异和程度差别，这些变异和程度差别只有通过对这些经验所提供的事实进行分析才可以理解。”²

作者在撰写这部著作过程中是始终严格遵循着这一指示的。至于他在这一方面究竟做到了多少——那就不应当由他来判断了。

本书在地名的音译方面，与从前出版的那些有关图瓦的著作相比，有许多不同之处，当时那些著作家还不得不按蒙古或俄国表达习惯音译地名，因为在1930年前图瓦没有本民族的文字。我们在本书中采取的音译则注意到现今通行的图瓦文字的经验，但是，为使用方便起见，我们对某些业已固定的地名沿袭使用，未加改动。

1 “在国和国、省和省、甚至地方和地方之间总会有生活条件方面的某种不平等存在，这种不平等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永远不可能完全消除。阿尔卑斯山的居民和平原上的居民的生活条件总是不同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34卷，第124页，《恩格斯致奥·培培尔》）

2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3卷，第892页。

本书是应“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科学研究协会”的要求而撰写的，作者在写作本书的各个阶段都曾得到“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科学研究协会”的大力支持与协助，该协会并使作者能够作为它所组织的图瓦考察团的成员于1930年和1931年两次前往图瓦旅行。这里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协会领导人Л. Д. 波克罗夫斯基同志和捷列日尼科夫同志那种始终不渝的同志友情，他们曾提出许多宝贵指教，帮助作者完成这一著作。由于中央档案管理局的协助，作者才能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两地的档案里搜集到那些必需的资料。图瓦学家—语言学家帕利姆巴赫在确定图瓦地名的正确音译方面曾给予宝贵的帮助，И. Г. 萨菲亚诺夫同志让作者使用其私人文献与照片，为此，作者谨向他们致以热烈的感谢。

P. 卡鲍

1933年7月10日

第一章 图瓦的自然条件

7

地理位置。地形。矿藏。气候。上叶尼塞盆地。土壤。发展农业的自然条件。森林。图瓦地区的基本类型。

这本研究图瓦的著作，其历史与经济部分之所以从叙述自然条件、从描写地理环境所借以形成的各种不同因素及其相互关系谈起，是因为我力图以这样一种开头来实现马克思的如下教导：“任何历史描写，都应以这些自然基础及其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人的活动而引起的变更为根据。”^①我认为，对于所谓“地理因素”这个问题的理解，马克思主义同一切假马克思主义或者公开的资产阶级主张之间的真正分水岭，绝对不象某些著作家所断言的那样，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著作或经济著作中，不应连贯、系统地描写地理环境。这两个派别之间的区别实际上并不在于这一派要这样描写，那一派不要这样描写。它们的区别，是对地理环境与社会运动内部规律在历史发展中的相互关系的不同理解。

这种差别，可以用最简洁的方式概括如下：“地理因素”派主张，社会运动基础是地理环境特点，并企图根据这些特点来说明该社会的历史发展过程；另一派则认为，历史的真正动力是社会原因，而不是自然地理原因。

只有研究按照自己内部规律发展的社会制度，才能理解社会制度与地理环境之间那种现实的相互关系。人变革自然界的进程，是在一定的社会形式之内并借助于这种社会形式进行的，而这类变革则根源于社会生产制度，因而也根源于阶级社会，根源于

^① 未注明出处，按词面翻译。——译者

“各阶级的生活状况和生活条件不同”^①（列宁）。社会阶级斗争反映着阶级社会经济结构的运动规律。只有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来理解历史过程，才能对地理环境与社会生产制度之间的互相关系获得正确的理解。

上述论点应用于图瓦具有以下两层意义：首先，它从根本上排除了以自然条件不利和自然资源贫乏来解释这个国家的落后及其历史发展条件恶劣的那种可能性；其次，它确证了这样一条原理，即十月革命以后在图瓦面前展现出来的发展经济与文化的新的远景，绝不会受到自然条件方面的阻碍。对图瓦自然条件进行系统缜密的研究，必然会发现非常广泛的生产潜力和极其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些生产潜力和自然资源迄今为止一直没有发挥作用，只有在阿拉特^②共和国革命后才能加以利用。

* * *

图瓦人民共和国差不多是在亚洲大陆的中心，地处叶尼塞河上游，其纬度在 50 度与 54 度之间。因此，图瓦南部与萨拉托夫、沃罗涅什、库尔斯克、契尔尼哥夫等城市处于相同的纬度。

图瓦的面积约有十五万平方公里（按整数计算）。¹ 从西到东最大长度为七百四十五公里，从北到南为三百八十里。

图瓦这块地方，就其边界线所围成的形状而言，大体上象一只

① 未注明出处，按词面翻译。——译者

② 俄文为 *апар*（蒙古语），指平民，劳动者，牧奴，牧民。——译者

1 上叶尼塞河盆地各个地区的面积如下：

1. 贝克木河流域	47,340 平方公里
2. 哈克木河流域	46,650 平方公里
3. 乌鲁克木河流域（从贝克木河与哈克木河汇合处到图瓦边境一段）	48,510 平方公里
4. 特斯河流域（图瓦境内一段）	7,450 平方公里

（摘抄件第 85 号）第 1 部分第 51 号，科斯京著，1922 年版，藏于米努辛斯克博物馆。

某些文章说是 175,000 平方公里，我不知该数字是怎么得来的。

尖端朝西的梨子。

地处叶尼塞河流域上游的图瓦，是一个盆地，周围群山环绕，北面是东、西萨彦岭，南面是唐努山。上叶尼塞盆地属于从里海到鄂霍次克海横贯亚洲的东亚高原的一部分。确切些说，它是东亚高原的偏低部分，是西伯利亚洼地向蒙古高原过渡的一个阶地。图瓦最低部分海拔为 505 米，而距图瓦北部山地约 50 公里的西伯利亚洼地海拔高度却只有 274 米。¹ 如果说从西伯利亚平原往南到蒙古高原第一级阶梯是萨彦岭的话，那么第二级阶梯便是唐努山了。唐努山是北冰洋与蒙古被封闭的盆地之间的分水岭。

被萨彦岭和唐努山两条边境山脉围绕的图瓦盆地，又被这两 9 大山脉的各条支脉所切割。西萨彦岭，特别是东萨彦岭，全是原始森林地带。东、西萨彦岭要比南面的唐努山高得多。唐努山的山口，比萨彦岭的山口较易通过，而且山口数量也较多。因此，从南边到图瓦盆地去，比从北边去要容易些。图瓦位于亚洲中心，因此远离海洋。按直线距离计算，离图瓦最近的海是东海海湾，但却被蒙古和中国隔断。叶尼塞河虽把图瓦同北冰洋连接起来，可是，它从发源地起，要经过 3,786 公里才能注入北冰洋。

图瓦好象是被装进了石头袋子那样封闭着的。但是，使图瓦同世界各个文化中心隔绝的，使它在历史上一直处于落后、无所作为地位的，并不是难于通过的丛山峻岭，不是无边无际的草原，也不是晒得炙热的沙漠。地理位置，这不仅仅是一个自然地理概念，而且也是一个历史概念。它随着社会历史情况的变化而变化。

为了对图瓦的地理位置有一个正确的理解，就必须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况，即图瓦千百年来一直被夹在世界上两个最大的专制帝国——博格德与俄罗斯中间。

图瓦南邻蒙古，蒙古由于帝国主义者以及本国王公、寺院和高

1 卡卢泽斯：《神秘的蒙古》，1914 年版，第 104 页。

利贷者残酷无情的剥削，其经济与文化发展的水平极低。图瓦北面，在萨彦岭以北，是十七世纪俄国沙皇占领的极其落后的西伯利亚边陲。沙皇政府的殖民政策已使这个地区的土著居民哈卡斯人遭到破产，陷于贫困。

山峦和沙漠依然如故，还是几十年几百年前的老样子，图瓦也仍然位于亚洲的中心并远离海洋交通干线，但是，不断啃噬的“历史田鼠”^①却把中国的博格德皇帝和俄国沙皇的宝座给彻底破坏了。这两个巨大帝国被革命风暴摧毁后，于是图瓦周围的社会历史情况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现在，图瓦南面是蒙古人民共和国，西面和北面是苏联的厄鲁特自治省、哈卡斯自治省和布里亚特蒙古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这些地区的经济面貌和社会面貌都在迅速地改变着。此外，再过几年，规模宏大的米努辛斯克-阿巴根工业枢纽（乌拉尔-库兹巴斯联合企业东方分公司）即将在紧靠图瓦的地区建立起来，该企业必将成为东方经济高涨与社会主义发展的强大杠杆。处于偏僻、孤独的死胡同里的图瓦，业已感受到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强大影响。

*

*

*

图瓦，如上所述，是一个宽广的盆地，四周群山环绕。西伯利亚两条河流——鄂毕河和叶尼塞河上游的分水岭赛留格木山是图瓦的西部边界¹。

^① 这个比喻出自莎士比亚剧本《哈姆雷特》。黑格尔曾用来象征其“世界精神”。无产阶级革命导师马克思在《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使用这个比喻来代表世界革命进程，俄国革命民主主义者赫尔岑也曾在这个意义上使用过这个比喻。——译者

¹ 格鲁姆-格尔日麦洛认为，赛留格木是一个地理学集合名词，指由赛留格木山与察布产山两个山脉所连接成的一个整体。他认为赛留格木山脉在珠卢库尔湖以东形成一个山结便终止了，因此，这个山脉仅仅北端进入现在的图瓦境内（见格鲁姆-格尔日麦洛：《西蒙古与乌梁海边区》，第1卷，第70—71页）。我主张仍把这个山脉称为赛留格木山，军事地形测绘团出版的40俄里地形图上，对这个山脉也是这样命名的。察布产山脉只是赛留格山脉的北翼。

赛留格木山在图瓦的西南边境上绕过楚立什曼河河源地区，同唐努山西部余脉结合，形成一个山结，有些山峰终年积雪。赛留格木山由此向西伸延，然后在克木奇克河左支流阿拉什河河源地区拐成锐角，向东伸延 50 公里，再朝北去，直到与萨彦岭山脉西端的塔斯克尔山¹相接。赛留格木山的整个山脉宛如一堵高耸的石墙，仅在个别地方有可以通行的山口。这些山口的位置也很高（察布产山口海拔 3,182 米，喀拉塔尔瑟罕山口海拔 2,441 米，苏尔山口海拔 2,407 米），两侧都是很陡峭的山坡。从西面即从厄鲁特自治省到山口去的路，比从图瓦到山口去的路更难走。

萨彦岭由彼此很不相同的两个部分组成，西部叫西萨彦岭，东部叫东萨彦岭。格林威治子午线东经 96° 为萨彦岭东西两翼的分界线。

无论从东萨彦岭的年代比较古老而言，还是从其岩石的性质来说，都可以有根据认为，萨彦岭山脉的两翼是两个山脉，它们是在较晚的地质时期结合在一起的。

西萨彦岭从低山脉塔斯克尔开始，首先向东伸延，在罕腾吉尔河（叶尼塞河左支流）一带拐向东南，然后再向东去，直到与叶尼塞河相遇。叶尼塞河穿过西萨彦岭，形成一道深谷，那里两岸陡峭，几乎到处都是悬崖绝壁，只有很少几个地方的河面上才看不到这种悬崖绝壁。² 这条峡谷称为博穆克木奇克³。西萨彦岭在叶尼塞河右岸的那部分，称为塔尔嘎克山和额尔吉克山，是乌鲁克木河同叶尼塞河右支流乌斯河之间的分水岭。西萨彦岭在叶尼塞河右岸上的这一部分，朝东北方向继续伸延，在快到北纬 54° 的地方同东萨彦岭会合。

1 塔斯克尔——即秃山之意。

2 格鲁姆-格尔日麦洛所著前引书，第 1 卷，第 90 页。

3 博穆——亚洲把高山构成的河岸称为博穆。

西萨彦岭，西起塔斯克尔山，东至与东萨彦岭会合的地方，时¹¹高时低，蜿蜒起伏，形成了一些由北往南的山口（沙宾达巴山口海拔 2,100 米，库尔图什宾山口海拔 1,850 米，等等）。

从前，从克木奇克河河谷经米努斯克赶牲畜的牧人，都是通过沙宾达巴山口的。

峰巅浑圆而不险峻的这条边界山脉，并无特殊的名称。下山的路比上山的路陡。一出山口，道路分成两叉：左边的路经过干燥的草原通往图兰村；右边的路直奔光秃秃的丘陵，通往乌尤克河上游俄国人的庄园。从图兰往下到乌尤克村的路全被踏得很平坦，可以走马车。

再往东，在昔斯提克木河的河源地区，山脉再度降低，这里是越过西萨彦岭的另一方便山口。萨彦岭的这段地势稍低地带有一条小路，叫阿梅耳小路，或叫昔斯提克木小路，这条小路在阿梅耳河河谷与昔斯提克木河河谷之间。

东萨彦岭，在我们的地图上称为额尔吉克塔尔嘎克山，是从萨彦岭两翼形成的山结起由西北往东南方向伸延。东西萨彦岭相接的地方是岩石重叠的高山，有些山的高度达到了雪线，有些山则超过了雪线。山北坡是雪原和冰川。格鲁姆-格尔日麦洛认为，此处山脉高达 3,000 米。

东萨彦岭是厚岩层山脉，有些地方岩层厚度达到 60 公里以上，在很长一段距离上没有突出的高峰，深邃的沟谷纵横交错。基于这一点，某些研究家认为：东萨彦岭是界乎典型山脉与平坦分水岭（例如雅布洛诺夫山脉或乌拉尔山脉）之间的一种中间类型的山脉。¹ 农学家什瓦尔茨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首先登上该山进行观察，其结论是：“萨彦岭的这一段丝毫不象山脉，它仅仅是一块没有突出高点的山地而已。”但是，山脉的西部还有一些童秃山，其

1 格鲁姆-格尔日麦洛所著前引书，第 1 卷，第 100 页。

高度甚至超过 2,800 米。¹

东萨彦岭的一些山口,相对来说,都很高(穆斯塔格山口海拔 2,104 米,蒙郭尔山口海拔 1,973 米,腾格斯山口海拔 2,116 米),上下坡度很陡,很难走,其中有几处山口,路上有很多沼泽、石块和大量倒下的枯树。南坡上的森林和草甸,其海拔比北坡上的高得多。例如森林线的上限,南坡上是 2,211 米高,北坡上是 2,013 米高;再如灌木林的最高线,南坡上是 2,470 米高,北坡上是 2,372 米高。

图瓦盆地,南面是以叶尼塞河流域与乌布沙泊^①水系之间的分水岭唐努山为屏障。唐努山的西端,经由低山脉萨干-西包塔同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赛留格木山结合在一起,其东部边缘(96°子午线以东)则与往西北方向伸延的岩石重叠的三格连山脉相接。

这样,唐努山西起巴尔雷克河(克木奇克河支流)上游,东至埃尔津戈拉河(特斯河支流)上游,全长 427 公里,象一道十分单调的高墙,北坡更陡,山脊平展,生长着草和灌木;山上还有一些宛如人工安上去的岩石重叠的山峰(秃山),其相对高度从 90 米到 152 米不等。²唐努山的宽度很不一致。例如,绍尔木克河和萨马加耳太河中间一段,总共只有 25 公里宽,而沙戈纳尔河与塔尔嘎雷克河中间一段的宽度,却达到 75 公里以上。

唐努山脉主要是沉积岩:砂岩、石灰岩和板岩,说明这条山脉原来是古代海底的一部分。构成这座山的易碎岩石,在大气和水的作用下,业已分化成一些山群。

虽然唐努山南北两坡都有树林,但还没有形成大密林,这些树林生长在草甸和草原中,象一个个岛屿。³唐努山没有终年积雪的

1 坦菲里耶夫教授:《俄国地理》,第 2 卷,第 2 册,第 155 页。

① Упса-нор 现名乌布苏湖。——译者

2 格鲁姆-格尔德麦洛所著前引书,第 1 卷,第 16、110 页。

3 同上,第 114 页。

高峰。在这条山脉的所有山口中，最容易通过的是哈马尔山口，车辆、骆驼商队和马帮早就在这里通行。唐努山在这里的高度大大降低，山口的海拔高度只有 1,409 米。这个山口，从乌鲁克木河河谷起，经过比尤连河（哈克木河左支流）上游，到蒙古境内的乌里雅苏台河为止。

其他几个山口虽然都很高（如无名山口海拔 2,161 米，巴音塔格内山口海拔 2,080 米，库普列山口海拔 2,360 米，浑杜尔贡山口海拔 2,131 米），但骑马和驮队都能通行，这就使整个唐努山脉都很容易通过了。

唐努山以东的上叶尼塞盆地南部边缘，是由许多山脉组成，其中有阿赞霍鲁姆山、三格连山、汗泰加山、乌兰泰加山、霍尔德勒萨尔德克山、巴音山。这些山脉迄今还很少被人们研究过，其中有些山脉，旅行家们尽管从远处看到过，但还未经攀登。然而现有的文献都说：这些山很高（海拔 2,400 米，甚至更高些），山脊呈齿状，山势险峻，山口高而陡，山坡岩石重叠。这些山脉从东南方向把上叶尼塞盆地包围起来。

位于萨彦岭和唐努山之间的上叶尼塞盆地，被这两大山脉的支脉分割成若干部分，这两大山脉是上叶尼塞河各支流之间的分水岭。

有人说，贝克木河、乌鲁克木河和克木奇克河河谷以北的山脉，都属于萨彦岭山系和赛留格木山系，而克木奇克河和哈克木河河谷以南的山脉，则属于唐努山山系。¹ 即使我们把这种划分图瓦
13 山脉的见解作为可靠的东西来接受，也还遗漏了贝克木河与哈克木河之间的一段山脉，这段山脉属于哪个山系的问题尚未有人论

1 这是著名学者修斯的见解。他的观点曾被格鲁姆-格尔日麦洛引用过。见《西蒙古与乌梁海地区》，第 1 卷，第 109 页（爱德华·修斯〔1831—1914 年〕是奥地利地质学家。——译者）。

及。盆地东部最大的一些山，是在哈木沙拉河河谷与贝克木河河谷之间，以及贝克木河河谷与哈木河河谷之间，并在这两个地方都占有很大的面积。

在贝克木河与哈木河汇合处以西，唐努山与萨彦岭相距颇近，这两大山脉的一些支脉在一些地方把乌鲁克木河河谷挤成了峡谷。再往西，在克木奇克河河源地区，有一些新的大山群，它们在这里构成了一个结构很复杂的山地。¹

除了山以外，还可以见到一些地势起伏均匀和平坦的地方，但是，具有水平面的平原却为数不多。

在贝克木河、哈木河以及它们的各支流河谷，可以见到一些具有水平面的平原，在这些地方，河流附近没有分水支脉，形成了一些往往有好几公里宽的广阔阶地。贝克木河各支流塔普萨河、乌尤克河、图兰河和昔斯提克木河河谷的情形尤其如此。在乌鲁克木盆地，特别是在该河左岸，大面积的平地较多，尽管这些向南延伸的平坦的或微向乌鲁克木河倾斜的平原有些地方布满了不高的小石岗。离唐努山越近，这些不高的小石岗便越来越连成一道道山岭。宽广平坦的山谷，在山岭与山岭之间继续延伸，缓缓上升，越往南越高²。

在克木奇克河中部流域最西面的盆地，平原较多。克木奇克河中游河谷的地形与乌鲁克木河河谷十分相似。³

平原面积及其地理分布情况，对于制订图瓦共和国发展经济的远景规划，具有重大意义。虽然具有水平面的显著平原为数不多，但在西部，甚至在东部，总还有足够的土地面积可供耕种。同时，还必须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况，就是对图瓦的考察，特别是从

1 格鲁姆-格尔日麦洛所著前引书，第1卷，第140页。

2 П. 克雷洛夫：《乌梁海地区旅行记》，第25页。

3 格鲁姆-格尔日麦洛所著前引书，第234页。

勘查新矿。

图瓦居民对铜的开采和冶炼，从远古时代就已开始了。出土的铜制的器具与兵器，就证明了这一点。在克木奇克河和查丹河两河一些支流发现了一些史前时期开采过的铜矿遗迹。这样的遗迹，在恰库利河流域和唐努山^①南坡，也发现了多处。

克木奇克河全部流域和乌鲁克木河流域部分支流河谷，铁矿的蕴藏量极为丰富。

非金属矿藏中，煤炭对国家发展工业的意义最大。在乌鲁克木河和贝克木河流域，从别格列达河到巴彦河的近一百公里的地段上，以及在哈克木河注入贝克木河的地方和距离塔普萨河口三公里的地方，煤炭产量是著名的。伊尔别克河和埃列格斯河河谷也发现了煤层很厚的煤矿。根据现有的不十分确切的资料可以断定，煤炭质量好，煤层也达到了开采所需的厚度。¹ 已发现的煤，其质量不亚于无烟煤。煤炭已露出了地面，所以并无开采技术上的困难。

在唐努山的南坡有多处云母矿。

唐努山南坡的塔尔嘎雷克河流域，岩盐蕴藏量很大；这里有一座盐山，叫图斯塔格山，全都是优质盐。位于乌鲁克木河以南高山草原的卡登湖和图斯湖，出产湖盐。

此外，考察过该地区的人还提到许多矿藏，如石棉、铍、石墨、大理石、菱镁矿、宝石等。

该地矿泉颇多：在哈克木河河谷，在哈木沙拉河流域以及发源于唐努山的各条河流的上游，都有碳酸矿泉、温水矿湖和硫磺温泉。

^① 原文在 Танну-ола 前有代表河的缩写字母 р., 疑为 хр. (山脉) 之误。
——译者

¹ 奥勃鲁切夫：《唐努图瓦共和国的自然资源》，载《新东方》杂志，1926年第13—14期，第268页。

昼夜气温差和年气温差大,平均降水量少。然而,图瓦不同地区的气候条件,彼此差别也很悬殊。因为这个地区的气候条件在植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所以气候差别表现为从很近似极地苔原带的高山苔原向几乎全由旱生植物组成的草原植物逐步过渡。¹

为了说明图瓦气候的特点,最好是以图瓦共和国的气候同东西相邻地区的气候条件进行对比。为了进行这种对比,农学家图尔恰尼诺夫选择了下列各气象站的观测资料:西部的阿巴根种马场气象站,东部的芒得气象站(在库苏泊湖畔),位于萨彦岭以东的通卡气象站(在伊尔库特河河谷中),以及乌辛斯科耶村气象站。通过对这些气象站的观测资料进行比较,发现图瓦的年平均气温比萨彦岭以东和以西各地的年平均气温低 2° 。下列情况也很有趣:即春季从西往东移,秋季反过来从东往西移,这种季节移动的一般规律,在图瓦土地上被破坏了。由于图瓦盆地处于被隔绝状态,四周为山峦环绕,所以这个地区同东西邻区相比,秋天来得早,春天来得晚。在降水量方面,图瓦与其毗连的各地区也大不相同:图瓦植物生长期内的降水量,要比其他地区少93毫米。看来这是由于雨雪受到萨彦岭山峦的阻隔,进到图瓦时已经大大减少了。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由于图瓦平均气温低,水分蒸发量也小,因此,可以说降水量的绝对减少并无重大影响。

只要看一看图瓦地图,也就可以找到图瓦气候条件多样性的原因了。图瓦盆地,北边是萨彦岭的潮湿地带,南面是干旱的蒙古沙漠。另外,地貌的多样性,也是其气候条件变化剧烈的原因之一。这些共同的原因,一方面告诉我们,为什么北部、东北部同南部、西南部之间的气候差别那么大;另一方面也告诉我们,为什么山区和低地虽处于同一纬度上而其气候却不一样。

首先,弄清图瓦四周山脉对图瓦气候条件的影响,是很重

1 格鲁姆-格尔日麦洛所著前引书,第1卷,第409页。

要的。

研究图瓦的学者罗杰维奇写道：“假如没有唐努山的话，图瓦
17 就跟南面的蒙古沙漠连成一片了。反过来看北面，在西萨彦岭降
低的地方（在叶尼塞河以东），气候相应就变得比较严酷，而在西萨
彦岭升高的地方，例如在克木奇克河河谷，气候就温暖干燥些。总
的说来，在乌梁海，还是北风和西北风多于干燥的南风，因而给这
个国家带来了足够的降水量；多水的叶尼塞河正是从这个地方发
源的。”¹

但是，北风不仅带来了水分，也带来了严寒。同时，在北半球，
阳光对南面山坡的照晒强度，比对水平地面尤其比对北面山坡的
照晒强度要高。由此可以理解，为什么南北两面山坡的植物会大
不相同：北坡覆盖着原始森林，而南坡却长满了草原植物。图瓦和
所有山国都具备的这一特点，在畜牧业游牧经济对这些山坡的利
用上，也反映出来了。

沿着叶尼塞河河谷及其各支流的方向，从上游开始观察，便可
看到图瓦气候按照它的上述地势特点逐渐变化的情形，因为图瓦
盆地底部就是沿着这个方向逐渐降低的。

四季气温统计表

	春季	夏季	秋季	冬季	植物生长期
西部地区	4.3	16.3	3.3	-24.6	10.3
东部地区	2.9	13.0	2.5	-19.6	7.8

对待上面援引的资料，必须极其慎重，因为这些资料是以一些
简要记载为依据的；将来积累了足够的资料，甚至可能证明这些资
料是错误的。不过，这些资料还是把平均温度的相对差别表明了。

1 罗杰维奇：《乌梁海边区及其居民》，第 144 页。

西部地区的全年气温高于东部地区，然而西部地区的冬季却更为寒冷。西部地区的总降水量平均不超过 300 毫米，东部则约为 400 毫米。东部地区植物生长期的降水量，要超过西部地区的平均降水量。此外，东部地区由于致密质岩广泛分布于底土中，使水分很难渗入地下，所以沼泽土壤颇多。从下列资料可以看出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一年四季降水量的差别。东部地区全年降水量的分别情况是：春季 10%，夏季 63%，秋季 9%，冬季 18%；植物生长期 73%，即差不多占全年总降水量的 3/4。西部全年降水量的分别情况是：春季 14%，夏季 56%，秋季 14%，冬季 16%；植物生长期 70%。同西部地区相比，东部地区的春天干燥，夏季雨多，冬天雪多。西部地区由于降水量比较平均，而且春季比较湿润，夏季雨水也不那么多，所以农业收成比东部地区可靠。在图瓦，绝大部分雨雪是落在从东西两面环绕这个盆地的山上，只有一小部分是落在洼地里。同时，有不下半数的降水量，从图瓦盆地，经由克木奇克河口以下的山口，流进西伯利亚洼地。

根据这个地区地形和土壤的一些特点可以看到，来自西方的降水在图瓦境内总要经过三次消耗：潮湿的西风，先在西萨彦岭留下大量水汽，再经过酷热的干旱草原上空，吹到翁都特山（在贝木河与哈木河之间），在这里与冰冷的山巅相接触，又留下一部分水汽；最后才把剩下的一部分水汽吹送到萨彦岭的东部。¹ 对植物生长期最低温度的观测，提供了图瓦东西两地区气候比较的极为重要的资料。这些资料表明：东部地区在六、七月份，即禾谷开花季节，气温有时降到 0° 以下，甚至在七、八月份，在西部地区根本没有霜冻的时候，东部地区却已经出现了零上 1° 到零下 3.7° 的轻微霜冻了。秋季最低气温的比较表明：东部地区的秋季最低气温低于西部地区，并且霜冻早来一个月。根据这点可以得出结

1 图尔恰尼诺夫：《关于 1915 年乌梁海边区的报告》，第 20 页。

论：东部地区的春季来得迟；夏季比西部地区短，来得迟，结束得早。在图瓦西部的克木奇克地区，春季要早来两个月，秋季则晚来半个月。可是，无论在东部地区还是在西部地区，这两个地区内部各地之间的差别也相当大。这里首先可以提出东部的贝克木河的河源地区即台地的最高部分。

贝克木河河源地区，可以说是气候十分严酷的地区。整个夏季阴云密布，并且夏季降水量颇大；秋季短而多雨；冬季酷寒少雪——这就是该地四季气候的特点。由于土壤浸透了水分，冬季冻土层相当厚。在贝克木河及其上游各支流发源地平坦高原的影响下，冬季的严寒更加酷烈，因为在其他条件下，平坦地带冬季要比同样海拔高度的那些个别的山冷得多。如把自然地理因素综合起来就能够明白：为什么叶尼塞河发源地区的台地在海拔不过2,000米的地方却具有极地荒漠的严寒特点。

19 位于贝克木河河源以下、贝克木河与哈克木河之间的山区，具有以下特点：夏季降水量丰沛、淫雨、多雾；冬季降雪比图瓦其他地区多，而且比较寒冷。

一年四季降水量丰沛，所以“此地草木特别高大”。¹ 这个地区几乎到处是森林。

乌鲁克木河河谷、贝克木河与哈克木河流域以及克木奇克河河谷林带以下的气候，是比较明显的大陆性气候，具有昼夜气温差和年气温差都特别大的特点：夏季酷暑高达摄氏40°，而冬季气温则常常降至摄氏零下30°—35°。同林区相比，这里的降水量也很少。如不进行人工灌溉，对经营农业来说，夏季的降水量那是不够用的。

这里，秋天到来时已是九月上半月了，到六月初才算完全进入春季，尽管河流解冻要早得多。在图瓦的这个开化最早的地带，夏

1 格鲁姆-格尔日麦洛所著前引书，第1卷，第413页。

季一共只有 80 天，冬季却不下 170 天。冬季气候异常干燥，雪刚降下来就被蒸发掉了（此地冬雪本来不多）——这就使当地可以终年靠草地上的牧草来饲养牲畜。¹

降水量最多的地区，除了上述地区外，还有克木奇克河与楚立什曼河（在卫拉蒂亚）之间那些分水岭的东坡，塔斯克山与叶尼塞河河谷之间和叶尼塞河河谷以东的西萨彦岭南坡，以及唐努山脉及其支脉南北两坡。

关于唐努山脉必须指出的是，它的某些山岭比同它相对的萨彦岭要高得多，所以北风和西北风能够经过萨彦岭上空把水分送到这里。唐努山脉南坡降水量所以丰沛，是由于该山脉的特点决定的，这条山脉形状颇象一堵宽大的长堤，中间有许多宛如人工安上去的高高的秃峰，乌云集聚于秃峰之间，将雨雪降到这个山脉的南北两坡上。² 这些地区降水量丰沛，适于木本植被生长，所以图瓦的这些地区在地图上具有跟林区相同的标志。

这样，上叶尼塞盆地尽管面积较小，但在气候方面却有许多变化，从东往西和由北向南，气候由湿润变为比较干燥。

由于降水量的这种分布情况，乌鲁克木与克木奇克两河南岸，即这两条河流同唐努山之间的地带，便成了图瓦最干燥的地区。克木奇克河河谷，北、南、西三面以群山为屏，气候最为干燥。

20

英国著名旅行家卡卢泽斯在一篇综述图瓦气候条件的文章末尾这样写道：“我看，森林跟草原好象在互相竞争的地区，最适于殖民。这个地区，既不十分干燥，又不特别潮湿，呈一带状，横贯图瓦盆地中部。”³

*

*

*

1 格鲁姆-格尔日麦洛所著前引书，第 1 卷，第 413—414 页。

2 同上，第 410 页。

3 卡卢泽斯所著前引书，第 118 页。

落在山上的雨雪水分，在萨彦岭和唐努山山坡上被森林截住，形成许多小的水流，这些小水流又汇合成大小溪流，最后形成了上叶尼塞河河系。贝克木河（从它跟哈木沙拉河汇流处以下叫作乌鲁克木河）的干流，沿着图瓦盆地总斜坡¹从东向西流，进入博穆克木奇克峡谷，在这个峡谷中，从海拔488米的高度降到海拔275米的高度，然后折流向北，进入西伯利亚平原。乌鲁克木河、它的河源和它的主要支流²哈木沙拉河、克斯提克木河和克木奇克河在整个夏季可以收集山坡上流下来的雪水和雨水，所以，一般说来，都具有水源丰富的特点，枯水季节是早春和秋季。贝克木河（特别在哈木沙拉河注入其中以后）和乌鲁克木河，可以算作大河：其宽度，从106米（在山区内）到640米（在草原上）不等。普遍深度有好几米，为数不多的几处浅滩，最浅的时候也到0.79米，而夏季平均深度为1.07—1.49米。上述其他河流也都相当大，其宽度从85米到215米，甚至更宽一些，但其浅滩的最浅处为0.26—0.64米。

叶尼塞河上游的全部支流，就其性质而言，都属于山地河流，它们的河床多半由岩石和砾石构成，流速颇快——时速不下7.5公里。有些支流流经狭窄的谷地，有时常常流经长满树木的峡谷，这一类河流中岩石和石滩很多，有时还出现一些急流；有些支流则流经草原谷地，其河流肆意漫衍，分成一些河汊，形成一些低低的河心岛屿。

上叶尼塞河的河水绝大部分来自贝克木河与哈木沙拉河的河源地区。萨彦岭最湿润的地带是从这里经过的，这里还耸立着东萨

1 为了判断上叶尼塞河河谷从东到西的倾斜度，我们引用了下列数据：

贝克木河对奥克木河口口的绝对高度	1,066 米
哈木沙拉河河源台里湖的绝对高度	1,282 米
台里湖在与哈木沙拉河相连处绝对高度	635 米
乌鲁克木河在克木奇克河口绝对高度	488 米

2 所谓主要的，是指流域与水量而言。

彦岭和唐努山东端的终年积雪的高峰。此外，图瓦盆地东部的高地还布满无数湖泊，这些湖泊是在冰川后时期的冰退去以后形成的，湖水都流入贝克木河与哈木沙拉河。因此，唐努山和萨彦岭弯曲部分形成的半圆形山峦的西坡，就成了上叶尼塞河三个主要源头即贝克木河、哈木沙拉河和哈木沙拉河的发源地。这些河流把发源于萨彦岭和三格连山等山脉的无数支流聚合到一起，然后向西流去，直至汇合成乌鲁克木河。¹ 相反，主要发源于唐努山的乌鲁克木河支流，由于流经一个夏季气候干燥、炎热的开阔地带，河水颇少，又因灌溉农田用去一部分水，所以等到流入乌鲁克木河的时候，已经消耗了很大一部分。其中，乌鲁克木河的主要支流克木奇克河发源于得不到丰富降水补给的山坡。克木奇克河一些支流的发源地唐努山北坡，要比萨彦岭南坡干燥得多。

乌鲁克木河支流中那些发源于萨彦岭的河流情况更是如此，由于山靠近河谷的缘故，这些河流的集水面积很有限。

上叶尼塞河河系流经萨彦岭、乌京斯克奥真山和克木奇克山等横山脉的河床，还远远没有形成。乌京斯克急滩、克木奇克急滩、充满河床的大量石块以及这些河流所特有的石坎和急流，都足以证明。上叶尼塞河由于尚处在积极形成河床和冲刷河床的时期，所以有急剧的落差，这条河流的落差为每公里 0.89 米到 1.50 米，而欧洲河流的落差每公里才 0.06—0.21 米。

上叶尼塞河河系拥有巨大的水力发电能力。利用这个河系的水力可以发电几百万瓩，并且成本很低。

但是，上叶尼塞河流域作为水路运输干线，却并不十分方便。乌鲁克木河整个流域、哈木沙拉河下游(由河口往下约 100 公里)和贝克木河(哈木沙拉河口以下)显然适于船只航行。其中，关于贝克木河适于行船的说法，在一定条件下才是正确的。因为该河从

1 卡卢泽斯所著前引书，第 113 页。

乌尤克河口到谢比村近 100 公里的深水航段，特点是山地河流水势湍急，河床中有大量石块、石滩，更主要的是，乌京斯克奥真山脉以险峻的乌京斯克急滩切断了航线，使船只无法通行。贝克木河与乌鲁克木河的下游流经草原地带，所以流势比较缓和，也没有石滩、急滩和石块，然而，河床却在某些地方分成许多河汊，从而形成了大量浅滩。这就为船只通行造成了很大困难，尤其在枯水季节²²（接近秋天的九月份）。沿克木奇克河、昔斯提克木河与哈木沙拉河，倒是可以浮运不大的木排，虽然这三条河流水势湍急，河床多石而且河汊很多，会给浮运木排造成困难。¹

叶尼塞河以及同叶尼塞河河系有联系的大量湖泊的活（流动）水总面积是很可观的。图尔恰尼诺夫根据罗杰维奇工程师、克雷洛夫、卡卢泽斯、奥舒尔科夫提供的资料和他本人的观测结果，作了一个粗略的统计。据他统计，经过测量的河流总面积如下：

主要河流总面积	319.00 平方公里
克木奇克河各支流面积	8.70 平方公里
乌鲁克木河各支流面积	1.85 平方公里
哈克木河各支流面积	19.05 平方公里
贝克木河各支流面积	27.45 平方公里
四大河系二级支流面积	17.11 平方公里
共计:	393.16 平方公里

湖泊总面积，除咸水湖和所有无排水渠道的小湖泊外，共为 532.83 平方公里。

这样，河流与湖泊的总面积是 925.99 平方公里。

如此广阔的水域，如果考虑其经济利用的首要条件时，首先必须注意到该盆地的丰富鱼产。在这一时期，渔业几乎完全由夏季到图瓦来的俄国渔民劳动组合经营的时期，据极粗略的计算，每年每公顷水域（湖泊和河流）大约产鱼 12 普特。这个数字表明，图瓦

¹ 罗杰维奇所著前引书，第 5、80—81 页。

水体的鱼产极为丰富。

叶尼塞河上游,由于子午线位置与下游不同,其解冻期比下游提早一个半月。当叶尼塞河流域中游和下游河面还覆盖着冰层的时候,在南方的叶尼塞河上游,浮游生物就已开始生长和繁殖了。显然,鱼类为了寻找食物会毫无阻碍地游到上游来,由于这时在下游还不能捕鱼,这种情况就保护了上叶尼塞河的丰富鱼产免于枯竭。托锦地区繁殖的鱼类,70%为茴鱼,25%为折乐鱼和细鳞鱼,其余是狗鱼、白鲑鱼、鲈鱼等。¹

还必须单独提一提图瓦的湖泊,这些湖泊大部分位于山区和东部地区,属于贝克木河河系。它们在某些方面是值得注意的:第一、这些湖泊保证发源于它的河川的水量;第二、可想而知,鱼产异常丰富。

* * *

对西伯利亚进行的地质研究确定:当欧洲处于冰河时代的时候,西蒙古与上叶尼塞谷地的北面和西面,被象地中海似的一些大 23
贮水池组成的带状水域包围着,使这个地区的气候比现在更温和、更湿润,而且夏季温度也大大低于现在。由于大量冬雪的融化过程极为缓慢,因此山峰便长年覆盖着冰雪。那些在图瓦山区发现作为冰碛沉积的冰河遗迹的研究家,都肯定说:亚洲大陆的这个区域曾有过冰河时代。在冰河时代末尾和现代地质时代之间,在亚洲也跟欧洲一样,曾有过一个气候比现代更干燥更温和的时代。沙与碎石摩擦而成的尘埃,即所谓黄土,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它们被风吹送到四面八方,这样就形成了黄土状亚粘土,黄土状亚粘土同卵石层、砾石层、砂质粘土层交相错杂,就形成了乌鲁木齐河广阔河谷与克木奇克河两岸的土壤。这种土壤成分十分肥沃,自然,这需要足够水量灌溉的条件。

¹ 图尔恰尼诺夫:《关于1915年乌梁海边区的报告》,第1卷,第105页。

但是,图瓦除大气尘埃土壤以外,还有地球上几乎所有各地带具有的各种各类土壤。这里有荒漠草原土壤(红土和玫瑰色土)、干燥平原土壤、草原厚草层覆盖下的黑色腐殖质土壤、白桦林与草原交错杂地带的灰色森林土壤、以及海拔2,000米以上的北极苔原土壤。¹

图瓦中部、西部和南部(唐努山以南)各地区,到处都是干旱草原。

这些区域的土壤,可以分成以下几种类型:

一、砂质荒漠草原土。这种土壤是由碳酸钙粘结在一起的砂岩经过水蚀而形成的。在大气降水(其中四分之三降于夏季)的影响下,粘结物质碳酸钙逐渐溶解,结果砂岩变成粒状,干燥以后,被风吹到附近的河谷中去。可以说,沙丘的沙土跟附近的砂岩山脉,其组成成分是相同的。²

由于水蚀的结果,山脉的海拔高度逐渐下降,而沙丘沙土的厚度则逐渐增长。各个沙丘的沉积物的厚度并不相同,据某些观测资料记载,其厚度能达到10—12米。这类土壤所占的面积大小不一:特斯河彼岸的大沙漠,面积为17,925平方公里;乌鲁克木河沿岸那些地段,面积都在2—150公顷之间。这类砂质荒漠上很少生长植物,只在靠近河川的地方才能见到锦鸡儿^①。

24 二、粘质的、亚粘质的与亚砂质的荒漠草原土。这类土壤所占的面积相当广阔,分布于粘土质页岩附近和流经粘土质页岩沉积物的一些干涸河川与峡谷两侧。这类土壤虽然干燥,但在有灌溉条件的地方,移民们是愿意在这类土壤上耕种的。在保持足够湿度的条件下,这种土壤富有粘性,但是,一遇旱灾,就会龟裂、变

1 图尔恰尼诺夫:《关于1916年乌梁海边区的报告》,第8页。

2 同上,第4页。

① 原文是 караганник, 在俄文词典中没有查到,疑指 карагана, карагана 拉丁名 *caragana frutex*, 汉译锦鸡儿,系西伯利亚长的一种灌木。——译者

硬，牲畜从上面走过时，便尘土飞扬。农学家图尔恰尼诺夫注意到，这类土壤在20—30厘米深的地方有一层跟灰化土相同的稍带白色的土层。

可以用图兰草原中部的土壤和埃列格斯附近的麦日格伊草原等地区的土壤作为这种粘质灰化荒漠草原土的例子。这种几十公里内都见不到树林子的完全开阔、平坦的大片草原上的灰化土是怎样形成的，至今尚不得而知。

三、黄土荒漠草原土。据图尔恰尼诺夫观察，在盛行风的背风山坡附近可以看到黄土沉积物土层。只要在哈克木河沿岸、乌鲁克木河沿岸，唐努山以南等地观察，就可以看到黄土沉积物。由于图瓦的盛行风是从西伯利亚洼地吹来的西北风，所以图瓦的特点是：在有山坡朝北和朝西北的山脉的地方，都有一堆一堆的黄土沉积物。在紧靠河流的地方，黄土沉积物形成陡岸绝壁；在不受水流冲刷的地方，黄土沉积物便形成规整的斜坡，顺山而下，一直延伸到完。例如在唐努山南坡的一些地方，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种情形。黄土沉积物土层，通常很象山坡上常见的亚粘土和淤泥质粉状土。¹

在这些分布广泛的土壤中，有些地方还可见到星星点点的小块碱土地段。碱土的产生，显然是由于这些地方的底土中含有大量盐分，饱含盐分的地下水靠土壤的通透性上升到土壤表层，水蒸发后，盐便分离出来留在地表面，形成板结层和风化物。

因此，流水对碱地具有巨大的作用。流水能冲掉地表面的这种盐分并浸析土壤，使土壤能生长出在其他条件下不能生长的各种植物。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一块土地撂荒的时间那怕很短，甚至刚刚停止灌溉，就会立即恢复到原来的状态。²

1 图尔恰尼诺夫所著前引书，第7页。

2 格鲁姆-格尔日麦洛所著前引书，第472页。

格鲁姆-格尔日麦洛在其著作的第三卷中描述乌梁海边区(这个名称在他的著作中指图瓦)的耕作方式时,曾指出该地土壤的一个重要特点。乌鲁克木河河谷和克木奇克河河谷的土壤虽含
25 有足够数量的磷酸、石灰和钾盐,但却特别缺乏含氮化合物。从唐努山和萨彦岭上流下来的水,多半是在雪原上由雪融化形成的泉水聚合到一起形成的。但是,我们都知道,由高山地带冰雪融化成的水,或者根本不含氮(氨)素,或者含氮量微乎其微(每立方米雪含氮0.1—0.13克)。其次,叶尼塞河河谷中部降水量少,并且雷雨罕见,使土地连空气中的氮素也得不到。这种情况告诉我们,为什么图瓦人不得不经常把自己的耕地撂荒几年,让土地自然恢复其土壤中业已耗尽的最低限度的肥力。这在实行人工灌溉的农业国家中,是一种极为罕见的现象。

其他类型的土壤(例如细碎石质土、石质土、荒漠草原土等),在这里较少见,就用不着详细描述。下面我们来讲讲东半部的土壤。

在这里最引人注目的,是大量的黑色腐殖质土,其上覆有厚实的浮土层,腐殖质土层的厚度各不相同。据农学家图尔恰尼诺夫说,这些土壤,从其性质来看,并无典型黑土的结构,但也不可将它们归于深灰色亚粘土一类,因为这种土壤颜色更黑些,其所含的有机残余物的百分比可能比深灰色亚粘土更高些。这种土壤的形成原因,大概可用下列方式来说明。东部地区的气候一般说来应算作干燥性气候(年降水量在400毫米以下),但其土壤湿度却很高,沼泽多,而干燥草原较少。大面积的沼泽与繁茂的草地存在,大概是因为底土的致密层使水分不易渗入地下。

由于水分靠近地表,夏季气温又比较适宜,微生物能够得到便于生长的一切必要条件,所以有机残余物腐烂得十分彻底而且迅速,土壤便含有丰富的腐殖质。¹

1 图尔恰尼诺夫所著前引书,第23页。

*

*

*

我们大致弄清图瓦各地气候条件差异和土壤特点以后，现在就可以从发展农业与改造畜牧业的可能性方面来评价这些条件了。

前面曾援引了农学家图尔恰尼诺夫对图瓦可耕地总面积的一个估计数字。那么多的土地面积，对图瓦人从游牧生活过渡到定居生活，是完全够用的。同时，不同地区的气候条件也给这种过渡创造了充分的可能性，但也给农业提出了如何适应这些地区自然条件的一些特殊任务。

气候差异这一点，不仅为研究家们观察到，而且居民也经常在考虑。例如，在西部的阿克苏克河支流巴彦河河谷，甚至在 1,428 26 米高的地方，仍可见到耕地；但是，中部(麦日格伊河两岸)的耕地最高不超过 1,233 米。再往东，在哈克木河流域靠赫列勃尼科沃村的地方，耕地的绝对高度却只达到 1,020 米。耕地的高度之所以如此明显地自然降低，不外是由于植物生长期从西往东越来越短的缘故。但是，东部夏季降水丰沛而且天气暖和，这就使多数易于经受短时间低温的草本植物，在这里长得惊人地高大。这种象“铺垫”一样茂密的草地上，草长得特别高，甚至人骑在马上都露不出头来。

图瓦中部的植物生长期平均为 139 天，而在图瓦附近的西伯利亚和北蒙古一些地区，植物生长期却更长一些。这里的大多数农作物，例如春小麦、春裸麦、燕麦、豌豆、黍、大麻的生长期，通常需要 140 天，其中有些作物所需的生长期恰与该地所能提供的最多天数相等，另一些作物则只需要 112—126 天。

关于图瓦各地区植物生长期的资料，需要通过在共和国各地进行系统的气象观测来加以检验，因为有根据认为，这个国家可能有的最高温度和最低温度还是未知数。但是，即使这种观测能够

扩大植物生长期，这也决不会削弱选择早熟谷物品种问题的重要意义。在蒙古地势高的地区(例如塔尔巴哈台、科布多、乌里雅苏台等省)培植出来的谷物品种具有特殊的意义，这些谷物的特点是成熟得快，不怕温度的急剧升降。选择适于图瓦东部地区耕种的作物品种，是一项特殊的任务，因为俄国移民用最原始的方式试种的农作物说明，与其说这里不能耕种，不如说这里有经营农业的可能性，尽管在该地从事农业会有很大的困难。谷物并不是年年都能长到成熟，可是，丰收年景的产量却高得惊人。例如1910年，谢比的春播作物，每5普特种籽就收回了150普特谷物。经过几个歉收年，就有一次大丰收来绰绰有余地把以往几年的损失弥补上。¹

图瓦中部和西部地区拥有大量未经开垦的土地资源，但是，这完全不是说东部地区发展农业的问题就可以不考虑了，相反，东部地区的林业与矿产资源的丰富，渔业与狩猎业的发展，以及水力资源的利用，无疑都必然会向共和国提出如何往东部地区推广农作物的课题。象托锦这类地区，其农业发展的前景，是同在寒带发展
27 农业的可能性问题的最新研究成果密切相联的。我国植物栽培研究所在全苏各地进行的试验已经表明：大体上可以把北极圈的纬度看作是现代早熟谷物能够成熟的极限。我国的实验以及全世界的实验都表明，大多数蔬菜作物，包括马铃薯在内，实际上都可以无止境地向北移植。蔬菜、直块根、块茎类作物与饲草，可以移植到欧亚大陆最北部边缘，远达冻土带深处。相应品种的选择是会起巨大作用的。必须选择生长期短与需要热量少的品种。有许多植物，越往北种植，长得越快，成熟期可以大大提前。瓦维洛夫院士说，有几种大麦和其他一些谷物，在北部地区播种后60—70

1 俄国移民莫兹加列夫斯基在托尔布克(托锦)地区试种了一种小麦，他称之为“黑小麦”。这种小麦成熟的时候，其他谷物尚未成熟，就被冻死了。

天内就能成熟。¹ 秋耕可能是延长植物生长期的很重要因素。伊尔库次克气象站的观测结果表明：热进入土壤所需要的时间，在有植被的地方比在无植被的秋耕地上要长一倍到两倍。保留地面上的植被会使热进入土壤的时间推迟一个多月。

在东部各地区，限制农业发展的因素，可能不是严寒，而是沼泽地，必须采取排水措施来根治沼泽。通过排水工程，可在现已适于作牧场和草地的广阔地区之外增加大量新的土地面积。

但是，选择适宜种籽以加速植物成长并对土壤加以相应的改良，如果这对图瓦两大区域都有重大意义的话，那么在东部地区的当务之急则是用排水的办法来改造沼泽地，而中部和西部的那些草原地区，迫于气候条件，却要把灌溉工作摆在首位。因为，在这些地区，农田面积的扩大是同建设灌溉设施密切相关的，而建设灌溉设施的前提则是拥有灌溉农田与草地用的丰富水源。

叶尼塞河的水量能否满足农业不断发展和畜牧业进行改造的需要呢？根据罗杰维奇工程师的测量结果，在克孜尔-霍拉伊(贝克木河与哈克木河汇流处)一带，河水每秒钟平均流量为：

贝克木河	719.9 立方米
哈克木河	452.3 立方米
共计：	1,172.2 立方米

从需要灌溉的土地面积来看，该河的水量是足够使用的。共和国的用水是有保证的，在彻底改造游牧经济的道路上，用水问题 28 不可能成为一个“关隘”。当然，引水灌溉会遇到巨大的困难，并且要花费大量的资金。

乌尤克河和图兰河河谷以及哈克木河下游河谷，即哈克木河

¹ 瓦维洛夫院士：《北方农业问题》，载《苏联科学院十一月学术会议论文集》，第 254—255 页。

盖着这些山脉的植被。¹ 我们不接受这样极端的观点,但必须承认,每一地区的“面貌”都是在植物因素参与下形成的,这些植物因素好象把自己的一幅复杂的图画覆盖在地表形状构成的不规则的、五光十色的图案上。这样,地理景观就是地形同植被在空间内互相结合的产物。

因此,在我们的叙述中,描述图瓦境内的植物群落时,总要联系到对地区基本类型的描述。

但是,在进行这种描述之前,必须先说明图瓦分成若干不同类型地区的根据是什么的问题。

地表形状是划分地区类型的基础。图瓦盆地,从地形角度来看,可以分成三个部分:一、东部山地,即贝克木河流域和哈克木河流域,但不包括这两河的下游;二、中部谷地—平原区,即乌鲁木齐河和克木奇克河流域的位于这两河河谷与唐努山之间的地区;三、图瓦盆地西部与西南部山地,即克木奇克河河源地区以及该河
30 一些左支流流域。唐努山南坡向汗呼赫山脉延伸中间横贯着特斯克河谷的地区,是一个特殊的区域。

就植被而言,上叶尼塞盆地是从西伯利亚沼泽森林到蒙古无水草原的一个过渡地带。“湿润的森林地带,逐渐让位于比较干燥的、中亚特征表现得越来越明显的地区。植物越来越少,森林多半生长于丘陵北坡,并且就连河谷也很象草原,河谷甚至逐渐延伸到山坡上,山坡同样具有十足的南方色彩。”²

由此可见,根据地形,或按植被特点来划分图瓦地区的类型,其分界线基本上是相同的。东部山地也就是森林,开阔的低地上是草原植物,而高原上是高山苔原。

中部平原基本上是辽阔的干燥草原。

1 格鲁姆-格尔日麦洛所著前引书,第 426 页。

2 卡卢泽斯所著前引书,第 110—111 页。

西部与西南部山区又是森林地带，但与图瓦盆地东半部相比，却有某些特点。翻过唐努山，朝特斯河的方向继续往南去，我们便很容易地看到植被急剧变化的情形：植被越来越强烈地显露出蒙古草原和蒙古半荒漠带所特有的色彩。

一、上叶尼塞盆地东部地区，如上所述，包括贝克木河、哈克木河及其各支流流域的广阔地带，不包括这两条河流的下游地区。从地形和植被的性质来看，可以把博穆克木奇克以东的整个萨彦岭山原，都划入这个区域。

这个地区的主要植物是针叶林，由于气候比较严酷，萨彦岭针叶林的上限从西往东逐渐降低。萨彦岭大密林区，同阿尔泰山东北部的“密林区”有许多共同之处。针叶林多半是由雪松、冷杉和云杉组成。针叶林以下，就出现了白桦，在河谷里占优势的是阔叶林^①，阔叶林象风景如画的一些公园一样，扩展到很远的地方。阔叶林的特点是，在又稀又粗的大树之间的空地上长满了密草。因此，阔叶林带同时也就是草甸。¹ 贝克木河流域（东经 94° 以东）的针叶林带都是一些难以通行的针叶密林，林中有沼泽地，有被暴风吹折的树，地上覆盖着青苔。因此，贝克木河与哈克木河的河源地区，它的特点是具有野生的高山密林。哈克木河上游地区，由于山岭都被河流冲成狭谷，所以驮载商队在有些地方根本无法通行。这些山岭长满混交林，到处是碎石堆、枯树、沼泽和纵横交错的溪流，引所以图瓦这一地区的交通异常困难。

31

在森林地带，从高处展目眺望，但见一片浩瀚林海，无边无际，伸向四面八方，偶尔由密林深处露出河流与湖泊的闪光。有些地方，在密林包围之中，呈现出一片绿油油的牧场，野鹿就在这些草地上吃草。唯有冬季，当密林中积雪很深的时候，野鹿才不得不跑

① 原文是 лиственница 落叶松，但从下文看，这里应是阔叶林。——译者

1 罗杰维奇：《乌梁海边区及其居民》，载《俄国地理学会通报》。

到无雪的光山秃岭上去生活。

无数清澈透明、没有径流的小湖泊，证明这里有过冰川作用并标志出远古冰川退走的路线。大小湖泊和沼泽星罗棋布，有些地方排成长串，一些河流及其支流（伊苏格河、哈木沙拉河上游等）从中穿过，图瓦的这块地方成了名副其实的“湖泊之乡”。图瓦的一些大面积的湖泊，如诺彦湖、托锦湖、台里湖等，位于群山环绕的图瓦盆地的深底。这些大湖泊，对于牧民来说，是很有吸引力的地方，他们冬季把畜群从高山赶到这里来过冬，支起帐篷在湖畔居住。

景观随着地势的升高而变化。萨彦岭台地的一般景色是：一片带小草丘的平原，上面长满了地衣、青苔和柳树丛，到处都是巨砾，而在巨砾之间，有许多死水坑，还有在同严酷的自然界搏斗中被摧毁了的树木的残骸。¹

这就是高山苔原带的情景。高山苔原所以产生在台地，是由于这里便于积水。各河系之间的分水岭，有些地方是真正的沼泽地带，在那里，稀软的泥土跟石块、树根交织在一起。夏季，这种密林泥泞地带蚋蝇成群，犹如片片乌云，跟着人和牲畜，把人畜紧紧包围起来，根据蚋蝇形成的乌云，可以很容易地找到驮载商队的踪迹。²

大密林区以下，树木逐渐变稀，茂密的草甸开始居于主要地位。在贝克木河流域，景观的特征是草甸和森林的结合、丘陵和平原的结合：洒满阳光的茂密的绿色草甸，点缀着一些浓荫如盖的落叶松小树林；成千上万个鱼产丰富的大小湖泊，波平如镜；成千上万条大小河流，纵横交错；群山披着森林，山顶有光秃秃的险峰，俨如一道岩石屏障环峙在盆地的四周。³

1 米赫耶夫：《西北蒙古与乌梁海地区之行报告》，第 160 页。

2 卡卢泽斯所著前引书，第 152 页。

3 同上。

再往下去，便开始出现草原杂草了，同时在开阔的丘陵南坡上，植被还具有强烈的草原特点。¹ 这些丘陵上植被稀少，不能形成接连不断的生草。

贝克木河中游地区的森林与草原交错情形如下：朝北的南岸³²，茂密地覆盖着密林，北岸也覆盖着森林。不过，在每一支流注入贝克木河的地方，森林都出现一段间隔，森林间断的地方是狭长的楔形草甸。这些林隙地是非常适宜于移民的。草原本身也已经具有真正的南方特点了。甚至在贝克木河上游一些地区还可见到一些处于无林化、干燥化过程中的地方。著名的托拉克木草原就是阿扎斯河²流域下游的这类草原之一。这里蔓延着干燥的长满草的小丘和落叶松小树林，好象是跟周围潮湿的无树丘陵相对峙。

上述地区内各种自然条件的结合，向我们说明了为什么较多的图瓦人正是居住在这些开阔的草原上。这里降雪不多，所以牲畜不难找到饲料。在短暂的夏季，牛群散放到河流两旁繁茂的牧场上，羊群和马群则散放在附近的丘陵上。冬季，这里居民就更多了，因为那些在山区过游牧生活的图瓦人这时要赶着畜群到这里来过冬。

这个覆盖着森林的山区，是人们经营的牲畜头数最多的一个地区。大陆性气候，多山，多林，广袤的森林面积，草原草甸、长满³³浆果灌木丛的沼泽，草原台地，流水和高峻的悬崖——所有这些极其多样的生活条件，不仅对各种动物的繁殖，而且对毛皮质量，特别对毛皮花色和绒毛，都有良好的影响。

这里繁殖品种珍贵的黑貂、狐狸、猓狍、水獭、白鼬、狼獾。在人迹罕到的大密林中有熊和长着枝形角的驼鹿。对狩猎业具有重大意义的动物，是松鼠。松鼠的“收成”取决于雪松籽的收成。雪松

1 П. 克雷洛夫：《乌梁海地区旅行记》，第66页。

2 阿扎斯河从托锦湖流出之后称为托拉克木河。

籽歉收会使松鼠向其他地区转移。图瓦盆地盛产雪松，雪松生长在各种不同高度的地方。因此，雪松籽歉收是罕见的事情。

这里大量繁殖关东马鹿，或称大角鹿，其鹿角（鹿茸）是珍贵的东西。

捕捉关东马鹿的方法之一，是利用早春雪盖的特点。在早春季节，由于阳光的温暖与早晨的严寒交替发生作用，使雪地表面出现一层薄冰，或称雪面冰凌，可是，这一层硬壳下面的雪，却仍然能够经久保持蓬松。雪上面完全经得住穿滑雪板的人，冰凌又有助于猎人加快滑雪速度，但是，这层硬壳毕竟还很薄，经不住野兽在上面奔跑。关东马鹿在雪上奔跑时，四蹄把冰凌踏出一个个深洞，腿被冰凌划掉了皮，流出血来，很快就会痛得精疲力竭，等它倒在雪地上的时候，猎人就可将它捉住。¹

萨彦岭有大量野生白鹿，但是猎捕白鹿却很难。家养的鹿，是托锦旗牧民经济中的基本财富。他们的游牧生活也是离不开鹿的。每到夏季，居民为了给家养的鹿寻找最适宜的牧场，就到地势更高的地方去，把鹿群赶到最冷的地方去，赶到高山峻岭即“塔斯克山”上去。萨彦鹿比北方鹿高大得多，重得多。贝克木河上游地区，由于有些地方土质软，草被稀少，不适于使用马匹驮载东西，因此在这些地区，鹿就成了最适宜的交通工具了。托锦人秋季骑鹿去打猎，从过冬的地方往过夏的地方搬家，也都靠鹿。鹿为养鹿人提供鹿奶，鹿奶是养鹿人夏季的主要饮食。²

贝克木河及其各支流上游的大量排水湖，是适于鱼类排卵的地方。贝克木河上游各河流与湖泊的鱼类繁多，有9—10种不同的品种，其中有折乐鱼、茴鱼、细鳞鱼、白鲑、山鱈鱼、狗鱼等。

1 斯科别耶夫：《乌梁海边区的狩猎业及其特点》，载《北亚》，1925年，第5—6期，第118页。对照谢罗舍夫斯基：《雅库特人》，第30页。

2 奥斯特罗夫斯基赫：《以养鹿为生的图瓦人》，载《北亚》，1927年，第5—6期，第83—84页。

大密林中成为狩猎对象的野禽有：雪鸡、黑琴鸡和榛鸡。

二、上叶尼塞盆地中部地区，包括乌鲁木齐河与克木奇克河谷和乌鲁木齐河与唐努山之间的地区。这是一个最大的，也是 34 最有价值的盆地。这个盆地的草原，从乌京斯克山梁到克木奇克山脉，长 200 公里，从唐努山到萨彦岭，宽 100—150 公里。¹ 这里的地形和植被，使人感到离蒙古荒漠已经不远了。

乌鲁木齐河的河漫滩，²北面是一些高山，山上完全没有森林，有些高山一直延伸到河岸。

南面是多石而光秃的低山丘陵同平坦的或稍微倾斜的草原交替。从哈克木河河口起，100 公里长的河谷有两层阶地。上层阶地的草原具有荒漠特色：“有的地方是多碎石土，有的地方是碱土地带，还有的地方宛如森林，有的地方长满羽茅草、蒿子、猪毛菜等；也有些地方被太阳晒得焦干。除了富饶的沃野以外，还可见到具有半荒漠性质的地方。”³

贝克木河流域下游(乌京斯克急滩以下)和哈克木河流域也应划入这个地区，因为这里是向盆地中部过渡的中间地带。植被沿着山地越来越稀薄。很少见到松树。在丘陵上，落叶松林差不多是唯一的树木，而且仅仅生长在北坡。南坡是光秃秃的，从丘陵脊背上极目望去，是一行行密密层层落叶松，树木沿北坡逐渐下降。 35

由此往南，在河谷上升到超过汛期水位的地方，河谷两侧是蒿草原，连续不断，波浪起伏，伸向远方。

旅行家卡卢泽斯沿贝克木河流域来到此地以后，曾经用这样一句话来表述自己的印象：“过了令人难以忍受的潮湿密林之后，我们在这里呼吸到了开阔地带清爽而干燥的空气。”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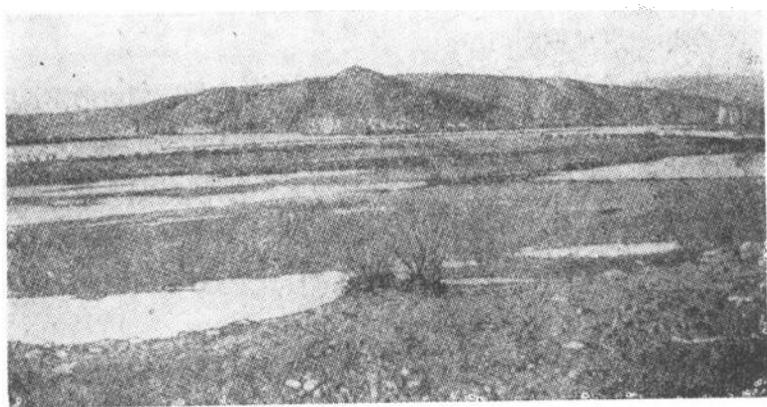
1 罗杰维奇：《乌梁海边区及其居民》，载于《俄国地理学会通报》，第 133 页。

2 河谷在春汛时被淹没的部分，叫做河漫滩。

3 罗杰维奇所著前引书，第 134 页。

4 卡卢泽斯所著前引书，第 189 页。

这里的主要色调是浅灰色，这是由于野蒿占优势的缘故。有的地方，多半是在丘陵的斜坡上，可以见到一些细弱的锦鸡儿灌丛。在下层阶地上，特别是在低洼沼泽地上，可以见到比较浓厚而鲜艳的绿色。滩林¹ 两旁的植被与北部淹水草甸相似。茂密的柳树林丛，主要是含香树胶的杨树林丛，呈窄条状，紧贴河岸蜿蜒伸展。这一块块杨树林给河流增添了美丽景色。



昌奇克山麓贝木河与哈木河汇合处。革命前在此地附近建了一座别洛查尔斯克城（意即白沙皇城），是俄国沙皇政府对图瓦实行殖民压迫的中心。现在，在从前的别洛查尔斯克城那个地方建起了共和国首都克孜尔。

36 乌鲁木齐河河漫滩，有的地方宽达数十公里，有的地方只是一条狭长的杨树林荫道。埃列格斯河口以下，高山向乌鲁木齐河河谷靠近，有些地方逼近河岸，有些地方两岸悬崖峭壁把河水夹在中间（如奥图格-塔希和海拉坎）。在上层荒原阶地上，即在能够从注入乌鲁木齐河的各支流取水灌溉的地方，可以见到图瓦人的农田，地里种着稗子、大麦与小麦。这些禾苗葱绿的农田，同周围光秃秃

¹ 滩林是指河谷两边的森林-草原地带和草原地带的狭长阔叶林带（在中亚称为图盖林）。

的草原，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但是，有时缺水，譬如在河川干涸的季节。这时，农田就显得很可怜：土地勉强掘松了一些，碎石颇多，稗苗稀疏，又矮又细，露出一块一块缺苗的空地。上一年撂荒的耕地，同周围的草原很少差别，只有从前的灌溉渠留下的干涸水沟以及生长得比较茂密的野蒿与田鼬瓣花，能够说明这里过去是熟地。”¹ 乌鲁克木河河谷以南，是一些岩石重叠的小山岗，这些小山岗好象长在草原的地面上似的，而在小山岗之间，则是一些地势平坦的或者微微朝乌鲁克木河倾斜的贫瘠草原。丛山之间的浅沟，有些地方被河流切割成峡谷，这些河流把那里的小盆地灌满了水，形成一些池塘，然后便逐渐消失于草原中（例如绍拉河）。

往前去，小山岗便连接成一条条不高的长冈，再往前去，就出现了群山，开始时山还不高，在山和山连结起来以后，变得陡峭，而夹在丛山中间的那些小的草原河谷则越来越窄。这些山脉的南坡完全是光秃秃的，北坡一般都长满了落叶松，开始所能见到的还是单棵的，往前才有一小片一小片的，然而这些小片松林却没有连成大片森林。

丛山之间有一些河流流到下游注入乌鲁克木河，如埃列格斯河、塔尔嘎雷克河、恰库利河，这些小河流两侧的边缘地带都长满了由落叶松与柳树组成的河滩林。在河谷边缘的阶地上，在潮湿洼地上，可以见到一些小草甸，这些草甸上长满了茂密青葱的禾本科生草和一些林间杂草。

在近 1,300 米高的地方，有时会遇到长满羽茅草和各种草原杂草的黑土地段。有的地方还可以见到一些咸水湖和淡水湖。

往西去，恰库利河河谷与查丹河河谷之间的分水岭上，是一片荒芜不毛、几乎无水的草原，草原上横贯着唐努山的一些支脉并长满了一片片的落叶松小树林。这个草原上，很久以前就铺设了一

1 克雷洛夫所著前引书，第 23 页。

条很好的石头大道,这条大道的碎石路堤和板石路面,至今还保存着。据传说,这条大道是成吉思汗时铺设的,可能是古代从这里经过的一条热闹的商路的遗迹。

克木奇克河谷的草原,虽然中间有一些山岭,但总的说来,其面积仍然长达(沿河流)75公里,宽达60公里。克木奇克河河谷处于丛山峻岭之中,是全图瓦最热的地方。

克木奇克河河谷是一块高地,南面是比它干燥的蒙古高原,北接阿巴根草原,这里丘陵与河谷纵横交错,气温较为稳定,降水量比较适中。¹

这个地区全是宽达14—16公里的平原(例如巴尔雷克河附近,或者阿拉什河河口对面),只是有些地方缩小为仅有1—3平方公里的河边沼泽地²。环绕右岸平原的那些山岭,多少可以攀登并把畜群赶过去的;但是,克木奇克河左岸平原边缘上的那些山岭却很陡峭,几乎是悬崖绝壁,只有沿着一些小河流的狭窄河谷才可以攀登。³“克木奇克到处是美景,但是格外富有诗意的,还是这两岸群山耸立、河水冲刷着悬崖峭壁的地方。”⁴

在草原向外伸展的地方,在地势比河床高出约六俄丈的阶地上,是杂有卵石的砂质粘土,有些地方是黑土。采用人工灌溉可以获得好收成,否则植物就不爱生长。⁵

克木奇克盆地最适宜于人们生活的地方,是查丹河谷中部。这个宽阔的河谷,灌溉渠纵横交错,整个是一片大牧场,在这里,图瓦人的毡包支在高大的落叶松的浓荫下,马群和羊群散放在绿色的

1 卡卢泽斯所著前引书,第199页。

2 河边沼泽地指平原紧靠河边被河水淹没的那部分狭窄低洼地带。

3 鲍利亚克维奇:《乌梁海的森林(根据1915年考察资料)》,载《俄国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通报》,第3卷,第3册。

4 格鲁姆-格尔日麦洛所著前引书,第234页。

5 同上,第235页。

草甸上。

下克木奇克河上的群山覆盖着被太阳晒枯了的植被，悬崖峭壁很多，是山羊、麝和狍子最喜爱的处所，在大密林里可以遇到狗熊。草原上，旱獭、跳鼠、狼比较多；野猪为数不多，藏身于湖泊附近。草原上有无数的雷鸟和大鸨。 38

三、上叶尼塞盆地西部地区，即克木奇克河上游，是一个山区，其特点与上叶尼塞盆地东部地区十分相似。¹

在克木奇克河流域，山上的针叶林多半是落叶松，落叶松常常形成一些稀疏的小树林，小树林与小树林之间的原野上长满了各种灌木丛和多汁的青草。落叶松中往往还混杂一些冷杉、雪松和云杉。阔叶树的数量微不足道，通常混杂于针叶树中。但在河谷地带阔叶树(杨树等)却占多数。林带以上是由一些矮灌丛、北极桦树群落和柳树林形成的过渡地带。再往上就是高山草原和高山草甸，高山草原和高山草甸常常互相交错。高山草原植被主要是艾蒿，这些艾蒿越往下越多。在2,300—2,500米高的地方，这类野草组成的大片生草便不见了，取代它的是苔藓地衣，上面点缀着一块块光秃秃的砂质和碎石质土壤。由此再往上去，便进入草木不生的岩石世界了。²

四、唐努山脉以南地区包括唐努山南坡和特斯河中游地区，形成广阔的乌布沙泊盆地的阶地。

唐努山巍巍耸立，宛如一堵高墙，形成了上叶尼塞盆地与特斯河盆地的一条重要分界线。唐努山南坡几乎完全是光秃的，北坡为 39 森林覆盖。“然而唐努山的森林跟萨彦岭森林不同。这里，甚至最低的地方都长满了落叶松丛林，还有少量的云杉，不过，云杉越往上越少，接着就出现了雪松，雪松越来越多，到森林的最上限，雪松

1 卡卢泽斯所著前引书，第109页。

2 格鲁姆-格尔日麦洛所著前引书，第447、449页。

的数量甚至超过了落叶松。这里的森林比较容易通过，林中完全没有沼泽，只有少数倒树往往成为我们前进的障碍。”¹

就是这个旅行家(卡卢泽斯)在描述从山口看到的景色时写道：“我们面前的景色，恰同西伯利亚风光形成对照，是色调清淡的蒙古草原和高原，这个地方阳光充足、气候干燥而具有一种神秘性，凡此种种给人一种强烈的印象。”

特斯河流经其底部的那个盆地，只有一部分属于图瓦共和国。

唐努山的南面是缓坡，由于南风 and 大气作用的影响，山的轮廓已变得平坦了。唐努山南坡的下山道路，与北坡截然不同，显得宽而微斜，为特斯河各支流峡谷所分割，这些支流两岸的树木(杨、柳、桦树和落叶松)在灰色草原植被衬托下，宛如一条条绿带。

从唐努山发源的许多小河流，只有少数几条能够流到特斯河。林带在特斯河附近终止，接着，小湖泊星罗棋布的沼泽地带便开始了，这些沼泽湖泊中芦苇丛生，牛虻、蚊子多得惊人。这一带地方，要到秋季才有居民前来放牧，而在夏天却总是空荡荡的。这里，有些地方牧草长得很好，可做牲畜的冬季饲料。特斯河两边的沼泽地带并不是到处都一般宽，从乌布沙泊起，越往东越窄，呈一楔形。²

“这一地区，多半是泥质的致密土壤，如果修筑灌溉渠，使向四面八方分布的水的径流得到保证的话，那么这块土地便可全部变成头等草甸，因为这里有足够的温度，也可有足够的水分，所以牧草能够长得好。”³

草原上纵横交错着朝不同方向去的畜群留下的一排排蹄痕，有的深而重叠，有的不深，这是经常鱼贯而行的马或骆驼在地表面

1 卡卢泽斯所著前引书，第 201 页。

2 图尔恰尼诺夫：《关于 1916 年乌梁海边区的报告》，第 17 页。

3 同上，第 18 页。

留下的痕迹。特斯河在宽阔的河谷中流过，河两面是深绿色带状滩林，滩林由黑林^①和落叶松林组成。从特斯河往南，布满土丘的广阔沙质草原一直延伸到边界上的汗呼赫山山麓。有些地方可以见到淡水湖和苦咸水湖，其中有一些大的湖泊。无水的地方寸草不生，仅仅在一些洼坑底部才能见到稀疏的草本植被和灌木植被。⁴⁰汗呼赫山脉是由一些山峦连成的窄而高的长岭。由于山坡短而且很陡，山上聚集的水分别汇成一些大小溪流，从山上流下来，当流到山麓附近的荒漠时，便被干燥的土壤吞没了。¹

在特斯河以南地区，居民夏季赶着畜群会集于淡水湖（杜鲁湖）边，可是，即使在湖畔，人和牲畜照样要遭受炎热的折磨。牲畜几乎整天要站在湖水中，不能吃饲料，只有在太阳落山以后才能开始放牧。

^① Чернолесье, 阔叶林的民间称呼。——译者

¹ 鲍利亚克维奇所著前引书，第65页。

第二章 图瓦封建制度的基本特征

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论封建主义。以畜牧业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的某些特点。上叶尼塞盆地的垦殖过程。喀尔喀的封建制度。图瓦政治上的分散性。图瓦的居民及其职业。宗法制的氏族公社的解体。图瓦封建阶级的代表。封建剥削的形式。直接生产者阶级在经济上的分化。“巴依-基吉”及其剥削方式。

图瓦人民的社会生产制度是怎么样的？图瓦人民划分为哪些主要阶级？劳动人民千百年来所受的压迫表现为哪些形式？这些问题是不久前才提出来的，是革命斗争的全部实践提出来的。提出这些问题旨在了解革命斗争的历史根源，以便获得在当前现实条件下正确行动的方针。

但是，对这些问题的研究程度，跟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是极不相称的。研究象图瓦这样国家的历史的人，其处境是不佳的，首先因为很难得到这一国家过去的必要史料。革命前的图瓦没有自己的文字，使用的是蒙文，然而，即使蒙文，也只有少数上层分子才会使用。在游牧生活条件下保留下来的有限的档案材料，经过国内战争暴风雨的年代，也差不多全部丢光了。历史见证人的回忆可靠性不大，因为他们文化水平低，其叙述中主观成分又太多。过去的官吏和喇嘛这一类人，即从前压迫、剥削阿拉特的那些人，由于充当过那样一种角色，对于研究这个问题更是没有用处。诚然，仔细观察当代的现实、研究这个现实，常常可以在社会关系结构中找到过去的一些残余，但是，在国内发展起来的新关系的影响下，这些

残余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众所周知，研究中亚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几乎没有。不得不利用的资产阶级著作，不仅不能令人满意，而且浸透了大国沙文主义（这种大国沙文主义往往变成对“异种人”的兽性憎恨）及民族偏见和阶级偏见。这里主要是指旅行家和各种研究家写的一些书籍和杂志论文。这些人有的是以研究图瓦为直接目的的，有的则是从俄国到蒙古或从蒙古到俄国路过图瓦时顺便对它进行研究的。这批基本资料的另一个特点是这些著作的作者们——地理学家、地质学家、民族志学者、考古学家——对于经济和社会关系方面的研究，只是顺便的、浅尝辄止的、断断续续的。在他们这些著作中，社会经济材料只能说明某一段时间的情况，而且这种说明是极其概括的。最主要的是，这些作者，除了两三个人（科恩和雅科夫列夫）外，其余全是俄国政府和俄国商业资本的直接或间接代理人。甚至有军事机关和非军事机关的反间谍人员，例如总参谋部上校波波夫和“学者”考古学家明茨洛夫，他们到图瓦都有各自的“秘密”任务。

对我所研究的这个问题最有意义的作家之一，毫无疑问是以研究中亚著名的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格鲁姆-格尔日麦洛。他的关于图瓦（乌梁海边区）和西蒙古的四卷巨著都是在苏联时期出版的，最后一卷是1930年才出版的。我们以这位作者为例，很容易看出，关于过去学院派东方学界绝大多数代表人物具有反动性和阶级敌对性的论点是正确的。

格鲁姆-格尔日麦洛作为一个研究家，其特点首先是他一贯维护沙皇俄国在亚洲、特别是在图瓦负有“文化使命”的主张。其次，他提出一个论点，说什么图瓦人民“无疑处在不可避免的逐渐衰亡的道路上”。他极力为俄国商业资本在图瓦和蒙古的活动辩护，为俄国商业资本的掠夺和抢劫行为开脱。值得注意的是，他甚至激烈地反对那些无疑是俄国商业资本的代理人（如1910年到蒙古

和图瓦旅行过的鲍戈列波夫和索波列夫两位教授)的善意责难。同时他极力保护喇嘛,认为把喇嘛看作是国家机体上的溃疡完全是一种误解。

研究蒙古和图瓦(这两个国家正在经历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过程并为走上非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奠定基础)历史的苏联读者不得不利用的著作,总的情况就是这样。因此在科学地(即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掌握这些史料的过程中会遇到的那些困难,是可以理解的。

为了对图瓦的历史获得一个正确而清楚的认识,首先必须依靠我们在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中能找到的关于社会经济结构方面的论述。因此,作者认为这部著作必须从确定资本主义以
43 前的封建农奴制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和以畜牧业为基础的封建社会的特点开始来进行研究。但是,由于这个问题在本书中没有独立意义,作者认为,对这个问题仅作概括的叙述,只求获得一个分析革命前图瓦社会制度的正确方针就可以了。

毫无疑问,封建社会生产方式的基本特征如同一切社会结构的基本特征一样,不能到上层建筑现象范畴中去找,只能到劳动力同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中、到生产资料所有者对直接生产者的关系中去。从这个观点来看,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的统治地位,工农业生产的统一即家庭工业同农业的结合,是早期封建制度的前提。在这里,最重要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特征,是直接生产者占有生产生活资料所必需的生产资料。直接生产者“还占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即他实现自己的劳动和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所必需的物质的劳动条件;他独立地经营他的农业和与农业结合在一起的农村家庭工业。”¹由此可见,既然这种制度是直接生产者独立进行农业和工业生产,那么,要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攫取剩余产品,便

1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3卷,第890页。

只能采取超经济的强制手段。封建主只有用强制手段才能从独立生产者身上榨取到剩余产品。

超经济的强制手段是榨取剩余产品的基本方法，而且由于是自然经济，所以为封建主干的活计和向封建主缴纳的产品，便以徭役和实物贡赋的形式进入社会生活的周转。但是，对直接生产者采取超经济的强制手段，必须以直接生产者对封建主的人身依附为前提，然而这种人身依附的程度和超经济强制的形式对于确定封建生产方式的实质并无决定的意义，虽然人身依附程度和超经济强制形式表明了封建生产方式不同的发展阶段。“这种强制可能有各种各样的形式和不同的程度，从农奴地位起，一直到农民有不完全的等级权利为止。”¹“在这些条件下(即在农民经济独立的条件下——作者注)，要能够为名义上的地主从小农身上榨取 44 剩余劳动，就只有通过超经济的强制，而不管这种强制是采取什么形式。”²

封建阶级对土地这个最主要的劳动条件的名义所有权是榨取剩余产品的基础。土地以前是氏族公社的财产，是后来被封建主霸占去的。但是土地私有制不是封建主有权占有直接生产者劳动果实并强迫他们担负一定徭役的原因，而是其结果。

土地所有制的形式，对于说明封建生产方式的特点是没有决定意义的，具体说来，土地是直接归封建主所有，还是归公社或中央集权制的国家所有(在后一种情况下，每个个别的封建主对国家说来，仅仅是土地的使用者)，对说明这个问题是没有意义的。关于这一点，在马克思的著作里有完全明确的指示：“所以这里必须有人身的依附关系，必须有不管什么程度的人身不自由和人身作为土地的附属物对土地的依附，必须有真正的依附农制度。如果

1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3卷，第161页。

2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3卷，第891页。

不是私有土地的所有者，而象在亚洲那样，国家既作为土地所有者，同时又作为主权者而同直接生产者相对立，那末，地租和赋税就会合为一体，或者不如说，不会再有什么同这个地租形式不同的赋税。在这种情况下，依附关系在政治方面和经济方面，除了所有臣民对这个国家都有的臣属关系以外，不需要更严酷的形式。”¹

在这段话中清楚地强调了这样一个思想，即国家土地所有制形式虽然引起了一系列政治和经济上的变化，例如课税和地租的合并，依附形式的缓和等等，但是，它却不能把存在着的封建生产方式变成其他任何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因为这种土地所有制形式没有改变基本的经济基础。

占有土地面积的大小也没有决定意义。在这方面可以指出：在农业需要大量劳动力的中国，封建主占有并借以奴役农民的土地，其面积可能比例如在从事畜牧业的蒙古小得多。同样，资本主义以前的地租形式也没有基本的决定的意义。不管是工役地租，还是实物地租，或者是货币地租，都是同一基本的生产方式的特点。

⁴⁵ 杜勃罗夫斯基同志说，实物地租和工役地租是不同社会经济结构的特征：一种是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特征，另一种是农奴制社会经济结构的特征。这种理论是不值一驳的。²

上述经济基础的特征是生产资料与劳动力以一定的封建方式相结合；封建主为了奴役直接生产者和榨取他们的剩余劳动而建立的统治机构，就是在这种经济基础上生长起来的。

毫无疑问，在亚洲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多地保留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所描述的、由前几个世纪遗留下来的原始社

1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3卷，第891页。

2 杜勃罗夫斯基：《关于“亚洲”生产方式、封建制、农奴制和商业资本的本质问题》，莫斯科，1929年版，第93页。

会结构，即闭关自守的小的宗法制公社。这种公社建立在土地公社占有制的基础上，它产生于封建社会以前，并在其解体过程中转化为封建社会。亚洲很多农业国家在上述基础上产生的封建制度，因为有水利灌溉机构和国家或公社土地所有制的存在，就带有集中的特点。

闭关自守的公社制和带有东方专制国家特点的国家中央集权制在向封建社会过渡时，它们在有的地方被保留下来了，而在其被保留下来的地方建立的并不是跟封建制度不同的独特的生产方式，而只是封建制度的特殊形式。显然，从基本特征来看，这种生产方式具有封建生产方式的共同特点。这就是通过超经济性质的强制手段对拥有基本生产资料并且兼营家庭工业和农业的直接生产者进行剥削。但是在这里，封建制度的这些基本条件的表现形式具有历史的特殊性，因为它是在原始公社制残余和东方专制国家中央集权制的影响下形成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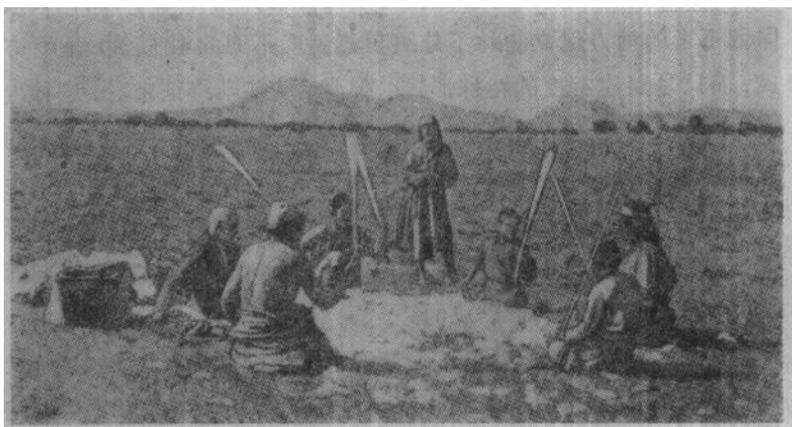
但是，当我们研究象图瓦或者蒙古这类国家的社会制度时，仅限于上面所说的一切是不够的。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们曾经多次分析过的封建制度，是以农业为基础的封建制度，而以畜牧业为基础的封建制度则具有某些特殊性。

以畜牧业为基础的封建生产方式的特殊性是什么呢？

无论是在畜牧业类型的还是农业类型的封建关系下，家庭工业都是同其主要经济相结合的，即在前一种封建关系下同畜牧业相结合，在后一种封建关系下同农业相结合。在以畜牧业为基础的封建社会里，农业—工业生产的结合，主要表现在对畜毛、皮革等的简陋加工上。廉价的棉纺织品以及其他机器工业产品的出现破坏了直接生产者的经济结构，破坏了家庭工业和农业的结合，因为自产原料的家庭加工业从这一结合中消失了。 46

过去，在蒙古和在图瓦，都可以见到外国大工业的廉价产品在

那里出现后,原始经济结构便遭到破坏,并使从前充当家庭工业基本原料的自然经济产品在封建国家机关压力下大部分变成了商品的情形。比如,人们住的毡包,从外表看来,除极少数以外,盖的都是又脏又破的毡子,这个事实表明,人们已经不再为满足自己家庭的需要而加工羊毛了。毡包之所以破烂不堪,是由于人们为了解决家庭的急需不得不把畜毛卖给收购商的缘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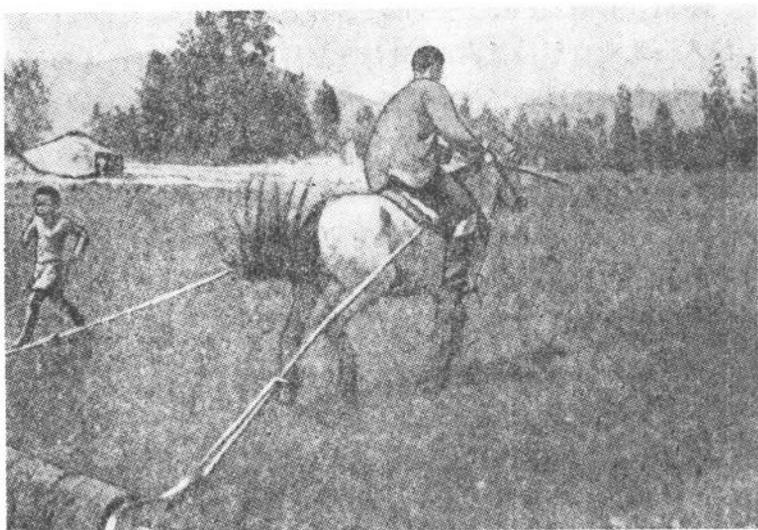


图瓦人制做毛毡的情景。在擀毡之前,先将畜毛洗净,然后用木棍捶打。

农业和畜牧业这两种类型的封建社会的基础,都是土地所有制同直接生产者的对立。有这样一种不正确的观点,好象在牧区,在畜牧业国家,牧场很多,愿意把畜群赶到哪里就赶到哪里,似乎在牧区和畜牧业国家中没有土地所有制出现的基础。实际上,在蒙古和图瓦,都曾不断发生过争夺好牧场的斗争。

具有灌溉农业的亚洲国家的供水调整,相当于畜牧业地区的牧场调整。但是供水的调整,在一定的地理条件下,需要有很复杂很昂贵的设施,以防止河水泛滥或浇灌缺水的土地。在畜牧业国家就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这就导致了第三个极重要的区别。

在农业国家里，供水机构的庞大设施，是国家政权的物质基础⁴⁷。由于在畜牧业国家里几乎完全不需要类似的设施，所以在那些封建国家政权就没有也不可能象水利灌溉网很发达的农业类型封建国家所具有的那种物质基础。因此，在畜牧业国家里，甚至在国家或公社土地所有制存在的情况下，封建土地使用者也比在农业国家里更容易变成土地的实际占有者。



图瓦人在擀毛毡。将洗净并用棍捶过的畜毛均匀地铺好，卷在木辊上，然后拉着木辊在平地上滚动，擀到湿毛脱离木辊时为止。

最后，我们可以看到，虽然这两种情况下的生产者都被固定在一定的地方，但是，不言而喻，拿游牧民族同从事农业的民族作比较，游牧民族的游动性要大得多。

游牧民族的游动性，跟他们全部财产，特别是其财产的主要部分——畜群的游动性是分不开的。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游牧民族已有牲畜作为财产，这种财产，到了成为相当数量的畜群的

时候,就可以经常提供超出自身消费的若干余剩”^①。因为这种余剩都是采取动产形式,可以直接让渡的形式存在的,所以便为交换
48 的产生创造了有利前提。而且他们的生活方式,使他们不断和其他没有畜群的部落发生接触,也促进了交换的发展。这样两种同时存在而又不同的生产形式的联系,同样也为正常交换创造了必要条件。¹

最后,因为畜牧业是一种单一经济,所以交换关系和商业资本一渗入畜牧业自然经济内部,就能比较迅速地控制生产过程,并以同样的速度破坏这种经济的自然基础。因此,封建关系的解体过程及这一过程的一些因素对商业高利贷资本的需要的适应,在畜牧业国家,就应当比在农业国进行得快,因为在农业国家,由于一些经济部门的结合,生产过程具有更大的稳定性和更大的力量来抵制商业资本的渗透。²

在象图瓦和蒙古这类不需要建设灌溉土地、整治河流等方面的庞大工程的畜牧业国家中,并不存在独立产生中央集权制国家的基础。但是,图瓦和蒙古是在被中国征服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所以很自然,在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出中国那种在另一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关系。我们知道,列宁论证过,中国的社会制度是封建制度,他曾指出,中国社会制度的客观条件“在将近五亿人民的生活日程上,只提出了这种压迫和这种剥削的一定的历史独特形式——封建制度。……这种剥削的政治代表就是以皇帝为政体首脑的全体封建主和各个封建主。”³毫无疑问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4卷,第161页。——译者

1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1卷,第107页(非直接引语,按词面翻译。——译者)。

2 “……正好与城市的发展及其条件相反,对那些没有定居下来的游牧民族来说,商业的精神和商业资本的发展,却往往是它们固有的特征。”(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3卷,第371页。)

3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2卷,第426页。

问,既然中国封建制度的特点是实行中央集权制,拥有大规模的水利灌溉设施、粮仓等,那么这些特点就必然也要在蒙古和图瓦的历史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来。

* * *

本书的任务是研究图瓦在殖民地时期,特别是在革命前几十年中间的社会制度。为了更好地了解这几十年内图瓦社会发展的特点,必须大概地看一看亚洲地图和图瓦所处的位置。图瓦所 49 处的地理位置使图瓦在历史上一直远离亚洲历史风暴所经过的那些主要道路。一方面在遥远的北方,这种风暴是以俄罗斯自西向东的侵略活动的形式进行的,这种侵略活动的支流在上叶尼塞盆地弱小的图瓦人民的命运中已有所反映。另一方面,在图瓦以南,另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历史运动,自中国起,经过南蒙古、新疆的广阔的草原和沙漠地带向中亚地区各国蔓延。

历史文献给我们提供了哪些有关图瓦人民的历史资料呢?是些什么人越过边境山脉涌进了这个国家?领导这个运动的力量是什么?长期定居于上叶尼塞盆地的那些部落都从事什么活动?这些部落的社会经济制度具有哪些特点?

对于这些问题,历史文献中几乎没有记载,即使有的话,也是非常不能令人满意的。历史的探照灯只能照亮个别历史时期,这些个别历史时期互相之间隔着几世纪的黑暗。

将这个国家遥远的过去同活生生的现实联结起来的历史链条加以科学的再现,应成为马克思主义东方学的一个特殊任务,完成这个任务将是对历史科学的重大贡献。

然而,根据历史文献所提供的有限资料,在这个问题研究程度所允许做到的范围内,对图瓦境内发生的历史过程,哪怕是予以概括的描述,现在已经成为非常必需的了。

在伏尔加河和阿穆尔河^①之间的亚洲中部地区，有一条被夹在肥沃的高地和低洼的平原之间的宽阔而干燥的草原和沙漠地带。

上叶尼塞盆地由于南边可从唐努山进入，因此好象是这个草原和沙漠地带的边缘，草原上发生的迁徙运动在这里便都有反映。早在纪元前很久，游牧民族就经常赶着畜群，从草原深入上叶尼塞盆地。这些游牧民族找到良好的生活环境以后，就长期居住下来，直到新的游牧民族来把他们撵走为止。无论是在西方或在东方，一有推动力，就会使伏尔加河和阿穆尔河之间广阔地区的各部落发生连锁反应。各个相邻的部落之间没有固定的界线，而在以河流和山脉为界的地方，这种天然界线也比较容易遭到破坏。通过其他民族居住地区的迁移，引起部落与部落的混杂现象，不仅使领土界线不稳定，而且也使种族界线变得模糊不清了。

50 这些游牧民族的基本生产活动是畜牧业，辽阔的草原被用来放牧牲畜。畜群在一个地方把草吃光了，游牧人就赶着畜群到另一个地方去。如果那里已被另一游牧集团占据了，那么他就得用武力维护自己的放牧权，或者把这种权利让给比较强大的对方，而自己则必须另找牧场。游牧人经常为其生产和生存的基本条件——牲畜寻找牧场，从而引起了草原上的不断的迁徙和不停的冲突。

辽阔的草原周围的一些具有较高物质文明的地区的存在，是说明游牧民族社会关系的另一个重要因素。这个草原的东面是中国，南面和西南是印度和阿拉伯，西面是土耳其斯坦，北面是米努辛斯克-叶尼塞谷地。这些地区的工农业技术水平把这些地区变成了对草原游牧人具有强大吸引力的地方，因为这些草原游牧人需要农业产品和加工工业产品。中国和土耳其斯坦之间从远古以

^① 即黑龙江。——译者

来就有一条商路，这条商路从一个绿洲通往另一个绿洲。这条路在咸海和里海之间的地区分成了两条：一条通往波斯并继续向前到拜占廷；另一条绕过里海，到伏尔加河，再引向伏尔加河发源地，然后到达波罗的海沿岸。

这条大路干线又分出许多支线。通往上叶尼塞河地区的那一条路，无疑是这些支线中的一条。萨彦岭和阿尔泰山一带的国家出产黄金、铜、食盐、牲畜，但主要是出产毛皮、野兽皮、家畜皮和马鬃。

因为主要商路所经过的沙漠和草原完全掌握在游牧部落手里，所以各游牧集团，特别是其中最强大的游牧集团，除了以自己的产品直接参与这种贸易活动外，还承担了保卫这些商路的责任，有时甚至可能组成驮运队来为商路服务，以便取得一些额外好处。已出现的广大牧民的政治联合体，是前进的封建主义战胜正在解体的游牧公社的工具，同时也是符合商业资本在草原上保护其商队的需要的。成吉思汗帝国就是游牧部落政治联合体最典型的例子。应当指出，成吉思汗帝国崩溃之后，在商路体系遭到极其严重破坏的时期，中国仍然继续从上叶尼塞地区得到黑貂皮、狐狸皮、雪豹皮、猞猁皮、水獭皮和其他“珍贵毛皮”以及马匹、马尾和马鬃。¹

在几千年中间，上叶尼塞盆地的游牧部落不断更换。上叶尼塞盆地正好是那些在强敌打击下被迫向大陆北部退却的游牧部落 51 必经之路。一群群游牧部落就象越过唐努山一样越过了萨彦岭。

上叶尼塞盆地由于许多部落集团杂居，形成了一个部落联合，这个部落联合早在公元六世纪时就已形成了一个建立在封建基础上的阶级社会。²

1 见莫斯科沙皇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于十七世纪第一个二十五年中间（1616年）派往蒙古阿勒坦汗处的使节瓦西里·丘麦涅茨的报告。

2 关于哈卡斯-吉尔吉斯人的经济生活，下列三本书中有记述：雅金甫：《中亚各民族情况汇编》，第1卷；里特尔：《亚洲农业》，第3卷；基谢廖夫：《叶尼塞河流域的氏族解体与封建制度》。

据中国史籍记载，在唐努山脉的北部很早就居住过一个被史籍称为哈卡斯的部落。在山岩上保存下来的铭文中说，这个部落自称吉尔吉斯人。他们留下了大量的遗迹。这些遗迹和史籍记载使我们能大体上了解上叶尼塞河河谷古代居民的历史。气候和土壤条件，在那遥远的古代同现代一样，使得农业生产只能在人工灌溉条件下进行。灌溉沟渠就是保留下来的人工灌溉遗迹。而这些水渠里的水，有时是从很高的山上引来的。伊利克木河和帖米尔苏格河沿岸复杂的水利工程遗迹，说明这个民族的工程技术水平是很高的。在乌尤克河和图兰河流域还发现了为蓄水而修筑的拦河坝的遗迹。水浇地种植小麦、黍子和大麦。当时是四月播种，十月收割。磨面用石磨，大石磨由马拉。大量的农民生活遗物都证明在那遥远的古代，农业是相当发达的。

畜群是由牛、骆驼和绵羊组成的，不过主要财富还是马群。富人拥有几千头牲畜。这个民族懂得冶铁方法。他们用铁制造武器和犁。他们还用铁缴纳贡赋。总之，锻造技术在哈卡斯人的国家里是非常发达的。但哈卡斯人的手工业不仅仅限于锻造。我们确切知道，还有陶器、兵器、珠宝等手工业。

哈卡斯人的国家是中国的附属国，有时往中国派使者。同时哈卡斯人与住在他们西面和西南面的各族人民也保持着频繁的贸易往来。在这些民族中，看来阿拉伯人居于首位。他们常到哈卡斯人居住的北方来，哈卡斯人也经常到遥远的南方去。哈卡斯人常常充当护卫护送阿拉伯人，使他们不受在南方草原游牧的维吾尔人的袭击。阿拉伯商人运来的是社会上层人物需要的锦缎和金银装饰品。后来挖掘散布在叶尼塞草原上的古墓时，这些物品经常被人们发现。

在公元 618—970 年这三个多世纪中间，哈卡斯人征服了草原上的许多游牧部落(维吾尔人等)，大大扩展了自己的领土。这个

5
时期以后，便是他们政治上的衰落时期。在衰落时期里，他们经常受到草原其他游牧部落的侵害，同时经济也极端衰退了，畜牧业重新上升为第一位，同中国和西方的贸易和政治关系也逐渐断绝了。直到成吉思汗时代为止，史籍再没有提到他们。约从1200年开始，哈卡斯人作为蒙古人的先头部队又重新登上历史舞台，这时他们的名称是吉利吉思(吉尔吉斯)。¹

内蒙古
蒙古史籍说，上叶尼塞河河谷是他们的基本住地。蒙古史籍对这个国家有很好的描述，这证明蒙古人非常了解这个国家。蒙古史籍提到过江州(译音)和伊兰州(译音)两个城市名。江州因附近有一条河叫做江(译音)而得名(叶尼塞河在古代叫这个名字)，这座城市位于江河西南，唐努山以北。吉尔吉斯皇帝的“阿若宫”就设在这里。这个国家叫做“汗浩汗”，意思是口小肚大的袋子，因为吉尔吉斯人占据的盆地就是这个形状。

我们已经讲过，萨彦岭一些国家自远古以来就曾往中国，大概也往中亚细亚运毛皮(貂皮和灰鼠皮)，以换取绸缎和棉织品。毛皮主要由住在萨彦岭山坡树林里的狩猎部落提供。这些狩猎部落居住的地区不但交通不便，而且野兽毛皮收获量也很不稳定，因此同他们进行交易并不稳妥，要冒风险。“所以猎人提供的商品主要是作为纳税物而不是作为交换物。这些商品主要是用来缴纳贡赋、阿尔班^①和实物税的。这些狩猎部落自古以来就受到追捕，几乎象他们追捕野兽一样。他们被要求缴纳‘实物税’”。²他们成了更强大更有组织的部落的贡民了。许多史料都指出，叶尼塞河河谷存在过狩猎部落。修道士雅金甫(比丘林)说，³在公元650年前后的一本中国编年史里，有关于居住在库苏泊以西的杜波族的记

1 里特尔所著前引书，第546页。

① 阿尔班(албан)：向国家缴纳的赋税。——译者

2 科兹明：《哈卡斯人》，第6页。

3 雅金甫所著前引书，第439页。

载。杜波族住在草棚里，不懂得畜牧业和农业。他们主要是以捕捉飞禽走兽和挖百合根为生。波斯历史学家拉希德·阿德·丁（1247—1318年）的著作中说这个地区存在过以狩猎为生的林区乌梁海人。确实，他在这里还谈到了非林区乌梁海人。传教士鲁勃鲁克在1253年的关于蒙古之行的报告中说：“北方……住着一53个游牧民族，叫吉尔吉斯。那里还居住着奥伦嘎伊人。¹ 他们把磨光的骨头系在脚上，在结冻的雪和冰上滑行，非常快，能捉到飞禽走兽。”²

这些弱小的狩猎部落在远古时代受吉尔吉斯人管辖，吉尔吉斯人向他们征收贡赋并对他们给予必要的保护。

从蒙古人那时开始，吉尔吉斯人逐步地从上叶尼塞盆地被排挤出去。他们受到来自南方的排挤，因此便不得不往北移到叶尼塞河左支流阿巴根河河谷去，但是在这里，他们首先遇到了居住在米努辛斯克草原上的各部落的抵抗，后来在十七世纪初叶以后，又遇到了由北方和西方扩展过来的莫斯科国的抵抗。莫斯科国的先遣队当时已经到达了叶尼塞河岸。

叶尼塞河地区在地理上是辽阔的西西伯利亚平原向广袤的东西伯利亚山区过渡的中间地带。叶尼塞河是把西伯利亚分成东西两半的天然分界线。从十六世纪下半叶叶尔马克军事远征开始，俄国人便不停地向西西伯利亚推进，结果于十七世纪上半叶便征服了大片土地，并把这些土地并入莫斯科国。

俄国政权在米努辛斯克州的扩展是以通常的办法进行的。城堡是军队在新占地区征服土著居民的据点³。在最合适最有利的

1 即乌梁海人。

2 鲁勃鲁克：《东方国家游记》，圣彼得堡，1911年版，第134页。

3 红亚尔（Красный Яр即现在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译者）是于1628年在卡恰河流入叶尼塞河的河口建立的。见瓦京有趣的著作：《十八世纪的米努辛斯克边区》。

地点设立哥萨克哨所。“最初这是为了给从中心据点城堡出来讨伐的小批哥萨克人建立的临时居住的冬营地。后来这些冬营地逐渐变成了军人阶层经常居住的地方。”¹

征服者在一个地区站稳脚跟以后，便立即替莫斯科沙皇及其封建奴仆们向居民征收“实物税”。作为“实物税”收缴的是一些“珍贵毛皮”，即貂皮、狐皮和灰鼠皮。然而土著居民对侵略者进行了顽强的抵抗，只有对土著居民进行残酷的、毁灭性的斗争才能收到贡品。

西伯利亚“贡民”缴纳的贵重毛皮换回了外汇，以沙皇为首的莫斯科贵族就用这些外汇来购买“洋酒”、糖果和他们用以在宫中互相炫耀的各种颜色的长袍，这些贵重毛皮换来了“成堆的黄金白银，装满了沙皇国库，使得外国人惊羨不已”。²

征收实物税也是当时西伯利亚军职人员的生财之道。为了征 54
收实物税，一个城堡要不断地同附近居民进行斗争。³

土著人变成了奴隶（“雅瑟里”），这是西伯利亚被征服的又一后果。征服者的经济大部分建立在被征服居民的奴隶劳动上。奴隶特别是女奴隶，是西伯利亚市场上的畅销商品之一。西伯利亚的军政长官和西伯利亚东正教的僧侣都是以大奴隶主身分出现的。

这些事实告诉我们：为什么西伯利亚被顺利占领并变为俄国殖民地，会使整片整片地区被掠夺一空，使土著居民衰弱下去，甚至被消灭。

俄罗斯人到来之前，米努辛斯克边区杂居着处于较低级发展阶段的萨莫耶德人、芬兰人和突厥人的部落。这时，古代哈卡斯

1 阿德里安诺夫：《米努辛斯克边区概况》，托木斯克，1904年版。

2 菲尔索夫：《异种人在莫斯科国里的地位》，第159页。

3 见瓦京所著前引书，第10页。

人的高度文化已经完全消失了。居住在草原上的部落过着游牧生活，居住在萨彦岭山坡上的部落则以狩猎为生。人数最多力量最强的是古代哈卡斯人的嫡系后裔吉尔吉斯人。吉尔吉斯王公是一些富裕牧主，他们管辖一些狩猎部落，这些狩猎部落向王公缴纳毛皮并作为臣民处于王公的保护之下。十七世纪二十年代末，当俄国人要求吉尔吉斯人缴纳更多的实物税时，王公伊谢伊回答俄国使者说，他们不能再多交了，“因为他们不捕捉黑貂”，所以不得不向自己的“基什蒂姆”借貂皮。¹ 所谓“基什蒂姆”就是指那些以狩猎为主的、向他们纳贡的依附部落。这些部落，有的必须向王公缴纳贡赋（“实物税”），有的则因为欠债而成了人身依附于王公的人。由此可见，不能说这些部落是各自独立的，因为它们是被以超经济的强制为基础的统治与服从的关系连结在一起的。

各个部落长期过着共同的经济和政治生活，必然使它们产生某种同族观念。这一点也表现在下述情况，即那些处于依附地位的狩猎部落，不管其族系如何，都用向它们收缴贡赋的那个部落的名字来称呼自己。例如，生活在乌布苏河（今名图巴河，是叶尼塞河右支流）流域的图巴部落是加入吉尔吉斯人政治联合体的大畜牧部落之一。这个部落使那些居住在萨彦岭和阿尔泰山脉山前地带的狩猎部落隶属于自己。“文化上较发达的图巴人对一些弱小的部落集团有一定影响。这些弱小部落也开始自认为是图巴人——自称为图巴拉尔。”²

因此，吉尔吉斯人成了俄国人在上叶尼塞河所遇到的武装抵抗的主力，是十分自然的。吉尔吉斯人部落不仅本身奋起反抗俄
55 国人的统治，而且还号召其他部落不要屈服。全体土著居民为保卫自己的独立而进行的英勇顽强斗争在十七世纪持续了一个世

1 菲舍尔：《西伯利亚史》，圣彼得堡，1774年版。

2 科兹明：《哈卡斯人》，第33页。

纪。他们虽曾有向俄国人无条件投降的时候，但在短暂的喘息之后，各部落又重新联合起来，举行新的抗俄起义，继续进行斗争，而且比以前更加紧张激烈。

但是，由于敌人装备精良，而且力量不断增强，所以土著居民进行斗争很艰苦，力量相差很悬殊。他们要想不遭到洗劫和奴役，只有一种办法，那就是迁徙到萨彦岭以南他们从前曾经居住过的地方去。描述叶尼塞边区的最早的作者之一斯捷潘诺夫写道：

“很多异教徒被各级长官用来为私人干活；鞑靼人谁也不知道自己的权利，也不知道对胜利者的义务。他们遗弃了自己的畜群；他们已经准备迁徙到萨彦岭那边的蒙古草原去放牧。”¹ 这样大规模的迁徙在十八世纪初确实发生过。

1703年，上卡拉乌利城堡得到一个消息，说“有2,500个卡尔梅克人进入了吉尔吉斯土地，把吉尔吉斯人全部赶到自己那里去了，如今在吉尔吉斯土地上连一个吉尔吉斯人也沒有了”。²

但是，离开这里的不只是吉尔吉斯人。1704年被派到吉尔吉斯土地上去征收实物税的大贵族的儿子兹洛宾报告说：“我们……由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骑马进入了吉尔吉斯土地，沒有碰到一个吉尔吉斯王公，只碰到了七个剩下的图巴人。”³ 由此可见，图巴人跟着吉尔吉斯人离开了叶尼塞河沿岸。⁴ 1701年，同时派出了两支远征队去讨伐吉尔吉斯人，不久之后又派去一支。⁵ 他们的袭击给吉尔吉斯人带来了巨大的伤亡，大概是吉尔吉斯人实在无法才不得不离开了故乡。

1 斯捷潘诺夫：《叶尼塞省》，第2部，圣彼得堡，1835年版，第136页。斯捷潘诺夫是叶尼塞省第一任省长。

2 《西伯利亚史的古代文献》，第1卷，第58号。

3 同上，第59号。

4 瓦京所著前引书，第22页。

5 同上，第24页。

反抗俄国人最不妥协、最坚决的吉尔吉斯人的离去，肯定大大减轻了俄国人征服这个地区的困难。在这以后，俄国权力便迅速扩展，不久就达到了萨彦岭。

吉尔吉斯人被赶走以后，上叶尼塞河地区又继续发生了哪些殖民地化的过程？关于在蒙古统治时期这个地区的居民情况有哪些历史资料，哪些民族由外地涌入了这个地区？

56 历史资料完全明确指出，“乌梁海”部落（现在图瓦人的祖先在文献中叫这个名称）在十七世纪时占据着从伊尔库特河上游到额尔齐斯河之间萨彦岭以南和以北这片广阔的土地。菲舍尔在其《西伯利亚史》中写道，阿尔泰萨彦人和上叶尼塞萨彦人，“从前是一个民族。他们的名称，鞑靼语叫谢彦(Сен)，光荣的萨彦岭就是因这个民族而得名。”¹

中国乌里雅苏台省志也指出了这些民族的共同性，其中还指出乌梁海(蒙古乌梁海)他们是一个民族。这个民族，按其居住的山岭名称，分为两支：唐努乌梁海和阿尔泰乌梁海。²

关于阿尔泰乌梁海和叶尼塞乌梁海人是同族的观点，也得到了格鲁姆-格尔日麦洛的支持。他写道：“萨因这个共同的部落名称和阿尔泰人在某些地方还保留着的根本语帖连吉特语，或称萨因语，都证明了阿尔泰乌梁海人和叶尼塞乌梁海人是同一个民族的组成部分。”³

只是由于划分国界才把同一个民族分割成两部分，使他们的历史发展走上了不同的轨道。

托木斯克军政长官向沙皇报告他预期于1609年同蒙古汗阿勒坛来往而未能实现的“奏折”中说：“蒙古的阿勒坛汗，吉尔吉斯

1 菲舍尔所著前引书，第458页（异体字是作者标的）。

2 里特尔所著前引书，第567页。

3 格鲁姆-格尔日麦洛所著前引书，第697页。

人到他那里去行程是一个月；他的贡民马特人距离吉尔吉斯人的行程是两天；从马特人处到他那里，居住着的都是他的人。¹马特人就是马德人，这个部落的个别部分于十九世纪初居住在乌尤克河、塔普萨河、巴彥河流域。²

此后不久，于 1616 年便派出一个外交使团到阿勒坛汗那里去了。使团首脑哥萨克阿塔曼³瓦西里·丘麦涅茨报告说，外交使团从吉尔吉斯人居住地区进入图巴人居住地区，图巴人居住在山坡上。丘麦涅茨说，图巴人赶着鹿和山羊，愿意到哪里去放牧就到哪里去放牧；他们吃的是山羊肉，穿的是皮革制成的衣服；他们不种庄稼；没有牛和绵羊；只有马匹和鹿。⁴

一般认为，丘麦涅茨所说的图巴人是居住在山坡上的一个或几个狩猎部落，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依附于居住在乌普萨河（图巴河）流域的图巴部落。这些狩猎部落生活在卡孜尔山和阿梅耳山山巅的高山原始森林地区，叫做“山区马托尔”（意思是住在山中的入）。

从事畜牧业的马托尔人居住在图巴人附近。他们是同吉尔吉斯人一起迁徙到萨彥岭这边来的，他们的后裔成了图瓦西部地区居民的组成部分，而“山区马托尔”迁到克斯提克木河和哈木沙拉河一带来的时间大概要晚得多。这是一个贫穷的部落，依靠狩猎为生。他们乘自制的桦树皮船，溯阿梅耳河上游航行时，在高山原始森林中，在星罗棋布的湖泊的岛屿上，都发现了富饶的狩猎场所，这些地方有珍贵的黑貂，还有很多河狸和水獭。同时，如果想到阿梅耳河和克斯提克木河的上游彼此相距很近这一点，那就不难推

1 《俄国历史丛书》，第 2 卷，圣彼得堡，1875 年版，第 188 页。

2 科恩：《乌梁海地区考察工作的初步报告》，第 20 页。

3 俄文为 атаман，哥萨克军队的首领以及地方军政首领。——译者

4 《斯帕法里横跨西伯利亚游记》《绪言》第 9—10 页。转引自科兹明所著前引书，第 30 页。

测：在这个地方，一些狩猎部落常常翻过萨彦岭，进入上叶尼塞河地区，并在这里杂居而被同化。不过，关于马托尔人移居的问题，十九世纪上半叶到这个地方旅行过的卡斯特连有明确的记载。他说：“有三百左右马托尔人，在中俄划界时迁到了中国境内，大概这些人和索约特人^①融合在一起了。根据卡斯特连在阿梅耳河流域听到的传说，久远以来就有众多的马托尔人家在那边居住，从事狩猎业和捕鱼业。”¹

十八世纪七十年代曾走遍边境地带的佩斯捷列夫报告说，1773年，他不仅在上阿梅耳河流域，而且在国境线那面的乌特河上游一带也遇见过马托尔人。根据最新材料得知，马托尔人已和图瓦人融合在一起，在图瓦人中形成了一个单独的氏族。²这些部落同时向俄国和中国缴纳贡赋。他们经常越境到别国境内去打猎。“现有的史料和其他材料证明，萨彦岭这边的索约特人，在十九世纪初，人数就相当多了。关于索约特人，当时是作为一个单独的民族来谈论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处在要向中俄两大帝国纳贡的特别不利的地位，这些索约特人便逐渐向边境退去，其中大多数人干脆就越过了边境，到本族大多数人很早以前就占据的地方去定居下来。索约特人逐渐地从俄国境内迁移到中国境内，又很容易地在中国境内找到了安身之处，这件事可以充分证明：居住在萨彦岭山系俄国一侧某些地方的索约特人和其中国境内的邻居之间存在着牢固的联系。”³

佩斯捷列夫在阿梅耳河和昔斯提克木河之间的分水岭地区碰到了托锦部落一批打猎的阿尔泰索约特人。⁴

① сойот, 俄国人对图瓦人(乌梁海人)的旧称。——译者

1 瓦京所著前引书,第114页。

2 格鲁姆-格尔日麦洛所著前引书,第700页。

3 戈罗辛科:《索约特人》,载《俄国人类学杂志》,1901年,第2期。

4 里特尔所著前引书,第443页。

除了这些部落之外，据史料记载，还存在过一个明加特部落。雅金甫说，这个部落有 3,000 个帐篷，在克木奇克河流域过着游牧生活。¹

俄国大使瓦西里·斯塔尔科夫于 1638 年曾经访问过这个明加特部落的王公。“他们来到了居住在克木奇克河边的明加特部落的王公库沙克那里。”² 后来于 1659 年，斯捷潘·格列恰宁领导的使团又在克木奇克河流域见到一些萨彦人和明加特人的毡包。³

上述吉尔吉斯人在俄国人的进逼下，大批撤离米努辛斯克草原这件事在图瓦居民的民族成分上留下了显明的痕迹。这个大迁徙的浪潮，也把许多小部落带到萨彦岭这边来了。

科兹明推测说，这些部落被安排在准噶尔的各个领地，是为了对他们进行同化。⁴

逃到萨彦岭这边来的绝大多数人在额尔齐斯东南的草原上找到了安身之处。另有极少数人分散在萨彦岭和唐努山之间的河谷里停留下来，同土著居民杂居在一起。图瓦境内的吉尔吉斯族，迄今仍处于有影响的地位，他们大概就是被大迁徙的浪潮带到这里来的。

虽然象吉尔吉斯人大迁徙这样的部落大迁徙再没有重演过，但是，我们得到的许多材料却表明：土著部落仍然继续越过俄国边境跑到蒙古去。其证明就是经常派军队“到萨彦岭那边去”，以便“搜捕逃到蒙古境内的缴纳实物税的逃亡异族人”。⁵

关于千百年来大批涌入上叶尼塞河地区并对该地居民成分产

1 雅金甫：《十五世纪到现在的厄鲁特人（即卡尔梅克人）历史概况》，圣彼得堡，1834 年版，第 137 页。

2 菲舍尔所著前引书，第 496—519 页。

3 同上，第 495 页。

4 科兹明所著前引书，第 88 页。

5 瓦京所著前引书，第 32—34 页。

生影响的那些民族的情况就是这样。但是这种影响并不能引起居民成分及其经济生活的根本变化,因为新来户和土著居民之间,正如戈罗辛科所说的那样,有着“牢固的联系”,所以对双方来说,彻底同化的过程是在双方不知不觉中进行的。

现在,谈谈图瓦盆地的南部边界的情况。我们没有任何材料证明中俄划界(1726年)以来的两个世纪过程中有什么移民流入这里。

满洲人会划出固定地区给上叶尼塞地区居民放牧用,严禁他们出界。¹另一方面,满洲政府由于特别重视年年缴纳毛皮贡赋的图瓦(蒙古的其余牧民则不缴纳),重视这种收入来源,因此保护其在图瓦的特权比保护其在蒙古的特权更为尽心。²

59 关于上叶尼塞河河谷及其毗连地区之间的垦殖过程的历史资料是很贫乏的。总结起来,可以得出下述结论,即无论是图瓦周围的山岭,还是大自然设置的其他障碍,都未妨碍图瓦同其南北接壤地区进行不断的频繁的来往。直到十八世纪中叶中国完全征服图瓦时为止,图瓦居民始终处于流动状态中。人的浪潮进进出出经常不断,各种民族集团递相更迭和同化,把这整个时期看作是芬兰族、突厥族和蒙古族等成分基本上形成一个新的民族的时期,是有理由的。但是,这些在人类学和人种学方面各不相同的成分能互相同化这一情况证明,这些部落的社会组织是有很多共同之处的。

* * *

既然图瓦的命运与居住在其南边和北边的那些民族的命运紧密交织在一起,而那些民族(蒙古人、卡尔梅克人、哈卡斯人)的历史多少已经有了比较详细的阐释,因此,为了说明图瓦的社会经济

1 格鲁姆-格尔日麦洛所著前引书,第3卷,第699页。

2 同上,第3卷,第812—813页。

关系，我们首先应当介绍那些部落的社会结构（早在遥远的古代，图瓦的个别部分已和这些民族有所接触了），那才会是正确的。从十八世纪下半叶开始，从蒙古在唐努山^①修筑了边防线，俄国在北部边界采取严格的警戒措施以后，图瓦便落入闭塞的、与世隔绝的处境中，造成这种处境的不是自然障碍，而是社会经济与政治的发展进程。

图瓦在进入其存在的这个新时期时，其社会关系基本上是一个时代形成的。

十七世纪时，现在的图瓦领土分别属于不同的国家：东和东南半部属于喀尔喀；西半部，在西伯利亚历史上有名的征服阿勒坛汗时期，即在十七世纪，属于喀尔喀，在十七世纪最后二十五年期间，即噶尔丹时期并入准噶尔。北部与叶尼塞-米努辛斯克边区的吉尔吉斯(哈卡斯)人的国家有着密切的联系。

上述这些国家的社会结构是怎样的呢？

在雅金甫(比丘林)的《十五世纪到现在的厄鲁特人(即卡尔梅克人)历史概况》一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对准噶尔的社会制度的如下描述：

“在游牧民族那里，宗族(поколение)是指有统治权的王公一家和王公一家在该民族最高首领汗的统领下所占有的封地。氏族(род)是指有统治权的王公的旁系亲属及作为生活所需划归他们的部分封地。这样，蒙古人先分成宗族，宗族再分成氏族。汗有自己的领地，与宗族封地的收入无关。有统治权的王公在自己领有 60 的封地中，也有自己的一块，也与氏族的收入和领地无关。战时汗、王公及其族人应负责维持自己领地上的军人的给养。”这本书还指出，乔罗斯汗从乌梁海汗国征收赋税。乌梁海部落归宰桑管

^① 原文在 Танну-ола 前有代表河的缩写字母 p., 疑是 xp. (山脉)之误。——译者

辖,这些人(据雅金甫神甫讲)为氏族的总管,是四个厄鲁特领主的远亲,他们的职位都是父子相传的。

在上述简短扼要的叙述里,准噶尔极盛时期的社会政治制度被描写成典型的封建社会结构,具有“按等级划分的土地所有制和与此相联系的武装亲兵制”(恩格斯)^①。这个军事组织不外是靠剥削直接生产者的劳动、向他们征收“贡赋”的封建阶级的国家机构而已。

如果注意研究吉尔吉斯人的国家,那么,从这一民族的历史中可以看到,某些部落在俄国殖民主义者的进逼下,在十八世纪初越过了萨彦岭,一部分(如图巴人、吉尔吉斯人)在图瓦盆地定居下来,并处于十分有势力的地位。另一部分部落则迁徙到遥远的额尔齐斯河上游一带。在另一方面,这个国家的领土通过不知不觉的变动,已与阿勒坛汗在萨彦岭那边的领地合并到一起了。俄国军职人员在给西伯利亚长官的报告中,关于这一社会制度有如下的描述:吉尔吉斯土地分成了若干“小地区”和乌卢斯,它们的首领是一些独立的或半依附于更强者的王公。吉尔吉斯王公是氏族首领、酋长,但是这时氏族关系已处于解体阶段,氏族政权从民意的执行者已变成了压制人民和统治人民的机构。王公都是一些军人,有卫队保护。处于王公统治下的已经不只是那些“氏族成员”了。每个王公周围都有一大批“乌卢斯的显贵”,或用俄国军职人员的话来说,叫作“优秀人物”,他们之下就是普通的“乌卢斯村民”,或称“吉尔吉斯庄稼汉”。此外,这种组织的特点(这也同样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说明图瓦地位的特殊性)还在于,每一王公领地里都有一些受其管辖的小的狩猎部落,这些狩猎部落住在萨彦岭山前地带或山中,其中一部分部落后来成了图瓦居民的一部分。这些住在深山老林里的“边远之民”,是那些比较强大的畜牧部落

^① 未注明出处,按词面翻译。——译者

的经济榨取对象，是他们的纳贡者和“基什蒂姆”，他们所生产的剩余产品被吉尔吉斯社会的封建上层分子攫为己有。

我们觉得这些事实都说明，关于封建关系在某些部落集团里的发展，已是不容置疑的事，这些部落后来有机地构成了目前被称为图瓦人的这个各种部落混合体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些部落在俄国侵略者的压力下被迫迁徙到南边的上叶尼塞⁶¹河盆地的时侯，其封建社会结构已完全形成，而古老的氏族组织只剩下了一些残余。

蒙古-满洲人征服图瓦是满洲人与准噶尔及其好黠武的王公噶尔丹博硕克图汗长期斗争的结果。在这一斗争中，图瓦西部各部落站在噶尔丹一边进行战斗，并且在准噶尔被征服后，在很长时间内还多次拿起武器反对新的统治者。直到十八世纪中叶，图瓦才被彻底征服。同时，图瓦的一些地方被赏赐给蒙古王公（博贝、策凌等）以表彰他们参加镇压噶尔丹和平定图瓦的功绩。

北蒙古（喀尔喀）对图瓦的历史发展具有显著的影响，而从中国方面来的影响却要微小得多，那么喀尔喀的社会经济关系究竟是怎样的呢？我认为喀尔喀的社会制度在波兹德涅耶夫的著作里，特别在他未发表的著作里描述得十分令人满意。¹我在下边描述喀尔喀的社会制度时，主要依据这些著作，这是作者的《蒙古与蒙古人》两卷集的续编。

在蒙古人臣服满洲人以后，博格德皇帝（清朝皇帝）把军事行政组织扩展到喀尔喀（和图瓦），将原有王公封地改成军事单位，称为“旗”。每旗在情况需要的时候都应提供一定数量的武装骑兵，那些领有封地的王公留下来即作为旗的总管，批准他们担任扎萨克的职务，扎萨克的意思就是“管理者”。通过这种途径建立起来

¹ 波兹德涅耶夫未发表的手稿收藏在民族问题与殖民地问题科学研究协会的手稿馆。

的军事组织归满洲的军事当局将军所统辖，这些将军在十八世纪下半叶还被赋予了高级文职官员的任务，负责监督地方行政管理工作。从1806年起，喀尔喀的每个旗和盟都有明确规定的土地范围，各旗或盟只有权在本旗或盟的范围内放牧，超越这个范围放牧，就被认为是侵占和动用他人财产而定罪。

除了扎萨克，即各旗的总管和他们的近亲所组成的王公等级外，还有一大批蒙古贵族，称为“台吉”，他们又分成四等，各有许多特权，其中包括占有牧奴的权力。统治阶级中人数众多的第三个等级是出家的僧侣（喇嘛）。其余的居民实际上都是处于从属的牧奴地位的老百姓，即所谓“贡民”（“阿尔巴都”）。“任何时候每个‘老百姓’的首要的和始终不渝的义务就是向本族（确切些说是向
62 总管）服役和缴纳财产税。……蒙古老百姓的全部财产，甚至个人生命都要完全听从王公的摆布”（波兹德涅耶夫）。由此可见，满洲人只不过是把喀尔喀在未被征服前就早已形成的封建关系在法律上加以固定而已。

牧奴本身也分成了若干种。其中最无权、最受奴役的一种叫“属丁”（“哈姆杰尔格”）。他们是家仆，分配给台吉，多少不等，视台吉等级而定。一等台吉可得属丁十五户，四等台吉可得属丁四户。属丁一旦划归某一台吉，便成为该台吉的私有财产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必须为台吉干活，用自己的劳动去供养台吉。台吉可以从属丁那里随意拿取一切东西，可以派他们去干活，等等。其余的居民是牧奴，他们向王公缴纳“阿尔班”赋税，同时，他们也相当于扎萨克的私有财产，尽管其受奴役的程度还没有达到属丁那样。关于这一点，波兹德涅耶夫这样写道：“一般地说，每一个扎萨克都被认为是属于他的那块氏族领地的全权管理者和主人。固然，在法律上他们无权宣判自己属民的死刑，但是却有权把属民转让给别人，可以送给任何一个格根（活佛）或交给某一政府机构终

身服役，等等。每一个扎萨克都有权把本旗蒙古人的财产全部拿走，任意支配。”而且，“属民的人身自由，扎萨克都有权操纵，当然更不用说他们的财产了。”

我们知道，许多喇嘛庙都有牧奴“沙比纳尔”^①，而且寺院里的人几乎都是由扎萨克献给喇嘛庙的牧奴。喇嘛庙财产的形成过程在很多方面都与农奴制俄国的情况类似。

喀尔喀社会制度的一些主要特征一直保留到革命前夕。在即将结束对这一社会制度的描述时，还需着重指出以下一点，这就是土地所有制的形式问题。我已经提到过，国家土地所有制的存在是蒙古的征服者中国的一个特点。波兹德涅耶夫（我在说明蒙古的社会制度时多半参考了他的著作）写道：“满洲人在法律上规定的各旗界限并未能改变蒙古人对各旗土地的看法。蒙古人把各旗土地看成是唯一的最高地主和各旗王公的财产，他的属民只是有权共同使用这些土地。在蒙古人看来，旗的土地是该旗王公即扎萨克的私有财产，王公有权随意支配。”我认为波兹德涅耶夫的这种观点是不能全部接受的。一系列的历史事实说明，清王朝是最高的地主，虽然是名义上的。国家保留了在蒙古封建主（他们常因争夺牧场而不断发生冲突）中间分配牧场的最高权力。由此可见，中国在征服了喀尔喀以后，首先把喀尔喀划分成旗，并为每旗划定了土地范围，并不考虑各王公领地在历史上形成的界限。此外，几十年来，国家还执行了一条缩小旗的土地范围的坚定不移的政策。我们常常会看到不断出现新旗的现象。旗的范围缩小了，各旗所使用的土地面积也随之缩小了。如果土地是旗的总管——扎萨克的不可剥夺的私有财产的话，那么，这一切都不可能获得如此的发展。

在图瓦问题上，我们看到执行的是同样的政策，而且表现得更

^① 蒙古语。指喇嘛的徒众或属民。——译者

旗的名称

牧区范围

- | | |
|---------------|--|
| 2. 托锦旗 | 贝克木河流域，西起乌特河东至萨彦岭，北界也是萨彦岭，南至奥图格-塔希（贝克木河与哈克木河的分水岭）。…… |
| 3. 萨拉吉克旗 | 比尤连河、乌鲁治贝河、纳伦河、额尔齐斯河①、赞格勒河、乌鲁克木河流域，哈克木河右岸，台里湖盆地周围的山区。 |
| 4. 唐努旗 | 唐努山北坡，卡登湖及达各台湖地区，绍尔木克河、马扎雷克及乌宗-卡拉希一带。唐努山南坡卡拉河及帖列克提克木河、特斯河左岸和纳伦河流域。唐努山以南。 |
| 5. 沙雷克旗和 | |
| 6. 尼巴兹旗 | |
| 7. 大王(马迪与乔杜)旗 | 乌斯河上游，乌特河、乌尤克河、巴彦河、塔普萨河流域及唐努山南坡。 |
| 8. 贝子(萨音诺颜)旗 | 克木奇克河流域，恰库利河、乌鲁克木河一带，铁米尔-苏格河、肯迪尔根河一带、叶尼塞河以东萨彦岭两坡。 |
| 9. 克木奇克旗(大旗) | 与贝子旗地区交错在一起。西起库兹涅茨阿拉套山，东至埃列格斯河和埃吉姆，北界萨彦岭，南至蒙古边境。 ¹ |

上述托锦、唐努、萨拉吉克及克木奇克旗都由世袭的总管(乌赫里达,图瓦语为奥古尔达或大诺颜)来管辖。这些旗联合在一起组成一个盟,由大总管(安本诺颜)来管辖。大总管在各旗总管之上、乌里雅苏台将军之下,既管各旗,又管本旗,唐努旗总管就是这

① 原文为 Иртыш, 位于东 65—89, 北 48—61, 距这里所讲的地区甚远, 疑是伊尔特河之误。——译者

1 还存在过第十个旗, 即达尔哈特旗, 位于库苏泊地区。居民为已被蒙古同化的图瓦人。他们已经丧失了自己的本族语, 改用蒙语。这个旗的居民是由库伦呼图克图的牧奴(“沙比纳尔”)组成的。因此达尔哈特旗由呼图克图任命的喇嘛来进行管理。关于这个旗同革命前图瓦的关系问题不清楚, 把它作为蒙古的一个组成部分可能更合适些。以下的叙述不包括这个旗。

样的大总管。

哈苏特旗由其总管独立管辖，不归大总管管辖。1911年前不久，克木奇克旗摆脱了大总管的管辖。这两个旗的总管取得了驻乌里雅苏台的中国当局的直接管辖。其他四个旗（贝子旗、大王旗和尼巴兹旗^①）归住在蒙古的蒙古王公管辖。这四个旗的牧区与大总管所辖各旗的牧区交错在一起。大总管不干预这些旗的内部事务。王公每年派蒙古官吏（称作达尔加）到这些旗（贝子旗除外）征收年贡，同时受理诉讼案件，就地开庭审判。

达尔加带着六名助手一年到头驻在贝子旗，他们的生活由这个旗负担。

据移民局 1914—1915 年统计，图瓦几个主要旗的土著居民数字如下：

两个克木奇克旗……………	35,600 人
（大旗和贝子旗）	
托锦旗……………	4,000 人
唐努旗……………	7,600 人
萨拉吉克旗……………	7,900 人
大王旗(马迪与乔杜)……………	1,200 人
<hr/>	
共计……………	56,300 人

上述居民人口分布状况的资料说明，革命前居民绝大多数集中在图瓦的西部克木奇克河及其支流地区。克木奇克河支流之一查丹河河谷集中了两个克木奇克旗一半以上的人口。克木奇克河流域的中心也在这里。

查丹河河谷的人口密集，是由于该地不仅适合畜牧业的发展，而且也适合农作物的生长。在查丹河河谷的肥沃地区有两座喇嘛庙，一座属于大旗，另一座属于贝子旗。上游的喇嘛庙共有一百五十名喇嘛，下游的喇嘛庙约有七十名喇嘛。

^① 原文先说四个旗，但只列了三个旗的名字。——译者

离喇嘛庙不远的地方设有两个旗的总管公署。总管的毡包附近是其亲信人员(恰赞)的毡包和给总管“府邸”服徭役的被称为“梅德”的一些普通图瓦人的毡包。

查丹河河谷也把俄国商人吸引来了,因此这里还成了一个商业中心。

这一切情况都是造成查丹河河谷居民民族成分比较混杂的原因。在这块面积不大的土地上集聚了两个克木奇克旗的二十七七个佐(苏木)的人口。许多人服徭役期满后没有返回原籍,就地留了下来,或留在附近的地区。¹

据 1915 年图尔恰尼诺夫统计,土著居民的牲口头数如下: 66

	牲口头数
成马	448,099
马驹(两岁口)	166,230
成牛	195,740
牛犊	117,444
成羊	1,196,211
绵羊	21,361
山羊	126,714
成鹿	70,460
幼鹿	7,588
共计	2,349,847 ²

革命前畜牧业是图瓦经济的基础。牲畜的头数和分配性质既标志着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又体现着各阶级间的社会关系。

但畜牧业并不是居民唯一的行业。有些地区的居民兼事狩猎,而另外一些地区的居民则兼营农业。

要比较细致地说明图瓦社会生产结构的特点,最好还是按不

1 叶尔莫拉耶夫:《关于克木奇克河流域调查报告的经济统计资料》,第 25 页。

2 波波夫在其《乌梁海地区》一书中(第 96—97 页)根据宾尼格先的资料所提供的牲畜头数,无疑是被大大缩小了。

同地区来说明，因为“不同的公社在各自的自然环境中，找到不同的生产资料和不同的生活资料。因此，它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产品，也就各不相同。”¹

萨彥岭南坡广袤山地的密林地带，大部分分布在图瓦东北部的托锦旗，一部分分布在萨拉吉克旗。这里的居民以狩猎为主，兼营畜牧业。畜牧业主要是繁殖北方鹿。

乌鲁克木河以南沿克木奇克河向西伸延的图瓦中部丘陵起伏的草原，是畜牧业地区。牧人在规定的地区内，根据季节有规律地周期性地赶着牲畜变换牧场，冬天在冬季牧场，夏天在夏季牧场。

远在俄国殖民主义者到来之前，这里的居民就从事耕种。他们在河谷地带耕种土地，并将古代修建的灌溉渠又重新修浚，进行灌溉。²

图瓦居民大概从远古时代起就从事农业了，虽然他们的农业从来没有达到过哈卡斯人的古国所达到的水平。居民经常处于遭
67 受军事侵袭的环境中，而且自身也参加袭击别人的活动，因此不可能大规模地垦荒种地。

十九世纪末与二十世纪初，在克木奇克河（从发源地至河口）与乌鲁克木河（右岸到上游的埃吉姆河，左岸到肯迪尔根河）一带，贝子旗与克木奇克旗的辖区交错在一起，这两个旗的居民主要从事畜牧业，尽管这里的农业比其他地区发达。³

在乌鲁克木河右岸的唐努旗，有以下几个农业区，首先是苏格鲁格-博穆地区，其次是埃尔别克河流域（这里自古以来就大规模耕种，因此整个地区灌溉沟渠纵横交错），此外在埃尔别克河河口和巴彥河河口之间的草原上的图尔根泉一带也经营农业。播种谷

1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1卷，第390页。

2 阿尔古诺夫：《米努辛斯克边区农业概况》，第42页。

3 雅科夫列夫：《异族居民的民族志学概述》，第20—21页。

物的地区还有卡登河（流入卡登湖）流域左岸，草原上的卡克泉与卡拉-苏格泉，麦日格伊河与埃列格斯河流域，唐努山南坡塔拉雷耶河与帖列克提克木河流入草原的出口处。¹

乌鲁克木河右岸克木奇克旗与唐努旗之间的萨拉吉克旗帕伊嘎拉佐的居民从事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主要是在巴彥河两岸。

马迪佐大规模进行农业生产的地区是塔普萨河河口、谢谢尔利克河流域与巴彥河流域。²

谢谢尔利克河、比格列河与乌尤克河流域的好牧场，当时实际上已被俄国殖民主义者所霸占。

畜牧业与农业的发展水平当时都很低。牧场畜牧业（游牧的和半游牧的）不准备过冬饲草，完全听任自然支配，因此畜牧业经济处于十分不稳定的状态。守旧的耕种方法，过去及现在在某些地区仍占统治地位。一块地连续耕种两年，然后撂荒五、六年，直到地里又重新长出象第一次耕种前所长过的那种植物时，才认为这块地完全可以重新耕种。

根据气候条件，只有在人工灌溉下才能从事农业，因此必须花费一些额外劳动去“饮庄稼”。挖渠进行灌溉，尽管这种灌溉系统很原始，也只有整个村社或个别封建主（他决定修筑水渠时可以吸收经济上依附于他的人参加）才能做到。由封建主建设的灌溉系统变成了剥削那些利用这条灌溉系统的全体居民的工具。

原料加工在多数情况下是每家自力完成的，因此它处于家庭生产的阶段，是游牧民家庭经济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这种家庭生产中还包缝鞋和缝羊皮袄，这种缝纫工作全都由妇女承担。擀羊毛和制毡子在图瓦人的生活中起着重要的作 68

1 科恩：《乌梁海地区考察工作的初步报告》，第19—20页。雅科夫列夫所著前引书，第20—21页。

2 科恩所著前引书，第19—20页。

用。

其他一些手工业部门处于比较高的发展阶段，由专门的工匠经营，这些工匠用自己的制品为周围的居民服务。其中居首位的是打铁业。图瓦铁匠很象欧洲中世纪的铁匠，既会钳工手艺，又会银匠手艺，因此，连锁头这种很复杂的制品都能做得相当精致。但是图瓦当地不产铁。过去曾经繁荣一时的采矿业早已被遗忘了，国内用的金属多半是从俄国商人那里买来的。¹

木工业主要由喇嘛经营。木制品做得很粗糙，其原因是缺乏合适的木料，同时木工设备又很简陋。属于这专门行业的还有专做皮条、鞅具、鞍子、鞍垫、桶等制品的马具业。

应当指出，那些经常生产出精致制品的手工业，如打铁业和马具业，主要集中在图瓦西部地区。这种手工业在克木奇克河流域特别繁荣。

69 这样，直接生产者的经济是由各种行业结合在一起构成的。在这些行业中，畜牧业在托锦旗以外的各个地区都占统治地位。在托锦旗狩猎业占第一位，畜牧业居第二位。凡在当时所拥有的技术条件下可以从事农业生产的地方，居民都把农业与主要行业——畜牧业结合在一起。农产品只为满足自家食用，原料是自家生产自家加工。

那么，将上述各种行业联合成统一整体的经济单位是怎样呢？在民族志学著作中经常可以看到“索克”（骨，氏族）、“氏族首领”等名称。作者使用这些名称似乎出于这样的看法，即图瓦在革命前几十年中仍继续存在着氏族组织。但是经过更严密的观察，这种看法是没有现实根据的。这是由于许多人（有时甚至包括一些“有名望”的作者）对待这一概念没有采取批判的态度。如果把氏族理解为一个由共同的世系和共同的财产联系在一起的人数较

¹ 格鲁姆-格尔德麦洛所著前引书，第3卷，第1部，第84—86页。

多的集团的话,那么,科恩早在二十世纪初期在一篇旅行报告中说的话无疑是正确的,他说:“索克——骨——是一种古老的单位,现在已消失了。”¹这时氏族组织早就过时了,而且看来这一过程距离现在已经非常久远,以致民族志学者确定“索克”这一名词的内涵都很费劲了。



图瓦人制作马鞍

图瓦氏族公社究竟是怎样以及以什么形式解体的,这个问题没有研究清楚。但是,图瓦以北的米努辛斯克盆地²及图瓦以南的蒙古草原氏族公社的解体过程,经过了较多的研究和阐述,可以认为,氏族公社解体始于遥远的古代,但是由于游牧经济停滞不前,所以解体的过程延长了。

很久以前发生的强烈的殖民化过程以及那些居住在上叶尼塞河盆地周围而且其中一部分已经变成图瓦民族的部落存在着完全

1 科恩:《乌梁海地区考察工作的初步报告》,第20页。

2 基谢廖夫:《叶尼塞河流域氏族的解体与封建主义》,国立物质文化史研究院,1933年版。

固定的封建社会结构,这样两个事实使人可以推测,图瓦于十八世纪中叶被大清帝国占领以前,氏族组织早已开始解体了。征服者在图瓦见到的是建立在社会集团互相对立基础上的社会组织。我们还记得,十七世纪图瓦各部落已归蒙古汗即著名的阿勒坛汗所统治。我们还记得雅金甫说,乔罗斯汗“曾向乌梁海汗国征收赋税”。当时乌梁海各部落由宰桑们管辖。宰桑是厄鲁特领主的亲属,他们的官职是世袭的。在厄鲁特被中国人征服以后,“原属阿勒坛汗的乌梁海人仍留在原地(由阿尔泰山起,沿唐努山脉往东,直到叶尼塞河发源地)游牧。这些部落(поколение)的王公都服从《中国理藩院则例》中对蒙古规定的法律,听从其牧区所在地区的总司令的统辖。”¹

图瓦也同其他地方一样,封建制度形成的过程中总有一批氏族显贵和贵族家庭从原始氏族公社中分离出来,这些氏族显贵和贵族家庭,由于剥夺共同族人和征战胜利,而积累了大批牲畜和沦为奴隶的俘虏。

早期的贸易发展促进了私有制的出现。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当时的贸易网已遍布中亚各地。而氏族公社内部的财产差别,炸毁了共产制氏族组织的基础,使它遭到了彻底破坏。²

高踞于氏族公社之上的氏族贵族,很快就变成了封建主阶级。他们企图使整个氏族公社都听命于自己,并且首先霸占了牧场和饮马场,还把广大的游牧人变成了自己的牧奴。新的封建主阶级同直接生产者斗争的结果是,氏族公社的反抗遭到了彻底的失败,它们的畜群被剥夺,牧场也被抢占,封建制度在草原上建立起来

1 雅金甫:《厄鲁特人(即卡尔梅克人)的历史概况》,第135页。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4卷,第160页(《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原文为:“各个家庭首长之间的财产差别,炸毁了各地仍然保存着的旧的共产制家庭公社;同时也炸毁了在这种公社范围内进行的共同耕作制。”——译者)。

了。

值得指出的是，从图瓦的民间创作中还可以听到从那遥远的 71 年代里传来这场斗争的微弱的反响。¹

最后，家庭在很久以前就已变成社会经济单位，这一事实也证明氏族组织已彻底解体了。属于家庭的牲畜和财产在下一代的成员中间进行分配。儿子成年结婚后，便离开父母的毡包，带走一部分财产，这些财产为成立新的经济单位打下基础。父亲的毡包和剩余财产由最小的儿子或姑娘继承。“母亲在世时，儿子只有结了婚才能成为有权的人，在这之前他被认为是没有行为能力的人，通常被轻蔑地称为‘住在妈妈毡包里的人’”。²

我们认为，图瓦在进入殖民地时期时，氏族制已经解体，因而已经没有了氏族的私有制，也没有氏族公社了，但是这并不等于否定古老的氏族组织的残余仍具有一定的生命力。

氏族制度的各种成分在新的社会经济结构中仍然存在，但是“形式上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而且变得滑稽可笑了”（恩格

1 最先收集图瓦民间创作的是著名旅行家波塔宁。他把一些民间创作收集起来，发表在其著作的第四卷（《西北蒙古概况》）里。在波塔宁之后，据我所知，又有科恩继续这一尝试。遗憾的是，他所收集的材料，除一篇名为《勇士惠蒂卡尔》的童话（这篇童话是克木奇克的一位图瓦人讲给他听的）外，其余都没有发表。这篇童话讲的是勇士惠蒂卡尔的功绩。他有很多财产、牲口和肉，马笼头和鞍子都是金银做的。套马索是用金带编的。他的皮袄用黑色绸缎缝制，帽子是黑貂皮的。他一个人的力气能顶一万个人。他共有一百零八个妻子。一次他出去检查自己的马群，发现黑色的“布尔”（未阉过的骆驼）不见了，便出去寻找，一去就是许多年。半路上他遇到了另一个勇士，叫阿克汗。两人搏斗起来，他把阿克汗杀了。阿克汗临死前遗言将马和妻子交给惠蒂卡尔。以后故事又讲到惠蒂卡尔是怎样侵占了阿克汗的财产。人民一看见他就都吓得四散逃跑。于是，他便把阿克汗的遗书拿出来给大家看。当他们带着礼物来到他跟前，他对大家说：“你们现在归我了，你们的国王已经被我打死。不要杀死没有母马的马驹，这些牲口也都是我的了。你们从今天起就是我的臣民，一个月以后，你们就迁到我这边游牧吧！我先走了”等等（科恩：《乌梁海地区考察工作的初步报告》，第 58—68 页）。

2 格鲁姆-格尔日麦洛所著前引书，第 3 卷，第 1 部，第 122 页。

斯)。^{1①}

氏族关系的许多残余继续存在，变成了封建剥削者的支柱和超经济强制的工具。氏族关系的残余所起的这种作用，一点也没有改变封建关系的内容，只不过用传统习惯和仪式把封建关系掩盖起来而已。不论是封建剥削者，还是征服者都善于利用旧的形式体现新的内容，使这种残余为自己的利益服务。而这种旧的残余也就是在为新的阶级服务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图瓦被征服的社会后果，自然首先受到了图瓦经济发展内在条件、氏族公社的解体和社会关系的封建化的制约。但是，因为中国方面不但有军事优势，而且有经济优势，所以在征服者的政治力量影响下，氏族组织解体的自然进程肯定会获得更快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征服者的暴力所起的作用与经济发展的方向是一致的。

中国征服图瓦的结果是：1. 使建立在血缘关系和共同财产基础上的原始公社迅速解体为一些小的家庭，基本生产资料在这些家庭之间进行分配；2. 使直接生产者与统治阶级之间的距离加大了。这说明阶级对立加剧了。土地在形式上归大清帝国所有，大清帝国仍使图瓦的统治阶级保留着土地的实际使用权。图瓦仍然是分裂成一些人口寥寥无几的游牧集团，游牧集团组成了一些小公社，但这已不是氏族公社。这种公社的职能是：1. 调整牧区。2. 协调简陋的沟渠灌溉设施的使用。公社是若干家庭为完成其面

1 我们也发现过这种残余，尽管表现在一种比较无害的习俗上，这种习俗叫“乌贾”(уджа)，现在已经逐渐消失了。雅科夫列夫、科恩和格鲁姆-格尔日麦洛都描述过这种习俗。格鲁姆-格尔日麦洛写道，这种习俗用俄语来表达就是“见面分一半”。如果一个猎人把黑貂赶上了树，这时被另一个猎人看到，只要后来的猎人喊一声“乌贾”，前一个猎人就得同意和他一起猎捕这只黑貂。这种对半分的习惯在捕鱼、瓜分各种外财，甚至分赃时都适用(格鲁姆-格尔日麦洛所著前引书，第3卷，第1部，第63—64页)。

① 恩格斯的引语未注明出处，按词面翻译。——译者

临的某些共同任务而结合在一起的一个组织。

这仅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但是，我们不会忘记，图瓦是中国的一个遥远边区，中国人自己对它也不太了解。他们把图瓦人称作“乌梁海人”。中国人用这个名称称呼居住在蒙古边远地区的他们所很少了解的部落。有人说，“乌梁海”这个词的意思是住在森林里的人。有人说这个词的意思是指衣衫褴褛、受人鄙视的人。还有人认为，这个词具有另外的意思。很可能，中国使用“乌梁海”这个词就象过去俄国人使用“鞑靼”这个词一样，作为一个集合名词，前面再附加一个地理名称，如喀山鞑靼、克里米亚鞑靼、米努辛斯克鞑靼等等。

图瓦是一个人们不甚了解的地方。它周围是一些广阔的半沙漠式的草原。须克服很大困难才能进入这个地方。同时，图瓦内部又分成许多彼此隔绝的居民地带。图瓦地广人稀，居民分散在河谷、湖畔盆地、山谷和密林深处。一个居民地带与另一个居民地带之间距离很远。在这种地区分散、互相隔绝的情况下，榨取剩余产品的活动是怎样组织的呢？

既然封建社会象其他一切阶级社会一样，把奴役居民与榨取剩余产品作为自己的主要目的，那么，怎样才能在这些经济上和地理上都互相隔绝的居民地带里比较有系统地组织榨取剩余产 73 品的活动呢？很明显，只有采取地方分权的办法。在被满族征服之前，蒙古王公曾是图瓦的封建领主。但是，由于征服者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绝对服从中央政府的地方政权，所以理想的人选自然只能从当地民族的上层分子中物色。而升官晋级的条件肯定会使他们与征服者的关系更加密切起来。

我们知道，封建主阶级无论何时何地都是包含不同的阶层：有的是贵族大地主，有的是小的军职人员。封建政权的性质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这两个集团中哪个集团占统治地位来决定的。既然在

图瓦的发展上反映了中国社会制度的特点——满族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制，所以，这种中央集权制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它在这个被征服的、没有大封建贵族的外省地方的社会基础的成分。

在图瓦，一方面把大片的王公领地分成若干小块，另一方面，又选派一些小军职人员和总管，他们与其他大军职人员即所谓官吏组成了以封建关系为基础的榨取剩余产品的地方机构。大的氏族，例如唐努旗的吉尔吉斯族（大总管就属于这一族），代表图瓦的封建所有制，掌握着超经济的强制权。但是，除了氏族贵族之外，当总管的也有出身于社会底层的人，即平民。克木奇克旗最卓越、最能干的总管海都布就是一个普通阿拉特女人的私生子。这些人把所获得的新的社会地位和官衔都归功于清王朝，因此他们在贯彻执行中央政府的政策时，要比成吉思汗的后裔——蒙古大封建主更为得力。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一些蒙古王公，主要是图瓦征服者的后裔，仍保留了几个旗作为领地，这些旗成了他们蒙古封地的边缘地带。清政府经常企图限制其蒙古附庸的权力，缩小其封建剥削的基地，这种趋势表现在准噶尔被征服后，蒙古阿勒坦汗的大部分领地被分给了一些小的附庸，而且，这种割划封地的政策，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几乎一直继续到 1911 年中国（辛亥）革命前。在图瓦，是些小的附庸——总管取代了那些大封建主。他们象蒙古封建主那样对其所统治的居民和居民的财产拥有无限的权力。在总
74 管的财产与其所辖居民的财产之间没有界限的这种情况，在图瓦同在蒙古一样，甚至超过蒙古。这使总管成为图瓦经济生活中起重要作用的一个因素。对每个生产者的经济来说，生命攸关的一切指示都是从他那里发出来的。总管负责在本旗成员之间摊派官差，规定赋税和在本旗居民之间划分居住区。因此，他可以使一些人生活条件好些，使另一些人生活条件差些，可以使人发财，或者

使人倾家荡产。每个总管都有权将本旗居民所有的一切全部拿走，随意加以支配。¹虽然对“法定捐税”的数额有过明文规定，但实际上这些规定都没有得到执行。总管可以随便从老百姓那里拿走他所需要的东西，而且愿意拿多少就拿多少。当然，总管无权判处其统治下居民的死刑。所有趋向于判死刑的重罪案件都要在乌里雅苏台进行审理，但是被告往往等不到乌里雅苏台审理，在当地侦讯期间，便按照总管的命令被拷打死了。²

总管的权力象蒙古扎萨克的权力一样是世袭的：父子相传，而且经将军批准还可以传给近亲。但是在图瓦和在蒙古都有过总管由于犯了某种罪行，或有时仅仅因为不称职就被清政府革职的例子。在总管自愿或被迫离职后，总管的职务就由他的长子或某一亲属继承，在个别情况下也有由外人接替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图瓦逐渐形成了由本旗世俗和寺院上层人物选举本旗总管的制度。有一种习俗作为旧的残余仍然保留下来了，这就是总管要从前总管的继承人中选举，但是将军可以不批准选举结果，甚至批准以后仍可更换。³

例如二十世纪头十年代初期，根据将军的命令撤换了克木奇克旗的总管，被选出来接替总管职务的甚至不是他的同族。在托锦旗总管革职后，被选出继承他的职务的不是他的儿子，而是他的远亲。⁴

蒙古王公的世袭领地有的被保存下来了，但由于这些领地距离太远，因此已不能牢靠地占有了。可以从蒙古王公那里剥夺这些领地转给现任的任何一个总管。精力充沛而好用权势的克木奇克旗总管海都布力图将夹在他领地中间的贝子旗弄到手，而且最

1 波兹德涅耶夫所著前引书，第164—165页。

2 雅科夫列夫所著前引书，第93页。

3 波波夫：《越过萨彦岭去蒙古》，第2部附录，第24—25页。

4 同上。

75 后终于达到了目的。

科恩在其著作中描述了图瓦复杂的行政机构¹。根据他提供的资料,图瓦行政机构组成如下:

大总管在恰赞(或塔马)公署协助下管理所辖各旗。这个公署的成员有:

1. 旗的扎兰负责行政管理工作;
2. 梅楞(又译梅伦)负责本旗司法工作及与“异族人”(居住于本旗境内的俄国人、蒙古人、中国人等)有关的工作;



以刚愎自用的大富翁、自称阿勒坛汗后裔的波斯图·萨伊格尔奇为首的克木奇克旗的一些封建主官吏。

3. 比杰其(秘书);
4. 由唐努旗、萨拉吉克旗和托锦旗派来的值勤官吏。顺便说一下,哈苏特旗和大旗各有自己的恰赞,不给大总管的恰赞派值勤官吏。贝子旗与马迪旗不归大总管管辖,而由蒙古王公管理。

每个旗又分成佐,佐的管理处有以下成员:

1. 苏木章京(佐领)是管理本佐的官吏,并负责处理本佐与其

2 科恩:《乌斯边区》,克拉斯诺亚尔斯克,1914年版。

他佐之间的关系。他负责把收缴的阿尔班赋税交给大总管，如大总管需要，须陪同大总管把阿尔班赋税送到乌里雅苏台。苏木章京离职期间由扎兰代理他的职务。

2. 扎兰是执行特别任务的官吏，类似“军职人员”，享有特权。他的官衔由大总管任命，在大多数情况下是通过给大总管送厚礼得来的。他的浅蓝色顶子也可以由大总管决定摘掉。扎兰的权力是临时性的，任务执行完毕，他的权力也就丧失。

3. 浑杜是佐领的助手，负责全佐内政和处理诉讼。苏木达尔加是他的属下，在他不在时代理他的职务。

4. 苏木达尔加是包希卡（贡赋征收人员）的头目。阿尔邦达尔加把了解到的犯罪情况报告给他。比较简单的案件，如盗窃案，而且犯人又已供认不讳的，由苏木达尔加个人处理，比较复杂的案情交浑杜审查。

5. 包希卡征收贡赋、捕捉罪犯交付法庭审判及负责监督处罚的执行。每个佐里都有几名包希卡，每一阿尔邦¹有一名。

6. 阿尔邦达尔加是阿尔邦的司法和行政官，官职很小，主管一切琐碎事务。近来，阿尔邦达尔加已毫无威望，谁也不服从他，他的判决无人理睬。阿尔邦达尔加中最有才干最善于指挥的人，在苏木达尔加不在时，代理苏木达尔加的职务。

苏木达尔加、包希卡和阿尔邦达尔加 *de jure*（在法律上），都是由全佐（前两种官职）和全阿尔邦（第三种官职）选举产生的官职。实际上，选举这些官员时，居民却被撇在一边，这些官员是由几个车希（чешь）——有权有势的人在一起选出的。

7. 比杰其——抄写员、秘书，他们不论在法律上还是实际上都没有任何权力，只是在执行任务时有一点临时授与他的权力，而

¹ 阿尔邦纯属行政机构。第一次户口普查时每个阿尔邦有十户牧民，后来户数大大增加了。

临时权力的大小则完全取决于任务本身的重要程度。有时甚至苏木章京都要听命于比杰其。

除上述各种官员外,在大总管和总管跟前供职的还有:

1. 哈:类似宫内官吏,专门完成大总管或总管所委托的私事。哈的官职是由大总管或总管委派的,博得他们欢心的人便可受到委派。哈是一些最受人喜爱的勇士,勤奋的牧民,等等。阿雅克哈在哈中占有特殊的地位。他是给自己长官端碗的人,长官授权给他端碗。这有点类似古波兰的端碗官(*podzaszy*)。阿雅克哈把这个碗放在一个特制的篮子里,用带子背在肩上。

2. 卡切嘎是大总管、总管和恰赞的护兵,干各种粗活。每个旗都向恰赞派出一名卡切嘎,轮流在大总管处值勤。¹

77 统治阶层中还包括宗教界,确切地说,就是还包括图瓦各地喇嘛庙中担任高级职务的那些喇嘛。不论在蒙古还是在图瓦,喇嘛庙都设在各旗总管公署附近。这种地方既是旗的行政中心,自然会吸引许多人来居住,因此便成了最容易赚钱的地方。至于谈到喇嘛,就其出生来说,他们都是本旗人,差不多都有自己的家业:毡包和牲畜。² 自然,喇嘛庙中有权有势的高级职务不是被那些与旗的总管有亲属关系的人占据,就是被那些因长期当喇嘛而发财致富的人占据。

除了旗的喇嘛庙外,还有佐的喇嘛庙,佐的喇嘛庙只包括一座大殿,没有供喇嘛居住的僧房。喇嘛只在节日拜佛念经的时候才到这里来。

图瓦究竟有多少座喇嘛庙不得而知,但根据接受俄国“保护”的各旗总管宣布,在克木奇克地区十五座喇嘛庙中曾举行祈祷和

1 科恩:《乌斯边区》,第90—91页。

2 波兹德涅耶夫:《佛教寺院生活习俗概述》,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民族志学论丛》,1887年版,第16卷,第15页。

“为查干迪尔^①神擘经”，从这一事来看，喇嘛庙的总数当在二十座⁷⁸以上。

最大的喇嘛庙可以举出以下几座：在查丹河流域，位于克木奇克旗大总管处旁边有一座很富的喇嘛庙，一座位于克木奇克河上游巴尔雷克河河口上方，一座位于萨马加耳太河流域唐努旗大总管处附近，一座位于达尔哈特旗希希基特河上游。巴尔雷克喇嘛庙、唐努喇嘛庙和达尔哈特喇嘛庙都有自己的汉布喇嘛，汉布喇嘛相当于东正教大寺院的主持，是由最老的僧侣（多数是由寺院的副主持，即所谓佐尔吉喇嘛）中间选举产生，尔后由呼图克图及旗的总管批准。

图瓦的佛教寺院与蒙古的佛教寺院一样，它同时又是一个商业企业，既是贸易办事处，又是信贷机关。根据商业流通和作用，其周围有许多货栈、分店及牛、羊、马群。它同中国的商行和蒙古的喇嘛庙都有商业联系。

由于这种商业活动在喇嘛庙的生活中占有显著的地位，所以，寺院里有一部分喇嘛专门从事这种活动。喇嘛庙为此特设尼尔巴（财务喇嘛），负责采买和验收一切入库的货物、签订承包合同、开展贸易业务，等等。其次，还有扎萨克喇嘛（或称杰姆共），是尼尔巴的助手，负责领导看管寺院畜群的牧人、检查财产，等等。

总管这一阶层尽管产生的时间比较起来并不久，但是统治阶层同社会底层、直接生产者阶级之间的社会界限，还是相当清楚的。军事组织原则成了行政机构的基础。封建主阶级对受奴役的生产者阶级实行赤裸裸的封建主阶级专政。以大总管为首的总管与其他官吏们一起执行这一专政。这些官吏（往往同总管一样，出身微贱）都是总管的亲密助手。

图瓦的牧奴基本上分为两类。一类是王公的牧奴，即蒙古封

^① 原文是 Цаган-дир。——译者

建主的奴隶，另一类是总管的牧奴，而且后者占依附人口的多数。那么，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无偿的剩余劳动时采取了什么经济形式呢？

占首要地位的是“阿尔班”（即国家赋税）。我们知道，在国家土地所有制的条件下，课税与资本主义前的地租和在当时条件下的实物地租是相同的。剩余产品以阿尔班的形式落入最高土地所有者满洲人的手里。

图瓦虽然位于中国遥远的边境地带，但是既然它已成为中国 79 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以封建剥削为基础的社会劳动分工过程便把图瓦同奴役它的国家联系在一起了。

自然，畜牧业可以部分地充当这种联系，但主要充当这种联系的是狩猎业。狩猎业提供贵重毛皮，这种贵重毛皮是统治阶级所需要穿用的，同时还作为“货币”商品，可用来换取其他任何商品。如果考虑到图瓦与中国相距遥远，那么，皮货价值高、分量轻，便于运输，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属性。

征服者把图瓦盆地看成辽阔的猎区，认为那里的生产者阶级应把剩余劳动的产品用实物阿尔班的形式交给外来的统治阶级。在以封建生产方式为基础的社会劳动分工体系里，图瓦的“专业”是提供貂皮、猞猁皮及其他毛皮。

从这个角度看，清政府对图瓦采取保护政策的动机就可以理解了。清政府派军队守卫，禁止其臣民越过沿唐努山设置的警戒线，是想用这种办法保护其国库利益，因为如果让中国商人剥削居民，国库收入就会下降。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所实行的政策与俄国政府在类似情况下在西伯利亚所实行的政策是相同的。¹

1 为了进行比较，引用一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长官巴克拉诺夫斯基 1733 年给萨彦城堡的管事叶尔米洛夫的命令：“他们住在萨彦城堡附近的实物税区，因此那些缴纳实物税的外乡人有不少都破产了……你应该把那些移民赶回原来的住地，他们在这里的房舍以及其他设施等等一律拆除。”引自瓦京著作第 93、94 页。

国家的赋税包括八种毛皮：灰鼠皮、黑貂皮、猞猁皮、水獭、雪豹皮、狼皮、貂皮和狐皮。这些兽皮可作为阿尔班上交，其他兽皮一概不行。每个旗都在各个佐里进行摊派，根据佐领和扎兰所提供的纳税人财产状况表收税。各佐当局负责收缴，把收上来的毛皮先交总管检验。每张皮子上都认真记载着缴纳者的姓名，便于以后在乌里雅苏台检验，发现不合格的毛皮时，可以知道要谁补缴。收缴的毛皮最后再上交大总管，由他运往乌里雅苏台上交国库。

阿尔班在清王朝末期规定为三千乌雷格。¹ 乌雷格是缴纳阿尔班的计算单位，每个乌雷格合三张貂皮。这样，从图瓦的盟总共 80 收缴九千张貂皮。貂皮数额不足时可用其他兽皮代替。

按照规定，富裕户缴三张貂皮，中下等户几户合伙缴一份，每户至少分摊十张灰鼠皮。但是，因为每旗应缴纳的赋税额是固定不变的，而纳税人数量却在减少，所以赋税的重担便落在剩下的各户肩上。² 每户应缴税额由十张灰鼠皮到十张貂皮，即由三卢布到四百卢布不等。据认为，图瓦人仅仅在缴阿尔班税上，平均都远远超过了其全年收入的三分之一。³

蒙古王公的领地贝子旗与大王旗的阿尔班，据俄国商人记载和图瓦人自己证实，是每头牲畜交一两银子（一卢布三十戈比）或每十头牲畜交一头。⁴

1 阿德里安诺夫指出，在他旅行期间，即八十年代初，图瓦的盟交纳一千乌雷格。这样，在二、三十年中间，尽管经济状况不断恶化，而国家赋税却增长了两倍。这里还应指出，绍伊热洛夫（纳佐夫）在他的《图瓦人民共和国》一书（13 页）中计算每年阿尔班税额的方法是错误的。他把图瓦的总户数一万二千乘以三（貂皮数）得出三万六千张貂皮，合现金一百八十万卢布（一张貂皮按五十卢布计算）。

2 格鲁姆-格日麦洛所著前引书，第 3 卷，第 1 册，第 166—167 页；见科恩：《乌梁海地区考察工作的初步报告》，第 38 页；雅科夫列夫所著前引书，第 67 页。

3 罗杰维奇：《乌梁海边区概况》，第 21 页；波波夫：《越过萨彦岭去蒙古》，第 136—137 页。

4 鲍戈列波夫和索波列夫合著的《俄蒙贸易概况》，第 146 页。

由于只有规定的几种兽皮可以作为阿尔班，所以这几种兽皮在图瓦的价格要比在西伯利亚贵得多，图瓦牧人（不是猎人）被迫用高价向俄国商人和中国商人购买这种兽皮作为赋税上缴，最常见的情况是用牲畜去换。¹ 虽然图瓦有些地方盛产毛皮，但是在其从俄国进口的物资中却有一部分是“阿尔班兽皮”，其原因就在于此。

除了国家赋税外，总管所辖各旗的居民还要缴纳旗的赋税。² 而蒙古王公所属各旗的居民每年则须另纳年贡，前边已经讲过，这种年贡有专人前来收缴。这两种赋税数额究竟多少不得而知，文献资料没有直接记载，但是如把现有的间接记载同这方面记述丰富的蒙古文献所提供的事实加以比较，我们对总管及其亲信的横征暴敛可以获得某些概念。

各旗总管甚至不用花费自己的财产来养活自己，他们的一切需要都由各旗供应，用分摊的办法由居民向总管供应一定数量的绵羊、茶叶、燃料及其他物资，除抵消日常开支外尚有裕余，并使他能够养活很大一批仆人，这些仆人都住在总管附近的毡包里，为总管打柴、挤奶、剪羊毛、做奶制品以及放牧牲畜，等等。

阿尔班、旗的赋税和年贡都是正常赋税，此外还有许多以各种理由随意规定的特别捐。在这些特别捐中，首先应提到温德留格。温德留格同阿尔班近似，也是定期性的，每年一次。这种特别捐是专为送给乌里雅苏台验收毛皮的官吏们的，目的是使他们在验收毛皮时不致吹毛求疵。大总管带往乌里雅苏台的这笔款子，是从各个旗征收来的，数额很大，而且还在不断增加，征收手段之残酷与收缴阿尔班无异。

其次是各旗总管为抵消自己的开支而征收的捐税，他们的这

1 罗杰维奇所著前引书，第 21 页。

2 波波夫所著前引书，第 137 页。

些开支大部分用于进行大量贿赂，是各总管在乌里雅苏台和北京为巩固官位、获得奖赏（顶珠、黄马褂、封号等等）时使用的。

克木奇克旗总管海都布为了获得帽上的红顶珠和花翎（这可以使他不受大总管的辖治），在乌里雅苏台送的礼竟达六万两银子（约九万卢布）。

1908年，海都布又向乌里雅苏台将军贿赂一万七千两银子，结果，得到了贝子旗。这笔款是他向中国商人借的，但债却要由全旗偿还。全旗在一年内要向中国商人偿还近二十万卢布的逾期债款和高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利息。¹ 托锦旗两任总管共向俄国商人萨多夫斯基借债一万五千张灰鼠皮。前任总管借了七千张，后任总管（上任一年死了）借了八千张灰鼠皮，他们死后债款由全旗偿还。

中国官吏和蒙古官吏因事到图瓦出差，对图瓦来说那是真正的灾难。仅仅这个消息就足以使居民害怕。“总管们听到中国珠尔甘（дзурган）即将到来的消息以后，便立即转移牧场，生怕被这些官吏遇上。任何自然灾害也比不上中国官吏的到来。”² 因为这些官吏一来通常就得送礼，礼物的多少要看到来的官吏的品级高低。例如，有两名中国侦讯官“丘尔甘”（чурган）为调查几名俄国猎人杀害一名图瓦猎人的案件来到图瓦，使一个图瓦公社花费了六千卢布。同年，另一批官吏来侦查克木奇克旗总管海都布的案件，克木奇克旗花费竟达三万卢布。³

绍伊热洛夫（纳佐夫）公布了一份饶有趣味的文件，并附有1893—1906年贝子旗向其总管“送礼”及向前来出差的官吏行贿

1 罗杰维奇：《乌梁海边区及其居民》，载《俄国地理学会通报》，第48卷，1912年版，第163页。

2 科恩：《乌斯边区》，第101页。

3 罗杰维奇：《乌梁海边区概况》，第21页。

的开支表。

82	1893 年行贿 1,000 头羊(每头合 1 卢布)	
	共计	1,000 卢布
	1893 年行贿 70 头牛(每头合 40 卢布)	
	共计	2,800 卢布
	1904 年行贿 1,000 头牛(每头合 40 卢布)	
	共计	40,000 卢布
	1904 年旗总管儿子婚礼费用白银 1,000 两,合	
	现金	1,300 卢布
	1905 年祝贺旗总管得到贝子爵号用银 2,000 两,合	
	现金	2,600 卢布
	1906 年祝贺旗总管得到贝子爵号用银 10,000 两,合	
	现金	13,000 卢布
	一个旗在十三年中共花费	60,700 卢布。 ¹

由于中国官吏的到来,图瓦居民不仅要送给每个中国官吏几千卢布的礼,而且还要负担沉重的乌尔顿(уртeльная повинность),即提供马匹、骆驼、驭手、毡包和食品。显然,官职越高,居民负担的乌尔顿便越重。

绍伊热洛夫(纳佐夫)引用了图瓦大总管为了准备迎接 1908 年到西部边境视察的乌里雅苏台将军呼比赛塔(译音)而给各地方当局的指示。其中说:“每个驿站都须做好如下准备:

1. 为将军大人准备二十七匹拉车的马、八匹备用马、一匹乘马、十峰驮载骆驼、一个帐篷、十六名驭手和相应的法定数量的食用羊。

2. 为大人的随员准备十二名骑马的驭手(供驾驭官吏乘用的车辆)、八匹备用马、六匹引马、四名骑马的驭手、两匹乘马、六峰驮载骆驼、六匹驮马、四个毡包和相应数量的食用羊。

3. 为随同大人前来的蒙古官吏和士兵准备七十匹乘马、二十七峰驮载骆驼、三十匹驮马、二十二名骑马的驭手、十五个毡包、两

¹ 绍伊热洛夫(纳佐夫)所著前引书,第 14 页。

个帐篷和法定数量的食用羊。²¹

因此,将军通过的每个驿站都应准备二百二十二匹马、四十三峰骆驼、六十四名驭手、十九个毡包、三个帐篷及其他物资。这位大官在一天当中要路过三个驿站,换句话说,要换三次马和骆驼等运输工具。不难算出,中国大官进行一次为期二十五天到三十天的舒适的旅行,需要图瓦人民付出多么大的代价。

当然,官吏的等级越低,随从人员也越少。但是,甚至一名普通的佐领(一个佐的首领)出差也需要一两名人员护送,而且出差次数非常频繁。还应指出的是,官吏在路过驿站时,并不食用规定给他的那半只或四分之一只羊,而是要求付给他银子。同样,他也不要毡包、柴禾和水,而要求为此付给他钱,每到一站拿了钱就走,毫不停留,一天要路过好几个驿站。此外还经常发生官吏将运送他们的马匹赶走的事。

使图瓦经济遭到破产的,不仅是世俗政权的剥削,而且还有喇嘛(其中既包括个别喇嘛,也包括整座喇嘛庙)的剥削。下面我们仅举几个最主要的剥削形式为例。

首先必须指出,为修建各旗喇嘛庙所征收的捐税。这种建筑和维修喇嘛庙的经费由喇嘛庙所在的旗负担。一所喇嘛庙里每次新建一座神殿或者改建庙宇的某一部分时,都要同时为所有喇嘛庙向全旗征收一次捐税,用这笔款子来抵补其他方面的花销。²

有些资料说明,不仅建筑喇嘛庙,而且维修喇嘛庙都得靠居民缴纳的特别捐税和正常捐税。喇嘛为了给社会和私人举行佛事而经常收缴捐税。这种捐税在文献资料里有大量的反映。

奥斯特罗夫斯基赫写道:“大多数喇嘛靠为其信徒举行各种佛事而得到的施舍为生,并且每年还到最远的地方去化缘,带回貂

1 绍伊热洛夫(纳佐夫)所著前引书,第15页。

2 波兹德涅耶夫:《佛教寺院生活习俗概述》,第15页。

皮、狐皮、灰鼠皮等各种布施。”¹

再看看另外一位作者是怎样描写的：“对边区来讲，喇嘛是个天大的祸害。只要他们得知哪个毡包里有人奄奄一息，他们便成帮搭伙地赶到那里去念经，而且连续许多天又吃又拿。这样的念经和葬礼甚至常常把富人也变成了穷光蛋。”²

最后，在高级喇嘛到来时，上述敲诈勒索的丑剧几乎要全部重演一遍。罗杰维奇在克木奇克河谷旅行时，在查丹遇上了一个从蒙古来的格根。“为了供养和服侍格根、他的随从以及全体喇嘛庙人员，竟动员了一个大索约特村子的全体人员。格根是神圣的，他以及他的意愿是绝对不能违背的。索约特人要提供牲畜和各种贵重物品，以便让他带回蒙古去，他想要多少就提供多少。”³

84 同时应当指出，这些喇嘛庙本身也经常遭到总管的掠夺。喇嘛庙好比一块海绵，当它吸饱各种物质财富时，总管便把那些财富榨取出来装进自己的腰包。

这样，组成图瓦社会制度基础的是小直接生产者，他们具有基本的生产条件，在超经济的强制力逼迫下，不仅提供剩余产品，而且把自己所必需的一部分产品也交给了封建社会上层人物（封建社会各种上层人物分别处于等级阶梯的各级梯阶上）。剩余产品是以马克思称之为实物地租的形式被从直接生产者身上榨取出来的。

实物地租是对图瓦牧民进行封建剥削的一种基本的，但不是唯一的形式。另外还有一种剥削形式，那就是工役地租。它与实物地租结合在一起便体现了图瓦当时形成的社会生产关系。遗憾

1 奥斯特罗夫斯基赫：《以养鹿为生的图瓦人》，载《北亚》，1927年，第5—6期。

2 明茨洛夫：《秘密使命》，第208—209页。应把这一评语同格鲁姆-格尔日麦洛在《西北蒙古与乌梁海边区》一书中对喇嘛教在该边区活动的评价加以对照。

3 罗杰维奇：《乌梁海边区及其居民》，第161页。

的是,后一种剥削形式在文献资料中缺乏足够的阐述。



图瓦人举着白桦树树根制成的杵在用木头凿成的臼里捣黍子。

占有大批畜群必然会使封建主和上层神权人物感到需要利用他人的劳动来为自己看管畜群、制做奶制品及经管家务。在半自然经济的社会里,封建主经济使用他人劳动的唯一可能的形式就是劳役地租。实际上,正如上面所指出的那样,每个总管和大总管的“庄院”里都有一些依附于他们的人,这些人住在总管附近的毡包85里,干的是仆人的活。

徭役的形式之一是“梅德”。所谓梅德就是每佐每年派一户人家自带毡包去为总管服劳役一年。

这些人轮流给恰赞当仆人,为总管及其官吏放牧牲畜,递送文件,传达命令,等等。此外,每个毡包里还住一名单身汉,这些单身汉是佐里派来为总管服役的人,称为“诺颜绍达马”,这些人每月更换一次。“梅德”和“诺颜绍达马”都由他们的头目——从梅德当

中选出的梅德达尔加管辖。这种“梅德”制在各旗的喇嘛庙里也实行过。

还有一种徭役叫驿递劳役。它沉重地压在居民的肩上，因为驿站(乌尔顿)很少，而行人来往却十分频繁。¹

实物地租和工役地租(后一种地租采用的范围要小得多)是迫使独立生产者交出产品的主要形式，而交出产品数量的多少由掌权人的胃口大小来决定。

几十年来从牧人手里榨取的产品仅有一小部分留在图瓦封建主的手里，而其余绝大部分都已流往国外。这种强制收缴贡赋的范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象雪崩那样在扩大，不仅掠夺剩余产品，而且还掠夺必要产品。这种状况不可避免地会导致生产力的下降和经济的衰退。这完全是上述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必然结果。

文献资料中经常可以看到有关图瓦居民在革命前二、三十年中间经济水平不断下降的记载。罗杰维奇写道：“这些苛捐杂税超过畜群的利润已经有几年了，索约特人，特别是其中的富户，渐渐开始破产了。他们当年曾是蒙古著名的大牧主，现在，谁有一百头牲口，谁就算最大的富翁了。”²他还写道，摊派的贡赋数额如此巨大，以致把索约特人繁荣昌盛的根基破坏了。³

波波夫在对图瓦和蒙古的经济进行统计以后得出结论说，仅“法定”赋税一项就已夺去牧人收入的三分之一以上。

其他许多研究家(科恩、雅科夫列夫、卡塔诺夫)也有关于图瓦居民普遍日益贫困化的类似说法。这一普遍贫困化的过程肯定是当时社会制度的必然结果，因为在那种社会制度下，畜牧业年年是
86 在日益缩小的基础上进行再生产的。

1 叶尔莫拉耶夫所著前引书，第 13 页。

2 罗杰维奇所著前引书，第 163 页。

3 同上，第 161 页。

这种制度的重要特点，不仅在于广大群众日益破产和极度贫困化，而且连生活富足的上层分子（当然不是指那些上层封建官僚），也无法保持其富裕生活不被当局的敲诈勒索和为所欲为所断送。所有的资料都一致指出，图瓦巴伊阶级^①的经济基础是不巩固的。巴依的经济规模日益缩小：搜刮的范围过去是几十户，现在却只有几户了，因为其他各户早已被掠夺一空，变得一无所有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一贫如洗的户数日益增多，所以，负担日益增加的课税的户数也越来越少，其经济必然走向破产，至少其中很大一部分会如此。

各旗总管、高级官员和喇嘛庙是不纳贡赋的，如果他们有时为了得到官职、爵位和奖赏等而需要花费大批款子去行贿的话，他们便会把自己的开销转嫁到全旗居民身上，在这种情况下，居民只能用自己的财物去给他们花费。

为了说明富裕户是怎样破产的，不妨举雅科夫列夫所讲述的事实为例：“有一个索约特人，他拥有二百匹马、七十头牛、二百只羊。1898年6月以前缴纳的各种捐税共合六百张灰鼠皮、五张猓狗皮、五张貂皮、五匹母马、五只绵羊、五只山羊、四头成牛……捐税可能还没有收缴完毕。”¹

科恩叙述了一个叫阿克-赫姆的富裕户破产的经过。他因不愿向乌里雅苏台官吏缴纳不断增长的费用而被逮捕，遭到拷打，并且被监禁了两个月。出狱后发现，他的财产一部分被盗走了，另一部分被拍卖作为抵偿他所应缴纳的捐税了。他的全部家业被彻底弄光了。

在图瓦甚至一部分富裕户也遭到破产，这一事实说明，本地积

^① 巴伊阶级（байство）是中亚地区的地主、牧主、富农、财主等人的总称。——译者

1 雅科夫列夫所著前引书，第67—68页。

累是不可能实现的,即使能积累的话,其范围也是非常狭隘的。

尽管如此,在直接生产者中间经济上两极分化的现象却有增无已。马克思在分析征收实物地租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削时指出,存在实物地租时“也会使各个直接生产者的经济状况出现更大的差别。至少,这样的可能性已经存在,并且,这些直接生产者获得再去直接剥削别人劳动的手段的可能性也已经存在。”²¹这样,在存
87 在实物地租的情况下,存在着个别直接生产者去剥削其他直接生产者的可能性,我们从图瓦的例子中可以看到这种情况。虽然依附的属民遭到了无情的掠夺,但终究不能否认,在这些居民当中还是出现了少数富裕的人,他们是从那些直接生产者当中分化出来的,在官僚等级阶梯上并不占有任何地位,因此在形式上不具有超经济强制权。

1889年到过图瓦的卡塔诺夫说:“一般说来,索约特人都很贫穷,因为遭受双重的掠夺。一百个索约特人中只有一个富裕的,其余九十九个都是穷人。”²²

许多研究家不加批判地引用有关“中等户”生活水平的资料,尽管这些“中等户”的水平很明显是被夸大了,而且与其他材料的记载有很大的出入。例如,科恩在《乌梁海地区考察工作的初步报告》中提出了下述资料:

“按乌梁海习惯,一个中等户通常都有:乘马十四、公马一至二匹、母马二十一至四十匹、两岁口以下的马驹二十五匹左右;公牛三一四头、未阉的公牛一头、奶牛十头、不产犊的母牛二至三头、三岁口以下的牛犊二十五头左右、小牛四至五头;种羊二、三只、公绵羊达二十只、母绵羊达二百只、羊羔达七十只、未鬻过的山羊二、三只、鬻过的山羊达二十只、母山羊达一百只、山羊羔达五十只。此

1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3卷,第896页。

2 卡塔诺夫:《西伯利亚来信》,第4页。

外还有骆驼二、三峰。”

这种关于“中等户”生活水平的说法，我们不仅可以在科恩的著作中找到，而且还可以从其他许多作者（罗杰维奇、波波夫）的著作中找到。

无需证明，这些资料所描写的已不是什么“中等户”，而是富裕户。下面我们再谈谈另一些说明图瓦居民经济两极分化的比较可信的资料。

十九世纪初，雅科夫列夫描写了著名的富翁阿吉克-哈兰佐领，说这个官吏拥有五千匹马、五千头牛、一万只羊，而当时贫苦户（巴伊呼希）的财产却下降到只有二、三只羊和一条狗（尤特）的水平。¹

几乎于同一时期去过图瓦的波波夫说，最大的牧主拥有三千头牛。大总管拥有二千头牛、七百匹马、五十峰骆驼。在萨拉吉克旗最富的牧主拥有一千匹马、五百头牛、一千五百只羊。²

波波夫十年后又去图瓦一次，他讲到马群时指出，最大的马群都是属于王公（各旗总营）、某些富裕的官吏和喇嘛庙所有。有些牧主的马群有马二千—三千匹，但是这样的大马群已很少了。³

在描写这一时期图瓦经济状况时，《俄蒙贸易概况》一书的作者写道：“在索约蒂亚^①富裕程度也是不同的……一个人财产达到 88 五百匹马、三百头牛、二千只羊而且还有现款，便算是富人。在贫穷的各旗里，中等户约有十只绵羊或山羊、一至二头母牛、二至三匹母马和几匹奶马。”⁴

在牲畜占有方面两极分化的加剧为富人剥削穷苦劳动力的奴

1 雅科夫列夫所著前引书，第 69 页。

2 波波夫：《越过萨彦岭去蒙古》，第 128 页。

3 波波夫：《乌梁海边区》，第 98 页。

① Сойотия 是俄国人对乌梁海（图瓦）的旧称。——译者

4 鲍戈列波夫与索波列夫所著前引书，第 152 页。

役形式的产生创造了新的基础。我们不会忘记，建立在财产两极分化基础上的这些剥削形式在原有剥削形式（这些形式是我们所熟知的，它来源于封建主的私有制和超经济的强制权）之外，不断产生新的剥削形式。

七十年代末到过图瓦的阿德里安诺夫写道：“每座富人的毡包周围通常都有一些破烂的毡包，里面住着侍候富人的穷人。由于富人的牛很多，所以便有这样一种习惯：富人把牛分给穷人饲养，每户几头，牛奶归穷人享用，但穷人要负责放牧，不得丢失一头。”

科恩在二十世纪初写道：“一进入乌卢斯，马上就可以看见一座大毡包，它要比其他毡包坚固。这是富人的毡包，乌卢斯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在他的毡包周围有三、四座（偶尔还要多一些）穷人的毡包。这些穷人根据需要可使用巴伊-基吉（富人）的马和牛，富人根据需要可使用他们放牧马群或充当埃吉姆（同事、仆人）。”

这样，牲畜多的人家经常向牲畜不足或没有牲畜的人家提供奶畜，后者享用畜奶，但得为前者干各种活计。

有时，需要干的活计都预先讲好，但是也有另一种情形：主人吩咐干什么，得到牲畜的人家就应当干什么。

穷人本人及其家属负责看管牲畜、浇地、收割庄稼和拾柴。穷人的妻子负责挤奶、提水、煮茶并帮助巴依的妻子做各种家务。在转换牧场过冬时，穷人骑着富人的牛先走，到新的地点准备好烧柴，然后富人才来。

农业对这种剥削关系的产生也起了不小的作用。雅科夫列夫非常形象地描述了这一剥削关系在实际上是怎样产生的，虽然他毫无疑问是把“发家致富”的过程过分简化了。

“索约特人发家致富的方法是：索约特人用锹或镐翻地，如果

走运,他从二、三大垧(每大垧合四分之一俄亩)地上收获三十袋黍和大麦。如果他由于偶然的机会有了欠债,那么,他就打下了发家致富的基础。

“他把打下来的粮食保存到仲冬再借给穷人。开春时每袋粮⁸⁹食还一头托尔巴克(一岁口的牛犊)。按照惯例,如当年不能还牛犊,来年春天要还一头两岁口的公牛或母牛。这样搞过两、三年以后,这个索约特人就有了牢固的经济地位,自己就不需要再去劳动了,从此一切活计都由周围的穷人给他干了,他只要象贵客一样到处去催债并把他象滚雪球那样增长的财富加以周转就行了。他以水和种子供给种地的穷人,产量的四分之三归他(收获四十袋,他取走三十袋),而种地的人,仍旧受穷。”

狩猎业也存在着类似的社会关系。“有时,索约特人根据包工合同去打黑貂,主人给他们一条猎枪、一条猎犬、一匹马和食品,所打的貂皮一半归主人。如果只有一个人打猎,也按同样比例分配。如果承包人供给猎人一匹马,那么一个狩猎季节就可以得到一张值四十张灰鼠皮的阿尔班貂皮……索约特富人雇用优良猎手去捕鹿。猎人从雇主那里获得猎枪、马匹、一切狩猎必需品及食物,所得鹿角一半归雇主。有些贫苦的索约特人,虽然不和富人住在一个乌卢斯里,但是使用富人的一头母牛、一匹马、一条猎枪等物,也需要用一半猎物作代价。如果贫苦的猎人(安纳特汉和安格吉)借用的东西更多些,例如借用两头母牛、两匹马等等,那么,照例应把全部猎物交给富人,由富人随意分给猎人一部分。”¹

雅科夫列夫指出,有的猎人对所租的生产资料付出的代价更大:“他(富人)供给猎人一匹马、一头母牛和一支步枪,他把一个季节的全部(异体字是作者标的)猎物除肉以外全都拿走。在猎获鹿角期间,雇主供给一匹马和一支步枪,猎获物便由雇主挑选。秋

¹ 科恩:《乌梁海地区考察工作的初步报告》,第35页。

季,年轻的猎人去捕松鼠,雇主供给一匹马,每去一次雇主便要一张貂皮或四十张灰鼠皮作代价。¹

雅科夫列夫作出的结论是完全正确的,他说:“猎人在还没有购置自己的马匹和步枪之前,索约特农民在还不能保证自己有足够的种子、耕牛和母牛之前,都得为富人干活。”²

叶尔莫拉耶夫是1916年去克木奇克河流域考察的,比上述几位作者要晚得多,他指出,那里存在着拥有二千匹马、一千头牛和三千一五千只羊的富人。与这些富户同时存在的是一些“连一只羊也没有的穷人,他们甚至没有毡包,象无家可归的野兽一样到处流浪,靠乞讨为生。”³这不可避免地会在这些社会集团中间建立一定的经济关系。这位作者还写道:“到处都有很多穷人,虽然初看可能看不到,因为牲畜多的富人把自己的牲畜交给穷人去放牧和喂养,有的一、二匹马,有的三十一五十只羊,有的二一五头母牛等等。放牧的人可以饮奶,使用畜力,剪少量畜毛,但幼畜全部归主人所有,最富的人家很少把全部牲畜圈在自己周围喂养,通常留下的母牛不超过二十一三十头,乘用马不超过十匹,绵羊和山羊不超过二百一三百只,其余的牲畜或交穷人看管,或雇牧人放牧。”⁴在靠近克木奇克河支流奇尔嘎克河一带,这位作者还观察到这样的情景:在一些富人毡包的周围聚集着一些穷人毡包,其数目达十个之多。这些穷人给富人干活,可以挤奶喝,乘用富人的马,这是他们为富人放牧和看管牲畜的报酬。

贫富差别在农业方面尽管没有在畜牧业方面那么大,但也比较悬殊。这位叶尔莫拉耶夫既见过种二、三十垧地的富户,也见过只种一“小”垧(一小垧有时相当于十六分之一—三十二分之一俄

1 雅科夫列夫所著前引书,第69页。

2 同上。

3 叶尔莫拉耶夫所著前引书,第24页。

4 同上。

南)土地的穷户。¹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在财富两极分化(牲畜分配不均,不言而喻对产生财富两极分化起了决定作用)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的生产关系是什么样的呢:

这种新生产关系之新在于它是在直接生产者当中发展起来的,而以资本主义以前的各种地租为其表现形式的生产关系则是使封建主阶级与全体直接生产者相对立的。但是,这种体现新生产关系的工役制形式,又使这种新生产关系同封建主义的生产方式相接近,因此使某些人把它看成是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表现之一。除了形式上相似之外,二者还有以下共同点:畜牧业和农业的经营管理和技术水平都很低,原始方法占统治地位,经济依赖于自然力。 91

尽管有某些近似之处,但也不难发现其本质上的差别。在同一封建技术的基础上,除了独立经营的直接生产者外,还出现了一些因本身生产资料不足而被迫为别人干活的生产者。由于在封建制度下直接生产者在经济上是独立的,所以要从他们那里掠夺剩余产品只能采用超经济的强制手段,超经济强制是封建主对依附于他们的居民的特权。而在新的生产关系里起作用的,除封建主外,还有被称为巴伊-基吉²的直接生产者,他们以超经济强制的办法,即通过向生产者提供他们所不足的生产资料来掠夺剩余产品。

很明显,巴伊-基吉同穷人之间的关系建立在一种基础上,而封建主与直接生产者之间的关系则建立在另一种基础上。把这两种关系混淆起来是错误的。不言而喻,在现实生活中,这两种根

1 叶尔莫拉耶夫所著前引书,第26页。

2 巴伊-基吉(бай-кижи):富人,有别于图吉梅特-基吉(тужмет-кижи)——官吏。

本对立的剥削体系是互相交织在一起的：一方面，封建主在某些场合也可能采取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剥削；另一方面，仅等级的不平等或生活上的不平等就足以构成超经济强制的基础。平民成为富人以后，其权力总要比穷人大得多。因此，在这一基础上产生的巴伊经济中不难发现超经济强制的因素。此外，在这两种体系之间在下述意义上还存在着有机联系，即封建剥削使直接生产者破产，但通常又不使其完全破产，使直接生产者赤贫化（赤贫化实质上是不彻底的无产化），结果变穷的阿拉特牧民需要生产手段，只能靠给巴伊干活，用自己的劳动作代价去换取。换句话说，封建剥削不断地把部分居民变成贫民，使他们不得不去为地主“效劳”。

在文献资料中经常可以看到有人把在直接生产者当中发展起来的这类剥削同劳役制混淆起来。列宁在其著作中不止一次地对这些关系进行过分析，列宁的观点同这些观点是相反的。

列宁指出，劳役制下的农奴是用自己的劳动和自己的工具去耕种的。他写道：“农民的这种劳动产品，用政治经济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必要产品；其所以是必要的，因为对于农民来说它提供生活资料，对于地主来说它提供劳动力；这正如补偿资本可变价值的产品是资本主义社会下的必要产品一样。农民的剩余劳动，表现为他们用自己的（异体字是列宁标的）农具耕种地主的土地，这种劳动的产品归地主占有。”¹

可见，劳役制的特点就是生产者用自己的生产工具为地主耕种。

同时，给巴伊干活的图瓦穷人之所以必须给巴伊干活，是因为他们没有足以进行独立经营的生产资料（这里指的是牲畜）。在

1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3卷，第157页。

商品生产不甚发达的条件下，丧失了起码的生产资料的穷人，被迫用自己的劳动去支付一切产品和任何生产资料的费用。正因为支付手段采取的不是货币形式，而是实物形式，即用劳动来支付，所以巴伊与穷人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要采取奴役形式，甚至采取穷人的身依附于给予“关照”的富人的形式，而这种“关照”又常常被看成一种善行，似乎没有这种“关照”穷人就得饿死。这种性质的相互关系，使人们丝毫不能把巴伊的“关照”与穷人所付出的劳动量加以比较。一户巴伊的多余的生产资料同另一户穷人的“多余”的劳动力的结合就是在这样一种被歪曲了的形式中进行的。巴伊因不能强迫别人为他干活而雇用劳动力，穷人则因不出卖劳动力他本人以及全家便会饿死。这里劳动力的买和卖都是在农奴制的外壳下进行，采取了工役制的形式。

列宁指出，工役制应当分为两种：“(1)只有有耕畜和农具的农民业主才能承担的工役制……；(2)没有任何农具的农村无产者也能承担的工役制……。显然，无论对农民经济或地主经济说来，这两种工役制都起着彼此相反的作用。第二种工役制是向资本主义的直接过渡，它已通过一系列极不显著的转变过程同资本主义溶合起来了。”¹（异体字是本书作者标的）

虽然上述两种类型的阶级关系在实际生活中互相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但是在一定范畴的阿拉特牧民当中，主要适用一种剥削形式。封建剥削主要适用于独立生产者中间，巴伊的剥削则主要适用于贫穷居民中间。穷人对封建主是不合用的剥削对象，因为从穷人身上榨取剩余劳动只能采取工役地租的形式。在畜牧业条 93
件下，封建主采用的劳役制不可能具有很大的规模，而向穷人索取作为实物地租的产品已完全没有东西可拿了，因为他们已被掠夺

1 列宁：《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3卷，第173页。

一空。¹ 于是被封建主搞得一贫如洗的穷人便成了巴伊奴役和剥削的对象。

反对上述说法的人们,通常提出下列理由,即在封建制度下不能把在超经济强制基础上产生的剥削形式与在经济压力基础上产生的剥削形式截然区别开来,因为剩余产品的占有是通过这两种强制形式的联合作用实现的。封建主义一直在掠夺独立生产者,并且使他们破产。所以在封建制度下,不仅有独立生产者,而且也有半独立生产者。因此,在封建制度下永远存在着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建立在财富分化基础上的剥削。

这种理由在一定程度上是正确的。但是,在同意这一观点的同时,还不应忽视以下两种重要情况。

第一,建立在经济基础上的剥削产生于直接生产者本身,产生于阿拉特牧民。剥削半独立的赤贫的生产者的是那些拥有农业所必需的生产工具并主要是拥有乳畜或耕畜的农民和阿拉特牧民。必须指出,这种类型的生产关系表现了惊人的生命力。甚至在革命消灭了封建主义,并把封建所有制连根拔掉以后,这一生产关系依然继续存在。所有最近考察的结果都毫无例外地指出了这些剥削形式在当代图瓦的发展。承认当代图瓦存在着农奴制的生产关系这不仅违反众所周知的事实,而且会导致最有害的政治后果,因为在这种情况下,反对当代阿拉特牧民中间的“农奴”制度的斗争就会被看成是反封建革命的一个组成部分。

第二,由于时间、地点不同,类似的生产关系具有不同的社会意义。可以设想,远在匈奴时期直接生产者当中就存在过依附和剥削的关系。其次,可以认为,产生封建生产关系的基础不仅包括直接暴力,而且还包括占有必需的生产工具、粮食和牲畜的财主通

1 “没有地、没有马、没有家业的农民,是不宜于农奴主进行剥削的。”(列宁:《十九世纪末俄国的土地问题》,见《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15卷,第62页。)

过借贷方式奴役农民。

但是在这里不应忘记时代的差别。资本主义根本不存在或仅仅处于萌芽状态的时代是一回事，而资本主义在其本国改变了生产关系，而且带上全部破坏手段侵入落后国家的时代则又是另外一回事。处于游牧封建主义繁荣时代的图瓦是一回事，而作为沙皇俄国殖民地的图瓦则是另一回事。沙皇俄国通过使农奴制服从其蓬勃发展的商业高利贷资本的需要来发展商品经济，而高利贷资本则力求变图瓦为其殖民主义体系的一个从属的组成部分。

当我们叙述到中国的殖民主义政策，但主要的是沙俄的殖民主义政策在图瓦经济中所进行的破坏性活动时，上述论点会显得更有说服力。

综上所述，革命前图瓦社会制度的特点是氏族组织几乎完全解体，封建生产方式居统治地位。图瓦居民由进行小规模独立生产的牧民和猎人组成，他们具有基本的生产资料。与直接生产者相对立的是清王朝（它是牧场与森林的最高的、然而名义上的所有主）及其附庸，即蒙古王公（清朝把这些王公领地附近的图瓦一些地区赏赐给他们）和以大总管（安本诺颜）为首的图瓦总管（诺颜）。清朝把赏赐蒙古王公剩下的图瓦土地赏给图瓦总管，连同这块土地上的数量很大的牧民一并交给他们世代领有，由他们在乌里雅苏台将军的最高监督下进行管理。封建上层分子还包括以占有高级重要职位的喇嘛（汗布喇嘛、佐尔吉喇嘛等）为代表的喇嘛庙。所有这些封建主和喇嘛构成了统治阶层。他们组成了奴役直接生产者并通过超经济强制手段去榨取他们的剩余产品（及部分必要产品）的国家机构。

蒙古王公逐渐失去了他们在图瓦的领地，同时，其势力也随着消失了，而作为军职人员的总管却恰恰相反，他们靠夺取蒙古王公的领地把自己的领地扩大了，他们手里集中了大量牧场及大量由

他们管辖的居民。作为小附庸，他们是清政府忠实恭顺的代理人。总管及其周围仆从(旗和佐的官吏)的主要职能，是利用劳动人民对封建主阶级的人身依附来榨取劳动人民的剩余产品。封建的政权组织采取了官僚政治的形式(官阶职位的等级制度、严格的官僚纪律)。

从被固定在个别牧场的直接生产者那里榨取剩余产品的经济形式是实物地租。这种实物地租采用正常的国家赋税(阿尔班)和特别捐(温德留格)的形式。每个独立生产者全年三分之一以上的收入被以阿尔班的形式夺走，而且由于纳税人越来越少，赋税的重担便落在剩下那些纳税人的身上。征收特别捐的借口很多，成了对居民不断进行掠夺的手段。

榨取依附居民的剩余产品的另一种形式是工役地租。这是住在总管附近毡包里的那些仆人所缴纳的地租，但由于游牧民族畜牧业经济的具体条件，工役地租只起次要作用。

毫无限制的封建剥削同肆无忌惮的封建政权压迫结合在一起，导致了下述的社会经济后果：

1. 广大居民赤贫化，独立经济的范围日益缩小；
2. 由于上层封建主和喇嘛挥霍浪费和以各种捐税的形式所征收的产品越来越多地从图瓦运往蒙古和中国的结果，生产力下降了；
3. 富裕的巴伊经济基础不稳，巴伊不掌握超经济强制权，相反，他们倒是超经济强制的对象，因此当地积累的可能性被极端缩小了。

在上述发展过程的基础上发展起一种在东方通行的赤贫劳动力同他人(主要是巴伊-基吉)的生产资料相结合的独特形式(赤贫劳动力给巴伊充当牧工和奴仆)。劳动力的报酬采取实物形式支付，即采取借给生产资料暂时使用的办法：借给农民的是工具、种

子、耕牛；借给猎人的是猎枪、弹药、马匹，而乳畜既借给农民，也借给猎人。

图瓦是一个连续几十年在经济上不断遭到掠夺的国家，这种掠夺使它的生产力年复一年地遭到了破坏。封建主没有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体现者的经济基础，因为他们赖以生存和积累财富的基础是剥削农奴。另外在依附居民当中未能形成一个稳定的土著资产阶级，因无权的地位和封建主和喇嘛的肆无忌惮的掠夺，能在转瞬之间使他们积攒的财富遭到破坏，因此他们的积累相当不稳定。

第三章 商业高利贷资本 向图瓦的渗透

俄国和图瓦贸易往来的开端。贸易的形式和对象。赊销贸易的发展，高利贷剥削。在贸易幌子下的掠夺方式。中国贸易的出现。中国商业资本对俄国商业资本的胜利。俄国贸易的改组。企业式经营的萌芽。商业高利贷资本对图瓦社会经济制度的影响。传统的社会生产方式的被破坏。封建关系是殖民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生产力的下降。

俄国和图瓦的贸易往来是由俄国哥萨克开始的。十八世纪初期，他们就在叶尼塞河流域建立了城堡（即哨所）。这些沿着萨彦岭建起的城堡构成了一条所谓阿巴根边防线。

住在哨所的哥萨克负责警卫界牌。哥萨克为此从五月份开始每月派一些由三至十人组成的小组去边境巡逻。哥萨克在巡视界牌时逐渐开始同前来巡逻的蒙古人和图瓦人进行贸易。由于贸易是以物易物的性质，所以他们用马驮来了食品、饲料和货物。“为了进行这种贸易还形成了这样一种制度：通常双方在同一时间内到某一界牌相会。蒙方由边防长官（шагдачалан）率领萨彦岭人参加，俄方由某一长官率领哥萨克参加。见面后先由双方领导人互相问候和赠送礼物，然后哥萨克和萨彦岭人便开始交易。”¹

最初这种贸易只是在极小的范围内进行，每年最多不超过六千卢布。²

1 莱科夫：《叶尼塞河上游之行报告》，载《俄国地理学会通报》，1898年，第2卷，第436页。

2 维谢尔科夫：《乌梁海人和米努辛斯克州南部边界的地理情况》，载《俄国地理学会通报》，1871年，第7卷。

哥萨克运来的是火石枪、小刀和其他货物，而换走的却是貂皮、河狸皮和狐皮。为了便于对交易进行监督，当地管理机关后来在克木奇克河口博穆克木奇克设立了一个实物交易站。

《北京条约》(1861年^①)签订前不久，在该地界牌附近开辟了⁹⁷一个不大的集市。这个集市在每年春季短期內（三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开放。关于有利可图的贸易和哥萨克带回贵重毛皮的消息很快传遍叶尼塞河流域，顿时引来了不少追求暴利的投机分子。在发展贸易方面，农民中的分离派教徒、“世外桃源”的探求者起了一定的作用。他们早在上世纪中期以前为了摆脱宗教迫害，越过阿巴根边防线逃到了大密林区里。他们逐渐地把图瓦人撵过萨彦岭，占领了乌斯河河谷，并在那里垦荒种地。俄国分裂派教徒在乌斯地区定居并建立了一些村庄，使图瓦人见到了俄国棉织品，尤其是莫罗佐夫斯克生产的厚棉布。

住在图瓦附近的俄国商人收集了为数不多仅值十一二十卢布的各种货物(如厚棉布、细平布、棉绒布、小琉璃珠、针等)，就骑马轻装上路，去用这些货物换来各种所谓“破烂”：绵羊皮、山羊皮、羊羔皮、皮袄、皮带、鬃制套马索、绊绳等等。

俄国的这种贸易遭到了图瓦官吏的反对。因为图瓦官吏每年护送大总管到乌里雅苏台去时，在那里买进中国货，在图瓦用惊人的高价出售，从中牟取暴利。而俄国的贸易对他们讲来是不利的，所以他们极力反对。但尽管如此，俄国贸易仍然逐年得到发展。1861年《北京条约》缔结后，撤销了哥萨克边防哨所。宣布边境对俄国贸易免税开放。而这一决定立即被米努辛斯克人广泛利用了。

靠与米努辛斯克州乌卢斯居民贸易而发了横财的大商人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首先参加了这一贸易。“他们原来都是牲口贩子，会讲鞑鞑话。他们常到索约特人那里去，从事他们完全熟悉的

^① 应为 1860 年。——译者

营生,即所谓本行”。¹

1864年,米努辛斯克商人维谢尔科夫、兹科夫首先派出商队乘雪橇沿叶尼塞河到博穆克木奇克去开展经常性的贸易活动。波兹德涅耶夫指出:“他们初次贸易(如果它还可以称作贸易,而不是掠夺的话)的赢利确实是非常大的。索约特乌梁海人的牲口是很多的,而这些半野人在当时对商品价值毫无概念。商人萨菲亚诺夫曾对我讲:‘往往有这种情况:牵来一头牛,商人只要用从牛角到牛尾这么长的一块呢子或者丝绸就可以把它换来’。在这种情况下,俄国人同乌梁海人的贸易肯定会获得令人难以置信的高额利润。诚然,这种贸易几乎从第一天起就遭到当地官吏的排挤,98 但是如果给这些野人送点贿赂或宴请一下,也不会使俄国人的贸易利润受到多大损失。”²

更大的商业资本家(比亚科夫、萨菲亚诺夫等人)出现在当地以后,贸易开始经常化了,商站建立起来了。商站象西伯利亚庄园:有坚固的木房、杂用房、高大结实的围墙,等等。商人在一个地方修了个仓库作为货栈,并在那里牢固地站稳脚跟以后,便从这个中心点派伙计用马驮着货物到某个地区去进行贸易,贸易的地区逐年扩大。当认为同当地居民的关系已经固定下来,当局也已友好相待时,便请求在此处开辟一个新的商站。新的中心点通过这种途径建立起来了,一个新的贸易区形成了,新的仓库出现了,从事贸易的专职人员也增多了。这样俄国贸易便逐年向图瓦渗透,一步一步地从山口和高山中的边界河流一直发展到叶尼塞河河谷,从这里又深入内地,逐步地悄悄地挤进了一些地区,其中有的盛产牲畜(如克木奇克河谷),有的盛产毛皮(如托锦)。

1 阿德里安诺夫:《1881年到阿尔泰和越过萨彦岭的旅行》,见《俄国地理学会论丛》,第11卷,圣彼得堡,1888年版,第358页。

2 波兹德涅耶夫:《蒙古与蒙古人》,第6卷,《中俄两国在蒙古的贸易》。这本书的手稿收藏在民族问题与殖民地问题科学研究协会手稿馆。

六十年代末，属于俄国商人的经常性贸易设施共有十六个：贝克木河流域三个；乌鲁克木河流域七个；克木奇克河流域六个。但是除大商人外，在图瓦还有小商人在活动，而且他们人数增加很快，这是由于容易发财的消息在继续不断地把一些来历不明、无恶不作的败类吸引到图瓦来了。

俄国贸易进入图瓦时，图瓦几乎还处在原始自然经济阶段。各户之间进行的交换关系是偶然性的，采取实物交换即以物易物的形式。

确实，象中国白银这样的货币本来可以从中国内地一些商业城市流入图瓦，但是我们知道，当时是禁止中国商人越过图瓦南部边境的。主要是由封建主掠夺来的毛皮组成的货流源源不断地从图瓦流往蒙古和中国。因此，白银一进入图瓦便落到了统治阶级上层人物的手中，被他们积攒起来，变成了他们财产的一部分。总之，俄国商业资本出现时，不论是居民之间互相交易，还是同出现在那里的商人所进行的交易，都没有使用货币。

但是，如果从这里得出结论，认为实物交易完全没有采取货币形式，那就错了。俄国贸易的深入和实物交换经常的、有系统的进行必然会使某种商品从被交换的商品中分离出来，这种商品在 99 社会上既有实物的形式，又有普遍等价物的职能。这种商品渐渐变成了货币商品，并起着货币的作用。但是，究竟哪种商品起货币作用，这完全由图瓦各地区生产的总趋向和性质来决定。

在托锦旗贝克木河流域，居民主要以狩猎为生。这里捕捉松鼠、黑貂、狐狸、貂、水獭，还获取麝香和鹿角。

而在乌鲁克木河和克木奇克河流域是以畜牧业为主，狩猎是次要的。牲畜和畜牧业产品是这个地区交换的主要商品。

因此，在东部地区某种毛皮起货币作用，而在西部地区某种牲畜起这个作用，这是非常自然的。

在以狩猎为主的托锦地区，灰鼠皮事实上起着货币商品的作用，灰鼠皮逐渐成为基本的计算单位。最初灰鼠皮的标价是十戈比，后来它的价格有所提高。到十九世纪末，俄国人要用价值十五戈比的货物才能换到一张灰鼠皮。同时灰鼠皮还用来缴纳阿尔班和特别捐。¹

在俄国商人的账本里，灰鼠皮成了折价单位，图瓦人所欠的债通常折合成一定数量的灰鼠皮。奥斯特罗夫斯基赫在自己的文章中引用了这样一篇账单作例子。²

托锦旗汗布喇嘛欠商人萨多夫斯基的账目：

旧债	1,700 张灰鼠皮
1 卢布(纸币).....	20 张灰鼠皮
2 块茶砖.....	70 张灰鼠皮
1 张猓狗皮	150 张灰鼠皮
1 袋面粉(约合 20 俄磅)	15 张灰鼠皮

托锦旗总管欠萨多夫斯基的账目：

旧债	400 张灰鼠皮
1 匹母马	200 张灰鼠皮
2 张猓狗皮	6 张黑貂皮
24 方 ^① 褐色厚棉布.....	96 张灰鼠皮
1 方呢子.....	50 张灰鼠皮
2 块茶砖.....	60 张灰鼠皮
1 大袋面粉	150 张灰鼠皮
1 块铅	600 张灰鼠皮

不仅借债时要用灰鼠皮折价，而且还债时也须将实物合成一定数量的灰鼠皮加以偿还。

1 科恩：《乌梁海地区考察工作的初步报告》，载《俄国地理学会东西伯利亚分会通报》，1903年，第34卷，第1期，第34页。

2 奥斯特罗夫斯基赫：《关于乌梁海地区托锦旗之行的简要报告》，载《俄国地理学会通报》，1898年，第34卷，第329—330页。

① 方(салбак)：用一幅见方作为量布的尺寸。——译者

我们仍以商人萨多夫斯基为例。我们在他那里发现了穷人布 100 祖克恰尔的欠债账目和结账清单。

欠 债 账 目

旧债	284 张灰鼠皮
1 匹马	150 张灰鼠皮
1 张羊羔皮	10 张灰鼠皮
1 锅面粉	8 张灰鼠皮
7 方黄色厚棉布	28 张灰鼠皮
2 束烟草	6 张灰鼠皮

结 账 清 单

花生	27 张灰鼠皮
水越桔	12 张灰鼠皮
各种浆果	12 张灰鼠皮
劈柴三天	12 张灰鼠皮
鱼	16 张灰鼠皮
越桔	24 张灰鼠皮
稠李子	5 张灰鼠皮
	等等。

这样，灰鼠皮起了小的货币单位的作用，成了确定被交换商品价值的换算单位。

在西部地区克木奇克河谷，一岁口的牛犊在商品交换中起灰鼠皮所起的作用。尔后，下文就要讲到，茶砖成了主要的货币单位。

贸易和商业资本的产生与发展是同社会劳动分工的发展相联系的，是同手工业脱离农业、工业脱离农业分不开的。于是，商人便成了一个部门的产品同另一部门的产品进行交换的中介人。图瓦作为一个畜产国，由于牧民的需求不太复杂，因此，自己将原料加工成工业制品的水平很低，但是手工业（据某些作者说）和中亚细亚其他游牧民族相比还算是比较发达的。¹

1 格鲁姆-格尔日麦洛所著前引书，第3卷，第1册，第84页。

每一家都尽量自己动手来满足自己的日常需要。家里需用的几年才购置一次的制品(如马具、斧头)是靠专门的手工业者的劳动来提供的。而手工业者由于缺乏足够数量的定货,过着和他们的邻居同样的生活,即基本上以畜牧业为生,手工业只是副业。他们制成的精巧的艺术品和各种装饰品都被封建官吏和上层神权人物拿去了,而且可能是他们迫使这些手工业者生产的。图瓦的这些上层人物很早以来就是贵重丝织品、陶瓷制品和祭祀用品(佛像)的消费者。这些东西都是中国来的,大约是上层人物经常去乌里雅苏台办事或去库伦朝圣时购置的。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喇嘛庙在商业上很早以来就起着中国、蒙古同图瓦贸易的媒介作用。它们利用和蒙古喇嘛庙的联系,经常从那里弄来加工工业制品,又转手用异常昂贵的价格在图瓦销售。101 喇嘛庙因此变成了商业机构,而宗教职能则降到了次要地位。

在中国贸易到来之前的很久一段时间内,中国工业品,主要是为数众多的中国手工业者(他们为了谋生,临时在蒙古乌里雅苏台、科布多等地住下来从事并不复杂的生产)的制品,就通过各种渠道传到古老的图瓦了。

图瓦的手工业还处于萌芽状态,因此,在图瓦出现的俄国贸易(最初是小规模的,后来随着商业资本的出现,规模就更大了),自然要在俄国工业制品与图瓦原料进行交换中起媒介的作用。

俄国工业制品,首先是棉织品的出现必然会引起,而且事实上也已引起了当地居民对它日益增长的需要,俄国纺织品开始时由于价格低廉,很快就把价格比较贵的中国纺织品竞争下去了。

除了厚棉布、细平布、印花布这些棉织品外,从俄国运来的商品还包括日用小杂货(针、线)、铁制品和生铁制品(刀子、羊毛剪子、斧头、铁锹、三脚铁架、杯子、经过切割的扁铁)、鞣过的皮革——油性革、鞋底(图瓦人用来缝鞋(идьги))、上等面粉以及已经

指出过的用来缴纳阿尔班的毛皮。

在这些商品中，一部分（如纺织品）是俄国资本主义工业的产品，而铁制品和其他商品，主要是集中在最邻近的米努辛斯克边区的小工业产品。

图瓦用户用牛、羊、原料、未加工的皮革和毛皮同俄国工业品进行交换。

渔业资源几乎完全不是由土著居民经营。这里的鱼是由俄国居民捕捞的，他们每年都从附近地区来到这里捕鱼。鱼的产量不多，每年都用木筏沿叶尼塞河运往米努辛斯克。图瓦还输出食盐。食盐是当地居民从大盐湖（图斯湖）提取的。俄国人从来也不从事盐业生产。通常在五月初，维谢尔科夫、萨菲亚诺夫等大商人派伙计到盐湖，用俄国商品换取当地居民的食盐。食盐是以“普特夫卡”为单位来衡量的，相当于一个半俄国普特。每普特夫卡有一定价钱：值一方（OM）即值一幅见方的厚棉布，约合俄国货币十二戈比，因而一普特盐用八戈比即可买到。

图瓦初期贸易的情况与马克思关于不发达国家贸易的初期情况的分析完全相符：“产品在这里是由商业变成商品的。在这里，¹⁰²正是商业使产品发展为商品，而不是已经生产出来的商品以自己的运动形成商业。”¹

在最初几十年期间存在的贸易，一点也没有深入到图瓦的经济领域中去。在初期贸易虽然吸收了些剩余产品，但贸易还远远不能“侵蚀到生产本身，使整个生产部门，离开它，就无法进行。”

在当地贸易的初期阶段上，主要由于交换关系的不发达，俄国商业资本便利用种种手段在这里大发其财，这些手段在这一时期便成了俄国资本“原始积累时代”历史的光辉一页。

马克思总结了商业资本在经济发展的各个阶段上活动的丰富

1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3卷，第366页。

历史经验。为了了解上述时期的经济内容，让我们首先学习一下马克思的某些教导。

“贱买贵卖，是商业的规律。因此，这不是等价物的交换。……产品进行交换的数量比例，起初完全是偶然的。……继续不断的交换和比较经常的为交换而进行的再生产，日益消除这种偶然性。但是，这首先不是为了生产者和消费者，而是为了二者之间的中介人，即把货币价格加以比较并把差额装入腰包的商人。商人是通过他的运动本身来确立等价的。”“只要商业资本是对不发达的共同体产品交换起中介作用，商业利润就不仅表现为侵占和欺诈，而且大部分是从侵占和欺诈中产生的。撇开商业资本榨取不同国家的生产价格之间的差额(……)不说，那些生产方式也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商人资本占据了剩余产品的绝大部分”，“因此，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¹

俄国商业资本(在括号里我们也指出还有中国的商业资本)在图瓦活动的整个时期都是“掠夺性”的，这样说是完全有根据的。

俄国贸易的掠夺性，特别是在持续了三、四十年之久的初期阶段，是任何一个论及这一问题的人都清楚的。“侵占”和“欺诈”在当地贸易中起主要作用。为了证实这一点，只要引用一些图瓦问题研究者在不同时期从当地收集到的几个事实就足够了。

一包针(二十五枚)价值五戈比，用它可从托锦人那里换回一
103 张半到二张灰鼠皮，价值二十一三十戈比。马合烟在米努辛斯克用四戈比可买八分之一磅，到托锦可换一、二张灰鼠皮。猎枪值三一五卢布，可换一张貂皮，至少值十五二十卢布。所有的布匹都用所谓的“方”来量。方是指布匹一幅见方。一方厚棉布值三一四张灰鼠皮或三十一四十戈比，这样，一俄尺厚棉布便可卖四十一

1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3卷，第368—370页。

五十戈比。而在米努辛斯克一俄尺厚棉布却只卖十六一十八戈比。细平布(幅面四分之三俄尺)一方卖一张半到二张灰鼠皮,也就是说,一俄尺可赚二十一三十戈比,而在米努辛斯克一俄尺才卖六戈比。棉绒布(幅面二分之一俄尺)在西伯利亚一俄尺卖二十八戈比,在托锦旗则卖六十一八十戈比,如按灰鼠皮的最低价格每张十戈比计算的话。¹ 弹筒帽(子弹火门)在俄国每盒二百五十个,值二十一四十戈比,在乌梁海商人论个卖,每个要一张灰鼠皮。²

我们看到,俄国贸易总利润的一般利润率是三百一四百,所以,除去货物运到图瓦的费用外,商人所得纯利润的数额仍是十分可观的。“少给”和“欺诈”在牟取这些利润时起着显著的作用,这一点为下述的一条惯例所证实,据奥斯特罗夫斯基赫讲,俄国商人都是遵循这条惯例办事的。一个俄国商人说:“你用十个戈比招待索约特人,作买卖时就可以赚回半个卢布,那个图瓦人是什么也不会说的!”而俄国人正是按照这种好客的惯例办事的。当地居民中所形成的有关俄国人贪得无厌的谚语也证明了这一点。如:“俄国人一肚子黑心眼”、“给俄国人一个手指头,他会把整只手都拿去。”

为了更准确、更全面地弄清楚商业资本活动的性质,主要是弄清楚这种活动在图瓦所造成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后果,必须详细研究赊销贸易的发展。这种赊销贸易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成为俄国的(以及后来中国的)资本活动的基本形式。赊销贸易的发展是商业资本二重化的产物:商业资本既在交换中继续起媒介作用,同时又成为产生利息的资本,即高利贷资本。马克思称高利贷资本是商业资本的孪生兄弟。在图瓦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简直就象

1 奥斯特罗夫斯基赫:《乌梁海土地的意义》,第11—12页。

2 明茨洛夫:《秘密使命》,第213页。

长在一起的“暹罗双生子”。^①

高利贷资本的出现究竟需要哪些前提呢？第一，“至少已经有一部分产品转化为商品”。第二，“随着商品买卖的发展，货币已经在它的各种不同的职能上得到发展”。¹

在货币的各种功能中，支付手段功能对赊销贸易的出现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

高利贷资本在各种社会经济结构中产生的时候，都必须具备这样一个前提，即生产者对其劳动条件必须拥有所有权或占有权¹⁰⁴（实际上的或名义上的），从而，生产者必须是独立的生产者。

只有成为一个独立的生产者，他才能在其生活的关键时刻向高利贷者借款，而高利贷者也才能趁机榨取他们的部分剩余产品，而且不断增大榨取的分量。但是，不仅拥有劳动条件的小生产者向高利贷资本借款，而且封建主也向高利贷资本借款。封建主由于其他原因也落入高利贷者的罗网之中，而封建主在这罗网里受到的束缚越大，他便越加紧压榨其统治下的居民，因为他们自己也被榨取得越来越厉害。²

这些基本前提，在商业资本进入图瓦以后同时作为高利贷资本出现的这一时期的图瓦经济中，我们都找到了。那么，究竟在哪些原因的影响下，采取什么形式，商业资本才由原来的媒介作用过渡到高利贷的作用呢？

使高利贷资本易于出现的条件之一，是俄国的工业品与图瓦的原料上市的时间不一致，互相脱节。

① 暹罗双生子：腹部（肚脐以上）上生有手臂粗的结缔组织联接起来的连合物的男性双生子（名字叫汉格和安格）。1811年诞生在暹罗（泰国）的夜功城，活了六十三岁。——译者

1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3卷，第671页。

2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3卷，第675页（不是直接引语，按词面翻译。——译者）。

俄国商人在牧民和猎人能用自己的产品支付以前，先把自己的商品交给牧民和猎人。这就是赊销贸易出现的共同条件，而这些条件同样也是由生产和运输条件所决定的。每个国家都有几天被定为总支付期限。这些期限在很大程度上是以同季节变化有关的生产的自然条件为基础的。¹

所以，要了解赊销贸易的具体特点，要了解高利贷资本活动的条件，就必须弄清自然条件是怎样影响着图瓦的原料和俄国工业品的上市。

下面让我们从这些特点出发分析一下图瓦的主要地区——东部的托锦和西部的克木奇克河与乌鲁克木河河谷的情况。

居住在托锦的图瓦人主要以狩猎为生。虽然每户几乎都养一些鹿，但是，甚至连养有几十头鹿的富户，其鹿群所提供的奶也不够五、六口之家食用的。另外，不到迫切需要的时候，谁也不肯杀鹿，因为这将意味着鹿群的毁灭，而且鹿还是山区大密林和冻土地带不可缺少的、最适用的交通工具。在这种条件下，肉类的来源只能靠打猎了。因此，在当时（而且现在也如此），托锦人的生活 and 福利全靠打猎来维持。

每年只能在一定季节，即秋、冬两季才能打猎。为了打猎，猎人必须准备弹药和粮食，这些东西都靠俄国商人供应。在九十年代，商人每年只沿阿梅耳小路用雪橇往托锦运一次货，一般在暮冬（通常在三月份）。货物所以迟运，是因为越过萨彦岭的山路这时才能通行，但是还有另一个原因，即货物从伊尔比特集市运到米努辛斯克的时间晚。贸易的旺季是四月、五月和九月，九月份是猎人准备过冬生活用品、火药、子弹等等的一个月份。

商品用赊销的办法在图瓦猎人中分配，每年都是赊销给同样

¹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中文版 第1卷，第161页（引文有出入，按词面翻译。——译者）。

的一些猎人。付款期限通常规定在十一月份，这时猎人已经带着猎物从密林归来，由塔斯克山来到贝克木河谷。在河谷一带，通常在喇嘛庙和总管所在地进行结账，与商品流通无关的全部款子（如赋税等）也规定要在这时付清。

在十二月中旬，商人带着皮货回到米努辛斯克州，把这些皮货投到伊尔比特集市以后，便采购新货，三月末带上新货重新回到图瓦。然而，打猎是受松鼠“产量”和其他很多纯自然条件限制的一种行业。猎人从森林里回来时如果所获较少，不延期还债和不赊购继续打猎所必需的新的生产资料（猎枪、火药、斧子等），就不能生存下去。

106 最后，可怕的时刻终于不可避免地到来了：欠债的猎人无法偿还债款，便不得不终生受债主的奴役，再没有希望从债主的手中挣扎出来。

猎人为了打猎首先需要火药和铅弹。火药和铅弹的大致比例是：一俄磅火药必须配备四—五俄磅铅弹。通常一俄磅火药值五十一—六十戈比，但是在托锦一俄磅火药竟卖到十一—十二张灰鼠皮，合二—三卢布；铅弹是一俄磅一卢布。火药和铅弹配合在一起，每份约四—五卢布。这通常只是初次交易的情况，这种交易后来就把这个猎人变成永远也还不清欠商人债款的债务人了。为了证明这一过程，我们不妨举这样一件事作例子。有个商人赊给了一个图瓦人价值五百张灰鼠皮的商品。结账时，债务人的灰鼠皮不够，仅有二百张，其余的三百张就得用别的兽皮来顶，这时其他兽皮的价格就得由债权人来规定。假定余欠的三百张灰鼠皮用中等貂皮（每张价值四十张灰鼠皮），或上等貂皮（每张价值六十张灰鼠皮）来偿还，那么，商人就用价值五百张灰鼠皮的货物（这些货对商人讲来最多只值二十一—二十五卢布）换来了二百张灰鼠皮（这些灰鼠皮在米努辛斯克市场最少值三十卢布）和五到八张貂皮（这些貂皮

最少值一百二十一—一百五十卢布)。这样,商人一年当中用赊销二十五卢布的商品,就可以赚上一百多卢布。如果图瓦人不能按期还清全部债款,那么,高利贷商人的赢利就会更大,因为剩下的那部分债款,过一年就要增加一倍,过两年则增加三倍,以此类推。¹

1915年考察过这个地区的农学家图尔恰尼诺夫报导说,图瓦人欠托锦商人(即俄国商人)五百万张灰鼠皮或一百万卢布。他写道:“值这么多钱的商品甚至在二十年中间能否运到图瓦也是值得怀疑的,因为这就等于每年输入五万卢布,在托锦旗的俄国商人中没有这样的资本家,根据他们的资料,每年输入量不超过二万卢布。”²

在图瓦的另一个地区乌鲁克木河和克木奇克河流域,贸易是在另外一种生产基础上进行的。这个地区是畜牧业区。牲畜和畜产品成了换取布匹、已鞣制的皮革、铁器、上等面粉等俄国商品的主要物资。在图瓦买到的牲畜(特别是牛),在西伯利亚最近的那些市场上销路很广。商业资本的掠夺活动在米努辛斯克草原上榨取了大量牲畜之后,图瓦的肉用牲畜不仅得供应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市场,而且还要供应更远的伊尔库次克市场。

其次,金矿的发展需要大量的牲畜和畜产品来供应金矿居民,牲畜和畜产品在这些居民中销路很广,价格也高。此外,几次兽疫流行(1870—1872年,1885—1887年)也使米努辛斯克州损失了 107 大批牲畜:仅在1885—1887年,就死亡了十万零五千五百九十头牲畜。居民几乎一头牲口也没有了,于是他们便开始到附近地区去购买。图瓦牲畜成了弥补损失的来源,而且图瓦牲畜品种好,适

1 雅科夫列夫:《南叶尼塞河流域异族居民的民族志学概述》,米努辛斯克,1900年版,第73页。

2 农学家图尔恰尼诺夫:《关于1915年乌梁海边区的报告》,第1部分。

合于改善米努辛斯克地区肉用牲畜的质量。¹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和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中间，铺设西伯利亚铁路和阿穆尔铁路期间，又引起了对图瓦牲畜的大量需要。

俄国商品运到克木奇克地区的时间也象运到托锦的时间一样，都是在暮冬，一般在二、三月。因为夏季运货价格昂贵，还有危险。货物都是用雪橇沿叶尼塞河运来的。在贸易旺季，牲畜由于冬季饲料缺乏都已瘦弱下去，还没来得及肥壮。这时牲畜瘦弱，要在早春季节赶着这些牲畜通过积雪覆盖的山路和山口是不可能的。另一方面，广阔的图瓦牧场和丰富的饲料，使牲畜不花任何代价就能恢复肥壮，等俄国市场上价钱更合适时再出卖。这样，商人便非常愿意不立即从买主手里接受换来的牲畜，把交牲畜的日期向后推迟一些日子。至于俄国商人大量收购的货物，如兽皮、畜毛等原料，只有在剪毛和屠宰季节之后才能交货，也就是说不能早于仲夏。我们可以看到，在克木奇克地区，赊销贸易出现的基础和在托锦一样。但在这里的赊销贸易有其某些特点。商人总是把赊销的货物折合成一定数量的一岁口的牛犊，并限期付清。图瓦人赊购十一十二卢布的货物，就得欠上十一十二头牛犊。但结账时债务人一般是拿不出这么多牛犊的，于是他只好有什么就用什么来顶：一头大牛（顶八头一岁口的牛犊）、毛皮和一部分一岁口的牛犊。如果有些牛犊到期偿还不上，就延期到第二年加倍偿还，或偿还同样数量的两岁口母牛。新债使欠债的数目又增加了。商人用次货（在米努辛斯克值三一五卢布，到萨彦岭南部地区就值十卢布）就可以换回价值三十卢布的一头公牛和价值二十五卢布的两头两岁口的牛犊。几乎所有的图瓦人都已陷入这种还不清的债务之中，而且逐年越陷越深，所欠牛犊也越来越多。²

1 斯涅基列夫：《乌梁海的牛羊》，载《农业与林业》，1896年，第5期，第120页。

2 雅科夫列夫所著前引书，第72页。

我们刚才引证过雅科夫列夫对高利贷盘剥的论述，他还补充指出：“索约特人的牲畜已多半不属于他们，而属于伊凡·伊凡诺维奇们了。这些伊凡·伊凡诺维奇们那么‘善良’，竟同意等一年以后再结账。”

赊销贸易除了使牧民活活地落入高利贷手中外，还使商人得到其他许多好处。第一，可以在富庶的图瓦牧场将幼畜喂养到三、四岁，其间由债务人无偿看管，债务人要对畜群的完整无缺负责。第二，用赊销的办法可以卖得更多、更有利，因为在赊销时牧民既不受现款的限制，也不考虑商品的价格，特别在初期，他们对物价的概念非常模糊。于是，商人尽量把商品大大塞给他们，其中许多是没用的破烂和滞销的劣品。

通常用强力手段向不按期还债的人讨债。俄国当局的官方代表、乌斯州边务官在报告中这样描述了强力讨债的手段：讨债的伙计一到，见债务人那里没东西可拿，就到他的亲属那里，甚至到他的邻居那里去拿东西，还说：“狗东西，你们都是自己人！你们自己去算吧！”²¹

连俄国商人自己在写给内务大臣伊格纳季耶夫的报告中也不得不承认：“不是所有的人（商人）都那么通情达理。始终不渝地采取合法手段，”商人讨债时，“对应付给的牲畜自己点数赶走，把债务人亲属的，有时甚至把外人的牲畜赶走。”²²图瓦地区最早的研究者之一波塔宁在谈到俄国贸易的性质时写道：“有些伙计在同考察团成员谈话时亲口讲过，这里进行的不是贸易而是掠夺：开始时，他们把商品强塞出去，到讨债时，伙计直奔畜群去挑选牲畜，常常不管是谁家的畜群，只要是属于债务人这一族所有，就给赶走。”²³

1 科恩：《乌斯边区》，第46—47页。

2 同上，第47页。

3 波塔宁：《西北蒙古概况》，第3卷，第126—127页。

东西伯利亚总督阿努钦在关于 1880 和 1881 年工作的《奏折》里也承认当时俄国的贸易是掠夺性的。他写道：“商人肯定可能被指控为有意剥削不发达的邻国居民。他们用高价赊给这些居民质量低劣的商品，讨债时毫不留情，根本不想建立正常的贸易关系，只是企图更快地发财。”²¹

俄国贸易的这种掠夺方法和形式在图瓦一直保持到革命前夕。前面提到过的明茨洛夫在帝国主义大战即将爆发的前夜曾在图瓦游历，表面上似乎是为了完成科学(考古)任务，而实际上是在执行俄国政府所给予的“秘密使命”。他报告说：“他们那里的贸易至今几乎仍是实物交易性的。要了解俄国商品的卖价，可以举例说明。用几盒火柴就可以换回一头绵羊，一包(十盒)火柴可以换
109 一头一岁口的牛犊。商人故意多赊给他们商品，因为图瓦人每个佐都有连环保，商人通过佐的官吏和总管可以绰绰有余地把债讨回来，而无力还债的人连最后一头羊也被抢走，还不起的债，他们只有用脊背来‘偿还’公社。”²²换句话说，债款简直就是从图瓦人那里硬逼出来的。赊销商品的价格比市价高得多。在二十世纪初，茶砖的赊销价格通常要高出一倍，本来值五张灰鼠皮，赊销就要十张。同样，中国土布赊销时也贵一倍，原来值十张灰鼠皮，赊销就要二十张。所以商人赊账八一九个月就可以从债务人那里索取百分之百的利息。

鲍戈列波夫与索波列夫两位教授举出这样一个情况作为说明俄国商人与图瓦人进行赊销贸易的样本：一个图瓦人赊购了八俄尺厚棉布，商定一个月后还四张熟羊皮，如果不能按期偿还，这个图瓦人来年必须偿还一头一岁口牛犊。图瓦人通常因疏忽大意

1 转引自瓦京文章：《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乌梁海问题》，载《西伯利亚大学生》，第 7—8 期，1915 年，第 95 页。

2 明茨洛夫：《秘密使命》，第 211 页。

(?——作者注)或遗忘(?——作者注),未能按第一个期限付款,来年只得加重偿还。俄国商人采用这种办法以八俄尺厚棉布从本地人那里换来一头成牛,这头牛在伊尔库次克市场上可卖六十卢布。如果这笔债延期几年偿还的话,那么,一岁口的牛犊就会变成一头到手的大牛。这种办法得到了居民和当局双方的一致承认,诸如此类的债务通常都由当局裁决。¹

因此,不容置疑,俄国商业资本家的活动具有公开的掠夺性,它不仅在充当实物交换的中介时从事剥削,而且作为高利贷者还加重几倍去剥削图瓦人民。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些结论是以无可争辩的事实为根据的。这类事实无论在旅行家的报告中,在正式文件里或俄商代表人物的自白里都是可以找到的。

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只能对那些所谓“客观”的学者们可悲的“勇气”感到惊异。他们为最无耻的、公开掠夺的俄国资本“活动家”在图瓦的罪行进行徒劳无益的辩护。格鲁姆-格尔日麦洛教授最近竟充当了以贸易为名行掠夺图瓦人民之实的俄国商人的辩护士。

他在自己的著作《西蒙古和乌梁海地区》一书关于俄国人贸易和殖民活动的一章(第3卷第2册)中,企图为“原始积累”的卑鄙人物涂脂抹粉。他认为对这些人的行动“严厉审判”,“指控其贪婪”,“无疑是不公正的”。²

按照他的意见,百分之百的利息应看作是正常的。

他假装幼稚单纯,看不出欠债过期加倍偿还的作法会带来什 110
么好处,虽然同样的交易,但如果是在图瓦人与中国商人之间进行的,那么用作者的话来说,这一贸易就可以说明“蒙古人是怎样逐

1 鲍戈列波夫和索波列夫:《俄蒙贸易概况》,第208页。

2 格鲁姆-格尔日麦洛所著前引书,第613页。

渐地从自己牲畜的所有者变成别人畜群的放牧人。”¹

利息高本身还不能使交易具有高利贷的性质。²

最后，他还“冠冕堂皇”地肯定说：“同样也绝不容许科学研究人员持有这种偏见，即本地人只是受苦受难，而外来商人则都是十足的剥削者，他们为了发财可以为所欲为，丧尽天良。”

这种为俄国商业资本的强盗行径进行辩护的企图，尽管表面看来似乎科学客观，实际上不值一驳。³

图瓦人自己对俄国商业资本活动的性质所持的见解是截然相反的。他们在反对俄国商人和高利贷者的强盗行径和掠夺行为时，多次企图采取平民手段，消灭和杀死那些最凶恶、最卑鄙的剥削者，他们开始以暴力反对暴力。袭击商人马群的事件越来越多了，那些为顶别人的债而被强行夺走的牲畜常常被赶了回来。

1877年，对俄国贸易的这种敌视态度达到了特别尖锐的程度，甚至一个极小的理由都会促使图瓦人去抢劫俄国商站。但这种反抗行为使图瓦人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根据中国法官的判决，许多图瓦人被砍了头。

1878年，图瓦人的革命活动在继续开展：他们从俄国商人那里夺回了许多牲畜，这些牲畜有的是被商人在结账时打马虎眼骗去的，有的是他们买的贼赃。图瓦人夺回牲畜时还给俄国商人开收据，写明夺回牲畜的头数，这说明图瓦人认为自己这种行动是多么正义。

这种行动也使图瓦人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中国官吏和图瓦官吏会审法庭经过长期审理，在俄国当局的

1 格鲁姆-格尔日麦洛所著前引书，第495页。

2 同上，第618页。

3 然而，有趣的是，这本书于1930年竟在“国立俄国地理学会”的招牌下出版了。这个协会曾被可耻地称为“皇家地理学会”，那个时期的大国主义传统直到不久前还存在于这个协会里。

压力下作出裁决，要求图瓦人付给俄国人二万九千头牡绵羊作为被抢走的牲畜的赔偿。图瓦人认为只要能尽快打发走那些借口审讯和裁判而残酷掠夺居民的强盗官吏，宁肯去完成强加给他们的各种义务。由这种处罚而缴回的“赃物”往往比被抢去的东西多十倍。这种处罚对中国官吏和“受害的”俄国商人讲来都是十分有利的¹¹¹。因此，他们亲自去挑唆居民“行窃”，那就不值得奇怪了。明确说出这一点的，我们所看到的不是别人，正是第一任边务官阿弗里卡诺夫。他说：

“不久以前，被盗对俄国人讲来是有利的，因为他们可以得到两倍、三倍于被盗物资的赔偿，还可以得到侦查费。例如，有人偷了一匹马，被罚赔了一千头绵羊。”¹

人民在一代人耳闻目睹之下变穷了，他们的牲畜落到了外来人的手中。这是通过“原始积累”时代所特有的强盗手段所造成的。无怪乎被污蔑为“道德败坏的”、“盗窃的”民族把俄国商人叫做“奴古尔杜克·奥蒂斯托尔”，意即既无人格又没良心什么卑鄙勾当都能干得出的人。²

*

*

*

俄国商业资本在以狩猎和游牧为生的图瓦出现，这仅仅是导

1 阿弗里卡诺夫：《乌梁海地区的俄国贸易》、《乌梁海地区和它的居民》，载《俄国地理学会东西伯利亚分会通报》，第21卷，第5期，第31页。

2 在米努辛斯克博物馆我发现了一部手稿，题为：《俄国文明人士在索约特人那里，在他们给了什么并为此……（字迹不清）问题上所建立的功绩》。这部手稿上有如下的附记：“这部手稿系根据比亚科夫口述写成的，其中一部分是根据我所提出的问题由比亚科夫亲自写成的。E.雅科夫列夫。许多东西没有收进我的著作……”比亚科夫是乌梁海地区最显要的殖民主义者，因此，他对自己所写的事情了如指掌，在他所写的这部手稿里描述了俄国原始积累骑士的“功绩”。

最常见的掠夺方法之一，是把某种商品偷偷地扔在富有牲畜的图瓦人附近，然后再指控他盗窃。“这种掠夺事件罄竹难书”。商人舒米欣就是以这种“功绩”在图瓦居民中臭名远扬的，人们叫他库纳尔·巴切奇，意即强盗瓦西里。“俄国商人采取各种手段去掠夺不幸的图瓦人。甚至从私利出发，也没有一个俄国人肯指出如何去管理其简

致图瓦人民迅速破产的这场悲剧的第一幕。

接着出现的是第二幕。这一幕的标志是中国商人“原始积累”新骑士的出现。他们在某些方面使俄国商人“黯然失色”，甚至使他们相形见绌。

112 中国的贸易虽然在附近的蒙古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但是对图瓦的渗透直到十九世纪末还是非常微弱的。当时，是严禁中国商人进入图瓦的。然而，中国商品早已通过各种渠道开始进入图瓦了。最初进入图瓦的商品是贵重的布匹、绸缎、茧绸、日用品和家具。这些东西主要是供富裕的消费者用的。科恩写道：“俄国人供应的多半是穷人穿戴的衣物，而中国人运去的却是供富人和官吏享用的衣料。”¹

这些商品的代销人首先是官吏，其次是蒙古和图瓦的喇嘛。总的说来，图瓦喇嘛庙利用同蒙古喇嘛庙的联系和经常来往，在贸易的发展中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样，图瓦的喇嘛庙就成了一个组织完善、分支很多、而且效能良好的贸易机构。“这些喇嘛庙经常做买卖。喇嘛庙定期组织一种类似集市的活动，在这里不仅大规模地进行交易，而且还开庭审判。债务人和小偷同样都要受到审判，不过小偷身上要多挨几棒，脸上多抽几鞭。”²

单的经济，怎样防治天花（它使大批羊群死亡）和瘟疫，如何解决牛羊缺乏饲料的问题。”“1893年，有一个商人（萨菲亚诺夫）用非常低廉的价格买来了一群牛，他明知其中大部分已经染上了瘟疫，但他把畜群赶到下乌丁斯克去了，沿途把瘟疫传染给了与瘟疫完全隔绝的索约特人的牲畜。人们劝说这位先生在路上停下，不要再往前赶了。甚至有些俄国人也这样劝他，因为他们的利益也可能会受到损失，但是，别人的利益与他萨菲亚诺夫何干，只要自己有利就行，他这样干不是无利可图的：牲口是廉价买来的，由于瘟疫流行，索约特人给钱就卖，而商人盘算的却是，即使畜群在路上死了一半也能赚钱，因为那年下乌丁斯克肉价很高，而这批牲畜买价却很低。……塔雷津在乌斯边务局任职期间专门处理过这一事件：因为如不预先采取严厉措施，乌斯地区农民的牲畜很难保住，瘟疫肯定会在米努辛斯克州蔓延开来（萨菲亚诺夫与塔雷津、兽医奥尔塔尔夫夫斯基事件）。”

1 科恩：《乌梁海地区考察工作的初步报告》，第27页。

2 叶尔莫拉耶夫：《关于图瓦贸易史》，载《现代图瓦》杂志，1929年，第1期。



台里湖畔的一群图瓦人。他们是贫穷的猎人和养鹿者。
远处是他们夏天住的白桦树皮帐篷。

不准中国商人去图瓦的这一形式上的禁令，于1903年才由乌里雅苏台将军下令废除。而实际上中国商业资本从1895年就开 113
始向图瓦渗透了。起初中国商人少量零星地来到图瓦，在货篷和图瓦人的帐篷里做买卖，后来才设立了经常性的商站。

从1903年起，中国小铺的数量开始迅速增加，到1910年在图瓦已经有五家中国大商行，这五家大商行的名字是巴彦宝（Баян-боу）、大石太傅（Та-ши-тай-фу）、白仁拔都（Бэ-жень-ба-ду）、杨冈（Ян-ган）和大麻子（Та-ма-цзу）^①。这些大商行在图瓦各地设有三十来个分行，分布在克木奇克、乌鲁克木和哈克木河流域。但是中国贸易的主要中心是在查丹河流域克木奇克总管处附近、唐努山以南萨拉吉克喇嘛庙和大总管处附近及恰库利河流域。

^① 以上各大商行名称皆为音译。——译者

在图瓦经营的中国商行，是那些早就在蒙古经商并在西蒙古的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设有据点的中国商行的分行。这些公司是由中国山西人组成的，所以又叫山西帮，他们几乎控制了西蒙古的全部商业。因此，他们已积累了几百年的在游牧民族中经商的经验。

中国贸易具有在同俄国商人竞争中占优势的某些特点。山西商行的一些总公司和总库设在归化城。这些总公司在蒙古一些较小的贸易城市设有分行，并由总库供应这些分行商品。这些分行又在一些最大的喇嘛庙和王府等处附近开设隶属于它的二级分行。二级分行派出流动货篷到蒙古各游牧区零售货物和收购原产品。原产品运到二级分行，加以分类，然后组成驮运队送交总行仓库。这些分行的商业网分布甚广，但注意到，不去已被其他商行占领的地区。

不论中国贸易还是俄国贸易，都不可能实行专业化。因为蒙古市场需求不多，购销单一。中国商人力求供应游牧民族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并收购草原在当时经济状况下所能提供的一切原产品。¹

中国商行在图瓦设立分行以后，便采用了和在喀尔喀所采用的同样的贸易方式，贸易性质基本上也和喀尔喀一样，所不同的是，中国商人在图瓦能够得到更多品种的商品来进行交换。

114 中国商行在克木奇克和乌鲁克木站住脚后，不久就完全控制了图瓦市场，这样他们就使俄国商人处于完全不同的境地。

中国商人未在图瓦出现以前，在俄国输入图瓦的商品中，棉织品占第一位。

自中国贸易在图瓦出现以后，中国棉织品——土布和粗布²便

1 有关中国贸易组织机构的材料转引自格鲁姆-格尔日麦洛：《西蒙古和乌梁海边区》，第3卷，第2册。

2 土布(далемба)：一种很粗的棉布。粗布(Цуямба)：本色布或称蒙古布。

充斥当地市场，把俄国棉织品顺利地 from 图瓦牧民的日常生活中排挤出去了。

中国纺织品(只是名义上叫做中国纺织品而已,因为这些纺织品是从英、美运到中国的未经漂染的原色布。运到中国后,用手工染成单色,而且印染的方法也很不完善)畅销的主要原因,首先是价廉耐穿。在图瓦,一块俄国土布的价格至少是二卢布二十五戈比,而中国商人出售的土布一块才一卢布七十戈比——一卢布八十戈比。虽然俄国土布的幅面要比中国的宽一些,但做一件长袍用中国土布要比用俄国土布便宜百分之三十,而且比用俄国布做的耐穿一倍时间。¹ 用中国布做的长袍能穿两、三个夏天,用俄国布做的则最多只能穿一个夏天。俄国的其他棉织品(如做衬衫、衬裤用的俄国土布以及鼠皮布等)的情况也是如此。

随着印有中国商标的英、美廉价棉织品的出现,俄国纺织品的销售量大大减少了,销售这些布匹那么不挣钱,甚至连俄国商人都被迫去销售外国商品了。

中国商人不仅控制了最畅销的纺织品的销售,还且还控制了茶、烟草这样重要的日用品的销售。

绿茶砖只有中国茶厂才生产。蒙古和图瓦的茶砖都是中国商行派骆驼队从张家口和归化城运来的。

俄国商人从中国人那里批发到(整箱的)茶砖后,转手零售给图瓦居民。据《俄蒙贸易概况》记载,中国人卖给俄国人一箱茶砖(二十七块)的现金是二十一—二十三卢布,平均每块茶砖七十八—八十五戈比。赊购每箱是二十七卢布,平均每块茶砖一卢布。

在图瓦一块茶砖平常的零售价格是现金一卢布——一卢布二十五戈比,赊销则贵得多。例如,一块茶砖用现金花五张灰鼠皮就可

¹ 详见 1913 年 4 月 16 日俄国商人给乌斯边务官的呈报,载于《西蒙古与乌梁海边区》,第 3 卷,第 2 册。

以买到，而赊销就得花十张。

115 绿茶砖这种最畅销的商品，很快就成了交易工具和换算单位。一块绿茶砖换算成俄国货币是一卢布二十戈比，换算成灰鼠皮是八张。

烟叶在图瓦的销售量很大，因为几乎所有的图瓦人都吸烟。俄国烟叶和马合烟的价格比它在米努辛斯克市的售价要贵一倍，所以就更竞争不过中国用豆油调制过的烟叶(тюньза)。

俄国商人向中国人买一束重十一两的烟叶，现售价格为二十八—三十戈比，赊购则为三十三—三十五戈比，而转卖给居民却要五十戈比。

由此可见，在最常用的必需品的销售方面，俄国商业一遇到中国商业的竞争，很快就投降了。图瓦居民需要的是价廉耐用的商品。由于封建剥削制度的压制和商业高利贷资本的掠夺，直接生产者的购买力不是在提高，而是在降低。正因如此，中国商人出售给居民的商品虽然不好看，但比较“便宜”、耐用，因此便迅速地控制了图瓦的批发业和零售业。俄国商人既然要继续零售这些商品，就只好向中国商人购买，而且价格高低也完全由中国商人说了算。在贸易处于实物交换的情况下，出售普遍需要的日用品与收购普遍出售的土产品(毛皮、各种原产品、牲畜)是完全分不开的。

在上文提到的俄国商人的那份呈报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对中国贸易所作的如下评价：“中国贸易控制了乌梁海地区主要商品的销售后，处于非常有利的地位，因为在贸易处于实物交换的情况下，谁用自己的商品换取的原产品越多，谁得到的利润也就越多。”

的确，原产品自然而然地集中到那些生意最兴隆的商人手里。控制了图瓦市场的中国贸易的主要优势，就在于它能够得到图瓦原产品，而以前这些原产品是完全控制在俄国商人手里的。

我们知道，当地的原产品是用来换取工业品的，而这些交换多

半转到中国商人那里去进行了。中国商人出售布匹、烟叶和茶的价格比较“便宜”，因而使人们愿意到他们那里出售原产品。中国商人换到的牲口、毛、毛皮和兽皮的大部分用驮运队运往张家口或归化城，另一部分出售给那些往俄国倒运原产品的俄国收购商。中国商人在交换中，图瓦人给什么要什么，牲口、兽皮、奶油、羊毛什么都要。这些货物因为有俄国收购商要购买，不愁卖不出去；同时，俄国收购商之间的竞争又造成了原产品价格不断上涨的趋势。自然，原产品价格不断上涨所带来的好处，完全被组织完善的中国商人得去了，而对分散的、被奴役的原产品生产者却什么也得不到。

中国商人以极低的价格买进图瓦原产品，再以高得多的价格卖给俄国收购商，从中得到了那么多的好处，这使他们完全能够以比俄国商品低一些的价格出售粗布和某些日用品，以便更好地把猎人和牧民的全部产品都弄到手里来。

低价收购原产品成了获取商业利润的主要来源和贸易的目的，而销售日用品却成了攫取图瓦原产品的基本手段。

中国资本在开展贸易的同时，还开始从事高利贷盘剥，并在这方面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在高利贷的影响下，对图瓦原产品的掠夺变得更加深刻、更加全面了。

在这方面中国资本不是先驱，而是步俄国资本的后尘，但是干得比俄国资本更为凶狠。中国商行在图瓦居民既无权利又受奴役的情况下，依仗地方当局的支持大放高利贷。众所周知，原产品和牲畜大部分是在仲夏季节上市，而茶、烟叶等商品却是牧民长年需要的。中国商行由于实际上垄断了日用品的销售，而且组织严密，所以在很短的时期内就将主要的高利贷业务集中在自己手里。为了在这方面获得更大成就，他们还采取了另一种行之有效的盘剥手段，即用预付“定金”的办法去收购原产品。商人提前先把土布、茶砖、烟草交给当地居民作“定金”，生产者则保证在一定期限内交

付预定的原产品。

在所有这些业务往来中是以绿茶砖作为核算单位的。假设买主赊购一些茶砖,那么他得到的一半是茶砖,一半是由商人选定的物品。商人就是利用这种权利来推销他手里的各种滞销商品。

图瓦人得到商品后,经过六、九或十二个月的期限,就必须交付一定数量的产品(比如灰鼠皮或牲畜)。债务人用以还债的产品要折成茶砖来计算,折价总是很低。如果债务人不能如期交货,他欠的债就要加倍偿还并改订新的还债日期。如果欠债只还了一部分,则其余部分便加倍偿还。要是债务人不能交付原先规定的货物,那么商人就把债折算成货币或其他货物,如用其他货物偿还,图瓦人的货物价格就会被压得更低了。

117 例如,用牲口还债,估价结果是商人每借出一卢布要收回五卢布或一头一岁口牛犊。这样,秋天借进的一块茶砖,九个月后就变成了一头牛犊。商人利用这种交易办法收购原产品和牲畜,价格比市场低得多。用廉价收购原产品说明了一个初看起来令人奇怪的事实,即中国人卖给收购商的原产品价钱常常要比俄国人自己向当地居民购买便宜,有时竟贱百分之二十。¹

地方当局积极协助向债务人讨债,推动了中国人向图瓦人的放债活动。他们在讨债时毫不留情。债务人因某些原因不能按时还债,便要遭到毒打,他们的财产便会被廉价拍卖,拍卖所得一部分用来抵债,其余则作为“诉讼费用”归法官所有。

如债务人无力还债,首先向其亲属讨还,如果亲属也一无所有,则向其所属之旗讨还。由于每项贷款过期都应加倍偿还,再加上利滚利,使借贷成了一项非常赢利的业务。因此,中国商行情愿只讨还一半债款,另一半同意延期偿还。这种作法使他们能保持大量当地居民处于还不清债务的境地,并保证他们能从这些居民

1 鲍戈列波夫与索波列夫所著前引书,第260页。

手里直接获得廉价原产品。这样,图瓦的原料便提前很久“在还未收获到手时”就预售给中国商人了。

除了向个别生产者贷款以外,还有另外一种贷款,这种贷款能使债权人对全区经济施加无限的影响。

这就是对总管贷款。总管若想获得职位、官衔,便必须行贿和送礼,这就需要很大花销,而且常常要花费白银。

显然,总管不是总能在指定期限内从居民身上搜刮到所需要的数目的。在总管感到为难时,中国商行便出来帮助他,并自愿贷款给他。于是,总管所拥有的那些超经济的强制手段(包括严刑拷打)就成了商人奴役全旗的手段。克木奇克最后的总管之一海都布就是这样向中国商人借款十万多卢布。付息和还本的重担便落在全旗居民身上,居民只得用自己的财产还债,如果反抗还要挨打。

此外,这些旗本身也经常课以繁重的苛捐杂税,限期缴纳,不能耽误。随着货币经济的发展,中国当局把实物贡赋折成货币。所需现款通常分摊给全旗的居民,因此每户都需要用白银去缴纳贡赋。在这种情况下,缴纳贡赋以及与此有关的一切花费便被中国商行所承包了。M. 萨菲亚诺夫认为,几乎百分之五十的阿尔班和许多“特别捐”都要由中国人来承办。¹ 118

对旗“有利的”贷款条件通常是:最初六个月旗不支付任何利息,随后三年每年按百分之三十六付息。如果旗三年后不能立即偿还贷款,可订“续借”债约,而债款的数目就必然地加一倍,等等。

债权人在向居民收取利息和债款时,自然无法要求白银,因为居民手里几乎没有白银,而只能要原产品、毛皮和牲畜。由于要债时债权人对这些物品自行作价,因此债款利息便随之增长数倍。

1 M. 萨菲亚诺夫:《商业资本在唐努图瓦的殖民政策》,载《新东方》,1928年,第23—24期。

借债使全旗居民成了高利贷者的债务人，全旗的原产品便都落到了他们的手里。

旗当局同时也就成了债权人的忠实奴仆，这对债权人讨债，特别是向全旗中讨还那些个别债务人无力偿还的私债时是有用的。

上述材料表明，中国贸易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俄国贸易的胜利。中国的土布、绿茶和烟草成了销路极广的基本产品。这使俄国同类商品的进口量大为缩减。俄国商人被迫代销中国商品。中国商人转卖给俄国商人的有这样一些大量出产的地方产品，如牲畜、羊、兽皮、毛和油脂。但是俄国贸易仍然掌握出售某些商品的垄断权，中国商品还不能同它们竞争。属于这类的商品有：红色和黑色的皮革（油性革）、铁料及金属制品。油性革在米努辛斯克每张值五一七卢布，在这里可换六一八头羊，优质的甚至可换九一十头羊。轮箍铁的售价比在米努辛斯克高一倍。在金属制品中，生铁锅比在米努辛斯克的售价高两倍。脸盆和铜壶的售价高一倍，珐琅器皿——茶壶、盘子的价格也高一倍。¹

此外，在图瓦也仍有一些地区和部门处于俄国贸易的直接影响之下。这就是盛产各种毛皮的托锦和与乌斯边区毗邻的饲养马鹿的北部地区，中国资本还未来得及向这些地区渗透。毛皮和鹿茸基本上仍由俄国商人收购，俄国商人把毛皮、鹿茸和麝香转卖给
119 中国商人，然后中国商人将这些商品运往中国。²

俄国贸易还拥有一个重要手段，这种手段使俄国贸易在形势发生变化之后仍能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这种手段与图瓦货币经济

1 格鲁姆-格尔日麦洛所著前引书，第3卷，第1册，第609页。

2 鹿茸在中国用作药材。中医认为鹿茸有补气养神作用。公鹿每年春天长角，鹿角要等完全长成而尚充血时割取。新鲜鹿茸重五一三十俄磅，每俄磅值五一八卢布，而用盐水煮过又晒干的鹿茸每磅值十二一十八卢布。

从事马鹿饲养业的主要是俄国农民中的一些老户，他们与乌斯边区一起每年收获鹿茸达九百普特。

的发展有着密切关系。中国贸易在图瓦出现后，货币经济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居民的实物贡赋经常被折成货币。总管和官吏都要求货币；喇嘛庙收布施也愿意要货币，他们也把自己的财宝换成货币。富裕的人家为了不惹起贪婪的官吏的注意，也把家里一些剩余产品换成货币。因此，居民在出售原料时越来越要求用现金支付（白银或俄国纸币）。另一方面，俄国商人被迫大大缩小了从俄国输入过去用来换取原产品的工业品之后，便从俄国进口俄国货币或白银，在一定程度上来巩固自己与生产者的直接联系。俄国商人因为拥有白银这一“普遍的商品”，便打开了通向原产品生产者的新路，不经过中国人的手直接从生产者手中收购原产品。

有许多事实证明，俄国商人已过渡到用现金收购原产品的阶段。“在索约蒂亚经商的比亚科夫证实，现在（1910年）用俄国货币收购原产品的现象日益增多了。据这个比亚科夫和克木奇克商人尼库林说，在索约蒂亚收购牲畜多半用现金。在索约蒂亚经商的乌斯商人库兹涅佐夫也证实了货币交易有上述发展趋势。”¹“索约蒂亚的俄国居民证实，为俄国人干活的索约特人，现在通常要求付给货币工资，而不是象过去那样要商品。”²

然而，不应过分夸大货币经济在图瓦的发展，实物交换仍然占统治地位。

俄国贸易遇到的新情况以及俄国贸易发生的变化，必然要引起俄国商人行列的变化。

当然，势力最大的仍然是米努辛斯克大商人，他们作为俄国贸易的先驱者来到了图瓦，几十年来广泛采用欺诈与侵占手段从当地居民身上榨取劳动成果。他们是俄国商人的核心，这个核心后来又增加了少数发了财的新商人（多半是乌斯地区的富农出身）。 120

1 鲍戈列波夫与索波列夫所著前引书，第179页。

2 同上，第177页。

但是，和这些大商人并驾齐驱开展贸易活动的，还有为数众多的小商贩，这些人有一大部分过去曾给大商人当过伙计，他们在为商人作事期间积攒了为数不多的资金。

然而，小商贩的资本不足以开展贸易。他们还须借钱去购买商品，后来他们还必须借俄国货币和白银去收购原产品。

他们在米努辛斯克从大商行那里得到货物或按高价赊给他们的白银后，便必须向这些大商行出售从图瓦收购来的原产品。他们也从图瓦当地大商人手里借款。这些大商人在贸易旺季向他们投放流动资金，他们则必须向大商人出售收购来的原产品，而且必须按被压低的价格出售。这样，这些小商贩在贷款和出售原产品的苛刻条件束缚下，实际上已沦为大商业资本的伙计，成了俄国商品在当地居民中的主要推销者。

在革命前的几年里，俄国各大商行中出现了一种新动向：放弃和取消俄国商品零售业务，认为赢利不大，而转向大规模地成批收购原产品和牲畜。在这个时期的文献中我们经常见到类似的提法。

“比亚科夫商行是所有这些大商行中最古老的一家，它在这个地区经营了三十五年以上。以前，这个大商行曾广泛经销俄国商品，但现在它越来越缩小商品销售的规模，而开始用俄国货币收购当地原产品了。”

“现在，这些商行（麦德维杰夫商行和瓦维林商行）的销售业务，特别是赊销业务，也大为缩小了。然而用现金收购牲畜、羊毛、皮货和熟油的规模却在扩大。”

“象萨菲亚诺夫那样的大商行的商品销售业务也缩小了。然而，现在它还在大量收购马、牛、羊等牲畜，多半是用现金收购，只有一小部分是用商品交换的。”

由大商人进行的成批收购业务的集中，通常会使这些大商人

手中积存大量的牛群、马群、羊群。这些商人要等到幼畜和瘦畜在一望无际的图瓦草原上长大和膘满肉肥以后，才从土著居民那里一小批一小批地把牲畜收集起来。此外，这种商业畜牧业还取决于俄国市场的行情，因为这里的牲畜和畜牧业所提供的原产品都要在那里销售。等待俄国市场上价格的上涨，也是不得不把牲畜留在图瓦饲养的一个原因。另外，我们已经讲过，中国的竞争大大限制了俄国商人同图瓦原产品生产者的直接交易。同时，俄国市场对牲畜和畜牧业产品的需要，以及这些商品价格的不断上涨，使占有牲畜成为有利可图的行业。在这些情况的影响下，建立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大畜牧业便开始发展起来了。 121

占有大量牲畜的现象，在图瓦并不新奇。我们知道，俄国商人早就开始实行以牲畜为抵押的信贷制度，后来中国商人也跟着实行。这些债款被折合成一定数量的羊或者一岁口牛犊，因经常延期还债而象滚雪球似的越滚越大，实际上只能导致一种后果：图瓦债务人虽然名义上还是畜群的所有者，而实际上却已变成了看管别人（俄国人或中国人）的畜群的放牧人。尽管图瓦畜群所有权已经落到了俄国商人和中国商人手中，但畜牧业却仍处于分散的、小规模的状态。虽然牲畜实际上已属商人所有，但债务人放牧这些牲畜不仅得不到任何报酬，而且债务人还要对畜群的完整无损负全部责任（例如发生畜瘟时）。仔畜也归主人所有。然而这种畜牧业制度也有其不利的一面，因为畜群的主人无法阻止债务人糟蹋牲畜：他们可以借口自然死亡而屠宰并吃掉一些牲畜，公牛被他们使用得筋疲力尽，母牛因照料不周，产奶量与产仔量极低；由于缺乏饲料和流行瘟疫，牲畜不断死亡，而想从放牧人身上得到赔偿，却又毫无油水可捞了。

由于上述各种因素的影响，图瓦的畜牧业经营方式便开始发生了变化，出现了采用专门放牧人的工业畜牧业。这种放牧人领

取工资，无权使用牲畜。俄国商人的企业性的畜牧业逐年获得发展，俄国商人便逐渐变成了大牧主。

1908年访问过图瓦的布尔加科夫，对乌尤克河流域几家俄国商站的牲畜头数统计如下：

商站名称	马(头数)	牛羊(头数)
瓦维林	1,500	1,500
麦德维杰夫	2,000	2,000
维捷尔尼科夫	500	5,000
希皮林	1,500	1,500
A. II. 萨菲亚诺夫	4,000	3,000

为了保证大批畜群有牧场放牧，商人们便开始千方百计把土地弄到手里，其面积之大，“会使一半的德国公爵听了之后羡慕得垂涎三尺。获得这些面积大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土地所花的代价是很低的：只是给总管们送了些酒和礼物。”¹

122 明茨洛夫访问过乌尤克河谷萨菲亚诺夫家族中的一个寡妇的商站，并有所记述。我们从他的记述中摘引一小段：

“我问萨菲亚诺娃：‘你总共有多少匹马？’

“她叹了一口气说：‘现在不多了，因为我一个人照管不过来……总共才有二千五百头……’

“所有这些马匹都由索约特人放牧。冬天他们赶着畜群在山坡上放牧，夏天他们把畜群赶进大森林里，这些马群几乎不在萨菲亚诺娃自己的广阔土地上放牧。

“当地要人所占有的大片土地都未充分利用，例如：萨菲亚诺娃虽然占有一万俄亩土地，却只开垦了十五俄亩，其余土地都没有开垦。”²

在图瓦脱离中国以前，商人们还不得不采取诸如行贿之类半

1 明茨洛夫：《秘密使命》，第213页。

2 同上，第66页。

合法的手段，而在图瓦声明接受俄国保护以后，他们便开始使出浑身解数，肆无忌惮地掠夺图瓦的土地。他们恬不知耻地把图瓦的牧场和耕地圈起来，据为己有，还企图把图瓦游牧人挤到不毛的峡谷去，甚至把他们撵过唐努山去。

明茨洛夫在给移民局的报告中写道：“萨菲亚诺夫、比亚科夫、瓦维林、麦德维杰夫、斯科别耶夫，主要就是这些人瓜分了乌梁海所有的肥沃土地。他们警惕地注视着，唯恐有人侵犯他们对大块土地的统治权，这些大块土地每块都超过欧洲许多公国。他们是从无权出售这些土地的索约特人那里廉价获得的，往往是用总共不超过几十卢布的酒、绿茶、土布等东西换来的……这些没有登记的乌梁海公国的面积一般有多大，我只要举一个远非最大土地占有者的领地作为例子就可以说明了。这个土地占有者曾亲自对我说，仅在唐努山脉他就有三百二十平方俄里的土地，在小叶尼塞河流域还有土地……。除此之外，这类采邑-富农式的公国是俄国向图瓦移民并使图瓦俄罗斯化的主要障碍之一，所以关于他们应否继续存在的问题，必须首先加以解决。”¹

俄国商人建立的企业式畜牧业经济，开始在总的背景上表现出一些改进，虽然这些改进当时尚极其微小。萨菲亚诺夫力求改良当地牲畜的品种，所以从国营育马场选购了优良种马。拥有大量畜群的商站开始发展油脂制造业，为此，萨菲亚诺夫、比亚科夫等商人购置了分离机来炼油，然后运往俄国。还有些商人开办了小型制革厂对自产的牛羊皮和马皮进行初步加工。经初步加工后，一部分皮革可用以缝制衣服(熟羊皮)，大部分只经过初步鞣制，便运往俄国。² 所有这些改革畜牧业的尝试，都带有萌芽性质，

1 中央历史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移民局公文，1914年，第55号文件。

2 例如俄国商人瓦维林在乌尤克(塔尔雷克)河流域拥有的大产业，就有二百俄亩耕地，二百多俄亩刈草田和几万亩牧场。该公司还设有一系列附属企业：一个拥有

沒有超出个别商站试验的范围。资本主义的畜牧业在创立以采用新劳动和新技术为基础的新生产方式上迈出了第一步。

结果从俄国贸易中产生出来的高利贷资本，经过一定的发展阶段，遇到了更强大的竞争者中国商人之后，开始成了“形成新生产方式的一种手段；这一方面是由于封建主和小生产遭到毁灭，另一方面是由于劳动条件集中为资本。”¹

后来，俄国贸易在帝国主义战争爆发前不久，在形势发生剧烈变化之后得到了新的发展。这种新形势的出现，一部分是由于实行了农业移民，在图瓦建立了新的俄国农业移民区；特别是由于一九一一年中国爆发辛亥革命和蒙古脱离中国后，中国贸易在图瓦被消灭的结果。

在分析导致这种新形势产生的过程之前，我们先把商业资本和高利贷资本渗入图瓦的过程及其对图瓦社会经济制度的影响总结一下。

外国的侵略更加剧了当地封建主义的残酷压迫，这种压迫为商业高利贷资本这种被列宁称为“最卑劣的最坏的”^①资本在图瓦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高利贷资本是先后从俄国和中国渗透进来的。沙皇俄国和满洲帝国是殖民主义大国。它们首先企图对缺少文化的落后民族和国家进行商业资本主义的剥削。

在这两个帝国的殖民体系中，商业高利贷资本是推行其殖民政策的主要工具和先遣军。

贸易在图瓦的发展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三匹母马的设备先进的育马场，一个拥有二百只鹿的养鹿场，以及面粉厂、碾谷厂等许多辅助企业。这个公司的年收入在十万卢布以上。获得如此高额的收入是完全可能的，因为瓦维林公司这个大企业完全是以采用图瓦贫民异常廉价的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详见谢佩托夫著的《畜牧业方面的第一个国家农业管理机关（以个人对问题的研究为根据）》，载《现代图瓦》，第20—21页。

1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3卷，第675页。

① 未注明出处，按词面翻译。——译者

任何商业资本,总是在不改变生产方式的情况下,作为一种产品同另一种产品进行交换的媒介往经济毛孔里渗透,在那里找到稳固的立脚点。俄国资本与中国资本也正是如此,在其发展的第一阶段上,其主要目的都是以工业制品交换狩猎业产品与畜牧业产品。这两国资本之间竞争的结果,是中国资本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在推销主要日用必需品方面,俄国贸易处于代销者的从属地位。从俄国商人那里夺来了这一最重要的阵地以后,中国商行利用实物交换形式,并以高利贷枷锁束缚生产者,从而顺利地控制了主要的原产品来源。无论中国贸易,还是俄国贸易,它们在其发展的第二阶段上,都以获取廉价原产品作为主要目的。这样,最关键的问题,在第一阶段是销售工业品,在第二阶段是通过推销工业品控制原产品。 124

在贸易方法与贸易形式的发展上,也可以看到一定程度的连贯性。

实物交换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始终是主要的交换形式,但到后期,商业资本多年活动的结果,使贸易关系得到了发展。于是实物交换便逐渐让位给货币贸易,这种货币贸易是使用运进图瓦的俄国货币与白银进行的。

交换关系早已同使商业产生高利贷因素的债务关系发生了密切联系,而债务关系发展下去就变成了高利贷商人对直接生产者的奴役关系。

小生产者在名义上尽管仍旧是其生产手段的所有主,但实际上已成了被奴役者,并已变成永无希望恢复其独立性、长年替商人干活的伙计。

另一方面,商业资本向图瓦居民提供工业品,并订购他们所生产的原产品,其结果,首先是破坏了图瓦经济的特点——工农业统一,因为家产的原产品几乎全部卖出,所以家庭原产品加工业的规

模便不得不因此而缩小；其次，商业资本也使家庭工业丧失了发展到更高水平（即使是发展到手工业水平）的可能性，因为一切日用必需品全都由商业资本从外地，即从俄国和中国运到本地来了。

这样，居民被吸引到商品货币经济的范围内以后，随之而来的是传统经济形式遭到迅速的破坏，而新的经济形式却没有同时产生。于是，在广大的、被从生产过程中抛出来的劳动群众里便产生了农业人口过剩的现象。

对封建主贷款所产生的后果也是很严重的。在此基础上产生的主要是以中国商人为代表的高利贷者与总管之间的关系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在直接生产者的经济状况上，因为封建主陷进资本的罗网越深，他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削便越重，封建压迫也越厉害。俄
125 国商人与中国商人都以榨取图瓦的原产品、毛皮和牲畜作为自己的目的，而封建主义分子则是商业高利贷机构剥削图瓦的代理人。

世俗封建主、神权封建主和满洲王朝不停地、变本加厉地对居民进行敲诈勒索，把居民推入商人与高利贷者的魔爪中，使他们成为一种固定的牺牲品。

遭受“本国”封建主奴役和掠夺的居民被迫向商业资本非常廉价地出售自己的原产品。

这样，封建关系变成商业资本主义殖民体系的一个从属成分，同时也成了向外国工业提供廉价原产品的最重要的条件。

在这个游牧和狩猎的国家里发展起来的军事封建集团，正是通过这种离奇的途径成了各资本主义邻国（俄国及其他国家）剥削图瓦居民必不可少的一环，资本主义以前的剥削形式成了殖民制度的支柱，中世纪的制度为了外国帝国主义的利益而被保存下来了。无比残酷的压迫制度使图瓦疲惫不堪，它必然会引起生产力的急剧下降并造成广大居民的极度贫困。

所有写过关于图瓦的文章的人都一致肯定了这样一些事实，

从这些事实中必然会得出一个不容争辩的结论，即图瓦的经济已陷于全面破产的境地，居民已处于绝种的边缘。连所谓“开明的”、“文明的”商人 Г. П. 萨菲亚诺夫（他的“文明创业”就建立在许多图瓦人的白骨上）也在 1910—1912 年的日记中写道：“在乌梁海人所实行的法规和惯例的影响下，乌梁海人的经济自中国贸易进入以后，逐年急剧下降，不用很久，有些旗将会弄得一无所有。”¹

如果从这句话中撇开对中国贸易片面的指责不谈（这种指责出于商人对比自己幸运的竞争者的仇恨），那么，它所指出的乌梁海人的经济急剧下降和居民贫困破产的情景却完全符合实际。

上述商业高利贷资本在图瓦出现和活动的具体历史包含了马克思所概括的一些基本因素，是对马克思出色结论的无数证明之一。“这种形式的高利贷资本，实际上会占有直接生产者的全部剩余劳动，而不改变生产方式；在这里，生产者对劳动条件的所有权或占有权以及与此相适应的个体小生产，是根本的前提；因而，在这里，资本不是直接支配劳动，不是作为产业资本和劳动相对立。这种高利贷资本使这种生产方式陷入贫困的境地，不是发展生产力，而是使生产力萎缩，同时使这种悲惨的状态永久化，在这种悲惨的状态中，劳动的社会生产率不能象在资本主义生产中那样靠牺牲劳动本身而发展。……高利贷不改变生产方式，而是象寄生虫那样紧紧地吸在它身上，使它虚弱不堪。高利贷吮吸着它的脂膏，使它精疲力竭，并迫使再生产在每况愈下的条件下进行。……在奴隶制占统治地位或者剩余产品为封建主及其家臣所吞食的情况下，奴隶主或者封建主即使陷入高利贷之中，生产方式仍旧不变；只是它对劳动者的压迫会更加残酷。”²

1 萨菲亚诺夫所著前引书，第 164 页。

2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 3 卷，第 674—675 页。

第四章 俄罗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及其在图瓦的殖民活动

沙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俄国在图瓦的农业殖民活动的开始。乌斯边务区的建立。打着科学旗号的军事侦察。克木奇克河边的冲突。乌斯马车道的修筑。俄国商业移民与农业移民在图瓦的分布情况。沙皇政府在“乌梁海问题”上加紧活动。伊尔库次克会议。内阁会议讨论“乌梁海问题”的情况。中国爆发辛亥革命与蒙古脱离中国。图瓦境内的中国商站被毁灭。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俄罗斯，是世界上最大的殖民帝国之一。沙俄殖民帝国是靠征服和兼并主要居民尚未形成统一民族的新地区而发展起来的^①（斯大林）。仅仅一个西伯利亚的领土就超过了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西伯利亚、中亚和高加索的人口，在1905年就达到了二千六百万，即相当于一个十九世纪下半叶象意大利这样的欧洲中等国家的人口。¹

图瓦在地理上除与俄国接壤外，远离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它恰似作为沙俄殖民地的西伯利亚在地理上的延伸。当然，单纯地理上的接壤并不能构成俄国侵略图瓦的原因，而只是进行这种侵略的一个条件。为了说明俄国侵略图瓦的问题，必须对能够左右沙俄殖民政策的执行与发展的那些社会集团的现实利益进行分析。通过对这些现实利益的分析，不仅可以明确看出沙俄推行殖民政策的动力，而且还可以看出它用以占领和剥削新领土的特殊形式

^① 非直接引语，按词面翻译。——译者

1 波克罗夫斯基：《马克思主义与历史发展特点》，第111页。

和方法。

众所周知,列宁把资本主义市场形成的过程分为两个方面:资本主义向纵深发展,即在本国领土内资本主义农业与资本主义工业的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向广阔发展,即资本主义扩展到别国领土上,其中有些地区完全没有旧地区的移民移居和被他们开发,有些地区被世界市场和世界资本主义以外的部落所占用。¹ 128

一切国家的资本主义都以极大的力量表现出不断扩大其势力范围的趋势,这种势力范围的扩大是靠变新地区为殖民地并将其卷入商品流通里去的手段来实现的,而当资本主义过渡到帝国主义阶段时,则靠将殖民地国家拖入建立在殖民地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生产中去的手段来实现。

在这方面沙皇俄国也不例外,但它的社会经济结构特点必然也要反映在其殖民政策的特点上。一方面,俄国的国民经济结构是在工业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特别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影响下形成的。另一方面,众所周知,1861年改革后保留下来的半农奴制地主土地所有制、拥有大量土地(在俄国欧洲部分有七千万俄亩土地)的三万个农奴主地主的统治,对俄国社会制度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领导这一紧紧束缚着俄国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农奴主剥削制度整个体系的,是一个半封建的君主专制国家。

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当工业资本刚刚开始蓬勃发展的时候,沙俄帝国的对外政策仅仅是对内政策的继续,即作为解决国内经济和政治矛盾的手段。沙皇政府的殖民政策是使资本主义不向纵深发展(国内半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统治剥夺了资本主义向纵深发展的可能性)而向广阔发展的一种手段。

沙皇的对外政策所追求的目标,首先是建立新殖民地,这些殖

1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3卷,第545页;《列宁全集》,中文版,第4卷,第75页(非直接引语,按词面翻译。——译者)。

民地，或者是直接掠夺的对象，或者是间接为俄国工业品扩大市场的商业高利贷剥削的对象。其次，这个政策所追求的目标是将俄国农民移居到所侵占的地区去，因为这种移民政策是与俄国本土农奴主、地主需要牢固掌握饥饿的受压迫的农民作劳动力这一利益并行不悖的。建立新的农业地区，扩大了俄国地主和商人的活动范围并为他们的剥削提供了新的对象。但是殖民政策的上述所有任务都包括在一个基本的、有决定意义的任务里，那就是保障地主土地所有制和专制制度万古长存。对于君主专制制度的这种趋向，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就已指出：“如果俄国资本主义在改革后时代初期所占领的领土界限以外没有地方可以扩张，那末资本主义大工业与农村生活古老制度（农民被束缚在土地上等等）之间的这个矛盾就应当迅速引导到这些制度的完全废除，引导到俄国农业资本主义道路的完全廓清。但是在被开发的边区寻求并找到市场的可能（对于厂主），出外到新土地去的可能（对于农民），就削弱了这个矛盾的尖锐性并延缓了它的解决。不用说，资本主义增长的这种延缓，无非是准备它在最近的将来更大和更广泛的增长。”¹

通过吞并新地区而得到扩大的东方辽阔地带，是罗曼诺夫王朝用来暂时缓和国内矛盾的主要手段，因为俄国农民到这里来可以避免“人多地少”，而俄国地主、商人也可以随农民到这里来。沙皇制度不是通过消除农奴制关系，而是通过扩大商业资本主义剥削的范围来寻找摆脱危机的出路。

在1904—1905年以后开始的下一个时期里，俄国和沙皇君主制度的阶级特点，也同它们的国际作用一样，随着资本主义进化到新阶段而有了一些变化。二十世纪初期开始的俄国经济与政治发展的新时期的特点是，俄国资本主义在继续受农奴制羁绊的情况

1 《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3卷，第545页注。

下已开始向金融资本主义发展。俄国银行与俄国工业在经济上同外国金融寡头有着紧密的联系，主要是同英法资本有着直接联系。从这时起，俄国便成了帝国主义所有矛盾的焦点。

“首先，沙皇俄国是以最残忍最野蛮的形式表现出来的各种压迫——资本主义压迫、殖民地压迫和军事压迫的策源地。谁不知道，在俄国，资本的万能和沙皇制度的暴虐是融合起来了呢？谁不知道，俄罗斯民族主义的侵略性和沙皇制度对非俄罗斯民族的屠杀政策是融合起来了呢？谁不知道，对土耳其、波斯、中国广大地区的剥削和沙皇制度对这些地区的侵占，和侵占领土的战争是融合起来了呢？列宁说得对：沙皇制度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沙皇制度把帝国主义各种最坏的因素集中起来，并使之变本加厉了。”¹

一些比较先进国家的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普遍发展，也牵连到了俄国。这种发展提出了殖民政策的一些新利益，这些新利益是由于沙皇制度变成了欧洲帝国主义在东方的看门狗而引起的。²

但是对外政策的这些新利益、新动机，并不取消对外政策的旧利益、旧动机，因为这些旧利益、旧动机在新利益、新动机出现以前就业已存在，并与沙俄社会政治制度的基本矛盾联系在一起，交织在一起，深刻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 130

在新的条件下，沙皇俄国积极参加了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争夺世界霸权和重新瓜分世界的斗争。在占领远东、中亚和高加索以后，沙俄的注意力便集中到中国、蒙古和图瓦方面来了。这些地区由于其地理位置的缘故，十分“便于”沙俄掠夺，就象被它掠夺过的那些“边区”一样，况且，其中蒙古和图瓦又不处于占统治地位

1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5页。

2 斯大林：《列宁主义问题》，中文版，第6页（非直接引语，按词面翻译。——译者）。

的帝国主义强国基本的帝国主义利益交叉的中心。俄国对这些地区居于独占的地位。但是，俄国是由一小撮地主分子管理的国家，军阀居统治地位，而军阀上层分子又与地主阶级有着血肉联系，社会下层毫无权力，这种情况不能不使其殖民政策的形式和方法具有由其整个经济政治制度所决定的一些特点。

列宁不止一次地强调指出，沙皇俄国的政策与其说是新型的具有资本输出和在殖民地发展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点的帝国主义阶段的资本主义的表现，不如说它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表现，因为“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在这个政策中总是占优势。¹沙皇俄国的政策总是极其强烈地反映着世袭显贵、宫廷、沙皇近臣、上层官僚的利益和商业资本的利益。沙皇俄国政策的主要动机是在日益迫近的革命面前挽救地主土地所有制和地主阶级君主制。这个政策的最集中表现，就是在新掠夺的领土上建立最原始的剥削形式，主要是商业高利贷的剥削形式，但也并不排除公开的直接掠夺的形式。这个政策必然会带来民族压迫与被征服人民的无权地位。

列宁写道：“压迫和掠夺其他民族的可能性加强了经济停滞，因为收入的来源不是依靠发展生产力，而往往是依靠对‘异族人’进行半封建剥削。”²这就是在西伯利亚、高加索、中亚等地得到了充分表现的俄国“军事封建”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基本特点。俄国在图瓦肆无忌惮地推行的也正是这种政策。

在上一章里我们叙述了俄国商业资本向图瓦渗透的情形并叙述了俄国“商业”（这种商业实质上并非什么商业，而是在商业幌子下的掠夺）的手段与形式。但是，借助商业资本的机构来剥削居民，只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的一个方面。它的另一方面，是殖民活

1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2卷，第674页（非直接引语，按词面翻译。——译者）。

2 《列宁选集》，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2卷，第675页。

动。向萨彦岭以南移民，就是沙俄专制政府的这种广泛的殖民活¹³¹动的表现，这种移民活动暂时缓和了俄国国内的社会经济矛盾，延缓了俄国社会经济制度彻底灭亡的到来，虽然这种延缓，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无非是准备资本主义在最近的将来更大和更广泛的增长，同时积累起来的矛盾也必将更激烈、更凶猛地爆发出来。

俄国政府是商业资本和移民向萨彦岭南新殖民地推进的积极参加者和鼓吹者，虽然由于一系列原因它宁愿暂时躲在幕后，准备彻底吞并图瓦的条件。由于农业移民过程与沙皇政府的侵略政策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把这两个问题作为一个整体来一并研究是较为方便的。

沙皇俄国在图瓦推行殖民政策的历史，可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从俄国商业资本开始向图瓦渗透与农业移民活动的初步尝试起，至十九世纪末为止；第二个时期约为十年，到公开夺取与占领图瓦为止；第三个时期只持续了几年，到十月革命为止，十月革命揭开了这个地区历史的崭新篇章。

* * *

俄国人向图瓦移民的历史是与整个叶尼塞边区特别是与毗邻的米努辛斯克边区的经济发展历史不可分割的。由于萨彦岭两边的经济发展过程有着内在联系，所以在叙述俄国农业移民活动及其所导致的后果之前，必须对萨彦岭以北的西伯利亚边区的经济状况加以简要的叙述。¹

土地辽阔，毛皮、鱼、木材自然资源丰富，土质肥沃，牧草丰盛，人口极其稀少，是使俄国居民在广袤的西伯利亚平原上的经济，除

1 我编写叶尼塞边区被占领和被变为殖民地的简史中主要参考了下列著作：格里戈里耶夫：《西伯利亚（叶尼塞边区）经济生活条件的变化》；阿德里安诺夫：《米努辛斯克边区概况》；科兹明：《哈卡斯人》；瓦京：《18世纪的米努辛斯克边区》；斯杰潘诺夫：《叶尼塞省》；戈洛瓦采夫：《叶尼塞省农民的农业经济及其发展条件》；阿尔古诺夫：《米努辛斯克边区农业概况》。

极少数例外，都具有掠夺、原始粗放性的最直接的原因。由于兽类“蕴藏”极其丰富，所以没有必要对猎捕野兽进行任何限制；在到处都是肥沃的处女地的情况下，保持土壤的肥力也不上算；牲畜质量低劣（弱小、产奶量低等）由数量众多来抵补。

自然资源好象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似的。贸易的主要对象是¹³²“珍贵毛皮”。“珍贵毛皮”畅销于俄国欧洲部分及国外。

粮食只向叶尼塞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米努辛斯克等少数几个城市出售。人民被苛捐杂税所累。地方当局是由招募来的俄国官吏中的败类组成的；同这些人相比，谢德林笔下的“塔什干人”^①简直是天使的化身。边区的官吏恣肆专横，受贿成风。

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开始的采金业的迅速发展，是对该边区的强有力的推动，使它暂时摆脱了所处的停滞状态。金矿的开发面积在短期内就达到了很大的规模。金矿区人口迅速增长，提出了对粮食、肉类、铁及其他物品的需要。边区在短期内便办起了酿酒业与制革业。从俄国欧洲部分通过边区向东西伯利亚运送货物的车辆不断增加。大批工人每年初春到金矿来，秋天离开金矿回去。工人的这种往返流动促进了马车运输业的迅速发展，沿着所谓莫斯科大道开设了许多大车店。很多金矿工人的工资都相当高，他们的一部分收入作为资金流入农业。但农业也从另一方面受到了良好的影响。莫斯科大道成了能大量销售地方产品（其中包括马车运输业需要的燕麦、饲草）的市场。马车运输业也促进了蒸馏焦油、制车轮、做雪橇、制轭等行业的发展。

在所有这些情况的影响下，人数相当大的一部分当地富裕居民的财产有所增长。无论是从开垦荒地的面积来看，或是从饲养牲畜的头数及经营副业的情况来看，上层富裕农民的生活在这一时

^① 谢德林(1826—1889)，俄国讽刺作家，“塔什干人”是其讽刺作品《塔什干的先生们》中的酷吏典型。——译者

期(八十年代末)都有了明显的改善。有耕地的农民拥有的耕地平均每户在十六俄亩左右;如果所有牲畜都折合成大牲畜计算,每户平均达到十三·八头。但是即使在这个时期,无耕地户甚至还占11%,无马匹户占7.6%,有一一二匹马的户数占17.6%,无牛户占12%。这些数字表明,在一些富有农户旁边,仍存在着一些极端贫困的农户。西伯利亚农村的阶级分化已达到相当尖锐的程度。

边区的开发水平,其巨大自然资源的利用水平,仍然低得可怜。不仅工业(采金业除外)没有得到任何显著的发展,而且农业也处在非常低的水平上。事实上,播种面积仅达可耕地的五分之一。在有居民的地区平均每平方俄里能有五·六人,整个地区平均每平方俄里仅有一·四人。为了判断农业发展的程度,可算这样一笔帐:一个成年农民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每年可耕种六俄亩地,并可在妻子的协助下进行收割;如果注意到当时农业的实有人口并把实际耕种面积与可能耕种的最大面积加以比较的话,那么当时农业人口能耕种的面积比实际耕种的面积多出40%。显然,居民的劳动力在农业以外的其他部门(如马车运输、副业)中得到了更为有利可图的应用。在1870—1890年间,每十年的耕种面积仅增加5%,而人口的增长,包括自然增长与机械增长(即移入人口增长),却达到了20%以上。由此可见,即使在由于采金业发展而引起的相对繁荣时期,农业的发展实际上也仍然处于停滞状态。不仅如此,叶尼塞边区一些当地农业专家通过对一些材料的研究得出结论,认为当时的农业肯定是在走向衰落。农业出现衰退的原因,不是土质开始贫瘠(相反,产量仍比黑土地带^①高得多),而是由于粮食没有广大的销售市场,因而每俄亩的收入极其微薄。例如,米努辛斯克州每俄亩耕地的纯收入为七卢布四十戈比,每户平均十

^① 苏联的黑土区包括有乌克兰的大部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黑土区、北高加索的一部分、伏尔加河流域中游和西伯利亚。——译者

六俄亩耕地，其收入仅为二百二十卢布。此外，粮价极不稳定：燕麦价格波动的幅度是 216%，黑麦价格波动的幅度是 350%。劳动力的价格比较贵。生产费用常常高于俄国欧洲部分。这就是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农业状况的特点。

农业的另一个部门——畜牧业的状况也并不见佳。由于附近没有广阔的市场，牲畜的价格很贱。九十年代初期，一头母牛的平均价格是十四—十八卢布。一只绵羊是二—二·五〇卢布，一匹本地种的马是 20—31 卢布。因此，虽然土地辽阔，畜牧业却得不到充分的发展。

畜牧业周期性地受到通常从蒙古传来的瘟疫的灾难。米努辛斯克、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阿钦斯克等县死于瘟疫的牲畜，1870 年近三万头，1871 年近五万头，1872 年近四万头，1885 年近八万五千头，1886 年近八万三千头。除了瘟疫之外，其他流行病也给畜牧业带来很大的损失。

在一个时期发展得相当可观的非农业行业，也很快出现了衰落迹象。除了一般的经济原因外，正好在八十年代末发生的采金业规模的缩小，对它也产生了影响。

由于整个地方经济与采金业的休戚相关，因此地方经济经过一段短期发展之后便开始出现衰落的迹象，农民的生活也随着明显地下降了。1891 年的农业歉收给边区带来了沉重的打击。米努辛斯克县连种子都没收回来。农业歉收与生活下降的结果，引起了老住户向外地迁徙的运动，牲畜卖价极低，一匹马仅值二—三卢布。

134 西伯利亚铁路建成以后，莫斯科大道便废弃了。马车运输业倒闭。大车店也关门。地方市场大大缩小。修筑铁路引起的城市与林业(砍柴业等)的发展远远不能使居民获得过去那样的收入。

西伯利亚铁路把本地同俄国市场以及世界市场连结起来所产

生的积极影响并不显著。叶尼塞边区可以输出黄金与毛皮，然而，这些商品价高、体积小，运输方便，并未感受到便宜的铁路运输有什么明显的好处。铁路本来可以对农业发展发挥比较大的作用。

但当地的畜产品质量不高，牲畜的屠宰重量极低，乳牛不爱产奶，马匹矮小，大尾羊尾不肥，羊毛粗糙。而距销售市场较近的西西伯利亚与外贝加尔盛产牲畜，而且牲畜质量也较高。当地粮食销售状况也不见佳。该地区的粮食输出量甚小，因为叶尼塞省以西地区生产粮食的劳力比较便宜，粮食售价不断下降。因此，叶尼塞省的粮食无法与这些地区的粮食竞争。粮食仅能向伊尔库次克省和外贝加尔输出，因为那里粮价上涨，但输出数量极其有限。

这一时期，西伯利亚铁路促进了因被地主剥削而破产的俄国欧洲部分农民向边区移居。1902年，移入叶尼塞省的移民有一万六千三百八十二户，十万六千八百二十五人。农业人口迅速增长，然而农业早已不能容纳劳力了。流入该地区的新居民只能发展粮食生产，因为他们不懂其他行业，而繁殖牲畜又因份地规模狭小而受到限制。

农业处在与新的经济条件不相适应的境况。居民由于不能转入新的行业，不能改变经济体系，便陷入了严重的农业危机之中。

在整个叶尼塞省出现过的那种强烈的殖民过程，在米努辛斯克边区也出现了。1893—1899年间，在米努辛斯克县的七个乡就建立了三十一个新村镇，有近万人在这里定居下来，另外还有成批的移民在旧村镇落户。

在米努辛斯克边区，也同在整个叶尼塞省一样，作为主要部门的农业正在缓慢而无疑地走向衰落。这点由按人口计算的粮食产量的不断下降中可以看出。同时畜牧业也没有增长。

另一方面，农业的下降也不可能促使地方工业的发展。唯一“繁荣”的工业部门是酿酒业，它是地方粮食的最大消费者。在米

了。乌斯河下游两岸人迹罕至的地方还有他们的一些小游牧地，夏季，他们中有很多人便去给乌斯农民当雇工与牧人。

叶尼塞边区最近的一些州(贝斯州等)的农民，跟在乌斯边区第一批侵略者的后边，他们发现乌斯河谷的好地方都被先来的人占去了，便未经允许擅自越过了萨彦岭，把萨彦岭南坡一些好地方¹³⁶占据下来，建立了房屋，开始经营畜牧业与农业。

科恩在其著作¹中叙述的图兰镇的建立，就是俄国移民擅自侵入图瓦境内的一个典型例子。

“七十年代初，只有维谢尔科夫在这里定居下来，不久 Г. П. 萨菲亚诺夫也来了。萨菲亚诺夫把维谢尔科夫建造的房屋买下来，又在现在的图兰镇那个地方建立了一所新房子，让雇工卡扎奇金和阿贝杜林住到这些房子里。道路被指出来了，于是在维谢尔科夫和萨菲亚诺夫之后，米克申也来了……。当地人民没有加以阻挠。一方面，因为这块地方居住的是马迪佐的牧民，他们不归索约特大总管管辖，管辖他们的是蒙古总管；蒙古总管住地距离此地很远，没有人保护他们。另外，他们自己也是外来人，他们占据该地的权利也是极为可疑的。因为担心自己占有此地的权利发生问题，马迪佐人不得不对俄国人的来到表示容忍。另一方面，新来户只是开设商站，根本不建立任何村镇。不过，马·叶·马尔蒂诺夫、谢苗·丰季科夫与格里戈里·丰季科夫来到商站之后，于1885年便开始耕种了，他们修复了‘楚德人’^①的灌溉渠，购置产业。这些独特的农业先锋清楚地意识到这个步骤的冒险性，所以便送给地方官员鲍鲁贾伊杰伊赞和珠尔加迪-昆杜一百五十卢布的礼物，取得了他们的支持和同意……。这次苦迭打(Coup d'Etat)并没有隐瞒得住。被收买的官员受到了降职处分，关于俄国人撞

1 科恩：《乌斯边区》，第52—53页。

① 古代斯拉夫人对芬兰民族的总称。——译者

自活动的情况报告了乌里雅苏台将军本人。但在文牒往返无尽无休的时候,又有一些俄国人到这里来定居了。1885年,比亚科夫、萨拉普洛夫和佩图霍夫来了,他们也种起田来。老住户们天真地说:‘他们是作为先来者的伙伴种田的,因此没有受到索约特人的阻挠’。当时的边务官阿弗里卡诺夫先生与塔雷津先生对移民是支持的,在发给他们的护照里写着,他们到中华帝国去‘种庄稼’。”

在七十年代与八十年代,用传教士普季洛夫的话说,乌尤克河谷成了米努辛斯克农民“梦寐以求的理想”。受到侵略者迫害的这个河谷的图瓦居民归马迪佐管理。他们在俄国殖民者到来前约一百年,便到乌尤克和图兰地区放牧了。我们知道,这个佐属于一个住在蒙古的蒙古封建主,因而不受大总管管辖。由于无人保护,他们在侵略者面前软弱无力,天真地求助于乌斯边务官,给他写了一封下述内容的控告信:

137 尊敬的大俄罗斯国乌斯边务官亚历山大罗维奇:

查我的前任巴图纳松达尔加曾于光绪20年3月6日通知您,居住在乌尤克河和图兰河一带的俄国人随意建房、挖渠、开荒种地、使用牧场、滑雪和捕鹿。当时他曾在信中要求您制止俄国人的此类行为,并命令俄国人把牲畜从牧场赶走;而为俄国人放牧的乌梁海人,巴图纳松达尔加已予惩处。

在您的答复中,只谈到了禁止俄国人狩猎,但关于建房、开荒种地、使用牧场却未置复。在此之前,虽然将军派来了官员,视察了迄今为止所建造的房屋、开垦的土地和挖掘的金矿,但对这个问题迄今未获任何答复。同时,俄国人却仍然在我地放牧、建房,并把耕地面积扩大了几百俄丈;此外还兴建了一处墓地,内有8—9座坟墓。俄国人不断由乌斯入境,而定居在乌尤克河和图兰河一带的俄国人,随意在我地伐木、割草和践踏我乌梁海人的牧场,最后,俄国人对草垛的围护极不牢固,因而被糟踏,以致引起一些诉讼和争吵。此外,俄国人(以下例举了姓名)在野兽经常出没的嘎布查尔这个地方的小路上,擅自挖掘陷阱,捕获野兽。但落入陷阱的野兽常常饿得要死,而受吓的野兽就逃进大密林,以致我们以狩猎为生的乌梁海人无法狩猎。

鉴于我们两国缔结的条约中的第五、六两条规定：“对于盖房、放牧以及兴建墓地均应给予足够的土地。”而在咸丰十年即俄历 1860 年所缔结的条约中则规定：“遇有中国人所住之处及中国人所占渔猎之地，俄国均不得占，仍准中国人照常渔猎。”因此，以上条款必须同样遵守。

尊敬的大人，您管辖下的俄国人竟占据了我们的马迪佐的地方，这种行为同我们两国之间的友谊极为不符，同时在当地居民和官员之间不能不产生不愉快的后果。因此，我们把这种情况通知您，请在审理此件后，命令在乌尤克和图兰地区兴建新房的俄国人带着牲畜离开那里，并命令俄国人不得再随意砍伐森林、建房、割草和扩大耕地，不要再用陷阱捕捉野兽以及把牲畜交给乌梁海人放牧。此事处理之后，敬请赐复。专此布达。

顺致

安好！

大清国乌梁海

马迪佐负责人蒙古达尔加图门·乌利扎伊

宰桑呼比勒汗格

宰桑巴图增吉勒

昆杜萨姆鲍乌

昆杜赞丹扎巴

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五日^①

这样，俄国移民进入别人领土，一步一步地把开阔的好地方据为己有，发展畜牧业，扩大耕种面积，砍伐森林，浮运木材；并占据了渔业区、狩猎区。

在此整个时期内，沙皇政府推行侵略图瓦的政策比较谨慎。它所以采取这种方式行事，首先是由于它对俄国移民未经允许就

^① 信中引用的条约，我们翻译时参考了《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另外，达尔加、宰桑、昆杜皆为官衔的译音。信末尾所注年月原文是 Правления 21—2 луны, 5 числа. 原文没明确写明年号。根据写信的年代和赵尔巽著《清史稿》关于类似情况的记载，我们译为光绪 21 年 2 月 5 日。——译者

138 已实际进入图瓦一事不希望引起中国注意。不愿为乌梁海边区同中国发生冲突,并不是因为俄国政府爱好和平(实际它并无爱好和平的本性),而主要是因为在上一个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他推行侵略政策的中心是在别的地方。在巴尔干的积极活动,俄土战争,中亚连绵不断的战争——这就是这一时期沙皇政府侵略活动的场所。

这一政策的利益要求不要在中俄两国之间引起纠纷,以免分散这一时期最重要的外交活动的精力。此外,那些同乌梁海边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社会因素,当时在决定沙皇政府政策方面起不了多少明显作用,无法使沙皇政府的政策采取更为积极的步骤,虽然他们希望做到这一点。众所周知,这些社会因素所包括的主要是米努辛斯克边区的小商人,米努辛斯克、伊尔库次克和赤塔的几个对图瓦进行批发贸易的大商行,此外再加上乌斯边区、米努辛斯克边区的几个金矿主和渔业主。当时俄国农业殖民活动的规模还是极其微小的。

这样,对图瓦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只是一些势力不大的人,沙皇政府不愿为争夺图瓦同中国发生冲突,这就是沙皇政府在对图瓦政策中采取某些谨慎作法的基本原因。

1886年建立了乌斯边务区,这是沙皇政府对乌梁海边区采取积极行动的第一个表现。边务区首脑在同中国和地方政权来往中称为边务官。边务官的职能是多种多样的:他身兼数职,既是商务专员、边务区的警察局长、矿山警察局长、而且还是农民的长官。这一职务是由警察官员,通常是由曾任过警察局长的人来担任。现将规定边务官职权的指令中最重要的两条摘录如下:

“一、为管理叶尼塞省米努辛斯克州南部边界事务和当地的边务局,为监督叶尼塞省靠近中国边界的金矿,特设立乌斯边务局,设置边务官一名、助手一名及蒙语翻译一名……”

“六、乌斯边务官负责同乌梁海当局交涉下列问题：

1. 因商务帐目或个人冤怨而引起的俄国人同乌梁海人之间的纠纷和争执问题；
2. 俄国人和乌梁海人间的双方债务偿还问题；
3. 自行越境和被盗出境的牲畜和马匹的归还问题。”

乌斯边务区的建立，也是那些日益增多的商人和金矿主为了扩大掠夺，急于在本国后方建立保护他们的据点而对政府施加压力的初步结果。

乌斯边务官虽然对商人百般怂恿，用各种手段加以保护，但在对待农业移民问题上，起初被迫采取比较克制的态度，因为他害怕 139 同图瓦居民发生尖锐冲突。

“对于引起土著居民最强烈抗议的乌梁海地区农业移民问题，彼得堡在这方面的行动是缺乏一贯性的，根据政治形势变化，有时命令成批成批的俄国移民返回乌斯边区，有时对不可扼止的移民洪流越过萨彦岭却装作没看见。”¹

边务官在被迫决定是否批准移民出境问题时，由于最高当局犹豫不决，便将移居问题交由移民自己决定。“我不禁止，但也不批准”——这就是边务官对农民请求回答的中心大意。

1890年，边务官塔雷津在巡视图兰村时，曾劝告移民要取得地方官员的同意，但在同他们谈话时，决不能推说得到俄国当局的批准。当时“乌梁海”当局要求新来的移民离境。这一要求是如此强烈，使得塔雷津不得不作出俄国人立即离境的决定，并且这个决定得到了伊尔库次克总督的批准。

当谈到俄国边境行政当局在对待俄国农民出境问题上的两面政策时，科恩得出了如下结论：“边务官‘不可能批准’出境，但他却可以如塔雷津那样建议‘设法以私人方式同索约特人’洽谈，也可

1 格鲁姆-格日达洛：《西蒙古与乌梁海边区》，第3卷，第2册，第540页。

以象阿弗里卡诺夫和塔雷津两位先生那样向这些移民发放出境种地的护照。在这种情况下，‘不批准’远不等于禁止，恰恰相反，而是默许。”¹

对这种耍花招的政策，农民是完全理解它的含意的，他们对每一个未经边务官批准就到这里来的新移民都给予掩护。他们对这种掩护的解释是，“在这些村镇里俄国移民落户的越多，地位愈稳固，而他们也就不容易被撵走。”² 未经准许进入图瓦的移民，利用图瓦行政当局的软弱无力和贪污受贿便积极活动，占据耕地、牧场和猎区。

另一方面，俄国行政当局对乌梁海边区殖民活动的态度日趋明确。1900年，边务官提出要求“擅自迁入乌梁海地区的移民”回国的呈文，被叶尼塞省省长驳回，其借口是“擅自迁去的移民已在新地区定居，他们在那里有牲畜和耕地，而移入谢比的移民除牲畜
140 和耕地外，尚有房屋，因此应允许他们都在自己选择的地方居住。”边务官关于“擅自迁入克木奇克、恰库利、沙戈纳尔等河河谷的俄国商业设施附近的米努辛斯克异族人的类似呈文递至部里后，部里却允许他们及其家属留在现住地方，并责成他们领取出国护照。”

这里顺便说一句，上述文件里讲的所谓“米努辛斯克异族人”指的是哈卡斯人、鞑靼人等，俄国政府是作为这些人的利益的“保护者”而出现的。这种对“异族人”出乎意料的保护，是由于这些“异族人”在把乌梁海边区变为殖民地的过程中能起到积极的作用，而且他们的语言和文化，也使他们非常适合于充当为俄国商人与俄国移民进入该地铺平道路的殖民活动先锋。

在1900年那一年，伊尔库次克总督还接到了上级一道严格的

1 科恩所著前引书，第19页。

2 同上，第21—22页。

命令，“今后不得使萨彦岭边区定居的俄国农民迁离该地区。”

现在我们且放下俄国农业移民问题不谈，再来看看金矿主们的情况。金矿主也是以侵略手段在国外定居下来的。我们可以看到俄国政府待机而动的政策在这里也有所表现。俄国政府认为应该采取与农业移民问题相同的方法，不顾这个国家愿不愿意，不顾当地居民愿不愿意，用武力来实际占领别国领地。从七十年代末，商人特别是金矿主们，就开始向东西伯利亚当局和部里申述自己的处境“困难”，并且请求宣布叶尼塞河右支流乌特河、乌尤克河及帖米尔-乌斯河流域的产金地可自由寻找和申请开发。

阿努钦总督在呈给沙皇的一份关于 1881 年工作的奏折中谈及这些请求时写道：“现在看一看米努辛斯克边界与金矿分布地图就可以清楚，位于昔斯提克木河及其支流流域的极大一部分金矿毫无疑问地在中国境内。其次只需根据文献资料与地图对事情加以研究也完全可以说明，一方面，金矿主们请求宣布自由寻找与申请开发的河流在中国境内；另一方面，布满金矿的昔斯提克木河系也在我国河流之间，它已向我们的企业主提供了 464.5 普特的黄金。”这位总督意识到金矿主们已越过了合法的边界，担心“如果我们的金矿主侵占中国领土的事实被发现”，就会引起麻烦，因此他的结论是，“不同中国政府举行类似问题的谈判较为适宜”。“所以鉴于当前存在的这种事态并未引起中国方面的任何抗议，我个人倾向于相信这个问题的最好解决办法是听任事态的历史发展，即不加限制地让我们的和平工业完全自由地向上叶尼塞河两岸甚至更远处，向我们在该地的自然疆界唐努山发展。”¹

141

1889 年，驻库伦总领事希什马廖夫向外交部报告说：“中国政府决定严肃地提出与我国叶尼塞省米努辛斯克州接壤的边界问

1 在伊尔库次克总督所提出的这份报告上，沙皇亚历山大三世的内务大臣、外交大臣等都签署了意见，表示同意报告中提出的政策。

题。”一个委员会已派到边界去了，它的任务就是勘察边界现状与条约规定是否相符，并判明俄国人挖掘金矿以及建筑房屋的情况。中国政府打算，一旦发现俄国人确实在乌梁海境内开采金矿，将提出任命专员来审理这种问题。希什马廖夫在报告结尾处提出了其本人看法：“不论以何种方式最终解决米努辛斯克地区的边界问题，对我们都是有利的，否则，在任何情况下它都会给我们带来不愉快，一般说来将成为发展当地边境友好关系的障碍。”外交部对总领事的看法表示完全赞同。

但是到上一世纪末，指望事态自然发展会使图瓦落于俄国手中的政策却出现了某种转折，它预示着在“乌梁海问题”上的新时期就要来到了。

为了弄清楚由模棱两可的声明到坚决行动的这种转变，必须记住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是俄国在巴尔干失利后把外交政策的重心转向远东事务的时期。1895年，日本统治集团对中国不宣而战，中国海军覆灭，陆军被击溃。俄国扮演了中国“拯救者”的角色。在俄国外交压力下，日本不得不满足于其比较“菲薄的”胜利成果：朝鲜脱离中国，侵占台湾，并获得大量赔款（三亿五千万日元）。

1891年，在符拉迪沃斯托克^①举行了西伯利亚铁路干线奠基礼。中国战败的结果使这条干线以最短途径穿过满洲。1895年，俄华银行^②建立，它得到了满洲铁路的经营权，这些铁路将使西伯利亚干线同已建成的中国铁路网连接起来。关于这个“俄华银行”，波克罗夫斯基写道：它“实质上不过是掩饰受巴黎银行家资助的俄国财政部活动的一个幌子而已。”³¹

① 即海参崴。——译者

② Русско-китайский банк 也译道胜银行。——译者

1 波克罗夫斯基：《十九世纪沙俄的外交与战争》，第363页。

最后,1900年,俄国军队在“平息”与镇压义和团起义的借口下,“以火与剑”通过满洲;在有条不紊地抢劫了许多和平城市并把几千中国和平居民在阿穆尔河淹死以后,俄国便占领了北满,并且¹⁴²实际上将北满变成了俄国的一个省。

当时远东形势的一般发展情况就是这样,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沙俄在“乌梁海问题”上的政策才发生了根本变化。

我们所提到的政策转变,在制定新的战略计划上也立即得到了反映。在这些计划中,乌梁海边区被看作是不断向中国施加压力的最相宜的战略要点。伊尔库次克军区司令部于1895年在给总参谋长的呈报中提出过下述建议:“俄国与中国一旦发生武装冲突,总参谋部打算责成伊尔库次克军区的机动部队占领西蒙古的科布多和乌里雅苏台两城。占领上述两个据点不仅有助于我军在西西伯利亚及外贝加尔地区开展军事活动,而且还可以保护我国边境不受处于中国统治下的异族匪帮的侵扰。”军队最理想最适宜的进攻路线被认为是:1.进攻库苏泊地区;2.经过米努辛斯克,越过萨彦岭,通过萨菲亚诺夫村直取乌兰固木。在这两条路线中间,军区司令部认为后一条路线更好。

这个计划正是在日本打败中国的时候制定的。这样,俄国在充当上述使中国免受日本侵害的“拯救者”的同时,却在制定从后方进攻中国的计划。这是俄国帝国主义在远东一贯推行的一项固定政策的两方面:在它力求最大限度地侵占中国领土的同时,尽量不让其他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加强势力。

不过上述战略计划过了一段时间后便不得不放弃了。第一,因为政治形势的变化,该计划在当时已成为不必要了;第二,从格里戈利耶夫卡村到乌辛斯科耶村修筑一条一百五十俄里长的马车道需要近两年的时间。¹

¹ 见伊尔库次克军区司令部1895年2月1日的公函。

但是修筑一条马车道的想法并没有被放弃。这个想法在 1904 年又重新被提出来了，而且这次是与侵占乌梁海边区的具体计划一并提出的。有关侵占乌梁海具体计划的制定是与总参谋部一个叫波波夫的军官在政治舞台上的出现分不开的。他曾几次在“科学”考察的幌子下到蒙古和图瓦进行军事间谍活动。在他的报告和情报中，甚至在他的“科学著作”中，这个俄国蹩脚的罗伦斯¹都喋喋不休地论证迅速占领乌梁海的必要性。

就是这个波波夫上尉在结束了对蒙古及图瓦的考察以后提出
143 了一份秘密报告，建议从蒙古沿乌里雅苏台-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方向修筑一条通往西伯利亚铁路的马车道。总参谋部对波波夫的报告所作的结论（1904 年 8 月 13 日）是同意修筑这条马车道，并提出了如下理由：“计划修筑的这条马车道必将有利于加强我们在乌梁海地区的影响，一旦与中国发生冲突也便于占领乌梁海，并将使我军的小部队更易进入蒙古，以便把从土耳其斯坦和外贝加尔发动的更大规模的战役联系起来。”

但当时的形势对实现上述报告中提出的计划是很不利的。那是 1904 年，那是日本在满洲原野上打败沙俄军队的一年。在这种局势下，俄国政府最担心激起北京对自己的敌对态度，并因自己的行动不谨慎而引起破坏它的中立。此刻甚至连更微小的措施也会怕引起不良反应而不能实施。这可以用设置边务专员一事作例子来说明。

这个问题是由西伯利亚军区司令官根据正在进行的俄日战争情况提出的。他写道：“我不能不提出，除了边务官这个平常的警察官员之外，我很希望再设置一个边务专员来处理这一地区相互间的复杂关系，即使是战争时期临时设置也好。”设立专员一职是出于“密切监视蒙古及乌梁海边区居民的需要。这两个地区处于从

1 罗伦斯——著名冒险家，英国反间谍机关的间谍。

托木河流域到恰克图经线一带，距西伯利亚铁路这条唯一的交通路线较近。”顺便提一下，在陆军部致外交大臣的信中有如下一段话：“鉴于乌梁海地区有俄国村庄，鉴于在这个地区俄国移民与贸易事业迅速发展，鉴于进行这些事业在俄国移民方面并无任何法定权利（异体字是原文件标出的），而仅是依赖于乌梁海人与俄国人之间单纯的互相信任。”¹

但是正如我已说过的那样，这项措施在当时是注定不能实行的。俄国政府驻北京公使列萨尔鉴于“给我的现在必须尽一切可能使北京政府保持中立的工作指示”，在密电中指出了设置边务专员可能引起的后果。这个理由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外交大臣和陆军大臣都赞同列萨尔的意见，认为将上述建议暂时搁置一个时期再实行是适宜的。² 设置边务专员的主张同修筑乌斯马车道一样，也是经过很久，在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前不久，在另一种军事政治形势下才再度被提出来并付诸实行的。 144

在对日战争失败与1906年俄国军队从满洲撤退之后，中国对俄国的态度急剧恶化了。这种对俄国态度的新变化在图瓦也有所反映。1906—1910年这一期间所发生的几件事说明，受中国支持的“乌梁海”当局开始对俄国进行了反抗，而俄国政府在“乌梁海问题”上也比以往坚定起来了。

1906年，为开发克木奇克河沿岸丰富的石棉矿（阿克-托武拉克矿床），一些俄国企业主在米努辛斯克建立了一家公司。1906年夏，该公司组织了以米努辛斯克州矿山工程师和乌斯边务官为首的图瓦考察团。考察团没有先去拜见海都布总管，便直奔石棉矿去了。海都布不接受给他捎来的礼物，并宣称他不同意开采石棉。聚集在石棉产地的群众不仅阻挠考察团树立标志，而且也不

1 总参谋部文件，亚洲部分，第5编，№. 13，第115号综合报告。

2 同上。

让他们察看矿床。俄国考察团在暴力手段威胁下被迫离开克木奇克河河谷，一无所得地回家来了。¹ 从此，俄国移民的任意伐木，放牧牲畜，在商业设施附近耕地以及任意迁移等活动均受到了限制。

1908年年底，海都布在乌里雅苏台将军的压力下（这种压力正符合他想制止俄国人在图瓦日益增强的移民活动的愿望），通过手下官员吩咐克木奇克河河谷的俄国居民离开图瓦，只有比亚科夫、瓦利耶夫、麦德维杰夫和瓦维林等四家俄国公司除外。并命令图瓦人在三天之内把为俄国人放牧的牲畜交还给俄国人。此外，海都布还在图瓦与乌斯边区交界的地方设置了一些警戒哨。因这种“无礼行为”而感到受污辱的克木奇克河流域的俄国商人，向自己的代表机构提出了控诉。在该机构的指示下，同年12月25日，总参谋部鼎鼎大名的波波夫上校带领一队哥萨克猎人和一连士兵计一百二十五人向乌斯边区的边界进发。他们沿着结冻的叶尼塞河上的冬季道路到达乌斯特-乌辛斯科耶村，“勇敢地”攻下了第一个图瓦哨所，俘虏了一个哨兵和两匹马，焚毁了“威武的”哨所（两个毡包），但是再向前却有些胆怯，便稍向后撤，等待进一步的指示。²

与此同时，海都布根据离境的移民的要求，把图瓦居民欠俄国人的¹⁴⁵一切债款，甚至包括那些毫无偿还指望的债款都追缴上来，并偿还给他们。事情的结局是海都布受到乌里雅苏台派来的官吏的追究，因为将军在试探气球失败之后，便假装对海都布的擅自行动表示愤慨。俄国商人丧失的权利不仅又得到了，而且比以前更加扩大了。唯一遭殃的是图瓦居民。他们偿还了旧债，遭到了乌里雅苏台来的侦查官员的敲诈勒索，支付了对海都布过失的罚款，而

1 罗杰维奇：《乌梁海边区概况》，第34页。

2 萨菲亚诺夫：《索约特研究》，载《西伯利亚报》，1913年，第207期。

且在海都布骤然死亡后，于次年，即1909年，为了新总管巴扬-巴道尔呼上任而不得不向乌里雅苏台缴纳大量捐税，结果图瓦居民的经济遭到了新的严重破坏。¹

* * *

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的中期，分布于图瓦地区的俄国移民村镇、庄园以及俄国人开设的商站和金矿等，成了俄国政府的真正前哨，成了俄国政府侵略政策的据点。关于这一时期俄国移民在商业、农业以及金矿等方面的分布情况，我们可以根据罗杰维奇工程师专门进行考察所得的材料加以说明。²

图瓦地区交通闭塞，农业离不开人工浇灌，因此俄国移民在该地区的分布路线便大体上沿着贝克木河、哈克木河、乌鲁克木河、克木奇克河等水路交通干线的方向。因此，我们对俄国移民分布状况的叙述，按照图瓦的上述主要河流，较为适宜，而罗杰维奇也是这样叙述的。

贝克木河流域

在贝克木河上游哈木沙拉河口以远的地方，俄国人已开辟了两处金矿淘金场。这里的移民大多居住在庄园里：萨菲亚诺夫、莫兹加列夫斯基以及斯科别耶夫等人的庄园，同时又是收购托锦旗猎人毛皮的贸易据点。

在哈木沙拉河下游昔斯提克木河流域，俄国人开辟了五处金矿淘金场，有萨菲亚诺夫商站与斯科别耶夫商站与土著居民进行贸易，还有捕鱼业。这里可以见到有人开始试种谷物、蔬菜和繁殖牲畜。在从昔斯提克木河河口至乌尤克河河口之间，有最早建立的两个镇（卡拉加什和奥特雷瓦洛夫卡）和第一个农村谢比村。由于贝克木河中游这一带的俄国居民主要职业是经商，因此商站在

1 罗杰维奇所著前引书，第38页。

2 见《乌梁海边区概况》一书附录。

这里也占多数。斯科别耶夫、萨菲亚诺夫、萨多夫斯基等人开设的商站都是建造得极好的庄园，既收购毛皮又贩卖俄国商品。庄园饲养着许多牲畜和马匹，并试种谷物。这些庄园同时还是俄国移民为了进行贸易、打鱼和开采金矿而到贝克木河与哈木沙拉河上游去探寻适合居住地点的基地。

但是俄国移民主要聚居在肥沃的乌尤克河河谷和图兰河河谷。我们知道，俄国移民首先是到这里来的。这里最大的居民点是图兰村(七十五户，四百三十七人)和乌尤克村(五十三户，三百人)等。俄国居民大多从事农业，平均每户耕种土地十七俄亩。居民拥有大量牲畜，牲畜可在草原上自由放牧。每户都割四一五俄亩的牧草供冬季饲养牲畜用。许多人从事猎取野山羊、灰鼠和黑貂，人们组成劳动组合进行捕鱼。这里有庄园二十九处，其中最大的一个属于 A. 萨菲亚诺夫。萨菲亚诺夫拥有马四千匹、牛近三千头，此外，尚有大量小牲畜。他的马群与畜群在沿河五十俄里范围内的草原上放牧，庄园四周是大量的耕地与刈草场。在乌尤克河与图兰河支流与河谷，俄国人建立了许多庄园，乌斯与米努斯克商人在这里开设了许多商站。这些庄园和商站主要是经营畜牧业。其中瓦维林、麦德维杰夫、舍佩林等人的庄园都拥有几千头马匹与牲畜(一千五百—三千头)。在图兰-乌斯草原上，俄国人的牲畜与马匹总计达两万头之多。这些畜群大多由雇佣的图瓦牧人放牧。

在塔普萨河河口附近建有俄国最早的移民者格里戈里·萨菲亚诺夫的公馆。这里有他的一个大庄园，庄园辟有菜园、瓜地和大田，有出售俄国商品的小卖店，有存放从图瓦人那里收购来的土产品的货栈。庄园四周辽阔的草原与丰茂的草甸供庞大的畜群与马群放牧。在塔普萨河上游，有萨菲亚诺夫开采的一座金矿，在该矿作工的有一百一十人。

哈克木河流域

在哈克木河流域，俄国村镇分布于河的两岸。在距哈克木河口十二俄里的地方，建有“贵族、地主”切尔涅维奇的一座大庄园。他拥有种马场与畜群，在他的庄园里使用农业机械。再往上去是瓦维林、维捷尔尼科夫、舍佩林等人的贸易庄园，这些庄园里也拥有大量牲畜。

从这些庄园再往前去，是哈克木河最早出现的两座俄国农村，一座位于哈克木河的左岸，另一座位于哈克木河的右岸。哈克木河河谷的所有俄国村镇都是在二十世纪才开始建立的，而且在我们叙述的这个时期里（二十世纪头十年），这个河谷正处于开始移民垦殖的阶段。

乌鲁克木河流域

乌鲁克木河流域有一些俄国村镇和几个商站与庄园。当时最大的恰库利镇有五十名俄国人居住。这是一个纯粹的商业镇，在这里收购牲畜和鹿角并向图瓦人出售俄国商品。中国贸易中心也设在这里。沙戈纳尔镇当时只有几所房子，俄国居民寥寥无几。¹⁴⁷第三个村镇是布卢克镇，位于乌鲁克木河和一条大道的交叉点上，这条大道从乌斯边区来到这里分成三条路，一条通往恰库利，一条通往哈克木，一条通往蒙古的乌里雅苏台。布卢克镇住着三十多个俄国人，这个镇拥有庞大的牛羊群和马群。

从右边注入乌鲁克木河的谢尔利赫河（伊利克木河右支流）沿岸有奇尔科夫和杰尼索夫两个金矿主开采的四座金矿。

克木奇克河流域

克木奇克河流域有二十二个俄国小镇，俄国居民达二百人。位于巴尔雷克河河口的最远的一些庄园，是同图瓦人进行毛皮贸易的前沿据点。这些庄园位于图瓦人从事狩猎活动的密林和高山的边缘。再往下是Г. 萨菲亚诺夫等人建立的大庄园。这些庄园

里有商店和仓库等商业设施。查丹河流域没有俄国村镇，但在查丹河口下游八俄里的地方，有俄国人比亚科夫开设的一个最古老、最著名的商站。比亚科夫商站成了克木奇克河流域俄国居民的中心。比亚科夫广泛地从事牲畜、畜产品以及俄国商品的贸易活动。在克木奇克河流域，俄国人由于图瓦当局的反对，几乎不从事农业生产。但是这个旗的大量刈草场都属于俄国人或者被他们租去了，这些俄国人需要干草作为牲畜的冬季饲料。

这样，在二十世纪第一个十年的末尾，在图瓦就有了一百一十五个俄国移民居民点，其中有四个农村，十一个镇，十四座金矿及八十六个庄园。这些村镇的男女居民近三千人。在这些被俄国人侵占的大片土地中，耕地约有三千俄亩，其余土地都被他们用来放牧牲畜，他们的大小牲畜多达几万头，另外债务人还欠他们大量牲畜。

大量的俄国移民都是他人财产的掠夺者，因此在对待土著居民的关系上有着共同的利益，但他们内部并不是亲密无间、团结一致的。恰恰相反，从他们的民族成分来看，他们来自不同民族（这里有俄罗斯人、哈卡斯人、鞑靼人、拉脱维亚人、波兰人），特别重要的是，他们的社会成分也是各不相同的。组成这一时期主要核心的首先是米努辛斯克边区出生的萨菲亚诺夫、比亚科夫等古老商人家族。其次是来自阿巴根草原和图巴草原的哥萨克人斯科别耶夫、塔尔霍夫等家族，最后是来自萨彦岭北麓林区附近的农民。¹

俄国居民的不同种类的社会成分在各个集团之间不断斗争的形式中表现出来了。如果把各种暂时的和偶然的原因撇开不谈，
148 那么这场斗争基本上是在两个方面进行的：第一，是掠夺了大量好地段的大商人和觊觎着他们的新来农民之间的斗争；第二，是新老移民之间的斗争，新老移民之间的关系基本上是贫农与富农之间

1 罗杰维奇：《乌梁海边区概况》，第 56 页。

的关系。老移民由于来的早而发了财，他们不仅剥削图瓦人，而且也剥削俄国来的贫雇农。这种斗争有时达到如此激烈的程度，以致不得不让乌斯地区当局来解决问题。乌斯当局为了审理冲突问题经常派人到图瓦来。¹ 在以后的年代里，由于新移民的不断增长，上述各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变得更加尖锐了。关于这点，我们在下面来谈。

* * *

二十世纪头十年是沙皇俄国对外政策的转折时期。由于一系列原因（对于这些原因，本文不可能加以叙述，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1905年的革命及借助于英、法交易所黄金的力量对这次革命所进行的镇压），俄国成了以英、法为首的一个强国联盟的成员国，这个强国联盟正在极其秘密地准备1914年的帝国主义战争。

所谓“乌梁海问题”过去和当时都是外交战线上的一个单独的狭小的地段，在外交战线上这个单独的狭小的地段上所发生的事件都同准备世界大战的国际形势这个基本背景有着直接或间接的联系。帝国主义矛盾的主要焦点已转移到西方，但保护远东后方，巩固日俄战争后它在远东所剩下的地盘对沙俄帝国主义来讲，是有切身利害关系的。俄国完全有理由担心日本进一步侵犯这些地盘，另一方面，俄国在北满的地位也受到了中国的威胁。

巩固后方，以便在西方放手行动的这一意图，在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呈给沙皇的一份奏折中得到了明确的阐述：“这个政策（即中国的政策——卡鲍），使帝国政府产生了一个想法，即通过使用武力和夺取中国某些地区的办法来达到加强我们在远东的地位，以

¹ 有趣的是，哈克木河-小叶尼塞河流域的一个农村取了舍尔舍涅夫卡(Шершеневка)这样一个并不光彩的村名，说明这个村的居民象胡蜂(шершень)一样，为了土地和水经常吵嘴，甚至有时打架。

便在我们需要把力量集中在我国对外政治活动的其他方面的时
候，在这些地区不致冒引起麻烦的风险（异体字是我标的——卡
鲍）。”¹ 不难看出，萨佐诺夫所说的“我国对外政治活动的其他方
149 面”，在1911年指的是俄国积极与英、法结成联盟来反对德、奥联
盟，其中也包括反对土耳其。1905年革命后的整个这一时期，成
了积极准备战争的时期。正是为了准备这次战争，才需要巩固“通
过使用武力和夺取中国某些地区的办法”所获得的在远东的地盘。
在这些地区中，满洲当然除外，那就是指“乌梁海边区”，这是俄国
政府的代表们都公开承认的。

在给总参谋部总管理局1910年9月21日的一份报告中，我
们读到：“自1906年俄国军队撤离满洲以后，中国人对我们的态度
急剧恶化了；近三年来中国人违反条约和协议的规定，不承认或者
粗暴破坏俄国利益的事件屡屡发生……在这种形势下，自然而然
地便产生了一个问题：这种压力（对中国）在什么地方、以何种方式
并在什么程度上施加为好呢？”²

其实对这一问题的回答，1907年曾考察过上叶尼塞河的罗杰
维奇工程师在他的报告中早在几年前就作出来了。罗杰维奇在后
来曾得到内阁会议讨论的报告中写道：“乌梁海确实是俄中边境上
抵抗力最小的一个点；但在这薄弱点的后面却是一个富饶的省
份……如果中国开始对我阿穆尔边区施加压力的话，那么乌梁海
边区就是适于俄国进行反击的地区，在这里可以花费最小的力量
取得最大的成功……。因此，从米努辛斯克经由乌斯往乌梁海修
一条设施完善的大道，同时在米努辛斯克再集结一定的兵力，就足
以调整俄中关系，而且必要时也可非常迅速地占领乌梁海。”

1 《萨佐诺夫1911年1月10日（新历23日）奏折》，载《红档》，第18卷，第89页。

2 总参谋部总管理局档案库，第177—044号案卷，《给总参谋部总管理局的报告》。

这样，前面所引的那份报告的作者对共所提问题的回答就不新鲜了：“除满洲之外，可以对中国施加压力的地区就是乌梁海地区了。”在列举了我们所熟悉的该地区各种“俄国利益”之后，报告的作者在结尾时写道：“因此，占领它（乌梁海地区）并修改这一地段的俄国边界，对中国的自尊心必然刺激很大；然而，最重要的（异体字是我标的——卡鲍）是通过这种占领完全可以使上述各种俄国利益得到保证。”当然，谁都清楚，事情的实质并不在于要对“中国的自尊心”施加压力，而在于“保卫俄国利益”。所谓“俄国利益”，实际上就是巩固在几十年中间建立起来的殖民剥削制度。

我们知道，俄国政府早就承认，修建乌斯马车道是为了彻底占领图瓦而进行的一项最重要的准备措施。通过萨彦岭山脉的乌斯马车道将把米努辛斯克区同图瓦连接起来，从而大大减轻同图瓦往来的交通困难，加速商品和军队的运输。1909年6月19日通过的法律决定，由国库拨款修筑一条从米努辛斯克县格里戈利耶夫卡村到乌辛斯科耶村的马车道。其中对铺设三十俄里长的由格里戈利耶夫卡村开始的这条路的起点地段和勘测至乌辛斯科耶村这条大道的其余地段，拨给了二十万卢布。另外，根据水运与公路交通管理局的预算，1911年拨款七万卢布，以改善上叶尼塞河的航行条件。工程项目是开辟绕过大急滩的航道和清除焦伊急滩的乱石。而据1912年的预算，又对该项工程增拨了五万八千卢布。¹⁵⁰

除了改善到乌梁海边区去的交通以外，为了给俄国吞并乌梁海准备条件，还采取了一些政治措施和行政措施。

上边提到的工程师罗杰维奇于1907年被交通部派去勘查叶尼塞河上游情况，他收集了一些俄国在该地区殖民活动的资料交给了政府。沙皇看过罗杰维奇的报告以后，下令把俄国殖民活动的资料提交给内阁会议讨论。罗杰维奇的建议《关于支持乌梁海地区俄国移民的措施》，于1909年6月16日受到了内阁会议的专

门讨论。结果是 1910 年向乌梁海派出了我们已经提到过的以波波夫上校为首的专门考察团,以便“就地详细考查乌梁海问题”。

同时,又产生了一个改造和加强俄国边境当局的问题,这是
151 为了使边境当局“能够充当敢于到乌梁海去的移民的后盾,在危险时刻能随时支持他们”。为此目的,伊尔库次克总督克尼亚泽夫于 1911 年 2 月 28 日在伊尔库次克召开会议来研究加强乌梁海边区俄国势力的措施。这次会议清楚地暴露了俄国官僚集团中在“乌梁海问题”上最具有侵略性的那派人的嘴脸,对这次会议,我们必须较为详尽地加以叙述。

这次会议是在伊尔库次克省总督克尼亚泽夫主持下召开的。参加者有伊尔库次克军区司令勃里列维奇将军、军区参谋长苏利克维奇将军、波波夫上校、乌斯边务官恰基罗夫等人。会议的“重心”是研究俄国殖民活动以及进行这种活动所需要的条件。¹

会议纪要写道:“乌梁海地区的现有俄国移民是在极其特殊的生活条件下,由自由迁移而形成的,即:移民选定了移居地点,取得边务官的允许之后,就去找乌梁海牧民洽谈,以取得盖房、刈草与耕种用地,这样就形成了俄国移民对乌梁海牧民的依附关系,这种依附关系有时与租赁很相近,有时却简直近于掠夺。自然,由于移民逐渐增多,乌梁海牧民便对排挤他们的白种客人愈来愈不欢迎。乌梁海人同俄国人在土地问题上的纠纷,极易爆发并酿成极为严重的事件,这就要求国家政权进行干预。另一方面,早期俄国移民(他们也是用半租赁、半掠夺方式获得了大量土地——这些土地有时可达几平方俄里),也对日益增多的俄国移民很不欢迎,因为这些新移民开始妨碍他们自由发展;而且可以预言,这些强大的地主商人决不会把他们占有的土地自动地让一寸给新移民,在这种情况下非常需要政府加以干预,这种情况很快就要发生。哪一个政府能够负起业已产生的土地问题的调节责任呢,中国政府还是俄国政府?”

1 伊尔库次克总督克尼亚泽夫主持于 1911 年 2 月 28 日召开的伊尔库次克会议记录。军事历史档案馆,第 180—387 号。

会议提出了关于未来土地调整工作的设想。这个问题提得完全适时而且非常必要。但是目前很难预料乌梁海人会对这种工作（测量土地）持何种态度，因为他们不久前（1909年）曾对我土地勘测人员在叶尼塞河河岸上树立标杆一事发生过吵闹。

生活在这块有争议的土地上的俄国移民，临时组成了一些团体，根据俄国法律行事并受乌斯边务官管辖，而乌梁海牧民则组成一些类似蒙古旗的公社，行使中华帝国的法律。邻里相处，经常因一些日常的细小的利益而发生冲突，农民与牧民之间经常发生一些外交往来，这种关系极不正常。

当前中国人已开始向乌梁海地区移居，并且人数不断增多。虽然现在人数与俄国人相比尚微不足道，但从发展的角度来看，将会给我们向该地区移民以及在该地区实施我们的总政治任务造成严重麻烦。

这就是会议对当前乌梁海事务现状所做的粗略描绘。不禁要问：下一步怎么办？”

我们知道，俄国殖民活动一直受到沙皇政府的鼓励，特别是在1905年革命以后和第一次革命期间形成巨大规模的土地运动以 152 后。本来想通过殖民活动来“消除”俄国本土的革命“脓肿”，结果殖民活动却在新的地方和新的条件下造成了新的“土地问题”。“土地问题”的魔影寸步不离地跟在俄国官僚集团的身后。迁移俄国农民的殖民活动是一种恶性循环：迁出地区的旧有矛盾稍有缓和，而在迁入地区又造成了新的矛盾。

然而，要想缓和先来的土地掠夺者——商人与新来的移民——农民之间的矛盾，却只有一种有效的方法，那就是掠夺土著居民的土地。

这种在沙皇俄国殖民地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俄国官僚集团是很熟悉的。他们在类似条件下曾不止一次地使用过。

图瓦附近，伊尔库次克省总督辖境以内的布里亚特人就曾经尝受过这种方法的滋味。历来属于他们的、归相应的氏族和部落所有的领土，竟被大笔一挥宣布为“代役租”的来源，必须根据当局

规定予以缩减。森林变成了“皇室林场”（即变成了沙皇的财产）；对牧场、草地和农田进行了划界，其唯一目的就是要把布里亚特人的大量土地划归俄国移民。进行了这次剥夺之后，伊尔库次克的布里亚特人的土地使用面积减少了53.3%。巴拉干斯克县的布里亚特人从事农业的比重较其他地区的布里亚特人都大，他们丧失了62.4%的土地。牧场及刈草场面积的减少，引起了畜牧业的急剧下降。为了饲养剩下的牲畜，有百分之二十五以上的牧草，布里亚特人不得不在从移民和国库那里租来的土地上刈割，这些土地不久之前还是属于他们的。毫无疑问，负责处理“乌梁海事务”的俄国官僚对图瓦地区俄国移民当中出现的“土地问题”的解决办法早已胸有成竹了。这就是仿效在布里亚特、吉尔吉斯、哈萨克斯坦等地使用过的办法，所不同的只是在图瓦地区，老移民商人业已掠夺大量地产，问题只是把从土著居民手中掠夺来的土地转交给新移民，以巩固商人的所有权。

但是这个步骤蕴育着危险，因为伊尔库次克会议参加者很清楚：乌梁海牧民对排挤他们的不速之客越来越敌视，而且牧民与俄国人之间在土地问题上的纠纷也极易爆发并酿成很严重的事件。俄国政府当然不惜冒此风险，但这里形势的特点是，布里亚特、吉尔吉斯等地区在遭受掠夺时已是沙俄帝国的一部分，而乌梁海尚未并入俄国，在形式上还属于中国。图瓦“土地问题”的特点就在于此。

为了使沙俄政府有可能任意推行其剥夺土著居民的政策，尚
153 需要占领乌梁海并宣布其为俄国属地。这样，尽快解决“土地问题”的必要性，便成了对外政治事件加速发展的因素。

说实在的，伊尔库次克会议所提出的问题：进一步怎么办？是修辞学上的设问。对这一问题的答案，与会者从一开始就都清楚。如果有分歧的话，那只是在占领乌梁海边区的时间和方式上：是立

即占领呢，还是根据国际形势等待一个时期？是用军事力量占领呢，还是通过采取相应的措施逐步占领？会议对此是怎样设想的呢？

“我们的公使在一份关于乌梁海问题的报告中主张，由于政治的和经济的原因，乌梁海问题的解决必须对我们有利。而且在这位公使看来，对乌梁海既可公开占领，也可逐步吞并。

公开占领该地区必然会引起外交交涉——这样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合适的，当前会议不能加以判断。至于逐步吞并，我们提出以下几点设想，作为措施。

1. 据波波夫上校考察团的观察，中国边界(沿唐努山南麓)，明确地把乌梁海与蒙古分开，因此可以设想解决有争议问题的实质在于乌梁海归谁所有。照档案文献看来，有理由认为，即使根据布连斯奇界约，乌梁海也是属于俄国的，但是我们应当注意到乌梁海人向中国纳贡并在中国管辖下生活已近一百五十年。乌梁海人的主要长官曾向波波夫上校宣称，他们向中国纳贡是出于自愿，好象有权拒绝纳贡。如果乌梁海人真能自愿拒绝向中国纳贡，摆脱中国的管辖而独立一个时期，那倒是一件对我们非常有利的重要事实。对这一有助于发展其福利事业的措施，乌梁海人当然在一定程度上是愿意接受的，不过我们必须给大总管以少量部队的支援，以便保证他不受中国当局的胁迫，并使乌梁海其他基层政权听命于他。把乌梁海人置于我们的势力之下，然后就可能在他们中间建立起必要的制度来，不需要在他们身上花费俄国一文钱，就能毫无阻拦地进行移民活动，而后再逐步吞并这个地区。

2. 如果说中国人从乌梁海人手中征收贡赋，并认为乌梁海人归他们管辖，因而在乌梁海地区行使国家权力，那么我们在该地区也早已行使着国家权力，即：1)俄国移民在那里已经定居、耕种田地并遵守俄国法律；2)我国政府批准在那里开采矿藏，而且这些矿藏的开采是依据俄国法律规定并在俄国政府的监督下进行的；3)我们允许俄国人根据俄国法律规定并在俄国政府监督下在那里经商；4)我们修建庙宇、学校，设置医疗机构等，对此中国当局早已清楚地知道、看到并未提出抗议。这就是说，我们应当继续推行这种政策，以期巩固我们的时效权和实际占有权，即继续向该地区输送俄国移民，给他

们建立俄国管理机构(乡和村的行政机构),建立警察、法院、医院及其他国家机构,给予他们文化、经济及教育方面的援助,逐步地使乌梁海人也接受这些措施;准确地根据俄国法律在乌梁海地区发展工商业。

3. 命令托木斯克省、叶尼塞省、伊尔库次克省省长不得派遣官吏或乡村政府人员与中国当局共同勘察边界,并且要力避提及北部边界,把我们地图上154 上的边界移到唐努山脉。万一在谈话中涉及边界问题时,必须谨慎而坚定地指出,这条沿唐努山的边界对我们来说是新的,而对中国来说则是旧的、早已存在了二百多年的边界。”

会议所说的“逐步吞并”,实际上非常接近于对该地区的“公开占领”。挑拨图瓦人拒绝向中国纳贡,即政治上脱离中国(这种脱离势必引起俄国的武装干涉)之类的措施无非是为“公开占领”图瓦而进行的准备工作。会议的意思是,沙皇政府准备在占领乌梁海地区之后加以掠夺的图瓦人民,不仅应当给自己脖子上套上绞索,而且还应当把它预先系紧。把同中国接壤的边界线擅自非法地移至唐努山脉就是公开占领的第一步。如果我们看看会议为了支持其基本建议——立即占领乌梁海边区——所提出来的措施,那么对这一时期俄国当局采取的一切行动方法,它的赤裸裸的侵略性就更加明显了。

“鉴于本纪要中已叙述的我们俄国移民在乌梁海地区的现状、我们在该地区未来的任务、巩固我们对该地区法律权利的措施以及乌斯边务区(乌梁海地区也归其管辖)管理机构当前的组成情况,会议认为必须:

1. 重新审定乌斯边务区编制,尽快建立新的编制并立即使其投入工作,同时为乌斯边务官制定新的工作细则。

2. 如果最高政府认为,可以把乌梁海人拒绝向中国纳贡作为我国兼并乌梁海的方式之一,那么就必须指定乌斯边务官或委派专人去同大总管谈判,而对所委人员应给予工作细则、经费和驮运队;兼并默夫^①的作法可作为

^① Мерв,地名,现名马里(Мары),土库曼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省中心,位于穆尔加布河畔。——译者

我国通过这种途径解决边界问题的经验。

3. 俄国居民和牧民(后者需征得乌梁海当局同意)的移居和土地调整事宜,均应交由有关机关去办理。所需款项及一应措施费用,由移民及土地调整贷款支出。

4. 为保障该地区平静,防止1908年发生过的那类误会重演,为使同乌梁海进行谈判、解决移民与土地调整问题以及推行俄国的进一步计划获得最大限度的成功,会议认为必须采取下列军事性质的措施:

1) 入夏以后,将米努辛斯克地方部队的一个排由一名军官率领调至乌辛斯科耶村,责成乌斯边务局负责安排住宿。象这样由一名军官率领的小部队调动,除了部队调动及在新址安排住宿必要费用外,几乎用不着任何超预算拨款。

2) 以该小部队为骨干,由居住在乌斯乡和国外边区(即乌梁海地区,该地有民团武装千人左右)中的预备役下级军官和民团士兵组成一支民兵部队,责成乌斯边务官筹办此事。

3) 从军区司令所掌握的武器储备中给乌斯边务官调拨一千支贝尔独弹步枪及必要数量的子弹,保存在乌辛斯科耶村,以备武装民兵部队使用。 155

4) 批准乌斯边务官将预备役军人及民团士兵分批集训一至两周,以期民兵部队在紧急建成之后能胜任保卫俄国居民的任务。

5) 为了彻底了解情况,责成乌斯边务官使用总参谋部的特别资金组织人力,在乌梁海地区及其邻近的蒙古地区进行军事侦察。

6) 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及伊尔库次克哥萨克骑兵中队增至十六个列队以后,可将克拉斯诺亚尔斯克骑兵中队的一个排调至乌辛斯科耶临时驻防。

7) 如果为加速乌斯土路建筑需要工兵增援,请准予调动西伯利亚第三军团所属工兵,其开销由上述工程经费支出。

8) 鉴于必须在唐努山北坡面对蒙古哨所设置我们的岗哨一事,允许伊尔库次克省和叶尼塞省哥萨克人移居乌梁海边区(因为这两省土地分配工作尚未结束,为达到四十俄亩定额尚缺很多土地),并由国库发给补助费,这种移居费用按移民贷款一般标准支出。

会议希望进一步巩固我们实际占领乌梁海边区的法律权利,也希望能有助于在我们正式文件中属于乌斯边务区管辖下的叶尼塞省的境外居民管理

工作,即移民活动及其土地调整工作方面的全部问题的尽速解决。”

上述引文中有一点很引人注意,它表述得极其含混不清,但仔细读来却包含着靠剥夺土著居民土地来解决“土地问题”的全部纲领。这就是涉及俄国居民和牧民土地调整的有关引文。俄国居民和牧民的移居与土地调整是什么意思,上面已经详细谈过。这个“移居与土地调整”计划必然遭到土著居民的反抗,这是与会者自己也都清楚的。会议由于预见到了这种反抗,才论证了必须采取一些军事性质的措施以保障图瓦的平静以及同“乌梁海人”的谈判和解决移民与土地调整问题取得最大成功。

这样,在伊尔库次克总督主持下召开的这次会议的全部工作过程与决议,无非是一个通过对图瓦人民广泛进行剥夺来解决俄国移民在土地问题上所产生的矛盾的广泛计划。这个计划的实施,需要俄国当局(军队、法庭、警察等等)进行公开干预,以镇压来自遭受掠夺的居民的任何反抗。

尽快占领图瓦是从这一计划中得出的必然结论。伊尔库次克会议所制定的占领乌梁海边区的计划是挑衅、欺骗和残暴镇压的大杂烩。

上述解决“乌梁海问题”的政策,首先必然会受到帝国主义资产阶级的欢迎,他们积极支持对满洲、蒙古、波斯实行领土侵略政策,对乌梁海边区也不例外。从《新时代》起,到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出版的《远东报》止,俄国资产阶级报刊都一致主张占领乌梁海边区。“面积相当于德国或日本而且有的地方已经住上了俄国人的这样一片富饶肥沃的土地难道不值得注意吗?而有争执的问题难道不值得去调查吗?俄国社会、报刊以及国家杜马难道不要求认真分析这一事件并研究清楚为什么俄国领土竟落到了中国手中吗?”¹

1 《远东报》,符拉迪沃斯托克,1910年2月2日版。

为了争取“乌梁海问题”的强力解决，围绕这一问题，一些地方势力开始组织起来了，他们力求通过召开会议、上书等形式大肆制造“社会舆论”。这些地方势力中有米努辛斯克商人，他们贪得无厌，要求吞并图瓦，以便不受阻拦地继续从事卑鄙的剥削勾当；其中有军人，他们被日本人打败后，梦想在远东对手无寸铁的对手进行没有危险的报复；其中有一些贵族子弟，他们要求吞并乌梁海，以便得到待遇优厚的肥缺；其中还有警官和其他社会渣滓，他们生活并呼吸在沙俄殖民政策的挑畔、压迫和掠夺的气氛里。

我曾一再提到的又重新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波波夫上校也是这种“社会舆论”的积极代表。从内阁总理致陆军部的信件中，我们可以了解他的作用。该信注明的日期是1912年4月21日。内阁总理在信中写道，据悉“西伯利亚第七步兵师参谋长波波夫上校干预涉及俄国对蒙古，特别是对乌梁海态度的政治问题。在这方面波波夫上校授意乌斯边务官必须将乌梁海边区并入俄国，而上述官吏(边务官恰基罗夫)不仅将此意写成报告，而且在这方面还采取了某些步骤。例如，他违反为他制定的工作细则，于去年年底(即1911年年底——卡鲍)主持召开了有其助理及五名当地俄国居民(即在图瓦经商的商人——卡鲍)参加的会议，在这次会上讨论了把乌梁海边区并入俄国的方式问题。”为了避免“任何误会”，内阁总理要求指示波波夫不得以任何形式干预外交部的事务。但内阁总理的这一训斥并没有使这个狂热的上校冷静下来。

俄国政府在“乌梁海问题”上的积极活动与中国上层统治集团的舆论在这一问题上的鲜明转变不谋而合。迄今为止，由于害怕俄国日益增长的威胁，中国所执行的政策一直是沉默和妥协的鸵鸟政策。1910年，当俄国驻北京公使馆向中国宣称“乌梁海地区”¹⁵⁷是有争议的地区时，中国政府忍气吞声并下令不得触犯俄国人。同年，俄国政府拒绝在图瓦进行通常的边界检查工作，中国政府仍

毫无表示。在中国国界测量图上，图瓦被中国人特别标示出来，置于中国与俄国边界之间。

中国在图瓦问题上的态度转变为积极，首先表现在它加强了在蒙古的影响；其次，在二十世纪头十年末，中国人开始执行向与俄国接壤的蒙古边境地区移民的计划，而且这个计划也可能把图瓦地区包括进去。

沙皇的公使科罗斯托维茨在 1911 年 4 月 21 日的一份紧急报告中写道：“几天前，北京的一家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谈乌梁海边区，说乌梁海边区‘其实’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那里俄国居民点多达一百个，引起了中国政界人士对此问题的注意。”1911 年 2 月 2 日，进步的中国报纸《中国报》在谈论乌梁海问题时写道：“这个边区早就是蒙古的一部分，并和蒙古其他领土一起归大清帝国所有，而且，那里驻有一支特派军队，同时该地区受乌里雅苏台副将军的直接管辖……。现在俄国人提出重新审查边界问题，并毫无根据地坚持：边界线不应该沿萨彦岭山脉划分，而应沿唐努山脉划分。俄国这个毫无根据的要求明显地表明，俄国人不论如何都想强占乌梁海边区。他们想以威胁的手段迫使我们立即同意把我国几千平方英里的领土割让给他们。我们没有那么多的领土去满足外国人贪得无厌的要求。”¹大约在同一时期，中国行政当局的一名代表从乌里雅苏台来到克木奇克地区。他把乌梁海的官吏召集到一起，要求他们不要背叛博格德皇帝，并命令他们：1. 严格守卫边界；2. 监视俄国人和新到克木奇克地区来的人的行动；3. 注视俄国军队在克木奇克地区的出现。²

在这种情况下，俄国政府代表们的担心是有充分根据的，他们

1 波列伏伊：《中国报刊》，转引自纳佐夫著作，第 24 页。

2 《伊尔库次克军区司令部收到的情报汇编》，1911 年 7 月 1 日至 20 日，案卷第 175—779 号。

对“乌梁海问题”一方面采取沉默策略，一方面进行实际占领是办不到了。“如果中国方面一遇到适当机会便提出划分边界的问题，那么我们所处的消极地位就会使他们增加勇气，并迟早一定会着手把目前为数已经超过三千人的俄国移民从乌梁海边区排挤出来。”¹这种怕失却“良机”²的担心，只能使俄国加强进攻性的政策。¹⁵⁸

然而，在说明沙皇对乌梁海的政策推动力时，只限于根据伊尔库次克会议材料所表现出来的形式加以描述是不正确的。因为这种说明并不完全，它不能揭示出沙俄政府决策集团中所存在的矛盾趋向。当时，在下层官僚和上层官僚之间存在着意见分歧。下层官僚直接反映着殖民分子向政府施加的压力（下面我们就可以看到尼古拉二世是支持这些人的）。而上层官僚所推行的政策则反映了俄国开辟占领殖民地道路所处的国际政治形势的全部复杂性。外交部就是后一派意见的首要代表。

当伊尔库次克会议的建议被提交给当时的代理外交大臣涅拉托夫请他作结论时，他对向乌梁海地区派遣整理土地的考察团提出了反对意见，其理由是：“俄国人有计划地向该地区移民，无疑会引起乌梁海人的不满，并使同中国的关系复杂化。”

1911年夏天，由于同中国关系的复杂化，陆军部积极进行了准备工作，“以便在必要时立即占领乌梁海边区”³。而外交部在就此项措施所作的结论中指出，外交部在乌梁海边区并没有发现什么特别令人惊慌的现象。

但在这时，中国爆发了辛亥革命。这次革命立即在蒙古得到了反响。蒙古各盟纷纷脱离中国。11月18日，库伦宣布了蒙古

1 <科罗斯托维茨 1911年4月21日的第40号秘密紧急报告>，案卷第189—387号。

2 “良机在当时看来可能已经失去了”。见帝国驻北京公使 1910年11月28日给外交大臣的密电。

3 见陆军部大臣苏霍姆利诺夫 1911年11月28日给萨佐诺夫的信。

独立；12月16日，库伦的博格德格根被推上了王位。同一天，乌里雅苏台将军向蒙古人交出了武器。

在喀尔喀激烈展开的这些事件随时都可能波及同喀尔喀有联系的图瓦的情况下，内阁总理科科夫佐夫“鉴于乌梁海边区在我们同中国的关系中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认为将所有收集到的有关这个问题的资料重新提交内阁会议进行讨论是有益的。”¹

内阁会议首先详细地研究了是否可以认为乌梁海地区是属于俄罗斯帝国的这个基本问题。

“代理外交大臣解释说：要把乌梁海边区说成在某一个时候中国曾割让给我们，或者在我们和‘天朝’确定边界线时已经划分给俄国，都没有无可争辩的证据。”在分析了一切能说明乌梁海是属于俄国的论据之后，内阁会议得出结论：“我们拿不出有条约根据的不可辩驳的理由来反对中国对乌梁海边区的要求。”1864年签订的塔城条约被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根据这个条约规定，两国边界线在乌梁海西部被规定在沙宾达巴哈西南，此地唐努山脉以北近二百俄里。

内阁会议决议接着指出：

“与此同时，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也可能更早一些，俄国移民就开始逐渐渗入乌梁海边区，先渗入乌尤克和图兰河谷，然后又渗入大叶尼塞河和小叶尼塞河流域。俄国移民与当地土著居民（乌梁海人即索约特人）的和睦相处促进了俄国农民和商人向该地移居，他们在那里从事农业、商业、畜牧业、渔业和采金业。中国当局对俄国人这样逐渐向乌梁海地区移居漠不关心。同样，对那些为了满足住在乌梁海的俄国人的各种需求而来到该地区的俄国官员的公务往来，中国人也未予阻拦。乌斯边务官及其助理为了这个目的一年内到乌梁海边区约六次。其他一些俄国官方人员（神甫、调解法官、医生、医士）也从乌辛斯科耶村到这个地区去。最后还应指出，为了勘察乌梁海边区的金矿，州的矿山工程师和他的助手还从来努辛斯克到过乌梁海边区，

1 1911年11月8日内阁会议特别议事录，档案案卷第126—724号。

金矿面积也是由米努辛斯克的矿山区划人员来区划的。这类公务来往都被视为极平常的事情,并没有受到中国方面的任何阻挠。

当然,中国当局对俄国移民向乌梁海地区渗透所持的这种态度本身,尚不能成为中国人承认乌梁海边区是俄国领土的证据。就连他们仍保持沿唐努山脉南麓的边防线,随时都可能被他们解释为防守内地,如同在蒙古某些地区设置哨卡一样。因此,在我们对乌梁海边区的要求缺少扎实的条约依据的条件下,上述情况还不能构成我们占有该地区的法律根据。上述情况仅仅造成这样一种实际局面,这种局面肯定我们在该地区有着特殊的利益,使政府有责任密切注视我们同中国在该地区的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同时也不能不考虑中国政治生活的现实条件所提出的一些其他情况。我们毗邻的这个帝国,当前正经历着激烈的革命骚动。对具有反对帝制、反对满族统治的色彩的这次民族运动的规模,目前尚难进行全面估计。但是毫无疑问,中国现在正处在尖锐的国内危机时期。在这种条件下,政治家的理智要求我们对待这个国家要特别谨慎。不应当忘记,中国领土上有政治经济利害关系的不仅是欧洲一些主要国家,而且包括日本和美国在内。任何一个大国干预中国的内部运动,甚至表示想利用这个运动来达到私利的目的,特别是肢解中国以扩大本国领土的愿望,都毫无疑问会遭到其他有利害关系的国家的坚决反对。因此,宫廷高级侍从官涅拉托夫认为他有责任提醒内阁认真注意, 160 我们在乌梁海问题上转入较为积极的活动的任何尝试,都会被解释为利用中国爆发的革命对中国挟嫌报复并攫取其与本国接壤的领土的无耻行径。这样,我们同中国之间很久以来所保持的那种睦邻关系也将会长期遭到破坏。

因此,内阁会议认为,目前不能把乌梁海问题全面提出来,它认为,正是中国当前的这种动乱局势,使得我们暂时推迟把上述问题提到日程上来。显然,不管席卷中华帝国的这场革命运动的结局如何,中国经过这次危机之后都会受到削弱,并且在最近一个时期内没有能力在边界地区采取进攻性政策。这样,中国当局采取措施向乌梁海地区加紧移民(如同他们在北满所企图干的那样)并进一步从该地区将俄国人赶走的危险,就消除了。该地区很可能仍听其自然,而且被蒙古沙漠把它同中国内地隔开,今后还是俄国自然移民事业发展的适宜地方。根据上述理由,内阁会议得出如下结论:在当前的政治形势下,现在不宜于对乌梁海地区显示积极企图,也不宜于就此地区

采取任何外交步骤，更不宜于在该地区采取直接行动，如派军队到那里去或者采取整理土地的措施以及建立移民区等。但是，不言而喻，上述决定绝不表明我们在乌梁海问题上承担了某种义务，也不能理解为放弃我们在该地区的优先权。去年，1910年，帝国驻北京公使馆就有机会向中国政府声明过，我们认为乌梁海地区是有争议的地区。这项声明并没有引起博格德皇帝的政府的抗议。因此，今后在北京与中央当局的往来中，特别是在同中国地方官员的接触中，都应极力避免有可能被中国政府解释为我们承认中国对乌梁海地区拥有主权的任何行动。该地区对俄国来说，有着不可置疑的极其重要的价值，因而不可能与我无关：目前该地区土著居民为五万，俄国移民为五千，俄国人占该地区全部人口的百分之十；该地尚有八十家俄国工商企业与金矿。由此可见，如果说乌梁海地区尚未通过军事行动和外交行动并入我国的话，那么在经济方面和文化方面却已处在占优势的俄国影响之下。该地虽然尚没有俄国军队与俄国官员，但却有着俄国人的巨大经济利益：有俄国农民，有一所学校，近五十名俄国儿童在那里学习；还有为纪念大主教英诺森而在图兰村修建的著名俄国教堂。在上述条件下，帝国政府暂时放弃那种有可能被认为是占领乌梁海地区的措施的积极活动，同时要竭尽全力逐步巩固俄国在该地区的地位。促使我们这样做的，既有经济原因，也有政治原因。乌梁海地区对我们来说是极有价值的移民区，这里有肥沃的土地、丰茂的牧场与各种丰富的矿藏，特别是黄金。据考察家估计，该地可供移民的面积近五百万俄亩。假定给土著居民乌梁海人留下足够数量的土地（每人平均约五十俄亩）以后，乌梁海地区仍能容纳移民四十万人。如此大量的俄国臣民移居乌梁海地区，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战略措施，因为据陆军大臣发表的权威性意见来看，在中国这段边境地区建立由俄国人组成的堡垒，无疑会减轻靠近中国边界的环绕贝加尔湖的铁路现在所受到的威胁。内阁会议认为和平兼并乌梁海地区的方法最为适宜，因而把向上述地区移民摆在首位。只有通过这种途径，才能在上述地区造成这样一些条件。这些条件将来在对我国比较有利的政治形势下，可以使我们有理由向中国政府声明，乌梁海地区存在着一些重大的俄国国家利益，这种情况促使俄国不能不对这个地区的前途表示关注。一般说来，在海外获得了大量属地的各西欧国家实行殖民政策的经验都说明，和平移民活动和在该地建立经济利益，以后在很大程度上会促进那个

与这一地区有着各种贸易和工业联系的国家在这一地区扩大政治影响。不久前，德国在实行这种政策方面就提供了一个有意义的有说服力的例证。它在保护居住在摩洛哥的德国臣民利益的借口下，曾于去年夏天将“豹号”炮舰派往那里，利用这些德国臣民的利益得到了很大好处：在解决摩洛哥问题时，在非洲大陆其他地方从法国手中得到了很多领土作为补偿。在乌梁海边区建立大量的俄国移民区，也将有力地支持我们保护居住在那里的俄国臣民，并使我们的政策逐步走上对该地区实行保护的轨道，而在更远的将来则可能把该地区直接并入我国。当然，内阁会议认为，鼓励俄国人向该地区移居，不当由政府出面人为地吸引移民去乌梁海。那样做很可能引起中国当局的怀疑，同时又可能成为新地方的移民因得不到在其他开放的移民区里移民所得到的政府机关与官员的关照而责难政府的正当口实。而在当前就未必需要政府进行这种干预。如上所述，向乌梁海边区的移民活动始于上世纪七十年代，而有些俄国人却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在那里出现了。而且到乌梁海边区去的多数是西伯利亚人，他们经受过故乡严酷生活条件的锻炼，比较能适应乌梁海的特殊生活与自然条件。西伯利亚人即使在将来也是向乌梁海边区移民的最理想的对象。

与此同时，伊尔库次克省总督于今年九月报告说，发现乌梁海人中间出现了骚动，在他看来，这种骚动很可能发展成为公开暴动。有鉴于此，狩猎官克尼亚泽夫指出，必须迅速将足够的军队调至边境的乌辛斯科耶村，这样可以保护乌梁海边区俄国移民的生命与物质利益不受损害，同时如果事件的进一步发展要求军事占领乌梁海边区时，也能对乌梁海边区实行军事占领。我国驻北京公使的结论也与伊尔库次克省总督相同，该公使也主张作为预防性措施在与乌梁海边区接壤的地区加强我们的军事力量。在四等文官科罗斯托维茨就此问题所呈的紧急奏折上，皇帝陛下于10月16日御笔亲批道：‘应将我军派往乌辛斯克。请与内阁总理商谈。’因此，内阁会议认为，目前有必要立即授权陆军大臣不必等待乌斯特别地方部队建成，迅即命令百人左右的哥萨克部队集中到乌辛斯科耶村。鉴于上述情况，内阁会议决议：

1. 委托国民教育大臣、内务大臣、土地规划与农业总局局长以及教会事务总局局长等分别在乌梁海边区注意进一步增加俄国学校的数目，组织医疗服务和兽医监督，发展该地区的教堂建筑以及给予在乌梁海人中间 162

业已定居下来的俄国移民以其他援助。

2. 贲成内务大臣对乌斯边务局现行编制的修改问题进行考虑，并将对此问题的设想按规定程序进一步加以发展。

3. 贲成陆军大臣就有关筹建乌斯特别地方部队事宜提出初步意见。

4. 在上述第三项措施实现之前，可暂由伊尔库次克军区司令酌情由该军区部队中派百人左右的哥萨克部队到乌辛斯科耶村去。

5. 贲成内务大臣与交通大臣设法完成从格里戈利耶夫卡村至乌辛斯科耶村一段马车道的修筑工程和上叶尼塞河航道的障碍排除工程。”

这样，沙皇政府由于考虑到了国际政治形势，担心会遭到日本、美国，首先是其盟国的反对，才不得不采取谨慎的等待时机的政策，但坚信，乌梁海边区今后仍是发展俄国殖民事业的“合适地区”。正是考虑到国际形势，才使俄国政府暂时放弃了利用中国的衰弱而采取积极行动去占领图瓦的打算。

1912年2月3日，尼古拉二世在我刚刚引用过的内阁议事录上“亲笔”签署意见，对议事录中所阐述的关于“乌梁海问题”的政策表示赞同。过了几天，外交大臣萨佐诺夫向沙皇呈递了一份奏折，说：

“臣不胜惶恐将驻北京代办1月29日第八号紧急报告伏呈陛下审阅。在该报告中，五等文官谢金主张我们立即占领乌梁海边区。其理由有二：一是从法律上讲，我们占有该地区的权利是毫无疑问的；二是现在的政治形势适合于这样做。

对这两点理由中的第一点，我认为有义务启奏陛下：波波夫上校证明乌梁海边区属于俄国的论据，波波夫本人也不认为是充分的和完全的，已被莫斯科总档案馆的文牍员四等文官别洛库罗夫不久前完成的一部著作所推翻。别洛库罗夫根据对十七世纪末¹即同中国签订‘布连斯奇界约’时期的一些文献原本和地图材料的研究得出了如下的结论：沿萨彦岭山脉的这条边界线是由于1727年由俄中两国专员根据‘布连斯奇界约’划界时共同确定的；划界以

¹ 这是明显的错误，应是十八世纪初。

后在伏拉迪斯拉维奇伯爵监督下绘制的边界地图对此也作了肯定。

这样，不得不承认俄国在法律上没有权利占有乌梁海边区。假使去占领萨彦岭和唐努山之间的这块土地的话，促使我们这样做的原因只能是从保护我们在那里的利益的观点看来必须这样做。但是，臣不知道在那里是否发生了一些什么事件，要求我们用军事力量去保护在乌梁海边区的俄国臣民而放弃内阁会议所制定的并为陛下在2月3日所批准的政策。

萨佐诺夫

1912年2月15日(新历28日)

于彼得堡”

尼古拉二世读完奏折后，作了如下的批语：

163

“恰好相反，朕完全同意驻北京代办的意见。从讨论乌梁海边区的问题时起，已逾时三月有余，中国发生了一些巨大变化，我们必须更加积极地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我们在沿中国边界的任何地方都不能为自己捞得好处。请回忆一下我们占领阿穆尔边区的历史。”¹

1912年2月15日(新历28日)于皇村”

尼古拉二世的批示无疑是有历史意义的，因为其中简明地表述了沙皇政府对外政策的全部掠夺性纲领，而这个批语出现时的一些情况也同样是值得注意的。我们面前有一份根据内阁会议对乌梁海问题讨论的结果而制定的文件。在这份文件中我们看到了精心策划的帝国主义政策：它既考虑到了国际政治形势，又援引了值得效仿的先进欧洲强国实行殖民政策的范例，等等。但是这座精巧地建筑起来的外交大厦竟被尼古拉二世一笔推翻了。尼古拉二世在二十世纪在帝国主义时代和准备世界大战的时代，在俄国工业资本转变为金融资本的时代，仍是同“世袭领地制度”(M. H. 波克罗夫斯基语)牢固地结合在一起的专制政体的首脑。

¹ 《红档》，第18卷，第89页。

“专制君主”，正如萨佐诺夫所写的那样，冒着“在我们应当把力量集中在我们对外政治活动的其他方面的时候”“在这些地区引起麻烦”的危险，表示完全支持那些推动政府立即占领乌梁海边区的社会力量。

这时，中国革命在继续向前发展。已有许多征兆表明风暴即将来临了。这些征兆如此明显，以致伊尔库次克总督有可能在1911年9月8日的报告中把这种征兆报告给内阁总理。¹

“根据我刚收到的乌斯边务官的报告和他派到我这里来的边务局翻译萨莫伊洛夫(他从唐努乌梁海大总管那里回来不久)的亲口报告，可以断定乌梁海人对中国制度的不满情绪正迅速增长，并可能酿成公开的暴动，如果发生后一种情况，中国政府就会得到口实派军队进驻乌梁海边区。这就等于决定了乌梁海边区是不属于我们的。例如今年7月，大总管处的一名乌梁海官员在陪同到乌梁海边区来检查嘎恰利斯基山口界牌的中国官员时，曾公开责难中国官员对乌梁海人征收捐税。中国官员因此对这个乌梁海官吏施行了鞭笞惩罚。这个乌梁海官员被打之后，立即集合起了六十名乌梁海人，召回了侍奉中国官员的所有乌梁海人，然后对他们说：‘我们忍受够了，打倒压迫，苍天有限！’”

164 革命风暴引起了蒙古脱离中国以及蒙古人捣毁中国商人反对中国商业资本的运动之后，于1912年初刮到了图瓦境内。这里突然爆发了一场强大的反对中国商人的运动。几世纪的沉重奴役和剥削所郁积起来的人民仇恨发泄出来了，捣毁了所有中国人的店铺。图瓦居民再也不听命于自己的总管和中国行政当局了(我们知道，中国行政当局于1911年末已在乌里雅苏台废除了)。他们开始对中国商人和高利贷者实行报复。关于1912年初的这场暴动，尚无著作加以阐述。我因为找不到记载这场有趣的群众运动

1 移民局档案，1914年第26号，第1卷《关于维护俄国在乌梁海的利益和保卫在那里居住的俄国臣民的措施》。

的史料，而只好仅仅根据题为《来自乌梁海边区的情报》的《伊尔库次克军区司令部的侦察报告》¹来对这次运动进行阐述了。

“1912年1月8日，巴彥河附近的中国人听说乌梁海人要来抢掠，便到小叶尼塞河方向避难去了。过了一时，来了四十个乌梁海人，接着又来了六十个。他们把货物抢走，大喝中国酒。

1月12日，塔普萨河河口附近和以下的叶尼塞下游的中国商号得到乌梁海人要到这里来抢掠的消息后，就把货物转移到萨菲亚诺夫那里并扬言说，他们把货物卖给萨菲亚诺夫了。

这些中国人的马群和牛羊被乌梁海人赶走了，中国人逃跑了。1月11日和12日，乌梁海人袭击了离切尔涅维奇庄园不远的维兰附近的一家中国商号。货物被抢走，房屋被烧毁了。1月14日，离图兰四十俄里的奥音-希维的一家中国商号被抢。

1月14日深夜，乌梁海人来到了贾库利，但是中国人已将一部分货物转移到帕斯图霍夫、丰季科夫等俄国人那里去了。中国人放了十五枪之后逃走了。乌梁海人就动手抢东西。他们是从老远的地方来的。乌梁海人中有一个蒙古人，他是领头的。有几个乌梁海人曾试探着说，不妨把俄国人那里的中国货物也拿走，但是头目决定说：‘好好想想吧！那样谁来保护我们！’

俄国人也担心乌梁海人对他们抢劫。那些没有得到收藏中国人东西的俄国人出于嫉妒心，显然并不反对让乌梁海人到给中国人收藏货物的俄国人那里去。

1月16日，乌梁海人到了查丹。抢劫中国人的乌梁海人没有任何武器。他们暂时只追求一个目的：把中国人全部赶出乌梁海。”

1912年发生的事件把图瓦境内的中国商业资本完全消灭了。但是图瓦的群众暴动只是砍掉了商业资本这条多头蛇的一个中国

1 图瓦档案案卷，第175—779号。

头,而其另一个俄国头则依然存在,并准备利用对它有利的独占地位掠夺图瓦。

上述事件发生之后不久,即于1912年4月16日,在图瓦从事
165 贸易的俄国商人向乌斯边务官递交了一份呈报,他们写道:“最近在中国和蒙古发生的事件也对乌梁海产生了影响。库伦呼图克图被选为全蒙古的大汗以后,蒙古与中国的关系因此断绝了,乌梁海人不准中国人在乌梁海境内做任何生意。我们俄国商人现在清楚地意识到,我们应当尽量充分地利用这种形势以扩大俄国贸易并使俄国贸易、俄国工业资本在这个国家里把根子扎得更牢。”¹

俄国商人在其竞争者被赶走之后,不仅独占了图瓦市场,而且由于俄国已实际占领了图瓦以及由于俄国实行把图瓦变成俄国边区的政策,他们在这个被征服的国家里还获得了无限的权利。

现在我们把本章的内容归纳一下。

沙皇俄国这个最大的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国家,是一个最积极地参与瓜分世界的国家。它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就把图瓦确定为其领土扩张政策的新目标。渗入这个国家的俄国商业高利贷资本是殖民奴役体系中的一条传动带。

向图瓦迁移俄国农民则是另一条同样重要的传动带。

向图瓦迁移农民开始时俄国移民以分散的试探形式渗入图瓦,以强力侵占靠近俄国边境的图瓦土地。由于受到俄国政府的鼓励,移民的活动便越来越大胆而果决了。不断涌来的大量移民占据了图瓦内地河流两岸和山前地带的大片土地,把土著居民从最肥沃、最适宜的土地上赶走了。

俄国政府力求通过“和平的”贸易和农业移民的活动在图瓦建立一些据点,以便在有利的国际政治形势出现时,正式吞并图瓦,

1 转引自格鲁姆-格尔日麦洛:《西蒙古和乌梁海边区》,第3卷,第2册,第628页。

完成由移民开始的、俄国资本掠夺图瓦土地，剥削图瓦居民的事业。而在这样有利的时机到来之前，俄国政府决定尽量谨慎从事，随机应变，避免提出尖锐问题。

修筑乌斯马车道、改善叶尼塞河航道和在边境附近集中军事力量等等，也都是为了达到彻底占领图瓦这一目的而逐步采取的一些措施。

俄国政府鼓励农民移居图瓦，对移民予以协助，但结果跟它的愿望相反，它在新地区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在这种局面下新移民不可避免地要与老移民发生冲突，因为那些先迁移来的商人通过 166 贿赂和欺骗，已把大量最适宜的可以经营农业的土地占据了。

俄国政府所依赖的这两类移民之间的尖锐冲突，使俄国政府不得不进行公开的干预，采用在俄国其他殖民地多次使用并行之有效的方法来调整土地问题，即为了不使老移民即商人的地产受到损失，而对图瓦人民的土地进行新的大规模的掠夺，把掠夺来的土地分给新移民。

这样的矛盾激化成了促使所谓“乌梁海问题”彻底解决的另外一个动因。

沙皇政府所期待的新的政治形势因中国 1911 年发生辛亥革命和蒙古在政治上脱离中国而出现了。这些事件在图瓦引起了人民运动，在短短的期间内就消灭了中国商业资本和中国的政治统治。由于政治形势的激烈变化，沙皇俄国在图瓦推行的殖民政策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第五章 占领乌梁海

图瓦社会的“政治派别”。萨拉吉克旗和托锦旗脱离大总管的管辖。任命乌梁海边区边境专员。采取这项措施的政治原因。俄国移民的增多。一些图瓦总管向俄国政府的呼吁。俄国宣布对图瓦实行保护。“乌梁海边区事务专员”。格里戈里耶夫及其对图瓦居民的镇压。移民管理局策划侵占图瓦土地。当地居民的积极反抗。俄国政府的傀儡阿格旺被杀。

沙皇俄国利用辛亥革命爆发和蒙古脱离中国后所形成的政治局势，巩固了其在图瓦的地位。图瓦数十年来实际上已成为俄罗斯帝国的殖民地，而现在则要正式地变成俄国的属地了。

图瓦人民世代所遭受的苦难生活已接近尾声了，但并不是所有参与这一生活的人都对历史局势有一个清楚的认识。

辛亥革命后所发生的事件，几百年来压迫者的压制被推翻，必然会使图瓦人民感到意外而大为震惊，同时也会使他们产生摆脱一切外国压迫的希望。中国统治以及中国商业资本在图瓦的被消灭，使图瓦的阿拉特牧民摆脱了一年一度的阿尔班和其他捐税，摆脱了拖欠中国商行的一切私人债务。束缚在居民身上的几代人无法偿还的奴役性债务被人民运动一扫而光。摆脱中国商业资本的束缚这件事，不仅对普通的阿拉特牧民，就是对富裕阶层和封建上层人物总管及其亲信们也是件大快人心的事，因为这些封建上层人物再不用把自己所攫取来的剩余产品分一部分给中国高利贷者了。但是摆脱这种束缚对图瓦封建主来说还有另外的意义。图瓦

的统治者处在受满洲帝国和中国商业资本的双重压迫之下，变成了他们唯命是从的代理人，不得不满足于图瓦的事实上的主宰者留给他们的份额。图瓦政治生活中的突然变化，必然会使图瓦上层统治者产生一种幻想，即他们能够成为独占从“自己的”人民身上剥削来的全部剩余产品的社会力量。

图瓦的统治者并不指望在政治上完全独立，但在要吞并图瓦 168 的两种势力之间，即在俄国和蒙古之间进行选择时，他们宁愿接受蒙古的“保护”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希望在蒙古的保护下他们建立在封建主义基础上的古老的宗法制度“自己的”总管、“自己的”寺庙等等都能够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但是，这种希望是同当时整个经济、政治局势极不相容的。俄国的商业资本已牢固地进入了图瓦经济的每一个毛孔，在它的较为机灵的中国对手被赶走之后，更加兴旺起来了。一批批俄国移民不断地涌进了图瓦。一支为数不多但足够占领图瓦的军队已集中在俄国的边境上。

但是俄国政府在准备直接占领图瓦的时候，不能不考虑到图瓦出现的政治形势和图瓦社会上层人物的动向。即使是为了对这些上层人物进行相应的政治工作和把这些封建主拉到自己一边来，也不能不考虑这一新的政治因素。

图瓦各总管之间发生了内讧，为俄国实行这一政策造成了有利条件。大总管企图成为全图瓦真正的首领和统治者，他的企图受到了其他总管的抵制，他们不愿意服从他的管辖，不愿意将自己的收入分给他一份。

图瓦封建主之间的内讧，在海都布管辖下的克木奇克的两个旗于 1908 年脱离关系以后，更加激烈起来。唐努旗的总管还管理着东部的两个旗——萨拉吉克和托锦，继续保持着大总管的称号。他无时不想把自己的权力扩大到克木奇克分离出来的两个旗去，使这两个旗的总管隶属于他，以便使他成为全乌梁海边区的统治

者。但是他不仅没能达到目的，反而在 1912 年中国人被赶走之后，失去了离他最近的萨拉吉克旗：萨拉吉克旗的总管宣布了独立。托锦旗的总管陶木特也打算步萨拉吉克旗的后尘，不久他真的这样做了。

东部这两个旗的总管打算依靠蒙古封建主的支持来独立管理本旗。

必须指出，倾向蒙古的趋势在这之前已经以某种方式受到过战斗洗礼了。

“早在蒙古脱离中国、争取独立的革命时期，蒙古人就会吁请过索约特人给予援助，以反对共同的敌人。索约特人的王公(总管)们接受了这个请求，并从各旗抽了一百人作为士兵前去援助他们。激烈斗争结束以后，萨拉吉克和托锦两旗的索约特人都向桑达格¹⁶⁹扎布活佛这个蒙古旗的总管(他的总管处设在流入色楞格河的穆伦河支流邦绥河边)提出申请，说他们愿意成为他的寺庙的属民。活佛接受了他们的申请，并授予托锦总管陶木特王公爵位，授予他的助手纳门以赛古尔其官衔，同时赏赐给他们二人珊瑚顶子”。¹

但是，倾向蒙古方面的并不是只有萨拉吉克和托锦两个旗。

在上面引证过的“各部联合委员会议事录”中，曾记载着伊尔库次克总督的代表在向会议介绍乌梁海边区的情况时说道：“乌梁海的统治者们自己无力在本地区建立任何秩序，正在向俄国和蒙古寻求援助。一部分乌梁海人表示愿意加入俄国国籍，另一部分人，而且是一大部分人(异体字是我标的——卡鲍)则愿意归顺库伦呼图克图。”

在伊尔库次克总督的报告(1913年)中，我们也看到了明确指出居民的亲蒙情绪，虽然这种情绪被根据警察“社会学”说成是“蒙古人宣传”的结果。

1 И. 萨菲亚诺夫：《萨彦岭南地区》。

“乌梁海人……由于受蒙古人宣传的影响，已表现出愿意归顺刚刚脱离中国的蒙古统治者的倾向。”

伊尔库次克总督在论证必须执行政府制定的对乌梁海边区的政策时，特别援引了正动摇于俄国和蒙古之间的乌梁海人的情绪，“我国对库伦政府虽已提出警告，蒙古无权染指乌梁海边区，但蒙古特使仍未停止诱使乌梁海人成为呼图克图臣民的活动。”¹

但是，在某些旗的总管企图依靠蒙古封建主的支持，脱离大总管管辖的同时，大总管本人正在竭尽全力要恢复对那些已独立出去的旗的管辖，并巩固对这些旗的统治。他认为达到这个目的的最好办法是依靠俄国的帮助。当时的大总管棍布台吉，据萨菲亚诺夫描写，是一个“三十一—三十二岁的青年人。他从自己父亲那里继承了珊瑚帽顶子和银印。他父亲因过度饮用中国烧酒而死了……他智力贫乏，意志薄弱，完全被控制在他的指导者，即那些有功劳的老官吏手中。他的父亲年轻时就是索约特的头号富翁，但留给他的遗产却少得可怜。所以他不得不依靠自己有钱的岳父生活。他怕中国人，绝对服从中国人的命令，但他对俄国人抱有好感，特别是他在乌辛斯科耶村被接待和得到沙皇奖章(1910年)之后。”²

1912年2月15日，乌斯边务官收到了大总管一个通告，其中 170 说喀尔喀已摆脱了中国人的“惨无人道”的统治，并宣布脱离中国而独立了。乌梁海人(图瓦人)选举大总管棍布台吉为联合在一起的三个旗的首领，决定信奉佛教，并选出了统一的宗教领袖。这个通告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决定宣布乌梁海在“大俄罗斯帝国的保护”下“独立”。通告还吁请俄国军队立即占领乌梁海的居民点，因为乌梁海人害怕北京方面对中国人被擅自赶走而进行报复。³

1 《伊尔库次克总督、狩猎官克尼亚泽夫关于乌斯边区和乌梁海边区管理问题的报告，1913年》，《军事历史档案》，第440—683号卷宗。

2 И. 萨菲亚诺夫：《索约特研究》，载《西伯利亚报》，第217期。

3 列昂诺夫：《唐努图瓦》，莫斯科，1917年版。

俄国政府非常清楚，大总管呼吁俄国给予保护的做法，在图瓦居民中既不会得到同情，也不会得到支持。但是，这个情况却促使它决定凭借大总管（虽然他没被所有其他各旗承认）的邀请，迅速去占领乌梁海。此外，大总管发出呼吁的时候，图瓦其他总管对俄国的敌对情绪正在显著增长。在这种形势下，由于图瓦总管中间各种派别的发展，俄国当局就产生了一个想法，即“由于需要注视乌梁海边区的局势，制止那里的无政府状态，防止乌梁海人转向喀尔喀当局，必须任命一名特派员前去乌梁海边区，负责管理乌梁海边区的俄国臣民，注视当地形势发展，采取各种措施来加强俄国在乌梁海的影响”。¹ 乌梁海边区边境专员，便应成为处理边境事务的这种特派员。其职责就是完成一定的政治任务。内务部附设的各部特别联合委员会所拟定的指令中给专员规定如下任务：

“1、制止乌梁海一些统治者及其所管辖的乌梁海人变成蒙古（库伦呼图克图）的臣民。

2、向这些统治者和乌梁海人说明不依赖中国和蒙古而独立的利益和好处。

3、对乌梁海统治者施加影响，使他们在其内政和自治的所有重要问题上都向俄国官员征求意见。

4、采取措施防止乌梁海地区的无政府状态并保护居住在此地区的俄国臣民的生命财产安全。

5、对居住在图瓦的俄国臣民进行管理。”²

由此可见，专员的职责具有突出的政治特点。其目的是通过向图瓦统治者进行“说服”和“劝告”，造成一种适当的“局势”，以便公开地、直接地吞并图瓦。为使这种“说服”和“劝告”具有说服力，

1 摘自伊尔库次克总督 1912 年 7 月 12 日的信。

2 见内务部附设的研究加强俄国在乌梁海地区影响的各部联合委员会会议事录，《军事历史档案》，126—724 号卷宗，第 272—291 页。

还把一支武装力量交给边境专员使用。

促使俄国官僚统治集团做出这种决定的政治动机，在我引证的《各部联合委员会议事录》中，已清楚地表现出来。当出席会议的财政部代表指出：会议的纲领比我们已知的内阁决定中所规定的纲领要广泛些时，外交部代表解释说：“当前远东的政局是如此地明朗，要求对乌梁海地区采取比1911年末内阁所拟议的更为重要的措施。”但是当会议主席问道，鉴于派遣代表的外交目的，我们是否应该在乌梁海边区设置一个特别政治代表时，这位外交部代表却回答说：“暂时不可能采取此类措施，因为乌梁海边区在形式上被认为是属于中国的领土，在那里设置国际机构，立即就会引起中国和在远东有重要政治利益的其他国家（日本、美国、英国等等）¹⁷²的非难，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这可能成为其他国家侵占中国领土的口实。所以，根据四等文官卡扎科夫的意见，为完成规定的任务，必须设置一个行政官员，其权限和职责与边境专员相同，仅授予他政治代表的某些权限。”

显而易见，在乌梁海边区建立新机构的目的是，不仅是为了要制服图瓦的总管们对俄国占领图瓦的反抗，而且是为了能给这种占领披上一件“自愿的”、和平并入俄国的外衣。而为达此目的，把大总管拉拢过来是最为有利的。如果他不完全顺从的话，就把他踢开，用另一个完全顺从的人来代替他，然后再用武力迫使那些脱离大总管而独立的旗的统治者就范。

这就是为派往乌梁海地区的被称为“边境专员”的这个人所规定的行动纲领。但上边说的只是这个纲领的一部分，尽管这是最重要的一部分。纲领的另一部分是用俄国移民开拓乌梁海地区，以便，正如被派到图瓦去的“学者”明茨洛夫所说的那样，“把俄国人无声不响地塞满乌梁海边区，以未经许可的方式占有这块土地”。为了以不经官方许可的方式得到这块土地，“首要的问题是

使总管们驯服,把他们由中国的官员变成俄国的地主。”¹

内阁在派遣边境专员去执行上述政治纲领的同时,还根据土地调整与农业总局局长的提议,决定往乌梁海地区派遣“一名移民官员,去协助移民(?)专员对定居在那里的俄国居民进行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和行政上的支持”。派遣移民官员为建立移民机构奠定了基础。

这样,从1913年起,俄国政府在乌梁海边区设置了两个新代表:一个管政治,另一个管经济,他们的权力都很大。前者要“驯服”总管们,后者要使俄国移民“不声不响地塞满”乌梁海地区。下边我们就会看到是用什么方式使总管“驯服”的,现在先让我们看看移民机构的活动。移民机构负责把新老移民安置在这块尚未被彻底占领的地区,既要使他们得到土地,而同时又要使俄国商人的大地产丝毫不受侵犯。

“移民局宣布乌梁海是开放的垦殖区。在西伯利亚铁路沿线
173 和米努辛斯克县各乡都大肆吹嘘乌梁海土地如何肥沃。这种宣传的结果,使大量的移民涌入了乌梁海。这些移民很不自觉,对图瓦人比以前自由流入的移民和商人还坏。因为自由流入的移民和商人来到这里时还感觉到自己是客人,是外国人。当时,政府没有公开支持他们,所以他们想要土地,就得跟图瓦人商谈,结果使他们对图瓦人的相互关系多少还能将就(?)。而现在想要土地,只问问移民官员就可以了,而对于土地的主人,即图瓦人,则根本不予理睬。”²

由于没有掌握乌梁海边区俄国移民增长情况的直接材料,所以我们只好借用间接材料来说明移民的数量及其在各地区的分布情况。这个间接材料就是1918年的户口调查(只包括俄国居民

1 明茨洛夫:《秘密使命》,第268页。

2 凯斯基:《乌梁海问题》,载《北亚》杂志,1916年,第4期,第20—21页。

点)。¹

乌梁海境内俄国移民的增加情况和俄国村庄在各地区的分布情况²

地区名称	居民点总数	男女两性居民总数	建立村庄数			所占百分比		
			1905年以前建立者	1906—1911年建立者	1911年以后建立者	1905年以前建立者	1906—1911年建立者	1911年以后建立者
			克木奇克	82	714	15	25	42
小叶尼塞	42	2,132	4	13	25	9.5	31.0	59.5
波德赫列勃京	37	3,490	—	9	28	—	24.3	75.7
托锦	36	523	14	12	10	39.0	33.3	27.7
图兰-乌尤克	66	2,480	25	25	16	37.8	38.0	24.2
中央	30	1,333	8	7	15	26.7	23.3	50.0
恰库利-沙戈纳尔	47	1,286	2	7	38	4.2	15.0	80.8
乌梁海地区总计	340	11,958	68	98	174	13.5	35.3	51.2

1 这个户口调查材料的名称叫《乌斯边区和乌梁海边区的俄国居民点。根据1918—1919年户口调查材料》，载《叶尼塞省和乌梁海地区居民点一览表》，叶尼塞省统计局，克拉斯诺亚尔斯克，1921年版。

2 在材料中对各地区有下列说明：

I. 克木奇克区——在乌梁海西部，位于叶尼塞河右支流克木奇克河流域，是个山区。人们聚居于大小河谷。土著居民乌梁海人(索约特人)占多数(有三万多人)。俄国人主要职业是商业。面积为二万四千一百平方俄里。

II. 小叶尼塞区——位于谢尔巴科夫卡村以远的小叶尼塞河上游。山岭的支脉往往申延到河边，山上是杂木林。俄国居民的职业是耕田和捕鱼。面积为四万九千五百平方俄里。

III. 波德赫列勃京区——西边是埃列格斯塔河，东边是绥布伦河，位于两河的中游之间，与唐努山的北坡接连。除了和唐努山北坡接连的部分外，全是草原。俄国居民主要职业是农业。俄国人中1917—1918年来的移民占绝大多数。面积为八千七百五十平方俄里。

乌梁海的居民点,绝大多数(达总数的八分之七)是1905年以后建立的,而且有半数以上是在1911年以后建立起来的,从这一年起,移民活动已开始由俄国政府来组织和领导了。

当研究俄国居民点在各地区的分布情况时,须把图兰-乌尤克区和托锦区单独划成一类,这两个区的俄国居民早已定居下来,其中老商人家族拥有大量地产。另一类是小叶尼塞区、波德赫列勃京区、恰库利-沙戈纳尔区。这三个地区1911年以后建立的居民点所占百分比都超过了这个时期建立的居民点所占百分比的平均数,即百分之五十一.二。这三个地区,特别是后两个地区正是主要移民区,俄国移民机构有意识地往那里移民。

在上述三个区内,俄国居民不仅增加的速度最快,而且人口相对来说也比较多。当时整个乌梁海地区共有俄国居民11,958人,而小叶尼塞区有2,132人,波德赫列勃京区有3,490人,恰库利-沙戈纳尔区有1,286人,三个区总计6,908人,也就是说,在这三个新移民区里集中了全部俄国居民的百分之六十左右。

这样,俄国移民便开始掠夺老移民区以外的图瓦土地(因为俄国商人在老移民区已占有大量地产),他们受到了俄国当局的怂恿,而不是象上面引证的凯斯基所认为的那样,是由于什么“不自觉”。俄国移民来到的初期,还不得不对图瓦官吏虚与委蛇,搞好

IV. 托锦区——位于乌特河谷以远的大叶尼塞河流域,是山地密林地带。俄国人的主要职业是捕鱼。土著居民的养鹿业很发达。面积为四万五千六百五十平方俄里。

V. 图兰-乌尤克区——位于乌尤克河和图兰河流域,是草原地区,边缘多山。俄国居民的职业是农业和畜牧业。面积为四千八百平方俄里。

VI. 中央区——位于乌梁海中部,大叶尼塞河和小叶尼塞河下游以及叶尼塞河沿岸从狭长半岛到巴尔雷克河和下巴彦河一带。俄国居民的职业是畜牧业和农业。这里是山地草原地区。面积为六千五百平方俄里。

VII. 恰库利-沙戈纳尔区——位于克木奇克区以东,恰库利河和沙戈纳尔河流域。它的东部边界是巴尔雷克河(叶尼塞河右支流)。森林草原地区。俄国居民的职业是农业和商业。面积为五千五百平方俄里。

关系，款待他们，并向他们行贿。但是，当俄国行政当局在图瓦站稳脚跟之后，获得土地就再也无须图瓦当局批准，而是采取公开掠夺的方式了。

图瓦人为了保卫自己的土地和新移民展开了顽强的斗争，所采取的形式是偷走其大批牛羊和马匹。盗马贼(Кайгалы)在图瓦¹⁷⁵人民中间很受尊敬，图瓦人民没有力量用其他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所受压迫和掠夺的抗议。移民在抓到盗马贼时一般是把他们打死。俄国移民在俄国行政当局支持和唆使下横行霸道，使图瓦居民极为愤慨，真想把压迫者杀光。俄国官员的报告常常提到图瓦人和俄国移民之间的冲突，俄国人掠夺土地，图瓦人则偷盗牲畜。¹

* * *

伊尔库次克总督属下的官员采列林被任命为边境专员这件事，很快就取得了一定的成效。采列林到任后，立即同总管们和上层喇嘛们进行了“外交”谈判，其目的是促使他们请求“白沙皇”把图瓦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同时，他使出所拥有的一切手段来支持大总管。结果，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大总管第一个转向了俄国¹⁷⁶当局，希望借助俄国当局的力量来巩固他在乌梁海的地位。

俄国政府在收到大总管第一份请求俄国给予保护的书信之后，在一年半时间里陆续收到了不少新的“请求书”。其中有一份是已故的总管海都布的同父异母兄弟大喇嘛汗布喇嘛写的。关于这份请求书，我是从列昂诺夫小册子里知道的。这本小册子里有如下的叙述：“这份请求书指出，有下列一些情况促使图瓦人请求

¹ 有趣的是，移民局代表明茨洛夫竟告发俄国商人是这种冲突的教唆者。他在报告中写道：“俄国的商人先生们利用自己在索约特官员中的巨大影响，肆无忌惮地教唆总管们反对俄国人，给他们出主意，不许新移民来到乌梁海边区，并用不断盗窃牛羊、马匹的手段把已经定居的移民赶走。在这方面的最有害的人物之一是 М. И. 比亚科夫。他是一个富有的老移民，在克木奇克河设有商站，其反俄活动可以认为是证据确凿的。”(«1914 年档案，移民局公文处理第 55 号»)。

俄国的保护：

1. 最近几年来由于摊派徭役不均，蒙古人要求乌梁海人负担的徭役大大增加。

2. 氏族总管贡诺颜巴扬-巴道尔呼遭到蒙古人的各种排挤。

3. 来到这里的蒙古官员对乌梁海人施用暴力。

4. 俄国居民(汗布喇嘛说)已和土著居民融合在一起，他们的物质利益也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了。

5. 采列林宣称俄国对乌梁海有行使权力的历史根据。

根据上述理由，汗布喇嘛说，唐努乌梁海人相信，对他们自己来说‘虔诚地接受’俄罗斯的保护是最好不过的。²¹

1913年10月，俄国政府又收到了两封要求给予保护的“申请书”，一份是以贡诺颜巴扬-巴道尔呼的名义写的，另一封是以贝子旗统治者的名义写的。巴扬-巴道尔呼在申请书中写道：

“大约在三百年以前(1616年)，还是在罗曼诺夫王朝第一代沙皇米哈伊尔·费多罗维奇时代，我们的祖先就通过俄国派来此地的第一位使节瓦西里·丘麦涅茨宣誓归顺俄国。从那时起，罗曼诺夫王朝的皇帝对乌梁海人的保护持续了六十多年(?)。但是后来俄国对乌梁海人的保护不知为什么(?)中断了。于是我们这个小民族……就渐渐地非法地落到了满洲王朝皇帝的统治之下，而加入了中国国籍。这就是我们民族的真实历史。

如今，中国已废除满洲王朝，蒙古已宣布独立，我和我的旗已没人保护了。而我们乌梁海人由于人数少，仍不能独立生存，所以，我和我的僧俗官员以及全体人民，对当前形势进行了仔细的长时间的讨论后，一致决定请求伟大的察罕汗伸出高贵有力的手，把我们全旗置于您的保护之下。如认为可能，请给我们保留下少数的某些风俗习惯特点，这些特点另列专表陈述。”

在这封申请书后面，附有下列“克木奇克旗请求和愿望明细

1 列昂诺夫：《唐努图瓦。蓝河之国》，第44页。

表”¹。

“1. 克木奇克旗乌梁海人多年来一直信仰黄教(喇嘛教),请求将来仍然允许信仰这种宗教。

2. 我们克木奇克旗的游牧区在南部与杜尔别特东西两盟、乌嫩超里克 177 图汗和巴特乌列勒图达列伊汗两个旗接壤。在清朝时边界是按采采拉嘎卡、汗达盖图、鲍罗奇切图、邦戈尼古雷、乌隆多尔和奇希里苏台这些卡伦划分的。但是以前边界线设在规定的界线以外。我们请求不准许外国人(这里指的是不久前被蒙古政府迁到乌梁海边境的吉尔吉斯人)到现在的边界线附近强行居住。

3. 克木奇克旗地势多山,起伏不平,因此我们贫穷的乌梁海人从事畜牧业(有四类),主要选择有牧场和水的地方作为自己固定游牧区,而他们吃的则是山里的野兽和河里的鱼,世世代代都是如此。所以,请求不要对他们这些必需品征收各种捐税。同时还请求,除了居住在这里的商人外,不要再增加俄国居民到这里来盖房和种田。

4. 我们这些没有文化的乌梁海人,从来没有服过兵役。因此,我们请求暂免服兵役。

5. 我们还请求保留全体官民古老的服装和辫发的样式以及官员帽子上的顶珠和花翎(孔雀翎)。”

在俄国政府收到克木奇克两个旗的“申请书”以后,占领乌梁海的问题已非常“成熟”了,所以沙皇政府官僚们以空前的速度来着手解决它了。就在 1914 年初,沙皇批准了外交大臣萨佐诺夫的《关于俄国政府对乌梁海居民实行保护》的报告。

彼得堡各部在得到上述两封“申请书”后所写的来往公函中,萨佐诺夫给有名望的内务大臣马克拉科夫的信是值得读的。这封信阐明了俄国政府在占领乌梁海前夕对“乌梁海问题”所采取的政策。

1 内务部总局档案第 233 号。《关于俄国在乌梁海的利益》,中央历史档案馆列宁格勒分馆。

萨佐诺夫在通知收到了克木奇克两个旗的“申请书”后，写道：

“正如阁下已知的那样，政府认为在乌梁海问题上必须谨慎稳重行事。决定我们采取这种政策的那些原因，西伯利亚和乌梁海边区之间没有通路，以及由此所造成的乌梁海地区与俄国相隔绝的状态至今都没有消除。从米努辛斯克到乌斯-乌梁海边区一年有六个月不能通行。因此，我们在乌梁海地区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可以使我们在现在宣布乌梁海地区为俄国领土，乌梁海居民为俄国臣民。况且采取这种激烈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无疑会使乌梁海的社会制度受到一些破坏。同时，大旗和贝子旗在“申请书”中还提出（尽管是以希望的形式），他们归顺俄国当局的条件是不要破坏他们的现存制度。上述一些考虑，促使我同意伊尔库次克总督的意见，即暂不应当接受乌梁海人加入俄国国籍，而只予以保护……。

至于上面谈到的大旗和贝子旗的乌梁海人提出的并入俄国的条件，我不认为在这方面我们应该承担任何义务来束缚自己的手脚，尽管不能忽视乌梁海人的愿望。时间将会表明，乌梁海人同俄国当局的关系采取何种形式为好。”

“最高意志”的宣布一事，被安排得十分隆重。它先是单独向
178 大总管宣布，然后向克木奇克旗的总管和 Поток^① 旗（贝子旗的新名称）的统治者宣布的，最后才向马迪佐和乔杜佐的居民宣布。

马迪和乔杜两佐交由“铁里贡宰桑”管辖。亲俄的钦巴被任命为人口最多的贝子旗的布古德达尔加（总司令）。

1914年6月，伊尔库次克总督通知采列林，说俄国已对乌梁海地区实行保护。宣布保护以后，图瓦总管们必须承担下列两项义务：第一，不能擅自与外国（其中包括蒙古）有任何来往；第二，各旗之间的一切争执和误会都必须交由俄国驻乌梁海代表解决。所有统治者都必须呈递关于严格遵守这些规定的书面保

^① 原文如此，不知何意。——译者

证。

俄国对乌梁海实行保护一事，由于是在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日益迫近的时候宣布的，所以并没有引起外交界的注意。它这种侵略行径和帝国主义动机只有当时米努辛斯克出版的《米努辛斯克边区报》发表了一篇文章予以揭露（这是世界大战前夕在工人运动高涨的时候公开发行的具有布尔什维克倾向的报纸）。这篇文章的标题是：《侵略乌梁海》。

现在我们引用其中最重要的几段。

“我们面对着一次新的领土掠夺：在光天化日之下，公开地掠夺一块属于中国的领土。”

“1911年，当由于1881年签订的通商条约而同中国发生冲突时，关于‘修改’乌梁海边区和我国乌斯边区之间的边境线问题，也被我们的‘爱国’报刊提了出来。据《新时代》杂志说，乌梁海曾经在某个时候是属于俄国的领土，只是由于俄国外交官的疏忽才落到了中国人手里。如果这种错误不加以纠正，那么乌梁海地区由于‘地处西伯利亚中心’，将会成为‘复兴后的中华帝国分割西伯利亚的前哨’。”

文章继续写道：

“一方面，他们力求兼并乌梁海地区的目的，是为了在那个地方给我国联合起来的贵族阶级的雏儿们创建一些安乐窝，因为他们在国内已有拥挤之感。但是实际上还有经济方面的原因。主张兼并的人不仅要保护贵族的贪欲，而且还企图保护俄国商人们的利益。”

“商人们极力想把乌梁海地区并入俄国，其目的是为了依仗政府的支持，在这个地区确立自己在经济上的优势（“原始积累的骑士”）。为此，有利害关系的阶层编造了许多神话，说什么索约特人愿意当俄国臣民，服从‘白沙皇’管辖，用罗杰维奇的话来说，‘白沙皇’在居民中间素有声望。”

“掠夺领土的行径得到了自由主义派的支持。自由主义派的反民主本质，在对外政策上表现得特别明显。由于俄国外交在近东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它扩张领土的打算也因巴尔干战争的结果而完全落空；重心已转向亚洲，179

转向中东和远东；波斯、蒙古正在变成俄国的行省。俄国的资产阶级是在远东实行帝国主义政策的鼓吹者。”

接着这篇文章引证了米古林发行的《新经济学家》杂志于1914年第1—2期上刊载的论文：《我国的对外政策》中的一句话：“可以建议我们的政府实行这样的政策。”的确，《新经济学家》是建议购买乌梁海地区，但是购买只不过是侵占的一种伪装标记。这从下面的话中可以看出：“至于现在的蒙古和中国政府（对俄国来说幸好它们是软弱无力的）是否同意，可以置之不论，因为在这种场合，俄国的地位使它只要稍加坚持并适当采取强硬态度，就可以迫使对方接受其意志。”俄国资产阶级力图占领国外市场来弥补国内市场的不足。

“我国反民主的资产阶级早就赞同他们（对外政策的领导人）的主张。只有俄国的民主派才能够回击他们的政策，并把实行国内根本改革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

在宣布对乌梁海实行保护的第二天，采列林就指令大总管“立即恢复”其对萨拉吉克和托锦两旗的统治。如果上述两旗的统治者不服从，就把他们撤掉，另换别人，而且采列林还许诺给大总管必要的援助。

采列林坚决要求这两个旗的总管及其管辖下的居民服从唐努旗大总管。他“论证”自己的要求说：“鉴于大总管上书皇上请求保护时，不仅代表他自己，而且还代表他属下的(?)乌梁海人——萨拉吉克旗和托锦旗的人，所以接受俄国保护的，当然也应当是所有这些乌梁海人，即唐努旗、萨拉吉克旗和托锦旗的所有居民。但是，后两个旗的总管却乘混乱之机脱离了大总管的辖制，而加入了蒙古国籍。

“这样，接到对乌梁海人实行保护的圣旨以后，当我向大总管宣布此事时，自然要把萨拉吉克旗和托锦旗的人包括在他的管辖

之内,而不管萨拉吉克旗和托锦旗的人是否愿意(1)²¹

虽然采列林施出了全部“外交艺术”,但是,萨拉吉克旗和托锦旗仍不承认俄国的保护,继续同蒙古当局保持联系。而且甚至使俄国政府的傀儡大总管本人对“白沙皇”的忠心也开始动摇了。采列林在一封信中写道:“今天得到私人消息,说大总管和乌梁海人由于对移民机关的行为极端不满而开始同中国人洽谈重归中国的问题,还说要把俄国人赶走。”

俄国政府的代理人认为,图瓦各旗总管及其亲信们中间的怯懦的“反对活动”,是对刚刚被占领的这个地方(图瓦人民对侵略者的愤怒和仇恨在危险地增长着)实行的管理制度中,缺乏足够强硬的方针的结果。随着殖民洪流的漫延,俄国移民对土著居民的经济阵地,首先是对牧场等等的侵占也日益加紧了。所以自然要担心:土著居民被灾难逼得走投无路时可能举行公开暴动,从而使占领乌梁海的“静悄悄的工作”发生困难。在这种形势下,总管们的动摇对殖民主义者来说是一个危险的征兆。为了消除日益增长着的暴动威胁,沙皇政府认为结束“自由主义的”“说服”和“劝告”政策是必要的。采列林的甜言蜜语不合时宜了。俄国政府决定对心怀不满的人采取残酷镇压的方针了。

执行这个方针的代表人物是新任专员格里戈里耶夫,他从政府那里得到了更大的权限。他来图瓦上任时官衔已改为“乌梁海边区事务专员”了。采列林在1914年12月17日的一封信中,把格里戈里耶夫的任命告诉了收信人,并强调指出了这件事的政治

1 引自采列林1914年7月19日的信。在这封信中,我们发现了一个说明殖民地管理方法的值得注意的细节。采列林给收信人写道:“您认识的那个楚勒杜姆,我已派他当马迪和乔杜佐的头目了,给他的官衔是铁里贡宰桑(即大宰桑),并授与他戴二品红顶的权利,以便在居民眼里提高政权的威信。不久以前,楚勒杜姆到乌辛斯科耶村来见我,没有戴官帽,也没有戴红顶子。请费心……要象朋友那样劝说楚勒杜姆,一定叫他戴,这会提高他在他现在所管理的乌梁海人中的威信。”

意义。

“我国政府对乌梁海边区的方针政策问题，在格里戈里耶夫被任命为专员之后，可以认为是完全清楚了。再也不用怀疑了，这个政策的表现将是以普通俄国移民住满乌梁海……他将怎样对待不幸的乌梁海人，我不愿妄加判断。总之，乌梁海和乌梁海人完了！2—3年以后，这里将有2—3个俄国乡，和同样数量的异族人（索约特人）的乡，乌梁海边区将被称为叶尼塞省米努辛斯克县的一部分了。”

新专员到任之后，首先向各旗总管和官员们发出了指令，向他们说明了图瓦在俄国宣布给以保护之后所处的新的政治地位。

“大俄罗斯帝国宣布乌梁海地区处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以后，便使这块土地和居住在这块土地上的乌梁海人处于俄国单独监护之下。因此自宣布保护之日起，除俄罗斯帝国外，任何其他国家非经大俄罗斯帝国的允许，不得通过自己庶民、僧侣或官员在乌梁海地区进行任何活动，更不得侵犯对乌梁海181的管理权，即不能向居民征税、审判和惩罚乌梁海居民，不能要求乌梁海官员或总管本人进行说明，否则每个外国必须对俄国政府负责。因此甚至在人民、官吏以及总管中有人想用其他国家的保护来代替俄国保护的情况下，乌梁海人民、官员以及总管也必须无条件地接受俄国政府的保护。所以，如果乌梁海居民、官员或总管中有人同任何外国或外国统治者进行政治谈判（例如商谈国籍问题），为他们征收赋税，提供关于管理乌梁海方面的任何解释说明，擅自协助而不是按规定阻止外国官员和平民鼓动者通行，那么，第一，他便是做了不明智的、无益的事情，不论是乌梁海所有各旗统治者的全体，更不用说某些个别旗的总管，不管他们多么愿意和多么希望得到来自乌梁海外面的援助，也不管他们做出多大的努力企图用其他国家的保护来代替俄国对乌梁海居民的保护，他们都是完全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乌梁海居民的前途将建立在俄国皇帝强有力的领导下；第二，所有在上述活动中犯罪的人，不论是谁，特别是官员，尤其是总管，我将坚决予以追究，并根据俄国法律加以处罚，以惩其对待俄国保护的错误态度和拒不执行俄国当局的要求。”

这一指令发布后不久，镇压那些不驯服的总管和官吏，主要是镇压图瓦劳动群众的活动便开始了。¹

格里戈里耶夫为了贯彻其新的统治方针，决定首先要撤掉不可靠的大总管，物色一个绝对驯服的更为合适的人物来接替这个位置。在绍尔木克河边召开了各旗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代表都是由专员特意挑选的，大会由专员授意，在秘密情况下把前大总管棍布台吉撤了职，并选出了最为居民所痛恨的封建主阿格旺-杰米奇接替了他的位置。

阿格旺一上任就开始按照自己后台(格里戈里耶夫)的指示镇压被撤职的总管的拥护者，这些人成了格里戈里耶夫所建立的制度的第一批牺牲品。

“阿格旺把被哥萨克抓来的四十九个人关在一个小屋子里，这个小屋子连容纳十五二十人都很困难，因此第一夜就有一名被捕者憋死了。余者遭受了残酷的刑讯，逼使他们供出主谋。拷问进行了一个月(中间稍有间断)，有几个人被折磨死了，另一些人经受不住残酷折磨，供出了预谋的全部斗争计划和所有参加者。大规模的逮捕和拷打开始了。唐努旗的所有优秀人物都受到了牵连，他们当中大部分人没经住拷打，招认了推翻阿格旺、不服从格里戈里耶夫的打算，最后不得不表示完全驯服。”

镇压了中心地区的“谋叛”以后，格里戈里耶夫又派哥萨克部队去镇压特斯河对岸的“萨彦佐和右支流特斯-埃尔吉努、纳伦河 182 附近的“吉尔吉斯佐”，因为这两个佐脱离了唐努旗宣布独立。但是讨伐队在萨彦佐的游牧地只见到一些妇女和儿童，这个佐^①的成年男人都跑到蒙古内地去了。

1 关于格里戈里耶夫镇压图瓦人民的情况，萨菲亚诺夫有详尽的描写，他亲眼见到了这个俄国暴吏镇压手无寸铁不能自卫的居民的情形。下边的叙述都是以 И. 萨菲亚诺夫的材料为根据的。

① 原文是这些佐，可能有错误。——译者

讨伐队到了吉尔吉斯佐以后，便到佐领处，找到了自立为总管的佐领。新总管经过一番抵抗之后被哥萨克兵拿获，解往乌辛斯科耶村。

在建立了这两次丰功伟绩之后，剩下的便是征服东部的萨拉吉克和托锦两个旗了，这两个旗的总管到那时还拒不承认俄国当局的管辖。

首先讨伐萨拉吉克的总管，使他从“亲蒙派”变为“亲俄派”。格里戈里耶夫把他拘留了整整一个月，终于达到了目的。在这之后，总管接受了今后应如何行事的指示，才被释放回家。

萨拉吉克旗被“征服”的直接效果是这个旗的总管也向专员提出了加入俄国国籍的请求。

他在请求书中写道：“当时我们非常愤怒和惊慌失措，因为向我们征收我们已缴纳给扎尔罕扎呼图克图的阿尔班重税”。他保证今后认为自己是俄国皇帝的臣民，绝不反悔。

现在只剩下“征服”托锦旗了。

专员带领哥萨克队伍来到托锦，叫托锦旗总管陶木特来见他。第二天总管带领六十名持枪官吏作随从应召前来。“当向专员报告，总管带领那么多武装人员前来时，专员派出一名哥萨克去传令，只接见总管一个人，并且要求总管的随从官吏把武器交给哥萨克。总管拒绝单独去见专员，并拒绝交出武器，他强调指出，专员本人也是带着武装随从到他这里来的，他不明白为什么要求解除他的随从的武装。索约特总管‘态度不逊’，使专员大为恼怒，于是便下令哥萨克强夺图瓦人的枪枝并用武力把总管押来见他，他嘱咐哥萨克小心行事，不要流血，只使用马鞭和刀背。哥萨克根据专员的命令，手持军刀和马鞭突然冲到图瓦人跟前，‘不流血地’缴下了他们的枪械，可是总管本人，在抵抗哥萨克打击时，却被砍伤了一只手臂。把索约特官吏镇压下去之后，哥萨克便把不愿面见专

员的总管强行扭送到专员面前。愤怒的专员便开始对这个索约特总管大喊大叫，暴跳如雷，揪下他的帽子(这是对索约特人最大的侮辱)，扔掉了帽上的顶子，把帽子用双脚践踏，然后宣布总管因不服从管辖，所以被逮捕并剥夺总管称号，还向他宣布，要把他解往乌斯监狱囚禁。”经过谈判，专员同意释放陶木特，选举新的旗的总管。“因为托锦旗的官员几乎都随陶木特来了，所以他们就立即举 183 行了会议，选出了当时不在场的纳门为自己的总管，纳门原是旧总管的助手，获有蒙古赛古尔其称号，帽子上带有红珊瑚顶子。之后把选举结果告知了专员。专员承认这次选举，并在第二天接见了新总管纳门，同时释放了陶木特。”

托锦被“制服”以后，新专员的政纲的第一部分就完成了。此后，新政权“创造性”行动的时刻就到来了。

在这方面行动的第一步是几乎完全废除了以前的司法制度。1914年5月16日关于保护的问题彻底得到解决后不久，内阁便举行专门会议来讨论新的诉讼程序和法院组织法了。内阁批准了司法大臣的建议，这个建议的实质在于扩大俄国法院的权限，使“乌梁海比较重要的案件”都要由俄国法院审判。新的法院组织法和诉讼程序由专员在1915年12月2日给总管和官吏的指令中公布了(指令的全文载于纳佐夫的书)。专员在指令中写了这样一段话：

“俄国政府把乌梁海地区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以后，就把在乌梁海居民之间建立司法制度作为自己的任务，因为在这里几乎完全没有司法制度，所以在很多地方强者为所欲为而弱者遭受压抑的现象非常之多，某些地方偷盗马匹、偷盗牲口现象极为严重，欠债不还之类现象亦屡有发生。为此，俄国政府力求达到的目标是：一、使乌梁海官员组成法院，审判不太重要的案件。并使这个法院尽可能经常并公道地进行工作；二、使俄国法院在乌梁海审判比较重要的案件，并使其审判工作不受妨碍。

“到目前为止，俄国法院在乌梁海各旗的行动遇到的主要困难是，不仅证人而且传被告人来法院调查罪行和审判都很困难，主要是乌梁海人不习惯于准确地执行俄国司法当局和警察官员的要求，另一方面各旗和佐的当局在协助俄国司法当局进行工作时，不是非常清楚地了解在哪个方面以及怎样才能给以应有的协助。

“今后不允许各旗再有这种情况。司法工作必须坚持进行，不许妨碍……。”

今后，一切诉讼案件应当由调解法官按俄国法律审判。比较重要的案件应送交州法院处理。1915年，以调解法官巴拉什科夫为代表的俄国法院已在图瓦开庭，第一批受审判的人是克木奇克旗的图瓦人，这批图瓦人是在贡诺颜同意下殷勤地交给俄国法官审判的。经过短暂审判，巴拉什科夫判给了俄国商人和移民三十万卢布，以此作为偷盗他们马匹的赔款。各旗的官员都应当坚决地执行俄国警察的命令。图瓦各旗都设立一个警察署长，当地政
184 权应当隶属于警察署长的管辖。蒙古曾发给各旗官印以取代中国所发的官印，现在这些官印都被俄国收缴去了，而俄国没有发新的官印。由于当地居民非常重视官印，认为官印是政权的象征，所以剥夺官印就意味着把图瓦政权机关降低到最下层的警察机关的水平。

在采取这些措施把图瓦各旗变为具有俄国法院和俄国行政机关的俄国乡的同时，对居民人口及其经济情况进行了登记，以便征收新的捐税。移民局的工作更加紧张起来了。各旗都开始测量地形、丈量土地了。适宜于移民的地区被划分出来，尽量使俄国移民多得好地。¹仅1915年一年，移民局就占去土地32万5千俄亩。

1 内阁于1914年5月16日举行会议，审查给“乌梁海边区事务专员”工作指示的草案。该草案第27条规定，专员在制定边区移民工作计划时，须事先同土著居民洽商，使他们自愿()把土地让给俄国移民。内阁会议决定，从这一条指示中勾去专员须事先同土著居民洽商一节，为移民官吏任意剥夺图瓦土地大开方便之门。

地形测量主要是在西北地区，即哈克木河流域的图兰、乌尤克等村镇进行。在最近的两年（1916 和 1917 年）中间移民局预计使俄国居民人数增加一倍。移民局打算在未来较长的一个时期内，使俄国居民数量增为 1915 年的 10 倍。最近几年的移民区是哈克木河流域麦日格伊山系弗拉基米罗夫卡村附近和乌鲁克木河流域埃列格斯和沙戈纳尔之间，移民局企图把土著居民排挤到山里和河流的上游去。移民局的年度报告用以下语句结束了对乌梁海地区移民机关“成就”的描绘，它说：“我国新边区‘萨彦岭南的俄罗斯’的未来远景就是如此。富饶的乌梁海边区接纳了新移民之后，应当完全变成俄国的地方，因为俄国移民在数量上正在赶上土著居民，也许将来可能超过他们。”¹ 不过，报告的作者承认说，即使在目前，俄国移民也可以被认为是这个地区的全权的主人。²

与上述往新地区安置移民的措施有紧密联系的是采取了一些措施使牧民过渡到定居状态。³ 这些措施的目的是最大限度地缩减当地居民的土地使用面积。移民机关悄悄地按着我们已知的俄国殖民“边区”（布里亚特、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等地）的榜样制定这些措施。图瓦居民不顾侵略者的压倒优势，丝毫不愿驯服地忍受 185 对他们施行的暴虐压迫。目击者不止一次地报导过这个或那个乌卢斯，有时甚至是整个佐企图反抗压迫者的情况。图瓦居民和俄国新来移民之间的冲突往往形成一些规模不大的战斗，通常要由警察署长和警察的干预、靠监狱和鞭笞来结束。在一次这样的冲突中，警察署长亚历山大罗夫及其警察队不得不以冲锋来攻占一个图瓦乌卢斯。在这次事件中被捕获的六个图瓦人被送进了米努

1 《1915 年乌拉尔以远地区的移民与土地调整工作》，彼得格勒，1916 年版，第 327—338 页。

2 同上，313 页。

3 同上。

辛斯克监狱，三个人死在狱中，三个人被法院判处苦役。

人民同时把仇恨倾泻到那些为外国奴役者忠实服务的本国官吏身上。专员的新走狗阿格旺尤其为人所痛恨。有一次他拜神回来，虽有五个哥萨克和三个官吏护送，但是被人击毙了。凶手未被捕获。阿格旺被杀，使专员格里戈里耶夫大为惊慌，他请求总督皮列茨派一团士兵到乌梁海来。不过，这种恐怖活动再也没有发生，因此格里戈里耶夫便变本加厉地着手在这个被占领的地方“建立秩序与安宁”了。

第六章 革命前的图瓦与沙皇俄国间的 经济关系(关于不等价交换问题)

186

俄国与图瓦间的不等价交换。输入与输出的分析。贸易平衡的构成是商业资本的利益在俄-图贸易中占统治地位的表现。实物交换比货币交换占优势。俄-图贸易进程。再生产的特点。贸易利润变成货币的地点与形式。马克思论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途径。革命前的图瓦是通过什么途径发展的？

在研究革命前图瓦的社会经济制度及影响其形成的条件和势力时，必须对图瓦和沙皇俄国之间的经济关系予以特别重视，因为这种关系在我们看来就是殖民地和宗主国之间的关系。一方面，图瓦是一个殖民地小国，其自然经济的基础已被外国商业高利贷资本严重破坏了，在这个破坏过程中，外国商业高利贷资本是依赖当地封建阶级的支持。另一方面，俄罗斯是一个军事封建大帝国，它占领了图瓦，使之在经济上、政治上都从属于自己。

这两个国家以贸易关系为表现形式的外部经济联系，其基本特点是不等价交换。这里说的不等价交换，指的并不是其产生的根源，即在经济发展程度不同的国家之间的交换中，经济比较发达国家的劳动作为比重较高的劳动。而比较落后的国家，其劳动生产率 and 劳动强度低于世界市场上的平均水平，所以在交换中，用实物来说，付出的物质化劳动总是比得到的多。¹ 由于这个法则的作用，图瓦在用毛皮、牲畜和畜毛同俄国印花布、斧头和茶叶交换时，

¹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3卷，第264页（非直接引语，按词面翻译。——译者）。

已被迫以较多数量的劳动去换取对方较少数量的劳动。但是，不单纯是价值法则的作用决定了俄国和图瓦产品之间实际上确定下来的交换比例，也不单纯是价值法则的作用使图瓦的商品按廉价输出，使宗主国的商品按高价输入。在不等价交换的问题上起了基本的和决定性的作用的是“侵占和诈欺”。这是刚要脱离但还没有完全脱离自然经济的游牧民族同寄生虫式地剥削他们的善于经营、贪得无厌的商人和高利贷者所进行的贸易往来中必然要产生的。本书第三章曾列举过很多“侵占和诈欺”的实例。俄国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对图瓦的政治压迫只能进一步促使商业资本加强其对直接生产者的压榨。

图瓦对内和对外的贸易结构是非常简单的。商人在俄国购买能畅销于图瓦市场上的工业和手工业产品。在这些俄国商品同图瓦产品交换（交换的途径和方法前面已有详细描述）后，商业资本家（百分之百是俄国人）就占有了牲畜、毛皮、畜毛、皮革等等，然后又把这些东西输出图瓦，在俄国市场上销售。

图瓦对内对外贸易的结构很单纯，使我们不仅能把往俄国去和从俄国来的两条货流以货币为单位加以比较，而且能通过进行这种比较得出结论来说明俄国和图瓦之间所确定的交换比例。本章的任务就是具体说明宗主国和殖民地之间的不等价交换问题和在材料允许的范围内确定不等价交换的差额以及弄清究竟是哪个社会集团通过交换攫取了大量利润。

在开始阐明上述问题之前，必须首先指出能说明俄国和图瓦之间商品流转额的材料是很不充足的。对过境商品进行不间断统计的只有一个地方，那就是设在叶尼塞河的乌斯河口的检疫站。但是商品的输出和输入不仅通过叶尼塞河一条道路，而且也通过由图瓦到俄国去的各条小路（阿梅耳小路、阿巴根小路、贝宾小路），这些地方没有作过任何统计。

1915年,“乌梁海事务专员”公署曾向乌梁海边区和乌斯边区境内的俄国商人发调查表,调查贸易规模。但把表填好寄回的商人只占总数的四分之三。商人由于调查的问题与自己有利害关系,所以往往不提供正确的情况,隐瞒真实的贸易额,等等。对商人提供的材料进行分析的结果,发现材料与实际情况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例如,根据这些材料把输出和输入加以比较时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即输入图瓦的商品额超过输出图瓦的商品额。如果俄国商人把积累留在图瓦的话,这个结论是对的。但是,俄国和图瓦贸易的真实历史,却是在贸易幌子掩饰下的典型的殖民地掠夺的历史。另一方面,贸易利润通常都是以图瓦产品的形式输出图瓦,然后在俄国国内市场上出卖,变成货币。

农学家图尔恰尼诺夫当年曾对得到的材料进行过核对,他从一开始就对输出和输入的“统计”抱有理所当然的怀疑态度。但由于缺乏其它更可靠的材料,所以他用补充查询以及跟其它来源的资料进行比较等办法,对每一项数字都做了复杂的核对工作。他通过对查询结果和检疫站四年(1911—1915年)的报告进行相当细致的研究,得出了图瓦与俄国之间的贸易额,这些数字比较接近实际情况。

根据这些资料,1915年入口总额由下列各项具体数字组成。¹

1914—1915年俄国向乌梁海输入的情况如下:

布匹	133,821 卢布
茶叶	105,942 卢布
粮食(面、米等)	73,958 卢布
烟草	28,324 卢布
皮革制品	18,802 卢布
小商品和杂货	23,078 卢布

¹ 下表与图尔恰尼诺夫的表稍有不同,因为他的计算有些错误。此外,我还从表中删去了往乌斯边区的所有输入额,总共十五万一千卢布。

糖	20,000 卢布
铁、铜制品	10,262 卢布
器皿	6,184 卢布
火药	4,000 卢布
火柴	3,900 卢布
缝纫机	3,822 卢布
煤油	3,000 卢布
铅	3,000 卢布
食品杂货	1,000 卢布
锡	15 卢布
盐	1,740 卢布
农具(分离器 and 犁)	3,900 卢布
纸币	141,110 卢布

共计——585,858 卢布

表中首先引起人们注意的是进口总额,相对来说是不大的,总共不到六十万卢布。这是在 1911 年驱逐中国商人之后俄国贸易绝对垄断图瓦市场的时候,是在新的俄国农业移民涌入乌梁海边区对俄国产品提出更多需要之后。图瓦与俄国、中国进行了数十年贸易之后,市场容量竟如此之小,这只能用土著居民生产力极度衰退来解释,而这种衰退在很大程度上又是由这种贸易本身所引起的。图瓦居民贫困到如此程度,以致他们对俄国商品的购买力无法提高了。

仔细观察上列图表就可以发现,俄国商品输入较多的只有一
189 种,那就是纺织品。象糖、煤油、缝纫机等其它工业品进口数量微不足道,其中有些是图瓦毗邻的西伯利亚各地小手工业者制造的产品(如铁器和皮革制品等)。进口的内容表明,俄国工业资本除了供应极小一部分纺织工业外,在和图瓦进行的贸易中几乎毫无作为。另一方面,因为大量商品是小手工业者或农民生产出来,然后被俄国商业资本集中起来的。所以,俄国商业资本的利益在商品流转中起了主要作用。如果我们注意一下图瓦出口的内容和规

模,这点就更加清楚了。

1914—1915 年乌梁海向俄国输出的情况如下:¹

毛皮	355,533 卢布
鹿角	119,510 卢布
羊角	3,182 卢布
牲畜: 马	15,000 卢布
骆驼	350 卢布
牛	669,500 卢布
羊	69,632 卢布
畜产品	263,180 卢布
鱼	19,620 卢布
浆果	3,150 卢布
禽类	40,000 卢布
岩盐	2,000 卢布
黄金	116,009 卢布
纸币	35,746 卢布

共计——1,712,412 卢布

如果把出口数字和前表中的进口数字加以比较,我们就可以看到,出口数字要比进口数字多两倍(即多一百一十二万六千五百五十四卢布)。如果从出口总数中扣除运走的黄金价值(因为黄金不是通过与土著居民交换所得),商品运回俄国的运费以及在图瓦转化为资本的那部分商业利润,其余的金额几乎全是被俄国商人所攫取的纯商业利润,这里面不包括商业资本家从俄国小生产者(手工业者和农民)那里榨取来的商业利润,这些利润包括在向乌梁海输入的总额里。在输出的物品中,几乎完全没有大工业需要的原料。牲畜和畜产品完全销售在附近的西伯利亚地区,毛皮经过一定加工(主要是手工业加工)后便运往俄国内地或是国外,

¹ 下列表格中的输出额也许有些扩大,因为其中显然包括从乌斯边区的输出额。如果我的判断是正确的话(这个问题未能完全弄清),那么从乌斯边区输出的是鹿角、毛皮等,所占比重不大,因此不能改变总的情况和各批商品之间的比例。

190 鹿角则全部运往中国。这样，输出构成比输入构成在更大程度上说明了商业资本的利润在俄国与图瓦的相互贸易中所占的统治地位。

收益绝大部分为少数大商人（萨菲亚诺夫、比亚科夫等）所囊括，其余部分则落在从俄国涌来的小收购商手里。

如上所述，全部商业利润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侵占和诈欺”的结果。马克思说，侵占和诈欺在经济不发达的国家里是商业利润的基本来源^①。俄国商业攫取巨额利润（数额几乎等于出口额超过进口额的数字）的同时，也缩小了图瓦市场对工业产品的相应购买力。

受到商人掠夺的图瓦猎人和牧民对花布、小五金等货物的消耗量降低了二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商业资本的赢利就是工业资本的损失。由于难于置信的商业利润，据极为概略的计算，每年起码少运一百万卢布的商品到图瓦来，如果再注意到图瓦产品的价格只是其实际价值的一半的话，那么这个数字便要增大一倍。

通过输出与输入相比较所得出的另一个结论就是：实物交换比货币交换占优势。事实上，从以上所引的材料中可以看出，输入图瓦的货币（钞票）是十四万一千一百一十卢布，而由图瓦输出的货币则为三万五千七百四十六卢布。由此可见，当年共有十万零五千三百四十六卢布^②参加周转，仅占商品周转额（输入+输出）的百分之五。¹还应该注意到，商品流通的速度是非常缓慢的，因此输入乌梁海地区的纸币只能使比较少的一部分商品得到了周转，其余的贸易是以商品换商品的方式完成的。

① 非直接引语，按词面翻译。——译者

② 应为十万零五千三百六十四卢布，疑计算错误。——译者

1 实际上加入商品周转的货币多于上指数字，因为加入商品周转的还有以前输入的货币中未成为积累手段的那些货币，但是由于缺少前几年输入输出方面的资料，我不能把计算数字搞得更准确，这些数字当然只是非常粗略的计算。

各地区在输入和输出总额中所占百分比如下：

	%
托锦·····	3.5
乌鲁木齐·····	53.6
克木奇克·····	32.0
哈克木·····	3.3
乌尤克和图兰·····	4.3
麦日格伊草原·····	3.3

图瓦畜牧业的中心克木奇克地区和乌鲁木齐地区占全国商业周转量的百分之八十五点六。这种情况再次证明，图瓦的畜牧业是充当商业资本攫取剩余产品的主要基础的一个国民经济部门。狩猎业在这个过程中所起的是补充性的次要来源的作用。

为了能对俄国商业资本在图瓦长期活动的经济结果作出评价，看看俄国商业资本的活动逐渐往哪个方向演变不是没有意义的。我们可以把上述材料同阿弗里卡诺夫在《乌梁海地区的俄国商业》¹一文中所引用的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的同类资料加以比较。阿弗里卡诺夫当乌斯边务官多年，他因此有机会对俄国在图瓦的贸易进行观察和统计。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国贸易因被禁止尚未进入图瓦的时期，在1914—1915年间中国贸易因1911年被消灭也不复存在于图瓦了。所以，在我所比较的这两个时期内，俄国的贸易都处在事实上的垄断地位。阿弗里卡诺夫所引用的资料稍经修改以后提供了以下贸易往来情况：

由俄国向乌梁海输入的情况

1878年·····	40,310 卢布
1879年·····	32,782 卢布
1880年·····	49,310 卢布
1881年·····	41,202 卢布

1 阿弗里卡诺夫：《乌梁海地区的俄国商业》，载《俄国地理学会东西伯利亚分会通报》，第21卷，第5期，伊尔库次克，1890年版。

1882 年	——
1883 年	——
1884 年	56,567 卢布
1885 年	91,927 卢布
1886 年	57,667 卢布
1887 年	82,625 卢布
1888 年	93,001 卢布

十年内(1878—1888年)俄国的输入增长了一倍多。1914—1915年输入额达到了五十八万五千八百五十八卢布,也就是说在二十五年之内就增长了五倍,而且还在按前一时期的速度向上增长。但是,如果从只对图瓦土著居民的商品输入来看,那么这一时期内商品输入的增长速度可能甚至减慢了。

第一,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资料未指出纸币输入情况,而1914—1915年的资料中却包括了输入纸币的金额。此外,后一时期的商品输入颇大一部分是供应移居图瓦的、人数剧增而且人数相当多的俄国农民的需要。这种情况在输入商品品种的变化中是极容易看出来的,在输入商品中出现了糖、煤油、农业工具等土著居民几乎不购买的商品。

但是在过去的三十年内,俄国资本在攫取和占有利润的方式上取得了毫无疑问的“成功”。

按阿弗里卡诺夫的资料,1886年换出的商品总值为五万七千六百六十七卢布,换回了下列商品:

牛羊	69,078 卢布
毛皮及杂货	10,392 卢布
盐	1,740 卢布

总计金额 81,210 卢布¹

192 不能否认,以上的统计是假定性的,因为如上所述,这里所根据的材料虽经图尔恰尼诺夫修改,但仍是极不可靠的。但同时也

1 阿弗里卡诺夫:《乌梁海地区的俄国商业》,第23页。

不能否认,这些统计数字虽具有假定性,但多少能说明俄国和图瓦之间不等价交换的程度,并能明确地表明,是哪个社会集团攫取了图瓦猎人和牧民毫无报酬地提供的产品的绝大部分。这个社会集团就是商人,他们一身而二任:既是商业资本家,又是高利贷资本家。

但是,社会生产的任何过程同时都是再生产的过程。土著居民如能将其当年生产的一部分产品变换成生产资料,以更替当年生产中耗损的生产资料,那么即使谈不到扩大再生产,也能将再生产维持在原来的水平上。这样的更替在再生产的过程中曾经有过吗?从来没有过!图瓦居民所付出的劳动的数量和产品的价值总是比他们所得到的东西要多几倍。可是生产资料却不断地由图瓦人手里转移到商人手里去。商品流转使牧民的基本财富年年都要减少,这些财富都集中到商人手中去了。无论是牧民手中尚存的全部物质生产资料(牲畜),或是牧民通过交换所得的全部产品(个人消费品),都不可能使牧民把生产资料保持在原来的水平上,因此即使使其经济实现简单再生产也办不到。图瓦的牧民和猎人作为一定数量的生产资料所有者参加再生产过程,而每当这一过程完结时,他们都要遭受新的亏损;这种反复的过程要一直继续到他们的畜群完全变成他人的畜群时为止。

这样,生产过程本身就使劳动力同生产资料分离开来。接着而来的问题就是:被剥夺得一无所有的贫苦人能否为自己的劳动力找到出路?这个问题取决于商业资本以牲畜、畜毛、毛皮等实物形式所攫取的贸易利润进一步怎样使用和流向哪里。以生产者同个人所有的生产资料相结合为基础的社会关系受到破坏以后,在再生产的过程中是否被新的社会关系,即以劳动力同别人的生产资料相结合为基础的社会关系所代替了呢?商业资本家所攫取的物资有多少留在图瓦用于生产的需要,又有多少输出了图瓦——

这个问题根据现有的材料是不可能得到说明的。但毋庸置疑，绝大部分利润是被输出图瓦了，只有较少一部分留在图瓦积累起来，建立了一些个别的大的“文明”产业。

193 同积累问题密切相关的是革命前夜图瓦发展道路的问题，首先是下面这个根本问题：在上述条件下是否发生过封建主义生产方式的解体现象以及这个解体过程是采取什么形式进行的？在这种条件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否为自己开辟过道路？

高利贷资本在完全确定的历史条件下，在某种意义上起着积极的作用，因为它破坏和消灭着传统的所有制形式，在这里它破坏着封建主义的所有制形式。“在亚洲的各种形式下，高利贷能够长期延续，这除了造成经济的衰落和政治的腐败以外，没有造成别的结果。只有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其他条件已经具备的地方和时候，高利贷才表现为形成新生产方式的一种手段；这一方面是由于封建主和小生产遭到毁灭，另一方面是由于劳动条件集中为资本。”¹

使高利贷资本能够引起生产方式发生变革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这些“其他条件”，在革命前的图瓦是否存在呢？

在图瓦，高利贷资本是不能同商业资本分开的。高利贷资本虽是从牧民手里榨取原料的最有力量的手段，但不是独立的，而是从属于商业资本的，商业资本的利益占优势。

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解体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的途径问题只能这样提出：商业资本本身作为贸易媒介并在高利贷的协助下是否创造了封建主义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可能性？

众所周知，马克思把实现这种过渡的途径分为三种：“**第一**，是商人直接成为工业家……。**第二**，是商人把小老板变成自己的中

1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3卷，第675页。

间人，或者也直接向独立生产者购买；他在名义上使这种生产者独立，并且使他的生产方式保持不变。第三，是产业家（即生产者——卡鲍）成为商人，并直接为商业进行大规模生产。”¹

后一种过渡形式，即生产者变为商人和资本家，“这是真正革命化的道路。”²但是，这条途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是不存在的，因为革命前在图瓦的具体历史环境里，未能形成在自己手里集中大量生产资料的图瓦资产阶级，积累货币资本的可能性就更小。

第二种过渡形式，即商人直接支配生产和小生产者，在图瓦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就它本身来说，它并没有引起旧生产方式的变革，而不如说保存了这种生产方式，把它当作自己的前提予以维持。……它（即这种关系——卡鲍）不变革生产方式，只是使直接生产者的状况恶化，把他们变成单纯的雇佣工人和无产者，使他们所处的条件比那些直接受资本支配的人所处的条件还要坏，并且在旧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占有他们的剩余劳动。”³

图瓦有过一种独特的、与畜牧业条件相适应的“家庭大生产制度”。在这种制度下已卖给商人或通过其他方式归于别人的牲畜继续在小生产者看管下放牧。这种形式一方面使前资本主义关系保存下来，另一方面使牧民的状况不断恶化，并不意味着生产方式的变革。

但是，革命前的图瓦也存在过第一种过渡形式，即商人变为产业家。这种新的进步的资本主义生产形式，正如我在本书第三章中所指出的那样，是在革命前的最后几年在俄国商业资本家行列改组（这种改组主要是由当时顺利掌握了图瓦市场的中国资本的

1 马克思：《资本论》，人民出版社，中文版，第3卷，第375页。

2 同上，第373页。

3 同上，第374页。

竞争所引起的)的影响下产生的。

那些最大的俄国商业资本家手里集中了大群牛羊和马匹，并通过送礼、行贿和圈图瓦牧场等方法取得了大量地产。集中在他们手中的大畜牧经济(不只是占有牲畜)，由于采用了雇佣劳动、改进了技术和对畜产品进行加工而具有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特点。

但是，这些新的关系在残酷压迫、专横和居民贫困化的情况下，发展极为缓慢，碰到了种种障碍，往往还引起倒退。

这种新的趋势之所以未能成为发展的主流，主要是因为内部积累数额不多，未能发展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打下基础。

实际上，如果用 $M-T-M'$ 这个公式来表述商业资本的运动的话，那么这个运动的第一步就是把 M 变成 T ，即把货币变换成俄国商品，第二步是把 T 变成 M' ，即把图瓦商品变换成货币。这两步基本上是在俄国进行的。只是中间一步，即用俄国商品交换图瓦商品，是在图瓦进行的，而且在进行这一步骤时，货币与其说是实际参加了的话，还不如说是作为衡量价值的理想尺度参加的。

195 商人为了使自己所获的利润变成现钱，即把利润变换成货币，便将在图瓦换得的产品运到俄国市场。商业资本在俄国为图瓦市场购买商品以开始新的运动周期时，便不加改变地再现久已形成的输出构成。

自然，时间使这个构成逐渐发生某些变化。这些变化基本上是由下列两种情况决定的：第一种情况是移居图瓦的俄国农民需要新的个人消费品(粮、煤油等)和新的生产资料(农具、分离器等)；第二种情况是大商业资本家兴建生产事业(但没有超出个别试验的范围)。不过这些新现象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的良好条件：农民种田之所以没有得到发展是由于和谷物销售市场完全隔绝，因为谷物销售市场远在西伯利亚之外；商人的大畜牧业之所以没有得到发展，部分原因也是由于同市场隔绝，但主要是因为商业资

本家充当为流通过程服务的中介人比从事组织生产这一冒风险而又极麻烦的事业能长期有保证地获得更稳定、更高额的利润。

作为沙皇俄国殖民地的图瓦，其全部历史条件注定了它要遭受商业高利贷资本的寄生虫式的剥削，商业高利贷资本使土著居民内部的封建主义生产组织适应自己的需要。饱受经济剥削和政治奴役的图瓦人民，由于失去自己的牧场、森林和耕地，其苦难必将更加深重，并且面临着被外来的殖民主义者赶到寸草不生的深山狭谷中去的悲惨命运。

只有全部历史发展进程所准备好了的民族解放革命能够停止经济衰退、社会腐败和帝国主义奴役的过程。作为十月革命在殖民地国家所引起的强大革命运动的一部分，图瓦资产阶级民主民族解放革命，由于同胜利了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有密切联系，而给这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开辟了新的道路和无限广阔的发展前途。

参 考 书 目

一、俄语著作

1. Адрианов А. В. —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на Алтай и за Саяны, совершенное в 1811 г. по поручению И. Р. Г. О. «Зап. И. Р. Г. О. по общей географии», т. XI, II, 1888.
阿德里安诺夫:《到阿尔泰和越过萨彦岭的旅行(受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委托于1881年完成)》,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普通地理学论丛》,第11卷,1888年2月版。
2. Адрианов Н. В. — Очерки Минусинского края, Томск, 1904.
阿德里安诺夫:《米努辛斯克边区概况》,托木斯克,1904年版。
3. Андреевич В. К. — Сибирь в XIX столетии, ч. II.
安德列耶维奇:《十九世纪的西伯利亚》,第2卷。
4. Африканов А. М. — Русская торговля в Урянхайской земле. Урянхайская земля и ее обитатели. «Изв. В. Сиб. отд. Р. Г. О.», т. XXI, №. 5, Иркутск, 1890.
阿弗里卡诺夫:《乌梁海地区的俄国商业·乌梁海地区及其居民》,载《俄国地理学会东西伯利亚分会通报》,第21卷,第5期,伊尔库次克,1890年版。
5. Его же—Урянхайская земля и ее обитатели. «Изв. Сиб. отд. И. Р. Г. О.», т. XXI, №. 5, Иркутск, 1890.
同上:《乌梁海地区及其居民》,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东西伯利亚分会通报》,第21卷,第5期,伊尔库次克,1890年版。
6. «Азиатская Россия», т. II, «Земля и хозяйство» (О принадлежности Урянхия России), II., 1914.
《俄国的亚洲部分》,第2卷,《土地与经济》(关于乌梁海归属俄国问题),彼得堡,1914年版。
7. Аргунов П. А. — Очерки с. х. Минусинского края, Казань,

1892.

阿尔古诺夫:《米努辛斯克边区农业概况》,喀山,1892年版。

8. Арсеньев Ю. В. — Путешествие через Сибирь от Тобольска до Нерчинска и границ Китая посланника Н. Спафария в 1675 г. «Записки И. Р. Г. О. по отд. этнографии», т. X, вып. I, 1882.
阿尔谢尼耶夫:《斯帕法利公使 1675 年从托博尔斯克出发穿过西伯利亚到涅尔琴斯克(尼布楚)和中国边境的旅行》,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民族志学论丛》,第 10 卷,第 1 册,1882 年版。
9. Берлин Л. и Шморгонер Д. — Тувин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Мал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т. VIII.
柏林与什莫尔戈涅尔:《图瓦人民共和国》,载《苏联小百科全书》,第 8 卷。
10. Булгаков А. И. — Верховья р. Енисея в Урянхэе и Саянских горах. «Изв. Р. Г. О.», 44, П., 1908.
布尔加科夫:《乌梁海和萨彦岭山中的叶尼塞河上游地区》,载《俄国地理学会通报》,第 44 期,彼得堡,1908 年版。
11. Бобырь Н. П. — Список высот. определенных Во время Саян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1887 г. «Зап. В. Топ. Отд. Гл. Шт.», XLIV, отд. 2, VIII, 1889.
鲍贝里:《1887 年萨彦岭考察期间所确定的高地一览表》,载《总参谋部军事地形学论丛》,第 44 期,第二分册,1889 年 8 月版。
12. Боголепов М. И. и Соболев М. Н. — Очерки русско-монгольской торговли, «Труды Томского общ. изуч. Сиб.», т. I, Томск, 1911.
鲍戈列波夫和索波列夫:《俄蒙贸易概况》,载《托木斯克西伯利亚研究会丛书》,第 1 卷,托木斯克,1911 年版。
13. Баландин — Пути сообщения к Танну-Тувин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е и Монголии, «Плановое хозяйство», 1927, №. 5.
巴兰金:《通往唐努图瓦共和国和蒙古的道路》,载《计划经济》,1927 年,第 5 期。
14. Баранов — Урянхайский вопрос.
巴拉诺夫:《乌梁海问题》。
15. Беннигсен — Несколько данных о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Монголии.

1912.

宾尼格先:《关于当代蒙古的若干资料》,1912年版。

16. Боголюбский И. С. —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древностей Минусинского округа и верховьев р. Енисея в 1882 г. «Изв. В. Сиб. О. Р. Г.», XIV, №. 3, Иркутск, 1883.
鲍戈柳布斯基:《1882年对米努辛斯克州和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古迹考察报告》,载《俄国地理学会东西伯利亚分会通报》,第14卷,第3期,伊尔库次克,1883年版。
17. В. Е. — Немного географии,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Тува», 1929 г., №. 1. Кызыл-Хото.
В. Е. «地理浅谈》,载《当代图瓦》,1929年,第1期,克兹尔版。
18. В. Г. — Золотое дно (Урянхайский край). «Золото и платина», 1915. №. 21—22, П.
В. Г. «宝地(乌梁海边区)》,载《金与铂》,1915年,第21—22期,彼得堡版。
19. Ватин В. А. — Сойоты в начале 40-х годов прошлого века (выдержки из трудов Чихачева, посетившего в 1842 г. кочевье на р. Алаш).
瓦京:《上世纪40年代初期的索约特人》(1842年访问过阿拉什河游牧区的奇哈切夫著作摘录)。
20. Его же — Новая книга об Усинском крае Ф. Кона. «Усинский край».
同上:《科恩关于乌斯边区的新著》,载《乌斯边区》。
21. Его же — Урянха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в 80-х годах прошлого века. «Сибирский студент», 1915, №. 7—8.
同上:《上世纪80年代的乌梁海问题》,载《西伯利亚大学生》,1915年,第7—8期。
22. Его же — Минусинский край в XVIII в. Этюд по истории Сибири. Минусинск, 1913.
同上:《18世纪的米努辛斯克边区。西伯利亚史研究》,米努辛斯克,1913年版。
23. Веселков Н. Ф. — Урянхи и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сведения о южной границе Минусинского округа. «Изв. И. Р. Г. О.», 1871, VII.

- 维谢尔科夫:《乌梁海人与米努辛斯克州南部边界的地理情况》,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通报》,1871年,第7卷。
24. Его же — Поездка в землю Урянхов. Отчет И. Р. Г. О., II. 1872.
同上:《乌梁海地区之行》,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报告》,1872年2月。
25. Васильев — Урянхайский пограничный вопрос. «Журн. мин. народн. просвщ.», 1912, XXXVIII, №. 4.
瓦西里耶夫:《乌梁海边界问题》,载《国民教育部议事录》,1912年,XXXVIII, №. 4.
26. Грум-Гржимайло Г. Е. — Западная Монголия и Урянхайский край, т. I, Описание природы этих стран. П., 1914.
格鲁姆-格尔日麦洛:《西蒙古与乌梁海地区》,第1卷,《这两个国家的自然界描述》,彼得堡,1914年版。
27. Его же — т. II.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этих стран в связи с историей Ср. Азии. Л., 1926.
同上,第2卷,《与中亚史相联系的这两个国家历史概述》,列宁格勒,1926年版。
28. Его же — т. III, вып. I и II. Антропологический и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этих стран. Л., 1926 и 1930.
同上,第3卷,第1,2分册,《关于这两个国家的人类学和民族志学概述》,列宁格勒,1926年和1930年版。
29. Глебович, инж. — Усинский колесный путь. «Труды совещ. 1905 г. в г. Иркутске о путях сообщения Сибири», т. II, Иркутск, 1908.
格列鲍维奇工程师:《乌斯地区的马车道》,载《1905年伊尔库次克市举行的西伯利亚交通会议文件汇编》,第2卷,伊尔库次克,1908年版。
30. Горощенко К. — Сойоты. «Русский антрополог. журнал», 1901, №. 2.
戈罗辛科:《索约特人》,载《俄国人类学杂志》,1901年,第2期。
31. Его же —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Сибири. «Записки Красноярск. п/о. В. Сиб. О. Р. Г. О. по антропологии», т. I, вып. I, Красноярск, 1904.
同上:《西伯利亚人类学资料》,载《俄国地理学会东西伯利亚分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支会人类学论丛》,第1卷,第1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 1904 年版。
32. Дорогостайский В. — Поездка в сев.-зап. Монголию. «Изв. Р. Г. О.», 1908, вып. V.
多罗戈斯泰斯基:《西北蒙古旅行记》,载《俄国地理学会通报》,1908年,第5册。
 33. Десятилетие Тувы и Монголии. «Революц. Восток». 1931, №. 11—12.
《图瓦与蒙古的十年》,载《革命的东方》,1931年,第11—12期。
 34. Де-Рубрук В. —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восточные страны. Изд. Суворина, П., 1911.
德·鲁布鲁克:《东方国家旅行记》,苏沃棱出版社,彼得堡,1911年版。
 35. Ермолаев А. П. — 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об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х в Урянхайском крае в 1915—1918 гг. «Сибирские записки», 1919, №. 4—5. Красноярск.
叶尔莫拉耶夫:《1915—1918年乌梁海边区考察工作简述》,载《西伯利亚论丛》,1919年,第4—5期,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36. Его же — Урянхайский край, Минусинск, 1918.
同上:《乌梁海边区》,米努辛斯克,1918年版。
 37. Его же — Тожа. «Изв. Красноярск. отд. Р. Г. О.» т. III, вып. I, 1924.
同上:《托锦》,载《俄国地理学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分会通报》,第3卷,第1册,1924年版。
 38. Ермолаев В. П. — К истории тувинской торговли. «соврем. Тува», 1929, №. 1, Кызыл-Хото.
叶尔莫拉耶夫:《关于图瓦贸易史》,载《现代图瓦》,1929年,第1期,克孜尔市出版。
 39. Зайцева — Петр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материал, собранный П. Н. Крыловым в 1892 г. на Саянах и Урянхайской земле. «Зап. Р. Г. О. по общей географии», т. XXXIV. №. 2, П., 1901.
扎伊采娃:《克雷洛夫1892年在萨彦岭和乌梁海地区搜集的岩石学材料》,载《俄国地理学会普通地理学论丛》,第34卷,第2期,彼得堡,1901年版。
 40. Иваницкий К. И. — Медные руды в Урянхае. Ест. — производ. силы России, т. IV. Полезные ископаемые, вып. VII.

Медь, П., 1917.

伊瓦尼茨基:《乌梁海的铜矿》,载《俄国自然生产力》,第4卷《矿藏》,第7册《铜》,彼得堡,1917年版。

41. Ивакин А. — Каталог астрономических пунктов в Азиатск. России и сопредельных с нею государств, вып. I, III. Сибирь, П., 1913.

伊瓦金:《俄国亚洲部分及其毗邻各国的天文点一览表》,第1,3册《西伯利亚》,彼得堡,1913年版。

42. Кабо Р. М. — Обществен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строй до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Тувы.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Восток», 1931 г., №. 11—12. 卡鲍:《革命前图瓦的社会经济结构》,载《革命的东方》,1931年,第11—12期。

43. Клеменц Д. А. — Новый путь из Минусинского края на Бирюсинские золотые промыслы. С примеч. Н. Бобыря. «Изв. В. Сиб. О. Р. Г. О.», 21, вып. I, Иркутск, 1890.

克利麦涅茨:《米努辛斯克边区通往比留萨金矿的一条新路。鲍贝里注释》,载《俄国地理学会东西伯利亚分会通报》,第21期,第1册,伊尔库次克,1890年版。

44. Крылов П. — Путевые заметки об Урянхайской земле. «Зап. Р. Г. О. по общей геогр.», т. 34, №. 2, П., 1903.

克雷洛夫:《乌梁海地区旅途札记》,载《俄国地理学会普通地理学论丛》,第34卷,第2册,彼得堡,1903年版。

45. Его же —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Урянхайскую землю. «Изв. Р. Г. О.», т. XXIX, П., 1893.

同上:《乌梁海地区之行》,载《俄国地理学会通报》,第29卷,彼得堡,1893年版。

46. Каиский М. — Урянхайский вопрос. «Сев. Азия», 1926, №. 4.

凯斯基:《乌梁海问题》,载《北亚》,1926年,第4期。

47. Калинников — Танну-Тувин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Энциклопед. словарь Граната, т. 48.

卡林尼科夫:《唐努图瓦人民共和国》,载《格拉纳特百科辞典》,第48卷。

48. Кулагин Н. А. — Русский пушной промысел, изд. Сабашни-

КОВЫХ, 1920.

库拉金:《俄国的毛皮狩猎业》,萨巴什尼科夫出版社,1920年版。

49. Кон Ф. Я. — Усинский край. «Зап. Краснояр. подгъотд. В. Сиб. отд. И. Р. Г. О. по общей географ.», П., 1914., вып. I. 科恩:《乌斯边区》,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东西伯利亚分会克拉斯诺阿尔斯克支会普通地理学论丛》,彼得堡,1914年版,第1册。

50. Его же —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й отчет по экспедиции в Урянхайскую землю. «Изв. В. Сиб. отд. И. Р. Г. О.», 1903, XXXIV, №. 1.

同上:《乌梁海地区考察工作的初步报告》,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东西伯利亚分会通报》,1903年,第34卷,第1期。

51. Катанов Н. О. — Опыт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урянхайского языка. «Ученые записки Имп. казанск. унив., 1899—1903».

卡塔诺夫:《乌梁海语言初探》,载《帝国喀山大学学术论丛,1899—1903》。

52. Его же — Письма Катанова из Сибири и Восточного Туркестана. Приложение к LXXIII тому «Записок Имп.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П., 1893, №. 8 (Письма №. 4, 5, 8, 9, 11—17).

同上:《卡塔诺夫的西伯利亚和东土耳其斯坦通讯》,载《皇家科学院院刊》,第73卷附录,彼得堡,1893年版,№. 8 (书信 №. 4, 5, 8, 9, 11—17)。

53. Его же — Предания присаянских племен о прежних делах и людях. «Зап. Р. Г. О.», т. XXXIV, П., 1909.

同上:《萨彦岭附近部落关于往昔的事件与人物的传说》,载《俄国地理学会会刊》,第34卷,彼得堡,1909年版。

54. Его же — Среди тюркских племен. «Изв. Р. Г. О.», т. XXIX, П., 1893.

同上:《在突厥族部落中间》,载《俄国地理学会通报》,第29卷,彼得堡,1893年版。

55. «Красный архив», т. XVIII. Доклад Сазонова об урянхайском вопросе, стр. 96—97.

《红档》,第18卷,《萨佐诺夫关于乌梁海问题的报告》,第96—97页。

56. Котвич Вл. — Краткий обзор истори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политич. положение Монголии, П., 1914 г. (Администрат. устрой-

ство Урянхайского края).

科特维奇:《蒙古的历史概述与当前的政治形势》,彼得堡,1914年版(《乌梁海边区的行政机构》)。

57. Кастрен —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Минусинском округе до китайской границы. «Магазин землед. и путеш.», 1860, т. VI, ч. 2-я.

卡斯特连:《在米努辛斯克州到中国边境的旅行记》,载《农业与旅行杂志》,1860年,第6卷,第2部。

58. Комаров В. А. — Поездка в Тункинский край и на оз. Косогол в 1902 г. «Изв. Р. Г. О.», вып. I, 1905.

科马罗夫:《1902年桐金边区与库苏泊之行》,载《俄国地理学会通报》,第1册,1905年版。

59. Каррутерс Д. — Неведомая Монголия. том. I. Урянхайский край. Перев. с англ. Н. В. Турчанинова, П., 1914.

卡卢泽斯:《人所未知的蒙古》,第1卷《乌梁海边区》,图尔恰尼诺夫译自英文本,彼得堡,1914年版。

60. Кузнецов (Красноярский И. П.) — Из истории южных частей Енисейской губ., Томск, 1908.

库兹涅佐夫(克拉斯诺亚尔斯基):《叶尼塞省南部地区史漫谈》,托木斯克,1908年版。

61. Козьмин Н. Хакасы. Ист. этнограф. и хоз. очерк Минусинского края, Иркутск, 1925.

科兹明:《哈卡斯人。米努辛斯克边区历史民族志与经济概况》,伊尔库次克,1925年版。

62. Линцетти П. И. — Торговый оборот Т. Н. Р. в СССР. «Соврем. Тува», 1929, №. 1, Кызыл-Хото.

林采季:《图瓦人民共和国在苏联的贸易周转》,载《现代图瓦》,1929年,第1期,克孜尔版。

63. Львов — Современный Урянхай. «Новый Восток», №. 6, 1924.

利沃夫:《现代乌梁海》,载《新东方》,1924年,第6期。

64. Леонов Н. П. — Урянхайский край до начала XX ст. «Новый Восток», №. 3, 1923.

列昂诺夫:《二十世纪以前的乌梁海边区》,载《新东方》,1923年,第3

期。

65. Его же — Разведки на золото в Усинско-Урянх. крае, М. 1912.
同上:《乌斯-乌梁海地区金矿勘探工作》,莫斯科,1912年版。
66. Его же — Танну-Тува (Страна Голубой реки) Изд. Общ. «Сев Азия», М., 1927.
同上:《唐努图瓦(蓝河之国)》,“北亚”学会,莫斯科,1927年版。
67. Латкин—Саянский горный хребет. Энциклоп. словарь Брокг. и Ефрон, т. XXIX.
拉特金:《萨彦岭山脉》,载《勃罗克高兹和叶夫仑百科全书》,第29卷。
68. Липовец С. — Уложе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палаты внешн. сношений Перев. с манчжурского, П., 1828.
利波维茨:《中国理藩院则例(译自满文)》,彼得堡,1828年版。
69. Матусевский З. Л. — Топ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заметки о дороге, ведущей из г. Кобдо в г. Улясутай и оттуда на сев. в Минусинск. край. «Очерки сев.-зап. Монголии». Г. Н. Потанина, вып. I, П., 1881.
马图谢夫斯基:《从科布多市到乌里雅苏台、再往北到米努辛斯克边区沿途地形札记》,载波塔宁:《西北蒙古概况》,第1册,彼得堡,1881年版。
70. Его же —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Кита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П., 1888.
同上:《中华帝国地理概况》,彼得堡,1888年版。
71. Михеев В. С. — Отчет о поездке в сев.-зап. Монголию и Урянхайскую землю. Изд. Ген. шт., П., 1910.
米赫耶夫:《西北蒙古与乌梁海地区之行报告》,参谋总部,彼得堡,1910年版。
72. Минцлова К. Д. — Далекий край.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о Урянх. земле. Изд. «Библиотека восходов», П., № 3.
明茨洛娃:《遥远的地方。乌梁海地区游记》,“萌芽丛书”出版社,彼得堡,第3期。
73. Минцлов С. Р. — Секретное поручение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Урянхай), «Сибирское книго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Рига.
明茨洛夫:《秘密使命(乌梁海之行)》,“西伯利亚书籍出版社”,里加版。

74. Мальцев — Письма о сойотах. «Справочный листок Енис. губ.», 1890, №. 1 и 3.
马尔采夫:《关于索约特人的通讯》,载《叶尼塞省便览》,1890年,第1,3期。
75. Мурзаев — Краткий очерк скотоводства и ветеринар. состояния Урянх. земли. П., 1905.
穆尔扎耶夫:《乌梁海地区畜牧业与兽医防疫状况简介》,彼得堡,1905年版。
76. Материалы к отчету по обследованию бассейна р. Хемчика в стат. - эконом. отношении. — Собрания А. П. и В. П. Ермолаевыми (неопубликованы).
А. П. 和 В. П. 叶尔莫拉耶夫为克木奇克河流域考察报告所搜集的经济统计资料(未发表)。
77. «Мен-гу-ю-му-ци. Записки о монгольских кочевьях». Пер. с китайского П. С. Попова. «Записки И. Р. Г. О.», т. XXIV, П., 1895.
《蒙古游牧记》,波波夫译自中文,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会刊》,第24卷,彼得堡,1895年版。
78. Мачавариани В. и Третьяков С.—В Танну-Туву. Изд.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30.
马恰瓦里亚尼和特列季亚科夫:《唐努图瓦游记》,“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30年版。
79. Маслов П. — Конец Урянхаю. Изд.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33 г.
马斯洛夫:《乌梁海之终结》,“青年近卫军”出版社,1933年版。
80. Миллер Г. Ф. — Описание Сибирского царства.
米勒:《西伯利亚王国的描述》。
81. Нацов — Национ.-освободит. движение тувинских скотоводов. «Новый Восток», 1927, №. 19.
纳佐夫:《图瓦牧民的民族解放运动》,载《新东方》,1927年,第19期。
82. Его же — Правая опасность в тувинской народно-революц. партии. «Жизнь Бурятии», 1930, №. 1.
同上:《图瓦人民革命党内的右倾危险》,载《布里亚特生活》,1930年,第1期。

83. Нестеров П. В. — Очерки природы Саянского хребта и его предгорий.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е и география», 1910. №. 8.
涅斯捷罗夫: «萨彦岭山脉及其山前地带自然概况», 载《自然科学与地理》, 1910年, 第8期。
84. Обручов В. А. — Естественные богатства Танну-Тувин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и степень изученности последней. «Новый Восток», №. 13—14, 1926.
奥勃鲁契夫: «唐努图瓦共和国的自然资源及其研究程度», 载《新东方》, 1926年, 第13—14期。
85. Его же—Обзор путешествий Д. А. Клеменца по внутрен. Азии и географич. и геологич. результаты. «Изв. В. Сиб. О. Р. Г. О.», т. 45, 1915.
同上: «克列麦涅茨亚洲腹地游记述评与地理学、地质学成果», 载《俄国地理学会东西伯利亚分会通报》, 第45卷, 1915年版。
86. Осташкин П. — Доклад об урянхайцах и их стороне по сведениям 1883 г. у Катанова—Опыт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урянх. языка, П, стр. 1494.
奥斯塔什金: «关于乌梁海人及其地区的报告(根据1883年资料)», 载卡塔诺夫《乌梁海语言初探》, 彼得堡版, 第1494页。
87. Островских П. Е. — Значение Урянхайской земли для южной Сибири. «Изв. Р. Г. О.», т. XXXV, вып. III, 1899.
奥斯特罗夫斯基赫: «乌梁海地区对南西伯利亚的作用», 载《俄国地理学会通报》, 第35卷, 第3册, 1899年版。
88. Его же—Краткий отчет о поездках в Тожинский хошун Урянхайской земли. «Изв. Р. Г. О.», т. XXXIV, вып. IV, П., 1898.
同上: «关于乌梁海地区托锦旗之行的简要报告», 载《俄国地理学会通报》, 第34卷, 第4册, 彼得堡, 1898年版。
89. Его же—Оленные Тувинцы. «Сев. Азия», 1927, №. 5.
同上: «以养鹿为生的图瓦人», 载《北亚》, 1927年, 第5期。
90. Отчет о состоянии и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г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в 1917 г. (Рачковский и Педашенко). «Изв. Геол. Комитета», т. 37, 1918, стр. 219—226.
《关于地质委员会1917年的状况和活动的报告(拉奇科夫斯基与佩达

- 申科)»,载《地质委员会通报》,第37卷,1918年版,第219—226页。
91. Отчет о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за 1924 г. Комиссия по научным экспедициям, Л., 1925, стр. 214—217. «俄国科学院 1924 年活动报告。科学考察委员会»,列宁格勒,1925 年版,第214—217页。
92. Отчет о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Сибирского г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комитета за 1920 г. «Изв. Сиб. отд. геологии», т. II, в. VI, стр. 51—52; «Изв. Геолог. комитета», т. 40, 1921, №. 7, стр. 320—328. «西伯利亚地质委员会 1920 年活动报告»,载《西伯利亚地质学分会通报》,第2卷,第6册,第51—52页;《地质委员会通报》,第40卷,1921年,第7期,第320—328页。
93. О. Иакинф (Бичурин)—Собрание сведений о народах, обитавших в Средн. Азии и древние времена, ч. 1. 雅金甫(比丘林):《中亚古代居民资料汇编》,第1部。
94. Его же—Истор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 ойротов или калмыков с XV стол. до наст. времени (СПБ, 1834). 同上:《15世纪到现在的厄鲁特人(即卡尔梅克人)历史概况》(圣彼得堡,1834年版)。
95. Ошурков В. А. — Из странствований по земле Урянхов. Сибир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Прилож. к газ. «Восточное обозрение» за 1892 г., вып. I, Иркутск, 1898. 奥舒尔科夫:《乌梁海地区游记》,载《西伯利亚论文集》,1892年《东方评论报》附录,第1册,伊尔库次克,1898年版。
96. Его же—Отчет о поездке, совершенной летом 1902 г. в Зап. Саяны и зап. часть хр. Танну-Ола. «Зап. Краснояр. подь-отд. В. Сиб. отд. Геогр. Общ. и физ. географии», т. I, вып. I, П., 1906. 同上:《1902年西萨彦岭和唐努山西部地区之行报告》,载《东西伯利亚地理学会分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支会自然地理丛》,第1卷,第1册,彼得堡,1906年版。
97. Обращение Центрального комитета Тув. нар.-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партии «Крестьянск. интернационал», 1926, №. 1—2. «图瓦人民革命党中央委员会呼吁书》,载《农民国际》,1926年,第1—2期。

98. Палибин И. В. — Знаки Минусинского края. «Изв. В. Сиб. отд. Р. Г. О.», т. XXXI, №. 1—2, 1900.
 帕利宾:《米努斯克边区禾本科植物》,载《俄国地理学会东西伯利亚分会通报》,第31卷,第1—2期,1900年版。
99. Пестерев Е. — Примеч. о прикосновенных около китайской границы жителях как Рос. татарах, так и китайских мунгалах и сойотах с 1772 г. по 1781 г. «Нов. ежемесячные сочинения». т. XXIX, ч. 30, 31, 32, П., 1793.
 佩斯捷列夫:《1772—1781年中国边境附近俄国鞑靼人跟中国蒙古人和索约特人往来情况集解》,载《每月新文摘》,第29卷,第30,31,32册,彼得堡,1793年版。
100. П. И. — Язык урянхов. «Изв. Сиб. О. Р. Г. О.», Иркутск, 1874.
 П. И.:《乌梁海语》,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西伯利亚分会通报》,伊尔库次克,1874年版。
101. Позднеев А. М. — Монгольская летопись «Эрдин Эрихе», Материал по ист. Халхи с 1636 по 1736 г. П., 1883.
 波兹德涅耶夫:《蒙古编年史〈额尔德尼额尔罕〉》,载《1636—1736年喀尔喀史资料》,彼得堡,1883年版。
102. Его же — Монголия и монголы. Китайская и Русская торговля в Монголии (рукопись).
 同上:《蒙古与蒙古人》,载《中俄两国在蒙古的贸易》(手稿)。
103. Его же — Очерки быта буддийских монастырей. «Зап. И. Р. Г. О. по отд. этнограф.», т. XVI, П., 1887.
 同上:《佛教寺院生活习俗概述》,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民族志学论丛》,第16卷,彼得堡,1887年版。
104. Плоткин — Пути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го развития Тувы, революц. Восток», 1931, №. 11—12.
 普洛特金:《图瓦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载《革命的东方》,1931年,第11—12期。
105. Попов В. А. — Саянская горная система. «Северная Азия». 1926. стр. 58—65.
 波波夫:《萨彦岭山系》,载《北亚》,1926年版,第58—65页。
106. Его же — Через Саяны в Монголию. Омск, 1905 г.

- 同上:《越过萨彦岭去蒙古》,鄂木斯克,1905年版。
107. Его же — Урянхайский край. Изд. шт. Иркутск. воен. округа, 1913.
同上:《乌梁海边区》,伊尔库次克军区司令部,1913年版。
108. Его же — Второе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в Монголию 1910 г. ч. 3-я. Исследование границы на участке Кяхта-Алтай (урянхайский вопрос).
同上:《1910年第二次蒙古之行》,第3部《恰克图—阿尔泰之间边境考察(乌梁海问题)》。
109. Порватов В. М. — Медные руды Урянхая (отдельный оттиск).
波尔瓦托夫:《乌梁海铜矿》(单行本)。
110. Его же — Таловское месторождение золота в Усинском пограничном округе. «Горн. и золот. изв.», 1915, Томск.
同上:《乌斯边区塔洛夫金矿》,载《矿山与金矿通报》,1915年,托木斯克版。
111. Его же — Урянхайский край. «Горн. и золот. изв.». 1931, № 1, Томск.
同上:《乌梁海边区》,载《矿山与金矿通报》,1931年,第1期,托木斯克版。
112. Потанин Г. Н. — Очерки сев.-зап. Монголии. Результаты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исполненного в 1879—1880 гг. по поручению И. Р. Г. О., вып. III, П., 1888.
波塔宁:《西北蒙古概况。根据俄国皇家地理学会委托于1879—1880年考察成果》,第3册,彼得堡,1888年版。
113. Потанина А. В. — Из путешествия по Вост. Сибири, Монголии, Тибету и Китаю. 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Из странствований по Урянхайской земле).
波塔尼娜:《东西伯利亚、蒙古、西藏与中国游记》(论文集),《乌梁海地区游记》。
114. Пренн Я. — О флоре Саяна. «Изв. В. Сиб. О. Р. Г. О.», т. XIX, № 4, Иркутск, 1888.
普列英:《论萨彦岭植物群》,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东西伯利亚分会通报》,第19卷,第4期,伊尔库次克,1888年版。

115. Простосинский Б. — Проблема путей сообщения из Сибири в Зап. Монголию. «Сев. Азия», 1926, № 2.
 普罗斯托辛斯基:《从西伯利亚通往西蒙古的交通问题》,载《北亚》,1926年,第2期。
116. Пудалов — Поездка в Танну-Тувинскую республику. Доклад на засед. Ист. этнолог. отд. научн. ассоциац.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не опубликован).
 普达洛夫:《唐努图瓦共和国之行》(在东方学会历史民族志学会议上的报告,未发表)。
117. Путилов Н. — Летопись в с. Верхнеусинском с 1854 по 1884 г.
 普季洛夫:《上乌辛斯科耶村编年史(1854—1884年)》。
118. Путешествие прап. Крышина в 1858 г. «Тр. Сиб. эксп. И. Р. Г. О.», матем. отд. П., 1865.
 《克雷申准尉1858年游记》,载《俄国皇家地理学会第三次西伯利亚考察》(数学部分),彼得堡,1865年版。
119. Переселение и землеустройство за Уралом в 1915 г., изд. мин. земл., П., 1916.
 《1915年乌拉尔以远地区的移民和土地调整工作》,土地部,彼得格勒,1916年版。
120. Поликевич П. Н. — Леса Урянхая по данным обследования 1915 г., «Изв. Ср. Сиб. отд. Р. Г. О.», т. III, вып. III.
 波利克维奇:《乌梁海的森林(根据1915年考察资料)》,载《俄国地理学会中西伯利亚分会通报》,第3卷,第3册。
121. Памятники сибирской истории XVIII в., 1882.
 《18世纪西伯利亚史文物》,1882年版。
122. Райков М. И. — Отчет о поездке в верховья р. Енисея в 1897 г. «Изв. Р. Г. О.», т. XXXIV, П., 1898.
 莱科夫:《1897年叶尼塞河上游之行报告》,载《俄国地理学会通报》,第34卷,彼得堡,1898年版。
123. Риттер Карл — Землеведение Азии. Восточная Сибирь. ч. 1, Саянское нагорье. Составители Семенов П. и Черский И.
 里特尔·卡尔:《亚洲农业。东西伯利亚》,第1部《萨彦高原》(编者谢苗诺夫和切尔斯基)。

124. Его же — Землеведение Азии, т. III, П., 1860, и т. IV, Дополнение к III. Алтайско-Саянская горная система по свед. 1832—1876 гг. Состав. Семеновым П. П. и Потаниным Г. Н., П., 1877.
同上: «亚洲农业», 第3卷, 彼得堡, 1860年版和第4卷«对第3卷的补充»: «阿尔泰-萨彦岭山系(根据1832—1876年资料)» (编者谢苗诺夫和波塔宁), 彼得堡, 1877年版。
125. Родевич В. М. — Очерки Урянхайского края (Монгольского бассейна р. Енисея). Изд. Упр. внутр. водн. путей и шоссейн. дорог, П., 1910.
罗杰维奇: «乌梁海边区概况(蒙古境内的叶尼塞河流域)», 内河航运与公路管理局, 彼得堡, 1910年版。
126. Его же — Урянхайский край и его обитатели. «Изв. Р. Г. О.», т. 48, П., 1912.
同上: «乌梁海边区及其居民», 载《俄国地理学会通报》, 第48卷, 彼得堡, 1912年版。
127. Рашин-Эддин — История монголов. Изд. Н. Березина, 1858. 拉希德-阿德-丁: «蒙古史», 别列津出版社, 1858年版。
128. Сапожников В. В. — Монгольский Алтай в истоках Иртыша и Кобдо. Путешествие 1905—1909 гг. «Изв. Томского унив.». Томск, 1911.
萨波日尼科夫: «额尔齐斯河和科布多河发源地的蒙古阿尔泰。1905—1909年游记», 载《托木斯克大学通报》, 托木斯克, 1911年版。
129. Сафьянов Г. — Торговля Минусинска с ойротами. «Изв. В. С. О. Р. Г. О.», 1880, т. XI, №. 3—4.
Г. 萨菲亚诺夫: «米努辛斯克同厄鲁特人的贸易», 载《俄国地理学会东西伯利亚分会通报》, 1880年版, 第11卷, 第3—4期。
130. Сафьянов М. Г. — Страна будущего. «Сев. Азия», 1926, №. 5—6.
М. Г. 萨菲亚诺夫: «未来的国家», 载《北亚》, 1926年, 第5—6期。
131. Его же — Страна Танну-Тува. «Торговые известия», 1926, №. 6.
同上: «唐努图瓦国», 载《贸易通报》, 1926年, 第6期。
132. Сафьянов М. Г. — Страна будущего (к вопросу о развитии

добывающе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в Танну-Туvin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е).
М. Г. 萨菲亚诺夫: 《未来的国家 (关于唐努图瓦共和国采矿工业的发展问题)》。

133. Его же — Танну-Тува в годы революции. «Сев. Азия», 1929, №. 4.

同上: 《革命年代中的唐努图瓦》, 载《北亚》, 1929年, 第4期。

134. Его же — Колониаль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торгового капитала в Танну-Туве. «Новый Восток», 1928, №. 23—24.

同上: 《商业资本在唐努图瓦的殖民政策》, 载《新东方》, 1928年, 第23—24期。

135. Сафьянов И. Г. — Хоярхан. Сборник «Альфа». Москва, 1915.
И. Г. 萨菲亚诺夫: 《霍雅尔汗》, 载《阿耳发》论文集, 莫斯科, 1915年版。

136. Его же — Этюды о Сойотии, Газета «Сибирь», Иркутск, 1912, №. 217, 218, 230.

同上: 《索约特研究》, 载《西伯利亚报》, 伊尔库次克, 1912年版, 第217、218、230期。

137. Его же — Прошлое и настоящее сойотского народа. «Сибирский архив», 1915, №. 1.

同上: 《索约特人民的过去与现在》, 载《西伯利亚档案》, 1915年, 第1期。

138. Его же — Статьи в «Минусинском листке», 1915—1916 гг. («Страна чудес», «Путь закрыт», «Еще о стране чудес», «Сказка суровой действительности», «Поэзия сойот», «Великий день»).

同上: 《1915—1916年发表在〈米努辛斯克报〉的文章》(《奇迹之国》、《道路被堵塞了》、《再论奇迹之国》、《严酷现实之童话》、《索约特人的诗歌》、《伟大的日子》)。

139. Снегирев Ф. — Урянхайский рогатый скот. «Сельское хоз. и лесоводство», 1896, №. 5.

斯基基列夫: 《乌梁海的牛羊》, 载《农业与林业》, 1896年, 第5期。

140.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Тува и ее хозяйство (из доклада торгпредства). «Торговля России с Востоком», 1929, №. 1—2.

《当代图瓦及其经济(商务代表处报告)》, 载《俄国与东方的贸易》, 1929

- 年,第1—2期。
141. Соловьев П. — Торговля СССР с Тувой. «Торговля России с Востоком», 1925, июль — сентябрь.
索洛维耶夫:《苏联与图瓦的贸易》,载《俄国与东方的贸易》,1925年,7月—9月。
142. Скобеев М. — Промысловая охота в Урянхайском крае и ее особенности. «Сев. Азия», 1925, №. 5—6.
斯科别耶夫:《乌梁海边区的狩猎业及其特点》,载《北亚》,1925年,第5—6期。
143. Его же — Мараловодство в Усинском пограничном округе и Урянхайском округе. «Сев. Азия», 1925, №. 4.
同上:《乌斯边区和乌梁海边区的马鹿饲养业》,载《北亚》,1925年,第4期。
144. «Современная Тува», орган торгпредства СССР и Тув. нар. республики, 1929, №. 1, Кызыл-Хото.
《苏联与图瓦人民共和国商务代表处机关刊物〈现代图瓦〉》,1929年,第1期,克孜尔出版。
145. Степанов — Енисейская губерния, П., 1835.
斯杰潘诺夫:《叶尼塞省》,彼得堡,1835年版。
146. Список населенных пунктов Енис. губ. и Урянхайск. края по данным Воеросс. с.-х. и позем. переписи 1917 г. и по другим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1916—1919 гг. Енис. губ. стат. бюро. Красноярск, 1921.
《叶尼塞省和乌梁海边区居民点一览表(根据1917年全俄农业与土地普查和叶尼塞省统计局1916—1919年间其他考察资料)》,克拉斯诺亚尔斯克,1921年版。
147. Смирнов Н. Н. — Растительные остатки яруса Урса ср. Улухем. «Тр. СПб. общ. ест.», т. 35, вып. V. П., 1912.
斯米尔诺夫:《乌鲁木齐木河 Урса 阶的植物化石》,载《圣彼得堡自然科学学会著作集》,第35卷,第5分册,彼得堡,1912年版。
148. Семенов П. П. —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о-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т. IV, П., 1873. и т. V, П., 1875.
谢苗诺夫:《俄罗斯帝国地理统计辞典》,第4卷,彼得堡,1873年版;第5卷,彼得堡,1875年版。

149. Гурчанинов А. А., агроном — Отчет по Урянхайскому краю за 1925 г. и 1916 г. (рукопись).
农学家图尔恰尼诺夫: «关于 1925 年和 1916 年乌梁海边区的报告» (手稿)。
150. Торговые обороты СССР с Тувой. «Торговля России с Востоком», 1926, октябрь — декабрь.
«苏联与图瓦的商业周转», 载《俄国与东方贸易》, 1926 年, 10 月—12 月。
151. Труды экспедиции по изучению соболя и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соболяного промысла, II., 1911.
《黑貂与捕貂业考察队著作集》, 彼得堡, 1911 年版。
152. Труды совещания 1906 г. в Иркутске о путях сообщения Сибири. т. II. Материалы. Иркутск, 1908.
«1906 年伊尔库次克西伯利亚交通会议文件», 第 2 集《资料》, 伊尔库次克, 1908 年版。
153. Фишер И. Э. — Сибир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с открытия Сибири до завоевания сей земли русским оружием. П., 1774.
菲舍尔: «西伯利亚史(从被发现到俄国武力占领)», 彼得堡, 1774 年版。
154. Фабрициус М. П. — Саянский край. Краткий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Изв. Р. Г. О.», т. XXXV. П., 1899.
法勃里齐乌斯: «萨彦岭地区地理概况», 载《俄国地理学会通报》, 第 35 卷, 彼得堡, 1899 年版。
155. Шварц Л. — Труды сибир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в 1858 г. «Изв. Р. Г. О.», П., 1884.
什瓦尔茨: «1858 年西伯利亚考察成果», 载《俄国地理学会通报》, 彼得堡, 1884 年版。
156. Шишкин Б. — Очерки Урянхайского края. Томск, 1914.
希什金: «乌梁海边区概况», 托木斯克, 1914 年版。
157. Его же — Материалы к флоре Урянхайской земли. Томск, 1909.
同上: «乌梁海边区植物群资料», 托木斯克, 1909 年版。
158. Шмидт Ю. — Экспедиция в пограничный Саянский район Тувинского ведомства. Иркутск. губ. в 1887 г. «Записки Вост. топ. отд. гл. шт.», XIV, 1889.

- 施米特:《图瓦管辖萨彦边区考察。伊尔库次克省1887年》,载《总参
 谋部东方地形学论丛》,第14卷,1889年版。
159. Шойжелов Н. А. (Нацов) — Тувинская народная республика.
 Материалы и докум. по ист. нац.-рев. движения тув. ското-
 водов, изд. НИАНКП, М. 1930.
 绍伊热洛夫(纳佐夫):《图瓦人民共和国。图瓦人民共和国牧民民族革
 命运动史资料与文献》,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研究会,莫斯科,1930年版。
160. Его же — Западная Монголия. «Новый Восток», 1923, №. 4.
 同上:《西蒙古》,载《新东方》,1923年,第4期。
161. Шостакович С. В. — 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строй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
 правов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Танну-Тувы в прошлом и настоящем. Сб.
 тр. Госуд. ирк. унив. Иркутск, т. XVI, 1929, в. I. С резюме
 на англ. яз. и текстом конституции Тув. нар. респ.
 绍斯塔科维奇:《唐努图瓦过去与现在的政治制度与国际法地位》,载
 《国立伊尔库次克大学论文集》,第16卷,1929年版。в. I. 附有英语摘
 要和图瓦人民共和国宪法全文。
162. Шишмарев—Сведения о дархатах-урянях ведомства Ургин-
 ского хутухты. «Изд. Сиб. отд. Г. О.», т. II., №. 5, 1871.
 希什马廖夫:《库伦呼图克图管辖下的乌梁海达尔哈特》,载《地理学会
 西伯利亚分会通报》,第2卷,第5期,1871年版。
163. Щепетов Ф. Н. — Очерки ветерин.-зоотехн. дела и его зада-
 чи. «Современ. Тува», 1929, №. 1, Кызыл-Хото.
 谢佩托夫:《兽医动物饲养工作概况及其任务》,载《现代图瓦》,1929
 年,第1期,克孜尔版。
164. Его же — 1-я госуд. с.-х. экономия животноводческого на-
 правления. — Там же.
 同上:《畜牧业方面的第一个国家农业管理机关》,出处同上。
165. Юдин В. — Современное соц.-эконом. положение Тувин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Революц. Восток», 1928, №. 3.
 尤金:《图瓦共和国当前社会经济形势》,载《革命的东方》,1928年,第
 3期。
166. Юдин В. —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положение Тувин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Торговля России с Востоком», 1927, №. 7—10.
 尤金:《图瓦共和国的经济形势》,载《俄国与东方的贸易》,1927年,第

7—10 期。

167. Юзефович Т. Ю. — Договоры России с Востоком, П., 1869.
尤泽福维奇:《俄国与东方签订的条约》,彼得堡,1869 年版。
168.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Брокгауз и Ефрон, т. XXX, П., 1901.
《勃罗克高兹和叶夫仑百科全书》,第 30 卷,彼得堡,1901 年版。
169. Ядринцев Н. М. — Сибирские инородцы, их быт и современное положение, П., 1891.
雅德林采夫:《西伯利亚异族人,他们的习俗与当前状况》,彼得堡,1891 年版。
170. Яковлев Е. К. —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бзор инородче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Южного Енисея. Минусинск, 1900.
雅科夫列夫:《南叶尼塞河流域异族居民的民族志学概述》,米努辛斯克,1900 年版。
171. Его же —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заметки о сойотах-урянхайцах. «Изв. Красн. п/о В. Сиб. О. Р. Г. О.», т. I, вып. III, Красноярск, 1902.
同上:《索约特乌梁海人民族志学简论》,载《俄国地理学会东西伯利亚分会克拉斯诺亚尔斯克支会通报》,第 1 卷,第 3 册,克拉斯诺亚尔斯克,1902 年版。
172. Ячевский И. А. — Краткий предварительный отчет о г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части Саян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Изв. В. Сиб. отд. Р. Г. О.», т. XIX, №. 1, Иркутск.
雅切夫斯基:《萨彦岭考察工作地质部分简要初步报告》,载《俄国地理学会东西伯利亚分会通报》,第 19 卷,第 1 期,伊尔库次克版。
173. Киселев С. В. — Разложение рода и феодализм на Енисее. Вып. 65. Гайнк, 1933.
基谢廖夫:《叶尼塞河流域民族的瓦解与封建主义》,第 65 册,国立物质文化史研究院,1933 年版。

二、其他语言著作

1. Ichichatcheff P. — Voyage Scientifique dans l'Altai oriental et les parties adjacentes de la frontière de Chine. Texte, planches et atlas. Paris, 1845.

伊希卡切夫:《在阿尔泰东部和中国边境邻接地带的科学考察》。正文、图版、地图。巴黎,1845年。

2. Schmalhausen I. — Pflanzenpaläontologische Beiträge. 11. Pflanzenreste aus der N W Mongolei. «Bull. Ac. Gc. S. Pet.», 28. 1883, N 4. (Mel. biol. XI).

I. 希马尔豪森:《植物古生物学论文集(11, 蒙古西北部的植物残迹)》。《圣彼得堡 Ac. Gc. 学报》, 28, 1883, No. 4.

3. Voyages de Dmitri Klementz en Mongolie occidentale de 1885 à 1897. «Bull. Soc. Geogr.», Paris, 1899.

《1885年到1897年德米特里·克菜门茨在蒙古东部的考察旅行》,《地理学报》,巴黎,1899年。

4. Douglas Carruthers — Unknown Mongolia. A record of travel and explorations on Russ. — Chinese borderlands. London, 1913, 2.

道格拉斯·卡拉瑟斯:《未经勘探的蒙古》(俄中边界地区的旅行和考察记录),伦敦,1913, 2。

5. Granö G. F. — Beiträge zur Kenntnis der Eiszeit in der nord-westlichen Mongolie und einiger ihrer südsibirischen Grenzgebirge. Helsingfors, 1910 (а также статьи в Meddelonden af Geograf. fö renigen, Finland, VIII, 1907, 1909 и Journal de la Société Finno-orugrienne, XXVI, 1909).

G. F. 格拉纳:《西北蒙古冰河时代和西伯利亚南部一些边境山区的状况论文集》,赫尔辛基,1910(参阅地理学工作者协会刊物的文章,芬兰)。

6. Hansen H.—The Upper yenissei drainage area (Territory of Uriankai). Acta Geographica I, No. 1. Helsingfors, 1925.

H. 汉森:叶尼塞河上游流域(乌梁海地区)。《Acta. Geo. 学报》, I, 第1期,赫尔辛基,1925。

7. Printz H.: 1) De Chlorophyceen des südlichen Sibirien und des Uriankailandes. 2) The vegetation of the Sibirian — Mongolian Frontiers (The Sayansk region) Publ. by Det Kongllige Norske Videnskaberets Selskab. 1916—1921.

H. 普林茨: 1)《西伯利亚南部和乌梁海地区的植被》。2)《西伯利亚——蒙古边境地区的植物(萨彦地区)》,挪威皇家科学学会出版,1916

—1921年。

8. Backlund O. — Om kemiske förändrigar vid mexamorfos. Geol. Fören i Stockholm Förh. Bd 41. Hefts. Stockholm, 1919.
O. 巴克伦:《Mexamorfos 化学变化》,斯德哥尔摩地质学工作者协会,斯德哥尔摩,1919年。
9. Hansen H. Tannu-Ola. — En kort geogr. karaktäristik av grän-sryggeu mellen övre Yenisseis flodom råde och N W Mongoliet, 1921.
H. 汉森:《唐努山——关于叶尼塞河上游地区和蒙古西北部之间边界山梁的地理特点》,1921年。
10. Pehrman G. — Uber ein Nickeleisen aus Iannu-ola (Mongolei) Ace Acad. Abolnsis, Math. et Phis. III Abo. 1923.
G. 贝尔曼:《论唐努山(蒙古)的一块镍铁》。
11. Paguet — Sudsibirien und die Nordwestmongolien, Jena, 1909.
巴古特:《西伯利亚南部和蒙古西北部》,耶拿,1909年。
12. Kleinow G. — Neu Sibirien, Berlin, 1928., S. 40—80.
G. 克莱因纳夫:《新西伯利亚》,柏林,1928年,第40—80页。

人名对照表

Абейдулин 阿贝杜林	Боголепов 鲍戈列波夫
Агван-демичи 阿格旺-杰米奇	Боголюбский 鲍戈柳勃斯基
Адрианов, Е. В. Е. В. 阿德里安诺夫	Болуджайджезан 鲍鲁贾伊杰伊赞
Ажик-Харан 阿吉克-哈兰	Болякевич 鲍利亚克维奇
Ак-хан 阿克汗	Бонгонигулуй 邦戈尼古雷
Ак-хем 阿克赫姆	Брилевич 勃里列维奇
Алтынхан 阿勒坛汗	Брокт 勃罗克
Александр III 亚历山大三世	Бубэй 博贝
Александров 亚历山大罗夫	Бузукчар 布祖克恰尔
Андресвич, В. К. В. К. 安德烈耶维奇	Булгаков 布尔加科夫
Анучин 阿努钦	Бяков 比亚科夫
Аргунов 阿尔古诺夫	Вавилин 瓦维林
Арсеньев, Ю. В. Ю. В. 阿尔谢尼耶夫	Вавилов 瓦维洛夫
Африканов 阿弗里卡诺夫	Валнев 瓦利耶夫
Бакич 巴基奇	Василий 瓦西里
Баклановский 巴克拉诺夫斯基	Васильев 瓦西里耶夫
Баландин 巴兰金	Ватин 瓦京
Баранов 巴拉诺夫	Веселков 维谢尔科夫
Батунасуи 巴图纳松	Ветерников 维捷尔尼科夫
Батуцэнгил 巴图增吉勒	Владиславич 伏拉迪斯拉维奇
Баян-Бадорху 巴扬-巴道尔呼	Галдан-Бошокту-хан 噶尔丹-博硕克图汗
Бейский 贝斯	Глебович 格列鲍维奇
Белокуров 别洛库罗夫	Головацев 戈洛瓦采夫
Белый царь 白沙皇	Гомбо-таджи 棍布台吉
Беннигсен 宾尼格先	Горощенко 戈罗辛科
Березин 别列津	Гранат 格拉纳特
Берлин 柏林	Гречанин, Степан 斯捷潘·格列恰宁
Бобырь, Н. П. Н. П. 鲍贝里	Григорьев 格里戈里耶夫
Богдо-Гэгэн 博格德格根	Грум-Гржимайло 格鲁姆·格尔日麦洛
Богдыхан 博格德汗	

Гумбольдт, Александр 亚历山大·洪
波尔特

Гун-нойон-Баян-Баторху 贡诺颜巴
扬-巴道尔呼

Гэгэн Санджива 桑达格扎布活佛

Денисов 杰尼索夫

Джургадый-кунду 朱尔加迪-昆杜

Дорогостайский 多罗戈斯塔伊斯基

Дубровский 杜勃罗夫斯基

Ермак 叶尔马克

Ермишов 叶尔米洛夫

Ермолаев 叶尔莫拉耶夫

Ефрон 叶夫仑

Злобин 兹洛宾

Зыков 兹科夫

Зюсс (Эдуард) 修斯(爱德华)

Ивакин 伊瓦金

Иваницкий 伊瓦尼茨基

Иванович, Иван 伊凡·伊凡诺维奇

Игнатъев 伊格纳提耶夫

Иннокентий 英诺森

Иоакимф(Бичурин)雅金甫(比丘林)

Ишей 伊谢伊

Кабо 卡鲍

Казаков 卡扎科夫

Казанцев 卡赞采夫

Казачкин 卡扎奇金

Кайский 凯斯基

Калинников 卡林尼科夫

Каррутерс 卡卢泽斯

Кастрен 卡斯特连

Катанов 卡塔诺夫

Киселев 基谢廖夫

Клеменец 克列麦涅茨

Князев 克尼亚泽夫

Козьмин 科兹明

Коковцов 科科夫佐夫

Комаров 科马罗夫

Кон, Ф. Ф. 科恩

Коростовец 科罗斯托维茨

Костин, Ю. В. Ю. В. 科斯克

Котвич 科特维奇

Крылов 克雷洛夫

Крышин 克雷申

Кузнецов 库兹涅佐夫

Кулакин 库拉金

Кушак 库沙克

Латкин 拉特金

Леонов 列昂诺夫

Лессар 列萨尔

Линцетти 林采季

Липовец 利波维茨

Лоуренс 罗连斯

Львов 利沃夫

Маклаков 马克拉科夫

Мартынов, М. Е. 马·叶·马尔蒂诺夫

Маслов 马斯洛夫

Магусевский 马图谢夫斯基

Мачавариани 马恰瓦里阿尼

Медведев 麦德维杰夫

Мигулин 米古林

Микшин 米克申

Миллер 米勒

Минцлов 明茨洛夫

Минцлова 明茨洛娃

Михеев 米赫耶夫

Мозгалевский 莫兹加列夫斯基

Мурзаев 穆尔扎耶夫

Намын 纳门

Нацов 纳佐夫

Нератов 涅拉托夫

Нестеров 涅斯特罗夫

Николай II 尼古拉二世
Никулин 尼库林
Обручев 奥勃鲁切夫
Олгаржевский 奥尔特尔热夫斯基
Осташкин 奥斯塔什金
Островских 奥斯特罗夫斯基赫
Ошурков 奥舒尔科夫

Палибин 帕利宾
Пальмбах 帕利姆巴赫
Пастухов 帕斯图霍夫
Педашенко 佩达申科
Пестерев 佩斯捷列夫
Петухов 佩图霍夫
Пилец 皮列茨
Плоткин 普洛特金
Позднеев, А. А. 波兹德涅耶夫
Покровский 波克罗夫斯基
Полевой 波列伏依
Поликевич 波利克维奇
Попов 波波夫
Порватов 波尔瓦托夫
Потанин, Г. Н. Г. Н. 波塔宁
Потанина 波塔尼娜
Преин 普列英
Простосинский 普罗斯托辛斯基
Пудалов 普达洛夫
Путилов 普季洛夫

Райков, М. М. 莱科夫
Рачковский 拉奇科夫斯基
Риттер 里特尔
Рашид-Эд-дин 拉希德-阿德-丁
Родевич 罗杰维奇
Романов, М. Ф. 米·费·罗曼诺夫
Рубрук 鲁勃鲁克

Садовский 萨多夫斯基
Сазонов 萨佐诺夫

Сайгырчи, П. 波·萨伊格尔奇
Самбоу 萨姆鲍乌
Самойлов 萨莫伊洛夫
Сапожников 萨波日尼科夫
Сарапулов 萨拉普洛夫
Сафьянов, Г. 格·萨菲亚诺夫
Сафьянова 萨菲亚诺娃
Семенов 谢苗诺夫
Семенов-Тянь-Шанский 谢苗诺夫-天山斯基
Серошевский 谢罗舍夫斯基
Скобеев 斯科别耶夫
Смирнов 斯米尔诺夫
Снегирев 斯涅基列夫
Соболев 索波列夫
Соловьев 索洛维耶夫
Спафарий 斯帕法里
Старков, В. 瓦·斯塔尔科夫
Степанов 斯捷潘诺夫
Сулькевич 苏利克维奇
Сухомлинов 苏霍姆利诺夫

Талызин 塔雷津
Тархов 塔尔霍夫
Танфильев 坦菲利耶夫
Тележников 捷列日尼科夫
Томут 陶木特
Трегьяков 特列季亚科夫
Тумен Ульцай 图门·乌列扎伊
Турчанинов 图尔恰尼诺夫
Тюменец, В. 瓦·丘麦涅茨

Унгерн 温甘伦
Унен Цзорику Хан 乌嫩超里克图汗

Фабрициус 法勃里齐乌斯
Федорович, М. 米·费多罗维奇
Фирсов 菲尔索夫
Фишер 菲舍尔
Фунтиков 丰季科夫

Хайдуп 海都布
Хамбу-лама 汗布喇嘛
Хан-хо-хан 汗浩汗
Хойтыкар 惠蒂卡尔
Хубийсайта 呼比赛塔
Хубилханг 呼比勒汗格

Цаган-дир 查干迪尔
Цеген-хан 察罕汗
Церен 策凌
Церерин 采列林
Цзанданчаба 赞丹扎巴
Цорджи-лама 佐尔吉喇嘛

Чакиров 恰基罗夫
Черневич 切尔涅维奇
Черский 切尔斯基
Чжимба 钦巴
Чингис-хан 成吉思汗
Чирков 奇尔科夫
Чихачев 奇哈切夫
Чоросский хан 乔罗斯汗
Чулдум 楚勒杜姆

Шварц 什瓦尔茨
Шепелин 舍佩林
Шипилин 希皮林
Шипкин 希什金
Шинмарев 希什马廖夫
Шмидт 施米特
Шморгонер 什莫尔戈涅尔
Шойжелов 绍伊热洛夫
Шостакович 绍斯塔科维奇
Шумихин 舒米欣

Щекин 谢金
Щепетов 谢佩托夫

Эрдин Эрхе 额尔德尼额尔罕

Юдин 尤金
Юзефович 尤泽福维奇

Ядринцев 雅德林采夫
Яковлев 雅科夫列夫
Ячевский 雅切夫斯基

地名对照表

Абакан, р. 阿巴根河	Безымянный перевал 无名山口
Абаканская караульная линия 阿巴根边防线	Бейский округ 贝斯区
Абаканская степь 阿巴根草原	Белоцарск 别洛查尔斯克城
Аджан-хорум, хр. 阿赞霍鲁姆山脉	Берёзовский пор. 别廖佐夫急滩
Азас, р. 阿拉斯河	Бигре, р. 比格列河
Аксук, р. 阿克苏克河	Бий-хем, р. 别克木河
Ак-товурак 阿克-托武拉克	Ближний Восток 近东
Алаш, р. 阿拉什河	Большой Енисей, р. 大叶尼塞河
Алтай 阿尔泰山	Большой-Пор. 大急滩
Алтай-улянхай 阿尔泰乌梁海	Бом-Хемчик, р. 博木克木奇克河
Амур 阿穆尔河(黑龙江)	Бонгонигулай 邦戈尼古雷
Амурская окраина 阿穆尔边区	Борочичегу 鲍罗奇切图
Амыл, р. 阿梅耳河	Бубэй 博贝
Амыл, г. 阿梅耳山	Буйбинская 贝宾(小路)
Амыльская (или Систи-хемская) группа 阿梅耳(或昔斯提克木)小路	Будук 布卢克
Аравия 阿拉伯半岛	Бунсуй, р. 邦绥河
Аральское море 咸海	Бурято-Монголия 布里亚特蒙古苏维埃社会主义自治共和国
Атамановка 阿塔马诺夫卡	Бурятия 布里亚特
Африканский материк 非洲大陆	Бюрен, р. 比尤连河
Ачинский уезд 阿钦斯克县	
	Верхнекараульский 上卡拉乌利
Баингол, р. 巴音河	Верхний Амыл, р. 上阿梅耳河
Баин-ола 巴音山	Верхний Енисей, р. 上叶尼塞河
Баин-тагны 巴音塔格内	Византия 拜占廷
Балаганский уезд 巴拉干斯克县	Вилан 维兰
Балканы 巴尔干	Владивосток 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
Балтийское море 波罗的海	Владимировка 弗拉基米罗夫卡
Барлык, р. 巴尔雷克河	Волга, р. 伏尔加河
Баянгол 巴彦河	Воронеж 沃罗涅什
Баянкол 巴彦河村	Восточная Сибирь 东西伯利亚
Бегреда, р. 别格列达河	Востонокитайское море 东海

Восточный Саян 东萨彦岭

Габцал 嘎布查尔

Гачальский перевал 嘎恰利斯基山口

Гме-гей 格麦盖山

Григорьевка 格里戈利耶夫卡

Гуй-хуачен (Куку-хото) 归化城 (库
库-浩陶)

Да 达(旗)

Да-вана (Мады и чоуду) 大王旗(马迪
与乔杜)

Дальний Восток 远东

Дархатский хошун 达尔哈特旗

Джакуль 贾库利

Джеба, р. 杰巴河

Джойский пор. 召伊斯克急滩

Джувлу-куль, о. 珠卢湖

Джунгария 准噶尔

Дзангльльгол, р. 赞格雷河

Дурбетский 杜尔伯特(盟)

Дуру-нор 杜鲁湖

Европейская Россия 俄国欧洲部分

Евразийский материк 欧亚大陆

Енисей, р. 叶尼塞河

Енисейск 叶尼塞斯克

Енисейская губ. 叶尼塞省

Енисейская степь 叶尼塞草原

Енисейский край 叶尼塞边区

Забайкалье 外贝加尔

Западная Монголия 西蒙古

Западная Сибирь 西西伯利亚

Западный Саян 西萨彦岭

Засаянский край 南萨彦岭地区

Знаменка 兹纳缅卡

Игин-гол (Селенга), р. 伊金河(色楞
格河)

Ий-Суг, р. 伊苏格河

Илан-чжоу 伊兰州

Или-хем, р. 伊里克木河

Ирбек, р. 伊尔别克河

Ирбитская ярмарка 伊尔比特集市

Иркут, р. 伊尔库特河

Иркутская губ. 伊尔库次克省

Иргыш, р. 额尔齐斯河

Кавказ 高加索

Каден 卡登湖(盐湖)

Казакстан 哈萨克斯坦

Казыр 卡孜尔山

Как (ключик) 卡克泉

Калган 张家口

Карагаш 卡拉加什

Каракол, р. 卡拉河

Каракуль 卡拉湖

Кара-суг 卡拉苏格泉

Кара-Тарсыхан 卡拉塔尔瑟罕山口

Каспийское море 里海

Кача, р. 卡恰河

Кемчигольский хошун 克姆奇戈利
旗(疑为克木奇克族。——译者)

Кемчук, р. 克姆楚克河

Кендирген, р. 肯迪尔根河

Киргизия 吉尔吉斯

Киргиз-нор 吉尔吉斯湖

Кобдо 科布多

Косогол 库苏泊

Красноярск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

Красный яр 红亚尔

Кузнецкий Алатау 库兹涅茨阿拉套
山脉

Куйлу-хем, р. 奎鲁克木河

Куку-хото 归化城

Купле 库普列山口

Курск 库尔斯克

Куртушибинский перевал 库尔图什
宾山口

Кызыл-хем 克孜尔河
Кызыл-хорай 克孜尔-霍拉伊
Кян-чжоу 江州
Кяхта 恰克图

Мажалык 马扎雷克
Мажалык, р. 马扎雷克河
Малый Енисей, р. 小叶尼塞河
Манчжурия 满洲
Марокко 摩洛哥
Межигей, р. 麦日格伊河
Мерв 麦尔夫
Минусино-Енисейская долина 米努
辛斯克-叶尼塞河河谷
Минусинск 米努辛斯克
Монгол-дабан 蒙郭尔山口
Монды 芒得
Муруген 穆伦河
Мустаг-дабан 穆斯塔格山口

Нарын 纳伦河
Нибазы 尼巴兹(旗)
Нижеудинск 下乌丁斯克
Нижний Байнкол 下巴音河
Нерчинск 涅尔琴斯克(尼布楚)
Никольское 尼科利斯科耶
Нойн-куль 诺彦湖

Оби 鄂毕河
Огарка-ола 奥加尔卡山
Оджа, хреб. 奥贾山
Оин 奥音(旗)
Оин-Шиви 奥音-希维
Ойратия 卫拉蒂亚自治州
Ондумский х. 翁都特山
Отоков 奥陶考夫(旗)
Отрываловка 奥特雷瓦洛夫卡
Оттуг-таш, р. 奥图格-塔希河
О-хем, р. 奥克木河
Охотское море 鄂霍次克海

Оюннарский хошун 唐努旗

Пайгара(сумо) 帕伊嘎拉佐
Персия 波斯
Подхлебгинский 波德赫列勃京
Приамурский край 阿穆尔边区
Приенисейский край 叶尼塞流域
Приенисейско-Минусинский край 叶
尼塞流域-米努辛斯克边区
Присянье 萨彦岭

Саган-Шибота 萨干-西包塔山
Сайлюгемский х. 赛留格木山脉
Сайон (сумо) 萨彦佐
Салдам 萨尔达姆
Салжакский хошун 萨拉吉克旗
Самагалтай, р. 萨马加耳太河
Сангылен 三格连山脉
Саратов 萨拉托夫
Саянский х. 萨彦岭
Саяны 萨彦岭
Себи (Себь) 谢比
Северная Манчжурия 北满
Северная Монголия 北蒙古
Северное полярное море 北冰洋
Сенленга, р. 色楞格河
Серлих, р. 谢尔利赫河
Сессерлик, р. 谢谢尔利克河
Синь-Цзянь 新疆
Систи-хем 普斯提克木河
Сой-Брень, р. 绥布伦河
Сойотия 索约蒂亚
Сосновка 索斯诺夫卡
Средняя империя 中华帝国
Средний Восток 中东
Средняя Азия 中亚细亚
Суглуг-бом 苏格鲁格-博穆
Сур-даба 苏尔山口
Сугкуль 苏特湖
Сыстыг-хем 普斯提克木河

Танну-ола 唐努山
Танну-улянхай 唐努乌梁海
Тапса, р. 塔普萨河
Тарбагатай, округ 塔尔巴哈台州
Таргак-шан 塔尔嘎克山
Таргалык, р. 塔尔嘎雷克河
Тарлык 塔尔雷克
Тарралые, р. 塔拉雷耶河
Таскыл 塔斯克儿山
Тастанди-тайга 塔斯坦季泰加山
Темир-суг, р. 帖米尔-苏格河
Темир-Ус, р. 帖米尔-乌斯河
Тенгыс-дабан 腾格斯山口
Теректихем 帖列克提克木河
Терикуль 台里湖
Теринур 台里湖
Тес, р. 特斯河
Тес-Эрзину 特斯-埃尔吉努河
Тобольская губ. 托博尔斯克省
Товурак 托武拉克
Тожа 托锦
Тожа-куль 托锦湖
Тожинский хошун 托锦旗
Толбук (Тожа) 托尔布克(托锦)
Томский губ. 托木斯克省
Томь, р. 托木河
Тора-хем 托拉克木河
Туба, р. 图巴河
Тубинская степь 图巴草原
Тунка 通卡
Туран 图兰
Туран, р. 图兰河
Тургень 图尔根(泉)
Турано-Уюкский 图兰-乌尤克
Туранский поселок 图兰镇
Туркестан 土耳其斯坦
Турция 土耳其
Тускуль 图斯湖
Тус-таг 图斯塔格(盐山)

Узун-караш 乌宗-卡拉希
Узун-караш, р. 乌宗-卡拉希河
Уланком (Улангом) 乌兰固木
Улан-тайга 乌兰泰加山
Улуджавей, р. 乌鲁治贝河
Улухем 乌鲁克木河
Улясутай 乌里雅苏台
Улясутай, р. 乌里雅苏台河
Упса, р. 乌布苏河
Упса, о. 乌布苏湖
Упсанор 乌布苏湖
Урал 乌拉尔
Урга 库伦
Урондор 乌隆多尔
Урянхай 乌梁海
Урянхайский край 乌梁海边区
Ус 乌斯
Ус, р. 乌斯河
Усинск 乌辛斯克
Усинский край 乌斯边区
Усинское село 乌辛斯科耶村
Усть-Усинское 乌斯特-乌辛斯科耶
Ут, р. 乌特河
Утинский пор. 乌京斯克急滩
Утинско-оджинский хреб. 乌京斯克
奥真山脉
Уюк, р. 乌尤克河
Формоза 台湾
Халдын-куль 哈登湖
Хайракан 海拉坎山
Хакасия 哈卡斯自治省
Халха 喀尔喀
Хамар-дабан 哈马尔山口
Хамсыры, р. 哈木萨拉河
Хандагайту 汗达盖图
Хантенгир 罕腾吉尔河
Хан-Ху-Хей 汗呼赫山脉

Хан-тайга 汗泰加山脉
Хасутский 哈苏特(旗)
Ха-хем 哈克木河
Хемчик, р. 克木奇克河
Хемчик-бом 博穆克木奇克河
Хемчик-бом 博穆克木奇克山口
Хемчикский хошун 克木奇克旗
Хлебниково, посел. 赫列勃尼科沃村
Хоральский прииск 霍拉利斯克金矿
Хордыл-сардык 霍尔德勒萨尔德克山
脉
Хундургун 浑杜尔贡山口

Царское село 皇村
Цецерагака 采采拉嘎卡
Цынак 齐纳克山

Чагаттай-куль 达各台湖
Чадан 查丹
Чакуль 恰库利镇
Ча-куль, р. 恰库利河
Ча-куль-Шагонарский хошун 恰库
利沙戈纳尔旗
Чаламалых 恰拉马雷赫山
Чанчик 昌奇克山
Чапчал 察布产山口
Чапчальский хреб. 察布产山脉
Чернягов 契尔尼哥夫
Чингенкат 钦根卡特
Чиргаккы 奇尔嘎克河
Чита 赤塔

Чихирисугай 奇希里苏台
Чулышман, р. 楚立什曼河

Шабин-дабаг 沙宾达巴哈
Шагонар, р. 沙戈纳尔河
Шагонарыг 沙戈纳尔
Шалык 沙雷克(旗)
Шерг, р. 谢尔格河
Шершеневка 舍尔舍涅夫卡
Шишикит, р. 希希基特河
Шола, р. 绍拉河
Шормук, р. 绍尔木克河

Щепетов 谢佩托夫
Щербаковка 谢尔巴科夫卡

Эжим 埃吉姆
Элегес 埃列格斯
Элегес 埃列格斯山
Элегес, р. 埃列格斯河
Элегеста, р. 埃列格斯塔河
Эрбек, р. 埃尔别克河
Эргик-Таргак-тайга 额尔吉克-塔尔嘎
克-泰加
Эргик-шан 额尔吉克山
Эрзин-гола, р. 埃尔津戈拉河

Южная Монголия 南蒙古

Яблонный хреб. 雅布洛诺夫山脉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图瓦历史与经济概述

作者=(苏) .卡鲍

页数=273

SS号=10115024

DX号=

出版日期=1976年04月第1版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序言

第一章 图瓦的自然条件

第二章 图瓦封建制度的基本特征

第三章 商业高利贷资本向图瓦的渗透

第四章 俄罗斯“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及其在图瓦的殖民活动

第五章 占领乌梁海

第六章 革命前的图瓦与沙皇俄国间的经济关系(关于不等价交换问题)

参考书目

人名对照表

地名对照表

附录页